

学校的理想装备

电子图书·学校专集

校园网上的最佳资源

处世智慧

 **eBOOK**
内参资料 非精英

序 说

一

人的生命只有一次。每个人都是在对人生茫然无知的时候，就匆匆踏上人生的旅途。等到对人生有所感悟时，人生的某一阶段已经过去，从中获得的人生经验只能供今后参考，走过的路不可能再走一遍了。至于对人生全面透彻的了解，需要有人生的全部阅历，只能走完人生的全程后才能做到；但那时生命之光已经熄灭，对人生的比较全面的经验只能供后人参考，自己不可能重新开始人生的旅程了。

但人生是宝贵的。宋高濂说：“天地有万古，此身难再得。人生只百年，此日最易过。幸生其间者，不可不知有生之乐，亦不可不怀虚生之忧。”（《座右编》）要想把握住匆匆而过的人生岁月，处理好人生的各种问题，我们不能不利用前人的生经验和智慧。

人类个体的生命诚然有限，人类绵延不绝的群体生命却是无限的。如果我们善于利用人类群体的人生经验，就可以减少人生旅途中的失误，避免“虚生之忧”，创造出有价值、有意义的人生。

鲁迅曾感叹：“中国是古国，历史长了，花样也多，情形复杂，做人也特别难。”不过，古国、历史长也有好处，留给我们的人生经验也特别多。

中国文化以人为中心，重视人生的意义与价值，重视处理人际关系的礼义道德。早在先秦诸子的著作中，就已经提出了系统深刻的人生哲学，教导人们如何为人处世的道理。

二

先秦诸子中影响最大的是儒家的思想。儒学创始者孔子提出以“仁”为核心的生处世哲学。所谓“仁”，就是“爱人”（见《论语·颜渊》），“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论语·雍也》）。从仁出发，孔子又提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论语·卫灵公》）的“忠恕”之道。孔子把“仁”看得比生命还重要，要求“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论语·卫灵公》）

孔子认为：“礼”与“仁”相辅相成。每一个阶层的人都有做人的标准，君要像君，臣要像臣，父要像父，子要像子，都要合乎“礼”的要求。孔子既主张维护上下尊卑的等级秩序，又提倡宽厚爱人，维护人的独立人格和意志。这是他思想中的内在矛盾。

面对不同的人生环境，孔子提出这样的人生目标和人生设计：“笃信好学，守死善道。危邦不入，乱邦不居。天下有道则见（现），无道则隐。邦有道，贫且贱焉，耻也；邦无道，富且贵焉，耻也。”（《论语·泰伯》）

孔子的人生价值观是以道义为基本取向，而不偏重物质功利。他说：“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贫与贱是人之所恶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论语·里仁》）“饭疏食饮水，曲肱而枕之，乐亦在其中矣。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论语·述而》）

孔子的言行记录在《论语》中。近人朱自清称这本书“不但显示一个伟大的人格——孔子，并且让读者学习许多学问、作人的节目。”（《经典常

谈》)《论语》也可视为一部人生格言录。书中许多睿智的话,如“温故而知新”,“人无远虑,必有近忧”,“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欲速,则不达;见小利,则大事不成”,等等,至今仍然活在人们的口头语言和书面语言中。

在相传为曾子所作的《大学》中,系统地阐述了孔子的人生处世哲学。《大学》开宗明义他说:

“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

“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致和在格物。”

以修身为基础,达到圣贤的至善境界,达到治国、平天下的至善境界。为了实现这种目的,就要“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不间断地日新其德,努力做一个新人,这就是《大学》倡导的做人的目标和修养方法。

战国时代的孟子把孔子的忠恕之道政治化,提出“仁政”思想,要求统治者关心人民疾苦,制民之产“必使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畜妻子,乐岁终身饱,凶年免于死亡。”(《孟子·梁惠王上》)他提出的“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孟子·尽心下》)的民本思想,在中国古代思想界,可以说是振聋发聩的空谷足音。

孟子提出著名的“性善论”,认为“人无有不善,水无有不下”,“恻隐之心,人皆有之;羞恶之心,人皆有之;恭敬之心,人皆有之;是非之心,人皆有之。”(《孟子·告子上》)这是四种善端,可以发展成为仁、义、礼、智四种德性。由于外部环境的影响,产生人类恶的行为。因此要修养身性,发扬本心的善性,同时要“求其放心”,找回丧失的良心。

孟子提出儒家的理想人格,即扩充美好的心灵,培养至大至刚的浩然之气,做“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孟子·滕文公下》)的大丈夫。这种理想人格成为无数中国人的人生价值标准,成为中华民族精神的象征。许多志士仁人正是在这种人格精神的鼓舞下,成就了惊天地、泣鬼神的伟业。

孟子也以仁义为做人的最高标准。他认为仁义不仅是君子和小人的分界,也是人与禽兽的分界。他说:“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孟子·告子上》)孟子说的“舍身取义”和孔子说的“杀身成仁”是完全一致的,都是把仁义看得比生命还重要。

在人生设计方面,孟子的思想也是和孔子一脉相承的。他主张“穷不失义,达不离道”,“得志,泽加于民,不得志,修身见于世。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孟子·尽心上》)许多中国人按照这种人生设计实现修己、济世的人生理想。

战国末期的儒家代表人物荀子,在政治上吸收法家的思想,提出“隆礼重法”、“爱民用贤”的政治主张;在人生哲学方面,与孟子针锋相对地提出“性恶论”,强调学习教育的重要性。他说:“人之性恶,其善者,伪也。”(《荀子·性恶》)只有通过后天的学习和教化,才能“积善成德,而神明自得,圣心备焉”(《荀子·劝学》),才能获得高度的智慧,达到圣人的精神境界。

荀子倡导的人格修养以礼义、忠信、仁爱为主。他说:“体恭敬而心忠信,术礼义而情爱人……劳苦之事,则争先;饶乐之事,则能让”;“君子

贫穷而志广，富贵而体恭，安燕而血气不惰，劳勩而容貌不枯；怒不过夺，喜不过予。”（《荀子·修身》）这仍然不失儒家仁厚平和的谦谦君子之风；但“怒不过夺，喜不过予”，则表现了荀子重法的思想特色。

荀子推崇的理想人格是：“虽穷困、冻馁，必不以邪道为贫；无置锥之地，而明于持社稷之大义”，“势在人上，则王公之材也；在人下，则社稷之臣、国君之宝也。”（《荀子·儒效》）这样的人即使是隐居在穷间漏屋，也没有人不尊敬他的。这和孔孟提倡的理想人格是一致的。

三

和儒家思想互相对立、又互为补充的是老子创造的道家思想。老子用对立发展的眼光审视世界，看到一切事物都包含互相对立、互相依存的正反两个方面，正反两个方面的运动促使事物的转化。唯有永恒存在、无影无形、作用无穷的“道”，才是宇宙万物生成衍化的总根源。“道”流贯于宇宙、社会、人生。“道”是无为的，只是自然地运行。社会、人生也应该遵循“道”的原则，“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老子二十五章》）因此，在政治上老子主张弃圣绝智“，清静无为，回到远古的社会中去。在为人处世的问题上，他也主张贵柔守雌，虚静无为。老子说：

“持而盈之，不如其已。揣而锐之，不可长保。

金玉满堂，莫之能守。富贵而骄，自遗其咎。

功名遂，身退，天之道。”（《老子》第九章）

老子认为：持功自满，还不如没有功德好；显露锋芒，难保久常；金玉满堂，难以藏守，富贵而骄，自取祸咎；只有功成身退，才合乎自然的道理。

老子提出柔弱居下、与世无争、不为天下先的处世原则。他说：“是以圣人后其身而身先，外其身而身存。”（《老子》第七章）“夫唯不争，故天下莫能与之争。”（《老子》第二十二章）圣人谦让退后，毫不自私，反而能够得到人们的拥护，实现自己的愿望。圣人与世无争，反而没有人能争得过他。

老子揭示了强弱转化的规律，认为“坚强者，死之徒；柔弱者，生之徒”，“强大处下，柔弱处上。”（《老子》第七十六章）在老子看来，坚强的东西意味着死亡，柔弱的东西充满了生机。从发展的观点看问题，优势往往在柔弱的一方，不在强大的一方。在这种认识基础上，老子提出“以柔克刚”的处世策略。

老子倡导“无私无我”的理想人格，认为世人过份看重名利，因而“宠辱皆惊”，得宠和受辱都担惊受怕；世人过份看重自己，因而“贵大患若身”，重视大患像重视自身一样。如果无私，还有什么可以担惊害怕的呢！如果忘掉自身，还会有什么祸患呢！老子认为，只有以贵自身、爱自身的态度去为天下的人，才可以把天下托付给他。（以上见《老子》第十三章）

老子还教导人们要有自知之明。他说：“知人者智，自知者明；胜人者有力，自胜者强。”（《老子》第三十三章），这些思想是非常深刻而又有积极意义的。

老子的人生处世哲学有明显的消极倾向。例如：他强调回避矛盾，不为不争，不为天下先，未免显得软弱油滑，不能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和创造力。他看到事物向对立面转化的趋势，但没有看到转化必备的条件，因而把柔弱

胜刚强看得简单化、绝对化了。不过他那充满朴素辩证法的深邃智慧，他那洞烛人生玄机的卓越思想，对我们有深刻的启示。他提出的“柔胜刚，弱胜强”，“大直若曲，大巧若拙，大辩若纳”，“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等等，已化为我们民族的智慧，对中国人的心理和行为方式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庄子继承和发展了老子的学说。他把老子的朴素辩证法发展为相对主义，把老子贵静守雌、处世不争的人生理想，发展为逍遥游世的人生理想。

庄子认为：“方生方死，方死方生；方可方不可，方不可方可；因是因非，因非因是，”是亦彼也，彼亦是也，彼亦一是非，此亦一是非。（《庄子·齐物论》）贵贱、荣辱、是非以至生死的差别都是暂时的，只有作为宇宙本源的“道”才是永恒的。

庄子强调人的个体价值，回归到人的自然本性；反对以仁义、名辨和耳目之欲去伤害人的自然本性。他说：“夫孝悌仁义，忠信贞廉，此皆自勉以役其德（束缚自己的天性）者也”（《庄子·天运》），不值得称赞；“以富为是者，不能让禄；以显为是者，不能让名。亲权者，不能与人柄，操之则栗，舍之则悲，而一无所鉴，以窥其所不休者，是天之戮民也。”（同上）在庄子看来，那些盯着富贵名位孜孜以求的人，就像受自然的刑戮一样。

因此，庄子主张忘掉生死年岁，忘掉是非仁义，不受外物的支配，“无誉无皆，一龙一蛇，与时俱化，而无肯专为；一上一下，以和为量，浮游乎万物之祖；物物而不物于物，则胡可得而累耶？”（《庄子·山木》）庄子主张用这种态度摆脱物质世界的种种纷扰，争取精神世界的绝对自由。

怎样达到这种境界，庄子提出“心斋”与“坐忘”的修炼方法。

“惟道集虚，虚者，心斋也。”（《庄子·人间世》）“心斋”就是空明的心境。忘掉自己，混灭意识的作用，保持空明的心境，自然能与“道”契合。

“堕肢体，黜聪明，离形去知，同于大道，此谓坐忘。”（《庄子·大宗师》）忘掉自己的身体，抛弃自己的聪明，同“大道”融合在一起，这样就不会去掉自己的私好，随自然的变化而变化了。

然而物质世界的矛盾是客观存在的，精神追求常和现实相冲突。因此，庄子的逍遥游世又有“安时处顺”的一面，即“知其不可奈何而安之若命”，“外化而内不化”。外在的形体顺应万事万物，生而不喜，死而不辞，更不计较贵贱、贫富、是非、祸福；内心则不为世俗所累，保持超然物外的态度，以实现人格价值和精神自由。

庄子的人生哲学也有消极软弱的倾向。面对现实生活中的矛盾，不是积极参与，促使它向有利的方向转化，而是消极逃避，想回到自我的狭小天地中，寻求精神上的绝对自由。他的万物齐一的思想，反映出浓厚的相对主义色彩。但是，庄子愤世嫉俗，对“窃钩者诛，窃国者侯”的不合理现实，表示出强烈的不满。他不随流俗，鄙弃功名利禄，为后世独立不羁、洁身自好的知识分子树立了楷模。他从超越有限的更高层次去探讨人生问题，提出了奇特深刻的人生哲理。这种人生哲理又以奇丽生动的文字表现，对中国人的理想、人生追求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儒道两家建立了各具特色的人生哲学体系。秦汉之后，两派互相排斥，互相吸收，此消彼长。西汉初期，从宫廷到民间，普遍推崇“黄老之术”，把道家的超凡脱俗和儒家的积极用世结合起来，应物变化，应俗施事，因时而动，无为而无不为。武帝时，尊儒兴学，注重教化，突出了儒学的主导地位。魏晋南北朝时期，儒学衰微，玄学独盛。玄学家们热衷于谈玄析理，专注于理论思辩；认为“无”是万物的根本，也是人格的理想。他们好谈老庄，排斥世务，崇尚放达，轻蔑礼法，寄情于山水之中，追求玄远清虚的生活情趣，在无为中达到与“道”合一。因此，玄学家们实际上是把道家的人生处世哲学，应用于魏晋六朝时期苦难深重的人生实践之中。

当儒道两家互相排斥、互相吸收的时候，又出现了另一种人生理论。这就是佛教的人生哲学。佛教是外来文化。东汉时传入中国。佛教提出“因果报应，生死轮回”之说。认为“身譬如五谷之根叶，魂神如五谷之种实。根叶生必当死，种实总有终亡。”（《理惑论》）人的肉身必死，但灵魂不灭。灵魂在地狱中轮回以后，随度受形，来生的命运由今世善恶决定。“此生行善，来生受报”，“此生作恶，来生受殃”。佛教要人们安于现世的命运，积极行善，追求来世的幸福；以虚幻的来世的承诺，安抚生活在苦难中的人们，给他们一种精神解脱的方法。

但佛教和中国本土文化相冲突。时人认为佛出自西域，是外国之神，中国人不应该祠奉。认为佛教使人有毁伤之疾，凳头之苦，不孝之逆，绝种之罪，亡生之体，是“不礼之教”。佛教还与君道冲突，有“不敬王者”之罪。为了适应新的文化环境，佛教便以佛理归玄言，迎合儒家的伦理道德观念，实现佛教的本土化。至隋唐时期，本土化的任务已经完成，形成了天台宗、华严宗、禅宗、净土宗等中国化的佛教，其中禅宗是中国佛学最重要的流派。

传说禅宗是由印度菩提达摩于南北朝时期创立，传至五祖弘忍后分为南宗慧能和北宗神秀两派。北宗主渐悟，须敛心入定，长期修炼，才能逐渐领会，逐渐贯通。南宗主顿悟，不立文字，教外别传，直指人心，见性成佛。开始时，北宗显赫，南宗沉废。后来由于慧能弟子神会等人的大力提倡，慧能定为禅宗六祖，南宗遂成为正统。

由慧能的弟子整理惠能言行而成的《坛经》，反映了禅宗的基本思想。

《坛经》认为：“世人性本自净，万法在自性”，人人所有的真常之心是世界的本源，众生皆有佛性，人人可以成性；佛法即是自性，“若识自性，一悟乃至佛地”；不必经历累生累世修炼，一旦开悟，当即成佛；“百念为宗，无相为体，无住为本”，心不受外界影响，心中不留外物表象，于诸法上无所留滞，虽处尘世，无滞无碍，来去自由。

南派禅宗不读经，不礼佛，不禁欲，不坐禅，免除了长期修炼之苦，只要顿悟，便可成佛，禅所追求的是一种摆脱尘世的种种羁绊、超然物外、大彻大悟、行止在我、清纯闲适的生活情趣。这很适合一些士人的口味，他们纷纷到禅理禅趣中去寻求精神寄托。至两宋时期，禅悦之风，遍及士林。

五

儒家、道家和佛教为人们提供了三种人生哲学和处世原则。

儒家提供的是积极入世的人生哲学和处世原则，以修身为本，完成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功业。人人都有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责任，人类个

体的人生价值实现于人类的群体价值之中，实现于伦理道德的精神追求之中。因此，儒家重道义，重气节，重社会责任感和历史责任感。但治国平天下的理想不是任何人、任何时候都可以实现的，理想常与现实相矛盾。于是儒家又强调安贫乐道，涵养德性，通过塑造高尚完美的人格来实现人生价值。这样，儒家的人生哲学和处世原则，便可以适用于处于不同环境、不同条件的个人，获得广泛的应用价值。

道家提倡的是避世出世的人生哲学和处世原则。道家主张虚静无为，顺应自然，游心于物外，不为物态俗情所累。道家重人的个体价值和人格独立，追求个人精神自由的逍遥境界。魏晋玄学家发挥“逍遥”的思想，认为逍遥有不同的境界。常人安于性分、适性自得即是逍遥。只有至人能够无我、无为、无名，与天道一体，才能达到“绝对自由”的逍遥境界。不过这种逍遥游世的人生理想是庄子的发挥。若从孔子和老子的思想来比较儒道两家的人生哲学，我们可以看到：儒家的人生哲学偏重于理想，从成圣成贤的要求出发，提出人生的目标和要求。因此，有的学者认为，儒家的人生哲学是士大夫的，不是老百姓的。道家的人生哲学是直面现实的，特别是老子所说的，都是饱经人生沧桑之后得出结论，在人生实践中有实用的功效。老子不是讲人生应该如何，而是讲人生的实况，告诉你应该如何应对处理。老子不仅讲处理人生问题的原则，还讲处理的策略和技巧，由于以上原因，在中国人的人生实践中便出现儒道并用、儒道互补的局面。

禅宗提倡的是在世而出世的人生哲学和处世原则。佛教本来要人们脱离红尘，寄希望于来世。但现世苦难，来世茫茫；为了解决这个矛盾，禅宗提出出世不离入世的主张。慧能说：“佛法在世间，不离世间觉。离世觅菩提，恰如求兔角。”佛法就在世间，离开世间去寻找智慧，就像寻找世上没有兔角一样。于是禅师们便出世而不离世；人生的价值取向不在来世，而在现世；也不仅仅是寻求个人解脱，还要普渡众生。禅师们追求的人生理想是：看透人生的真相，斩断一切欲念是非的烦扰，保持清静空明的心灵，遇事随缘应对，不为过去而懊丧，不为未来而忧虑，享受自由适意的人生。禅宗的人生理论沟通了儒家的入世精神和道家的出世精神，为立志进取、又屡遭挫折的人们提供一种心理调节的方法。近人朱光潜总结弘二法师（李叔同）的人生经验时，曾经提出“以出世精神做入世事业”的人生理想。出世精神使人超脱豁达，宠辱不惊；做入世事业，使人有所作为，有益于社会和人民，不致虚度年华，浪费生命。这样，禅学便作为儒学的有益补充，进一步世俗化、生活化了。

唐代三位大诗人可以代表儒、道、佛的人生哲学和处世态度。杜甫把个人生命投入社会群体中，处贫困之境不失济世之志，对国家和人民怀着深沉博大的爱，代表了儒家的积极入世精神。李白如天马行空，傲岸不驯，蔑视权贵，张扬个性，追求理想，渗透了道家重个体人格价值的精神。王维熟谙禅学，晚年隐居辋川蓝田别墅，以清静淡泊为生活情趣，

常在清静淡泊中化入天人契合的境界，反映出禅者自然适意的人生态度。

六

中国古代的人生处世哲学大体上是以儒家为主体，以道家、禅宗为补充，

形成完备深邃而又多姿多彩的理论体系。两宋以后，文人学者们又进一步做精致化和普及的工作。程朱理学就是以儒家为主体，吸收佛道思想建构而成。理学家们讲究“三纲”（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五常”（仁、义、礼、智、信），注重个人的修养和气节。理学是精致的哲学体系，也是实用的人生哲学。朱熹把《论语》、《孟子》和《礼记》中的《大学》、《中庸》两篇合编在一起，称为《四书》，加上“章句”、注释，作为人们修养心性、处理事务、治理国家的基本教科书。

明清之际，各种矛盾交织并发。一些失意文人退处山林之下，又不能忘情世道人心而思有所作为，于是汇编名贤的良言雅训，采集民间的嘉言谚语，或自述人生感悟。其内容涉及修己之道、人伦关系、治家方法、从政方略、处世准则等各个方面。这些著作不是抽象的思辩和深奥的玄谈，而是实际的人生体验和处世技巧，语言精炼，内容简朴，适合各阶层人士的口味。可以举出三种代表性的著作：

吕坤的《呻吟语》：吕坤是明万历二年（公元1574年）进士，当过刑部左、右侍郎，万历二十五年托病辞官。他居官勤于政事，居家努力学问，敢于直谏，严于律己。《呻吟语》是他根据观察社会、人生所得写成的，有多种版本印行，以清道光年间的栗氏刻本（栗毓美等编刻）收集较为完备。清人阮承信曾根据陈宏谋的节录本再加精选，编为上下两卷。上卷分天地、圣贤、修身、处人、应事、居官等22目，下卷是补遗，内容以儒家思想为主。阮承信在本书序言中说：《呻吟语》皆从圣贤书中推衍而出，大有补于世道人心，士大夫立身行事，事君临民，皆当以此为法。这本书明清时期颇有影响。

洪应明的《菜根谭》：洪应明字自诚，号还初道人，生平事迹不详。可能是一位隐居田园的文人，一生坎坷而能坚持高尚的情操。书以“菜根”命名，是根据宋人汪信民的名言：“咬得菜根断，则百事可破（又作“人能咬得菜根，则百事可做）”。菜根是果叶的根本，那末本书也是作者讲为人处世的根本道理。书的内容涉及为人处世的各个方面，采用对仗工稳的楹联诗赋句式，富于哲理性，读时琅琅上口，读后耐人寻味。其思想以禅理为主，兼收儒家道家思想，体现了一种把积极入世与超俗出世融合为一的人生处世哲学。这本书除在国内流传外，还传入日本。日本现代企业家把《孙子兵法》、《三国演义》用于企业竞争，把《菜根谭》用于处理人际关系。本世纪八十年代后期，蔡志忠的漫画菜根谭在国内大量印行，使这本书为广大现代读者所熟知了。

《增广贤文》：这是一本大众化的人生处世哲学，在民间家喻户晓，影响非常深远。这本书初名《昔时贤文》，又名《古今贤文》，后来经过修订改称《增广昔时贤文》，简称《增广贤文》。编者已不可考。《增文贤文》将圣贤名言（如“满招损，谦受益”、“居安思危”）和民间格言（如“忙中多错事，酒后吐真言”；“衙门八字开，有理无钱莫进来”）雅俗并集，以俗为主，精炼深刻，通俗易懂，蕴涵着丰富的人生智慧，铸就了中国老百姓的传统道德和处世原则。

此外，明末清初出现的论为人处世的读物还有陆绍珩的《醉古堂剑扫》，屠隆的《娑罗馆清言》，关从先的《小窗清记》，宋纁为《古今药石》，敖英的《慎言集训》，陈继儒的《安得长者言》，魏裔介的《琼琚佩语》，申涵煜的《省心短语》，申涵光的《荆园小语》，等等。这些书多数是汇辑前

人的言论和故事，因此作者们做的是人生处世哲学的普及工作。

七

上面说的就是前人留给我们的人生经验和处世智慧。我们应该怎样对待这些经验和智慧呢？

时代发展了。我国已从封建社会发展到社会主义社会，从封闭保守、节奏缓慢的农业国家向开放的、快节奏的现代工业化国家转化。我们所处的时代、所担负的历史任务、所面临的广泛多样的人际关系，都和古人迥然不同。我们自然应该有新的世界观、人生观，新的处世原则和方法。但新的理论、观念、原则、方法不是凭空产生的，需要以前人留下的思想资料作为出发点，作为参考和借鉴；然后结合新的实践经验进行创造，才能建构起新的理论体系和原则方法。毛泽东说：“中国的长期封建社会中，创造了灿烂的古代文化。清理古代文化的发展过程，剔除其封建性的糟粕，吸收其民主性的精华，是发展民族新文化提高民族自信心的必要条件”。（《新民主主义论》）毛泽东提出的对待古代文化的方针，自然也适用古人关于人生问题的经验和智慧。根据现实的生活条件和需要，对古人的人生理论中有价值的部分可以采取以下的原则和处理方法：

大力弘扬至今仍有现实意义的优秀传统。例如：儒家重视对道德价值的追求，把人的德性作为人之所以成为人而区别于禽兽的基本标志。儒家倡导利世济民、以天下为己任的社会责任感，赞颂“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的创造进取精神，推崇“杀身成仁，舍生取义”的崇高气节和“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浩然正气。凡此种种，至今都有很强的现实意义，需要大力提倡和发扬。现在，我们要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加速经济发展，提高人民的物质生活水平。但经济建设要和思想道德建设同步。如果经济发展了，道德滑坡了，不仅会阻碍社会的协调发展，也会导致人的自身价值的失落。因此古人重视道德价值的思想今天并未过时。另外，我国仍然是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国家，内有困难，外有压力。处在发达国家的经济优势下，有些人容易产生民族自我迷失的心理，一切都是外国的好。因此强调振兴国家、民族的历史责任感，保持国格、人格的尊严，崇尚气节操守和道义责任。也是非常重要而又有很强现实意义的。

纠正古人人生理论的偏颇方面，作出全面合理的新结论。例如，先秦诸子在人生价值观方面，偏重精神价值，但并不否定物质功利，而他们的继承者们却加以片面发展，以至走到君子不言利、空谈心性的地步。今天，我们应该把“义”与“利”统一起来。义即天下人民之公利，公利自然不应反对；个人的私利在合理的范围内也应该保护，但不能损人利己，不能以私利害公利。从人生价值来说，物质利益并不是我们追求的全部目标，我们还有更高的精神道德追求。只有这样，才能提升人的价值，获得心灵的平静、充实与欢乐。因此我们既要重视物质功利，又要以义导利，以义制利，使物质和精神得到和谐协调的发展。又如，儒家重群体价值，道家重个人价值，我们新的人生价值观则应该把群体价值和个体价值统一起来。人类的个体生活于人类的群体之中，不能奉行个人至上主义；另外，也不能否定个体价值，如果个体价值不能实现，群体价值也会落空。

对古人观点、主张和道德范畴赋予新的内容，作出新的解释。古人的许多人生理论和智慧都可以用这种办法来合理吸收。例如：古人重视怎样做人，我们今天立身处世，首先也要解决怎样做人的问题。我们和古人做人的标准和要求不同。古人要做圣贤，做忠臣，做烈女。我们要做“四有新人”，做有益于社会、有益于人民的人。古人强调律己修身，我们也要进行品德修养和自我约束。古人律己修身的方法体现一种向内探求的主体自觉性，我们的修身方法则应该把向内探求的主体自觉性和参加社会实践统一起来，在改造客观世界的过程中改造自己的主观世界。古人讲仁义道德，我们也要讲仁义道德，但其内涵已发生变化。古人讲的仁义道德自然是为了维护封建社会的政治经济制度和人伦关系。我们的仁义道德则是为了维护社会主义制度，协调当代社会中的人际关系和利益关系。我们应该讲以集体主义为原则的社会主义道德，讲职业道德和社会公德。“四有新人”的标准中“有道德”是一项基本内容。非道德倾向和社会的文明进步是背道而驰的。

根据不同的人生境遇和活动目标选用古人的人生智慧。人生是永不停息的生命流动，有扩充，有收敛；有坦途，有荆棘；有成功，有失败；有欢乐，有痛苦；有朝阳岁月，有黄昏岁月，故需以不同的态度和方法处理不同的人生课题。通全明变，灵活圆融；以退为进，以柔克刚；居安思危，防患未然；以自强不息的精神开拓创造，又以淡泊超脱的心情去化解矛盾和痛苦……古人留下的这类处世智慧，对我们都有参考借鉴的作用。

处世问题是人生哲学的一个层面，是将人生哲学应用于人生实践活动，其核心问题是人生价值、人生意义问题。处世问题涉及作为人类个体的人生主体，涉及主体如何对待他人，如何对待外在的人生环境和人生实践中遇到的各种问题。因此本书分为修己、待人、处世三部分介绍古人的经验和智慧，并根据现实生活的条件和需要，对古人的处世智慧加以分析、生发，以沟通古人智慧和现实生活的联系。

人生智慧需要亲自感悟，难以言传。因此笔者不奢望本书向读者提供现成的人生答案，只能为读者观照人生、探索人生提供一些可资参考的材料和意见；对人生真谛的了解，在于读者自己的思考、领悟之中。

总序 历史出智慧

一 未来是智能竞争的社会

智慧是最有魅力而又古老的人生追求，这是人类认识事物和运用知识、经验解决问题的能力，一切从先天获得、后天培养的悟性、技能和才思都可归结为智慧之果。人类正是恃有这种智慧和対智慧的不懈追求，才成为大千世界的万物之灵。

当人们在冥冥之中膜拜上帝、真主和释迦牟尼时，智慧就作为信仰，溶进了宗教意识。穆斯林祈求真主的祷词是：“赐我智慧”、“增我知识”；佛教供奉的“佛”，译成汉语，就是觉者，即智慧者，佛法无边又称“智慧海”；基督教的《圣经》赞美“智慧是理智尽善尽美的形态”，“人有智慧，就有生命的泉源”。虽然他们追求的是超脱的智慧，天惠的知识，具有理性和神性的双重色彩，然而无可置疑的是，不论在西方还是东方、当社会文明还处在早期发展时，人们就把智慧视为生命的一体，须臾不可分离。

出世者是如此，搏击生活潮头的先哲、学者和思想家们，对智慧的追求更是气概飞扬。古希腊的一代哲人明确宣告：“我们是爱智者！”以求知和爱智构筑博大精深的哲学体系，使后世受惠无穷。中国尤多智慧的大家，孔子的一部《论语》享誉古今中外，“半部《论语》治天下”是中国垂之久远的古训。享名近代的《人权宣言》，摘弓《论语》的吉光片羽“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至今仍在法国宪法中熠熠生辉。日本的企业之父涩泽荣一，自称根据《论语》之宗旨，使企业经营获得了成功。美国总统里根 1982 年在旧金山纪念孔子诞辰的纪念会上演说：“孔子的学说世代相传，揭示全世界人类丰富的为人处世的原则。”一部 2000 多年前的旧典，何以倾倒千秋万代？正是因为它历经大浪淘沙，荡涤历史的尘埃，积淀下来的是有关人类生存、发展、处世、为人的智慧，这是经过岁月磨砺，放之四海皆有启迪的人生哲理，所以它能超越时代和国界，为不同肤色的人们享用不竭。

古人对智慧这种超凡入圣的力量，早有精邃的见解。荀子指出：“知有所合谓之智”（《正名》），用现代意义来阐释就是说，知识是智慧的基础，智慧是知识的综合和升华。智慧和知识相依相生，智者，知也，这是中外先辈的共识。现代实验科学的鼻祖、英国哲学家培根提出“知识就是力量”的著名论断；殊不知中国的王充早在 1000 多年前的《论衡》一书中就提出“知为力”的卓见。难能可贵的是我们的祖先尤其重视群体智慧的力量。淮南子说：“众智之所为，无不成也。”（《主术训》）裴松之说：“智周则万理自宾。”（《上（三国志注）表》）曹操说：“吾任天下之智力，以道御之，无所不可。”（《三国志·魏志·武帝纪》）只要富集众人之智就能所向披靡，无所不成，这是对智慧何等热情的讴歌！

如果说在前工业社会，文化知识被少数人垄断，对智慧的认识还局限在文化人的范围，到大众传媒迅速发展的现代社会，知识就是力量的信念已经走出精英阶层，成为人民群众的共识，智慧的价值得到充分的估价，最能体现这种认识的，是“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概括和总结。科学技术本是人类利用自然、改造自然的智慧结晶，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提出，把人的智力活动作为推动生产发展、社会进步的第一动力，标示着人们从祈求救世主的恩赐，转向对人类自身的崇拜，这是人类认识自己，提高自己，进而

完善自己的一大飞跃。与此相媲美的，是未来社会的竞争是人才竞争的观念，愈来愈深入人心。当前世界上发达国家都非常重视人才的作用，提出“人才资本论”，因为资金的运转，资源的开发，都离不开人的运作。在生产发展过程中，体力和智力劳动的结合，人的才能越来越起着主导作用，资金和资源犹有尽时，人的才能却生生不息，用之不竭，所以人才是比货币资本、自然资源更为宝贵的财富。人才是以智力和技能加以评判的，技能又是智力成就的表现。人才资本实际上是智力资本，人才竞争又是智能竞争。

智能寄寓人的脑力活动。人脑是智能的载体、世界的表达、物质运动的最高形式。在当今人类面临一系列科学问题的挑战中，最吸引人心的就是脑科学的研究，只有在这个领域才能实现生命科学与物理科学的高度统一，所以自然科学将以脑科学的智能研究成为巅峰之作。在现代人文科学中，一切与增长智能有关的学科，如思维科学、语言学、心理学、教育学等都成为前沿学科，不断以最新成果造就人才，最大限度地调动人的智慧潜力，这是未来社会智能竞争的最大特色。

二 智慧大成之学

中国人的智慧超群是举世公认的。

且不说儒家文化主导东半球古代文化的发展，实际上是华人智慧辐射的过程，即以西方来客而言，13世纪的马可·波罗、16世纪的利玛窦，一踏上中华大地，就醉心中国文明，非常虔诚地把中国文化介绍到欧洲。18世纪西方最负盛名的启蒙思想家高度赞叹中国文化的成就。伏尔泰称赞中国人“在所有的人中是最有理性的人”。莱布尼茨说：“如果由哲人担任裁判的话，那么一定会把金苹果奖给中国人。”19世纪入侵中国的英法联军统帅瓦德西不得不承认，中国人“含有无限蓬勃的生气”，“无论欧、美、日本各国皆无此脑力与兵力，可以统治天下生灵的四分之一”。20世纪汉学大师李约瑟以毕生精力研究中国文化，撰写鸿篇巨著《中国科技与文明》，声称：“全世界都认识到他们身受到来自中国的恩惠。”科技最发达的美国拥有第一流的科学技术专家13万人，其中华人就有3万；在著名的阿波罗登月工程中，1/3的高级工程师是华人；全世界12大银行家，华人即有5位；全球船舶吨位总数的大半为海外华人所有。所以，毋用列举古代中国的发明创造有多少世界之最，即以这些驰名国际的思想家、学界泰斗、传教士和纠纠武夫，以及现代人才调查的统计，无一不说明，中国人的聪明为世人交口称赞，已成为不争的事实。

历数世界上历史悠久的国家，埃及、巴比伦、印度、玛雅，都以极其灿烂的文化今后人叹为观止，然而他们古老的文化传统又无一例外地在历史发展的长河中转移、中断、殒落、消失，留下千古不解之谜。唯有中华文化历经战乱颠沛，历朝兴亡，绵延不绝，处处有史可考证，非有高智能的民族，不足以创造这世界上唯一没有中断文化传统的文明古国，这样聪慧的人民和历历可考的历史，为我们留下举世无双的智慧宝藏，所以中国不仅是人口大国，也是智慧蕴藏最富有的大国。

史学是智慧储集的宝库。人是历史的创造者，也是历史的传承者。有了人才开始有历史，自然界虽也有历史，但这是由人来认识的，没有人，那只

是一个无知无识的存在。人，不仅发现自然史，更是社会史的主体。历史典籍中的笔录、叙事、记言、述理，归根到底是记人，不论是叱咤风云的英雄，聪明灵秀的文士，鬼斧神工的巧匠还是狡诈猥琐的奸邪，都是作为社会性的人在历史舞台上活动，留下他们的斑斑足迹。可以说，人类在生产斗争、阶级斗争和科学实验中积累的全部行程和经验都是历史知识。不问哪门学问，只要它在一定的时间中演进，就要留下它的发展轨迹从而进入历史的视野，所以史学荟萃了人类一切智慧的言行和功业。马克思、恩格斯指出：“我们仅仅知道一门唯一的科学，即历史科学。”美国历史学家乔治·伊格斯在《西方史学的历史演变》中说：“与人类有关的一切科学——语言学、经济学、法学、文学与神学——都是历史的科学。总之，既然历史是以过去这个广漠无限的领域为对象的，它就存在于一切人文科学中，因此，它就是一个综合者，一个管弦乐队的指挥。”这样一个包罗万象，总括万殊，具有高度综合性的基础性的学科，毫无疑问，是培育新知最肥美的沃土。

中国史学在传统文化中，是一门最辉煌的学问，天文地理、文治武功、士农工商、文采风流、生产经济、物性事理、风俗民情、修养节操，无不罗列其间。它不仅以浩如烟海的资料为外国史学家所称羨，更以巨细无遗的求实精神独步世界史坛。古希腊的《荷马史诗》、巴比伦的《创世纪诗》，都以耳传口授的神话传说作为史学的发端，可信而不可全信。中国却以实实在在的文字记录开其史学的滥觞。成书在 3000 多年前的《尚书·盘庚篇》是商代帝王的文书，以可靠的信史为文明古国所罕见。甲骨文上的“史”是执掌文书的官员的像形字，这表明从有文字以来就有历史的笔录者，记下的是确凿存在的人和事，后人从地下发掘的文物，往往能证实当初的文字记载，很少有所推翻。中华民族就以这样清明的头脑和笃实的态度认识自身的历程，在史学中表现出理性的早启，这是民族智慧成熟的表现。

中国古史少有浪漫的神话，并没有减弱它的神圣性，相反，却以至高的地位为其他学问所不及。被尊为至圣先师的孔子，是以历史教育家的角色登上文化舞台的，他写的一部鲁国历史《春秋》，在汉代被奉为法典，冒犯一句语录，有可能祸灭三族，援引一句古史，又可能化险为夷。在中国学术上争议 2000 年之久的今文经学派和古文经学派之争，究其源端，就是用古代蝌蚪文（篆书）和用汉代隶书抄写古史《尚书》不同版本之争。近代思想家郑观应说：“千古纲常名教，经济学问，皆从经史而出，悉数义所生。”（《郑观应集》）史学著作被尊为经典，受到人们的崇拜，左右中国学术思想的发展，这是中国独特的文化现象，有一种说法认为，中国传统文化是以经学为代表。这无异说是以史学为代表，早在清代章学诚就以“六经皆史”说揭示了这一实质。所以古代中国在各种学问中唯史学最发达，史学在世界各国中唯中国最发达。如果说古希腊以哲学为智慧的最高成就的话，那么说中国史学是古代智慧集大成之学，不为过誉之词。

三 把历史智慧变成你自己的智慧

历代治国安邦的能人志士，都重视运用历史经验创功立业。早在 3000 年前的西周王朝，执政的周公就教诲年幼的成王以史为鉴。汉高祖刘邦夺得天下，即命陆贾考察秦亡的教训，阐述古今成败之由。北魏孝明帝时，高昌

国王曲嘉遣使奉表，向北魏求借经史典籍。十六国时期后赵的创建者石勒目不识丁，但他深知学史的重要，还在戎马生涯中就令左右读《汉书》。宋太祖出身行伍，读书不多，但他强调宰相必须是读书人，以通晓史书优选辅政人才。唐太宗酷爱读史，声称史书使他“神交千祀之外”，“临睨九皇之表”，“大矣哉！盖史籍之为用也”。

读史的有借鉴意识，写史的也有为当代服务的明确目的，“述往事，思来者”，“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是中国史学之父司马迁的绝句。司马光自述《资治通鉴》的宗旨是：“鉴前世之兴衰，考古今之得失。”“究探治乱之迹，上助圣明之鉴。”王夫之《读通鉴论》认为：“所贵乎史者，述往以为来者师也。”顾炎武在家书中说：“史书之作，鉴往所以训今。”博览史书，诸如：“彰往知来”、“引古筹今”、“多识前古，贻鉴将来”、“总括前踪，贻诲来世”、“明镜所以照形，古事所以知今”、“欲知大道，必先为史”等等治史的名言，不绝于目。所以毛泽东的“古为今用”既是他的史观，也是对中国史学传统最精炼的概括。历史属于过去的时态，历史记述的是发生在往日的事件和言行，又对现实和未来有所启示和引导，从而又超越过去的时限，溶进现实生活的浩浩长流。我们的先人就是在不断总结前人的经验教训中改造自己，改造社会，所以中国历史不是一潭死水，它一代一代被人们重新认识，不断深化和更新历史见解，源源不断地滋养中国人的聪明才智。

中国史书并不仅仅是帝王将相的教科书，它也是哺育民族智慧的教本。古代启蒙读物《蒙求》、《三字经》、《幼学琼林》、《龙文鞭影》都用三言或四言的韵文，把历朝盛衰的典故编成琅琅上口的顺口溜，给少年粗知历史的教育。青年学予以熟读史书为进取，饱学之士以博古通今为荣耀，打仗兼通史书的雅称儒将，读经诵史又能经商的美名儒商，舞文弄墨的重视的是史笔，咏诗的也以咏史为上乘之作，有人为此评价杜甫说：“若是杜陵无史笔，姓名恐亦少人知”，没有史笔，就没有杜甫的盛名，这是对史笔的至高评价。至于流传在戏曲、评话、小说、歌谣中的历史故事和掌故，那真是家弦户诵，代代相传。

如果把这近乎全民性的爱好读史、听史的风气看成仅仅是统治者的提倡和力行，那就小看了历史对民族生存发展所起的向心作用。基辛格在《重建的世界》中说：“一个国家的成就只有通过共同的历史意识来鉴定。这是各个国家仅有的经验，也是它们唯一能从自身学习到的经验。历史就是国家的回忆。”所以爱国主义本身就是历史情感的表现。重视历史是民族的自信，这方面只要看一看建国只有 200 多年的美国，是怎样珍贵先行者的遗迹，就可知道不论是小农社会还是工业社会，只要有民族的生聚就有共同的回忆，历史是不可替代的使万众凝聚的同心圆、众志成城的火种。在民族危难之秋，同舟共济的历史情感会燃起救亡图存的火炬；在建设现代化中，历史面临的挑战和机遇，又会成为民族振兴的契机。周恩来总理说得好：“历史对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就像记忆对于个人一样，一个人丧失了记忆，就会成为白痴，一个民族如果忘记了历史，就会成为一个愚昧的民族。而一个愚昧的民族是不可能建设社会主义的。”

诚然，20 世纪的中国与古代不可同日而语。当今世界科学技术的发展，促使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型，工业社会向信息时代迈进，新学科层出不穷，知识更新加速。往日单一综合的史学不断分化，失去了往日的荣耀；琳琅满

目的信息，拓宽了人们的眼界，对史书的兴趣也有所淡化。显学地位的失落，说明日新月异的现代社会，需要丰富多样的知识，满足多姿多彩的人生追求。史学走出独尊，成为众多学科中的一员，是科学事业在前进的表现。

但是，史学又是一门认识世界的科学，它运用特定的社会记忆（历史资料），把已经消失的人物和社会现象再现出来，发掘潜藏在历史表象背后的因果联系。人类社会本是层层相因的有机整体，某些带有实质性的东西不可避免地反复出现，所以古今异时，环境有别的社会现象又具有某种共性，使今人有所参照。所谓鉴往知来，就是通过对往事的鉴别、筛选、提炼、概括，抽象成规律性的认识，以帮助人们深刻地理解现实，科学地预测未来，这是人类更高层次的认知活动，诚如英国哲学家罗素在《西方的智慧》一书中说：“智慧在于掌握万物所共有的基本准则。”历史智慧就是对规律的洞察和把握，这要比简单的以古喻今、以史为鉴更胜一筹。所以一些国家或企业的领导班子往往有熟悉历史的智囊人物参与战略研究，使决策具有驾驭势态的历史威力。

历史智慧对个人来说是进行创造性活动必须具有的思维训练。聪明睿智的特点就在于，只需要看到或听到一点，就能长远的考虑和更多的理解，这种能力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是来自历史知识培育的历史感。任何社会现象都是历史发展的产物，又具有进退、延伸、变异的连续性，被我们耳闻目睹，所感所知的，只是发展长河中的一段。历史感不仅要求把具体问题放在具体的环境中去分析，还向人们提供从长远、宏观的视角对这一段事态的发展进行全面、系统、整体的考察，从而见微知著，高瞻远瞩，立足方寸，远思千里，见人之所未见，有所突破和前进。恩格斯高度评价“黑格尔的思维方式不同于所有其他哲学家的地方，就是他的思维方式有巨大的历史感作基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13卷，531页）。马克思学说正是奠基于深厚的历史感，构建理论大厦，确立新纪元的里程碑。“不畏浮云遮望眼，只缘身在最高层。”王安石这首《登飞来峰》的诗句，就是对历史感风度最好的写照。

历史智慧也是民族文化素质和精神境界。中国历史与伦理道德水乳交融，古人以立德、立言、立功为人生理想，史书尤以立德为先，德高才能望重，身为平民的爱国志士、孝子烈女都能在青史留名。历史智慧往往也是伦理智慧，以史教为内容，进行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教育，普及到市井小民，纲常名教造成民族心理的重负，当今已不足取，社会主义精神文明需要继续清除封建糟粕，以促进人的现代化。但是道德又具有可资继承的超越性，那种蕴藏在历史智慧中的乐观进取的人生追求，务实求真的理性态度，舍我其谁的献身精神，以及种种宽容仁厚、公正廉明、急公好义、刚正不阿的美德嘉行，古今推崇，有口皆碑。凡是具有这些盛德佳誉的清官、良相、能人、巧匠、贩夫、农妇又几乎都是德才兼备的历史人物。人们也是按照智者也是贤人来神化自己的崇拜者。诸葛亮、包青天他们料事如神的智慧，洞察秋毫的眼力，公正无私的品节，典型地表现了历史智慧与道德精神的完美统一。充溢史书的大量人物不是神而是人，以实实在在的智慧言行体现道德崇尚，这是中华民族内在传统的精神力量。神游在这样的智慧氛围中，益智增德，如沐春风，所以历史智慧可以陶冶情操净化心灵，达到真善美的境界。

先人们那些超越常人的见解，出奇制胜的创造，机敏应对的蹈略，解颐醒世的良言，闪烁智慧之光，朗照历史的穹宇，采撷这火种，烛照在案头，千古之智就会奔涌在眼前，源源不断地激活你的思绪和才情。

为了荟萃群星的光华，我们编辑出版了“中华智慧集粹丛书”，收入《资政智慧》、《思辨智慧》、《制胜智慧》、《经商智慧》、《富国智慧》、《养生智慧》、《人生智慧》、《处世智慧》8本著作，作为1992年全国获奖图书“中华文化集粹丛书”的姐妹篇奉献给读者。

这套丛书对历史智慧的大海来说，不能说是最全的，但却优选了最称职的作者，选择了人生最关切的主题，从不同角度，用不同的风格娓娓道出那些动人心弦的历代俊杰的睿智风采。

禅宗的《坛经》说：“一灯能除千年暗，一智能灭万年愚。”把历史智慧变成你自己的智慧，那就在我们心中升起了不灭的长明灯。

刘志琴

处世智慧

修己篇

修身为处世之本

为人处世，首先是如何为人，如何提高自身的品德和素质。从个人来说，自身的品德和素质关系到能否立足于社会，应付自如地处理各种人生问题，实现人生的理想和价值。从社会来说，每个人的品德和素质，关系到世运的治乱，国家民族的兴衰。

中国古代思想家对个人的道德修养给予特别的关注，把它作为政治学说和人生理论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他们提出“修身”这一命题，并发挥了系统的见解。

孔子提出“修己以敬”，“修己以安人”，“修己以安百姓。”（《论语·宪问》）把“修己”看作关系到他人和社会的大事，要求人们用恭敬谦逊的态度对待一切事物，使自己的言行合乎原则和社会规范，以达到“安人”和“安百姓”的目的。

老子把“德”与“修”联系起来。他说：“修之于身，其德乃真；修之于家，其德乃余；修之于乡，其德乃长；修之于国，其德乃丰；修之于天下，其德乃普。”（《老子》第五十四章）

墨家的著作中专列《修身》篇，认为只有坚持不懈地注意自身修养的人，才能称为圣人。

《周易》中说：“谦谦君子，卑以自牧”，只有以谦恭的态度修养自己，才能成为有道德的君子。

孟子和荀子虽然有“性善”、“性恶”的不同观点，但他们都强调修身的重要。孟子说：“君子必自反也。”（《孟子·离娄下》）荀子说：“君子博学而日参省乎己，则知明而行无过矣。”（《荀子·劝学》）。孟子说的“自反”和荀子说的“参省乎己（自省）”都是指通过自察反省来修养德性。不过孟子的修身是扩充固有的德性，荀子的修身是改变固有的恶性。这就是“养心”与“化性”的区别。

儒家的“修身”学说在《大学》中有系统的发挥。《大学》开篇就讲了学习修养的目的、宗旨：明明德、亲民和止于至善，即发扬固有的德性，革除旧的思想习气，达到至善的境界。《大学》又讲了学习修养的步骤和方法：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要达到学习修养的目的，就要按照这样的步骤和方法一步一步去做。然后《大学》接着写道：

“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诚，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自天子以至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其本乱，而未治者否矣。”

这是一套完备的修身理论，也是一套完备的政治理论。按照这种理论，修身是立身处世的根本，也是治国、平天下的根本。从天子到老百姓，都要抓住这个根本。要像汤之《盘铭》所说的：“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不间断地革除旧的和习气，日新其德，努力做一个新人。这样，就可以达到道德高尚的圣贤境界，同时也可以实现治国、平天下的政治理想。这是古人对人生经验的系统总结。此后中国的修身理论就是以儒家思想为主线发展演变的。

儒家讲的修身以道德修养为主，通过自我修养培养高尚的道德品质。修身的过程也是道德完善的过程。孔子说：“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

艺。”（《论语·述而》）“道”和“德”是首要的。内心的道德品质是行为的依据。有德行的人才能根据“仁”的要求行事，合乎社会的行为规范。深明道义还是只知道追求财利，这是分别君子和小人的标准。

孔子还提出全面的修养方法，包括学习、自省、实践等各个方面，并留下了许多发人深省的格言警句。例如：“敏而好学，不耻下问”（《论语·公冶长》）；“见贤思齐焉，见不贤而内自省也”（《论语·述而》）；“三人行，必有我师焉，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论语·述而》）；“君子欲纳于言而敏于行”（《论语·里仁》）；等等。

孔子的“自省”修养方法并不排斥学习历史文献和社会实践经验。《论语》中记载：孔子是以“文、行、忠、信”教育学生的。这里说的“文”当是指三代的文化典籍，“行”就是人生的实践经验。

《中庸》对学习、修养的原则和方法也有具体的论述。《中庸》中说：“修身以道，修道以仁。”这就是说：修身要立足于道，修道要立足于仁。《中庸》以君臣、父子、夫妇、朋友关系的处理原则为天下之达道（普遍的伦常道理）；以智、仁、勇为天下之达德；以“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为修身的原则和方法。这种原则、方法是把学习、询问、思考、分辨、实行结合在一起的。《中庸》还强调修身要坚持不懈，“人一能之，己百之。人十能之，己千之。”如果能这样做，愚笨的人也会变得聪明，柔弱的人也会变得坚强。

修身是终生努力的过程。孔子曾自述这方面的体会。他说：“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论语·为政》）孔子从少年时代立志学习，到能随心所欲的做事而不逾越礼的准则，已是垂垂老矣。可见修身需要循序渐进，终生坚持不懈。

古人的修身理论给我们多方面的启示。历史的发展，社会的进步，以提高个人素质为先导。一个工厂企业，一个工作部门，工作能否做出成绩，事业能否兴旺发达，取决于每个成员的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一个国家、民族能否兴旺发达，取决于每个国民的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人的思想、知识和能力不是先天固有的，而是后天形成的。提高人的素质要靠教育，教育要和人们自觉地学习修养相结合。如果每个人都自觉地从好的方面学习，朝好的方面去做，集体就进步了，社会就进步了，国家就进步了。人们常说：振兴国家，教育为本。似乎还可以加一句话：振兴国家、修身为本。教育是外在的影响，修身是内在的要求，两者“相辅相成，并行不悖。”

我们生活的现代社会是充满竞争的社会。竞争的法则是优者胜，劣者汰。个人素质高的在竞争中处于优势，个人素质低的在竞争中处于劣势。一个人要想立足于社会，也要以修身为本，自觉地进行思想品德的修养和知识能力的修养，不断地提高自己，完善自己。

在现实生活中，人人都有理想和追求，毫无理想追求、浑浑噩噩过日子的人总是少数；但不重视修身的却大有人在。结果理想追求和自己的思想、知识、能力相矛盾，难免在现实生活中碰壁，被社会淘汰。许多人怀才不遇，愤世嫉俗，可能是社会埋没了他；也可能并非真正有德有才，而是放松了自己的修养和要求，志大而才疏，或者幼稚脆弱，对生活中的矛盾和挫折，缺乏适应能力、承受能力和临机处置的能力。这说明处于现代竞争社会，仍然要以修身为本，全面提高自身的素质。

当然，修身要适应时代要求注入新的内容。今天我们的道德修养以培养社会主义新道德为目标，同时发扬我们民族的优秀道德传统。除道德修养之外，还需注意现代科学知识的修养，职业技能的修养，以及心理素质、创造能力、思维方式的修养，等等。较之古人，修养的内容和要求都扩大了，提高了。

修身与修养是同一内容的不同表述。古人讲“修”就是修身，“养”就是养心、养性，养心、养性就是修身的内容。古人讲修身偏重于品德方面。今天的修身已将修养的范围扩大到人的素质、能力的各个方面，有政治修养、理论修养、道德修养、文化修养、艺术修养……这样，“修养”已成为使用频率很高的一个词。修养的涵义已演变成提高人的品质、能力所进行的学习、涵养、锻炼活动，以及经过学习修养人们在品质、能力方面所达到的水平。

刘少奇曾著《论共产党员的修养》，后来受到错误批判。由此造成人们对“修养”的误解。认为“修养”是“闭门思过”，脱离社会实践。儒家“内省”、“自察”的修养方法，后来的确被理学家们从唯心主义方面片面地发展了，空谈心性，不关心经世济民的学问。但“内省”“自察”有合理的方面，即学习修养的主动性和自觉性。自觉地发扬好的东西，克服不好的东西，以提高自己的思想道德水平，这仍然是值得我们继承和发扬的。自觉地学习修养和参加社会实践并不矛盾。我们需要投身社会实践，同时也需要自觉地学习修养。没有这种自觉性，既使身在社会现实之中，也会无所收获，两手空空。

现代人重视发展个性，这是否和修身相矛盾呢？实际情况并不是这样。修身的目标固然包括社会的共同理想和道德，遵守社会的行为规范，但修身并不否定个性。修身的目的是塑造现代人的健全人格，并不是把每个人铸成一种模式。修身不是扼杀个性，而是解放个性。如果不注意自觉地学习修养，人们潜在的品质和能力就不可得到发挥。科学家、艺术家、运动员获得独特的成就，都是和自觉、刻苦的修养锻炼分不开的。

修身和发挥创造性有矛盾吗？不会有矛盾。今天我们讲修身，不是要人们畏首畏尾，谨小慎微。我们要把培养独立思考的能力、开拓创新的能力，作为修身的一项重要内容和要求。我们修身的目标，不仅是培养有高尚道德的人，还要培养独立、健全的人格和自由、全面发展的个性。因此修身并不是束缚创造性，而是要发挥创造性。

简言之，今天说的修身，是每个社会成员自觉地学习修养，充实自己，提高自己，完善自己，这是我们立身处世的根本。

修身的目标和境界

古人修身的目的，是要使自己成为有德性的人，达到理想人格的境界。

儒家的理想人格是“仁人”和“圣人”。照孔子的解释，亡者爱人，能爱人的人便可称为“仁人”；至于“圣人”的标准要更高一些，不仅要爱人，还要“博施于民而能济众。”（《论语·雍也》）孔子不轻易称一个人为“仁人”或“圣人”。弟子们称孔子为圣人，孔子说：圣人我不敢当，只不过是学不厌、教不倦罢了。弟子们解释说：学不厌是智，教不倦是仁，既仁且智，就可以称为圣人了。（以上见《论语·述而》和《孟子·公孙丑上》）

可见儒家的理想人格是把“仁”和“智”、修德和济众结合在一起的。一方面要培养德性，达到高尚的道德境界；另一方面要做学问，增长才干，造就经邦治世的本领和业绩。对仁人的要求是推己及人，自己想树立好的品德，也帮助别人树立好的品德，自己想达到的也帮助别人达到。儒家把个人和社会、自己和他，人联系在一起，既要成就个人的人格，又要以天下为己任。

当然，由于环境的影响，在立己和立人两个方面不可能都做得很好。孔子曾举出三个“仁人”的典型，就是殷朝的微子、箕子和比干。微子是殷纣王的哥哥，纣王淫暴，他屡谏不听，只好逃到民间隐藏起来。箕子是纣王的叔父，他屡谏，纣王不听，便佯狂为奴。比干也是纣王的叔父，他谏纣王三月不去，被纣王剖心而死。在殷朝灭亡的时候，纣王暴虐无道，他们三人所处的社会环境并不理想，他们的性格遭遇各不相同，但他们都保持了自己的德性，达到理想人格的境界，因此孔子称他们为“仁人”。他们在历史上也作为理想人格的典型受到人们的尊敬。殷商灭亡后，周武王封箕子于朝鲜，周公封微子于宋，以承殷祀。

孟子讲“圣人”时，提出圣人的四种类型，孟子说：“伯夷，圣之清者也。伊尹，圣之任者也，柳下惠，圣之和者也。孔子，圣之时者也。”（《孟子·万章》）伯夷“目不视恶色，耳不听恶声，非其君不事，非其民不使。治则进，乱则退。”当纣王无道的时候，他洁身自好，隐居在北海边上，等待天下太平，因此孟子说他是圣人中清高的人。伊尹是“治亦进，乱亦进”，天下的老百姓中有一个男人或妇女没有受到尧舜的恩泽，就像他自己被推到水沟里一样，因此孟子说他是圣人中自愿承担天下重任的人。柳下惠“不羞污君，不辞小官”。被遗弃没有怨言，身处困境也不担忧，因此孟子说他是圣人中灵活随和的人。孔子“可以处则处，可以仕则仕。”能做官就做官，能隐居就隐居，因此孟子说他是圣人中能顺应时势、相机行事的人，是前三种圣人品格的综合，是集大成者。因此孟子认为他是最高的圣人。

孔子说的“仁人”和孟子说的“圣人”，都是儒家推崇的理想人格，他们的不同类型代表不同的处世态度。箕子和伯夷是一类，洁身自好，不与世俗同流合污。比干和伊尹是一类，积极进取，勇于负责。微子和柳下惠是一类，既不像比干、伊尹那样积极进取，也不像箕子、伯夷那样消极逃避以洁身自好。但这三种人都达到了理想人格的境界。儒家认为：按“仁德”和“济众”的双重要求，伊尹、比干最符合“仁人”、“圣人”的要求，但另外两类人也不能否定。孔子则兼备三种人的品格，所以尊他为“大圣”、“至圣”。

老子也以“圣人”为理想人格。但老子说的“圣人”和儒家说的“圣人”不同，儒家讲仁、智，讲匡济天下。老子心目中的圣人是善于依道行事的人，

即虚静无为，“处无为之事，行不言之教。万物作焉而不辞，生而不有，为而不恃，功成而不居。”（《老子》第二章）老子认为：圣人是依照“道”的法则，以无为的态度处理事情，用不言的方法教化民众。任万物兴起不加影响，生养、作育万物不据为己有，不自恃己能，成就了功业也不居功夸耀。又据《老子》第十五章对“有道”的人的描述，老子心目中的“圣人”是审慎恭谨、淳厚质朴、心胸开阔、融和可亲、沉静恬淡、飘逸无系的人。

庄子谈理想人格时，提出比“圣人”更高的“至人”、“真人”、“神人”。《庄子·逍遥游》中说：“至人无己，神人无功，圣人无名。”

在《庄子·天地》篇中，苑风问什么是“神人”，书中回答说：“上神乘光，与形灭亡，是谓照旷。致命尽情，天地乐而万物销亡，万物复情，此之谓混冥。”庄子认为，“神人乘日月光辉，无形无迹；与天地同乐无一丝牵挂，混同自然。

什么叫“真人”？“真人”不知悦生，不知恶死，无拘无束的来，无拘无束地去。（见《庄子·大宗师》）。什么叫至人？《庄子·齐物论》中说：“至人神矣，大泽焚而不能热，河汉沍而不能寒”，“死生无变于己，而况利害之端乎！”可见“至人”和“真人”都是超越生死和利害得生的。

庄子说的“真人”、“至人”、“神人”是一种虚拟的、遗世独立的理想人格。这种理想人格鼓舞人们在任何社会环境中，保持个人的独立人格的精神自由；但完全脱离社会现实，回避个人应负的社会责任，则是它的主观片面性和消极倾向。

儒家、道家标举的理想人格，对中国人的生追求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成为中华传统文化的一部分。今天我们仍然可以从中获得有益的启示。

我们生活在世纪之交的新时代，生活在改革开放、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时代。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推进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实现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全面转型，是时代赋予我们的伟大任务。国家和社会的现代化，要求人的现代化。换言之，要求塑造现代中国人的理想人格。我们修身，应该以全面提高人的素质、塑造和谐健全的人格为目标。

人的素质包括生理素质、心理素质、思想道德素质、科学文化素质等方面。生理素质（身体素质）是人的素质的物质基础，是“载知识之本而寓道之舍”（毛泽东：《体育之研究》），科学文化和思想道德素质是人的素质的基本内容，它们以心理素质为发展的基础，又反映心理素质的状况，促进心理素质的发展，如智力和科学文化素质的关系，情感、意志和思想道德素质的关系都是这样。

人的素质的综合反映便是人的人格。健全和谐的人格是建立在人的素质全面提高的基础之上的。现代中国人应该怎样提高自己的素质、塑造健全和谐的人格呢？根据邓小平培养“四有”新人的要求，应该在理想、道德、文化、纪律方面达到完善的境界。

理想是思想素质的基本内容。对某种理论学说的信念，对某种事业的追求，是人生观、价值观的具体表现。没有理想追求，只知饱食暖衣，则近于禽兽，谈不上健全的人格了。今天，我们应该提倡和树立的理想，是振兴中华，建立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强国。这是我们的共同理想。此外还要根据每个人的生存环境、职业分工和爱好特长，提出具体的奋斗目标，把远大理想落到实处。

有健全、高尚人格的人应该是有道德的人。古人称人格为人品，可见道

德和人格的关系是非常密切的。今天的中国人应具有高尚的道德品质。这种道德品质以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为核心，包括职业道德、社会公德和民族的传统美德在内。

知识是人类宝贵的精神营养，可以转化为觉悟、转化为能力，可以改变人的气质、性格和品格。知识和人格的关系也是非常密切的。现代社会是科学文化高度发展的社会，人们需要掌握现代科学技术和文化知识，需要培养学习、运用、创造新知识的能力。

纪律是道德的要求，有道德的人自然会自觉地遵守纪律。现代社会人类交往越来越频繁；由于通讯、交通手段现代化，生产、交换社会化、国际化，人类交往的范围从一个地区扩展到全国以至全世界。这样，每个社会成员都要有合作、参与的意识 and 遵纪守法的自觉性。这既是维护他人和社会利益的需要，也是维护个人主体人格的需要。

如上所述，和古代相比，我们需要塑造的健全人格不仅是内容方面的革故鼎新、而且人格的内涵也扩大了。我们塑造健全的人格，应该着眼于人的综合素质的提高。这样，个人才能立足于社会，社会才能依靠个人素质的提高而得到发展。

尽管如此，现代中国人的健全人格不会完全脱离中国文化的传统。古人崇高的人格精神会被赋予新的内容、而活在现代中国人健全高尚的人格中。

健全高尚的人格或理想人格，是人生修养的目标。由于每个人所处的社会条件不同，人生的机遇不同，性格和秉赋也不同，人格塑造的实现上必然具有层次性和多样性。儒家以尧舜为楷模，以圣贤为修养的最高境界，但不是每个人都能有尧舜的德行和事功，都能达到圣贤的境界。这就是孔子说的：“可与共学，未可与适道；可与适道，未可与立；可与立，未可与权。”（《论语·子罕》）但是，我们只要朝着目标一步步努力去做，总会有所成就的。

国学家钱穆曾说：“今天我们要来提倡中国文化，莫如各自努力先学做人，做一个中国人——一个理想的中国人。”（《中国文化与中国人》）。今天，我们修身，塑造健全理想的人格，也应该从学习做人开始。做一个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人，做“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有道德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毛泽东《纪念白求恩》）这样的人格理想，处在任何环境和条件下的人都是可以追求的。职位高的人可以追求，职位低的人可以追求，普通的老百姓也可以追求。一个人只要有高尚的品德，就是一个具有人格尊严、人格价值的人。他即使没有显赫的名位和功业，他的人格精神仍然会受到世人的景仰，对社会产生积极深远的影响。雷锋是一个普通战士，但雷锋精神代表了一种高尚的人格，成为全国人民学习的榜样。如果我们每个人都努力做一个中国人，一个堂堂正正的中国人，一个刻苦学习、勤奋工作的中国人，一个艰苦创业、大胆开拓的中国人，那末，我们的国家民族就可以再创辉煌的历史，我们的人生价值、人格理想，也就会在国家的腾飞、民族的振兴中得到实现。

志向与气节

志向是人生的理想，即人生的目标和方向，不过，志向和理想也有细微的差别。理想专指人生的目标、方向，志向除指目标、方向之外，还包括为达到目标的决心和勇气。因此志向又可引申为志气。美国人卡耐基说：“朝着一定的目标走去是‘志’，一鼓作气，中途不停止是‘气’，两者合起来是‘志气’，一切事业的成败都取决于此。”卡耐基对志气的理解和我们差不多。

关于志向对人生的意义、作用，古人已经谈得很多。

《礼记·儒行》篇说：“身可危也，而志不可夺也。”认为志向重于生命，在大是大非面前，要有以身殉道的精神。

孔子说：“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论语·子罕》）认为志向是一个人独立的人格尊严。

荀子说：“无冥冥之志者，无昭昭之明”（《荀子·劝学》），讲志向与见识的关系。

苏东坡说：“古之立大事者，不唯有超世之才，亦有坚韧不拔之志”，讲志向与事业的关系。

申居勋说：“人品学问，俱成于志气，无志气人，一事做不得”，讲志向与道德、学问、事业的关系。

关于志向的作用和立志的意义，我们还可以进一步作综合的阐释：

志向是关于人生的设计。我们要做什么样的人，成就什么样的事业，实现什么样的人生价值，都要有自觉的设计和筹划，不能浑浑噩噩，漫无目标，随波逐流。立志是人的自觉活动，是人的主观能动性的表现。

志向是人生的目标。有了目标，人的活动才有明确的方向，每一项行动才能获得明确的意义。漫无目标的行动，必然是劳而无功，一事无成。按照一定的目标行动，正是人类活动的自觉性的表现。

志向是人生的动力。有了明确的目标，就会推动人们为实现目标去发掘自己的潜能，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培养克服困难的意志和毅力。这样，在实现人生目标的同时，也提高了人的素质和能力。

总之，志向是人类活动的特征和要素。正如法国科学家巴斯德所说的：“工作随着志向走，成功随着工作走，这是一定的规律。立志、工作、成功，是人类活动的三大要素。”

任何人都会有自己的志向，只不过志向有大小高低之分罢了。古人讲立志时，强调要立大志，立高志。诸葛亮告诫他的外甥说：“夫志当存高远”，“若志不强毅，意不慷慨，徒碌碌滞于俗，默默束于情，永窜伏于凡庸，不免于下流矣。”程颐说：“君子之志，所虑者岂止一身，直虑及天下千万世。”张载提出：要“为大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万世开太平。”明人吕坤提出：要“做第一等人，干第一等事，说第一等话，抱第一等识。”今天，我们立志，也要立大志，立造福社会、利国利民的大志，不能只在个人或小家庭的范围里打圈子。

中国历史上流传着许多立大志、成大业的故事。下面举《史记》、《后汉书》中的两则：

《史记·陈涉世家》记载：“陈涉少时，尝与人佣耕，辍耕之垄上，怅恨久之，曰：‘苟富贵，无相忘。’庸者笑而应曰：‘若为佣耕，何富贵也？’”

陈涉太息曰：‘嗟呼，燕雀安知鸿鹄之志哉！’”

《后汉书·班梁（班超、梁懂）列传》记载：班超随兄移居洛阳后，“家贫，常为官佣书以供养。久劳苦，尝辍业投笔叹曰：‘大丈夫无它志略，犹当效傅介子、张骞立功异域，以取封侯，安能久事笔研（砚）间乎？’左右皆笑之。超曰：‘小子安知壮士志哉！’”

这两则故事的情节大体相似。陈涉当雇工为生，班超帮公家抄书维持生活。他们都不安于贫困，立志要干一番事业，又都受到周围人的嘲笑。后来，陈涉揭竿而起，自立为陈王，成为著名的农民革命领袖，完成了亡秦的事业。班超投笔从戎，率三十六骑出使西域，打通了西汉末年阻塞了几十年的丝绸之路，被汉明帝封为定远侯。这两个人都因为立大志，成大业，而名彪青史。如果没有大志，就只能一辈子当雇工和抄书匠了。

故人生的成就由志向而来。强者与弱者，奋起与沉沦，卓越与平庸，都是由于志向、理想的差别。强者为实现理想而奋起，取得卓越的成就。弱者因为失去生活目标而沉沦，碌碌无为，平庸一生。

志向、理想是现实的升华，受社会环境和时代要求的制约。不符合社会需要的志向、理想，只能是空想幻想。生活在现代的人，想当帝王将相，自然是荒唐可笑的事。志向、理想还要和个人的智慧、才智、特长等主观条件相适应，否则志大而才疏，也会成为空想和幻想。

志向、理想有政治的、社会的、职业的和生活的。政治理想和社会理想要合乎历史的潮流和入群的需要。中国社会已选择了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振兴国家、民族已成为全国人民的共同愿望。我们的政治理想和社会理想，要符合这一历史潮流，不能逆潮流而动。

我们的职业理想和生活理想要符合主观条件和客观需要。吕坤说的“做第一等人，干第一等事”，是每个人都可以努力做到的，至于“说第一等话，抱第一等识”，则需要相应的才智和修养，未必每个人都能办到。还是孙中山先生说得好：“要立志做大事，不要立志做大官。”身居高位的人未必都能做出利国利民的大事，普通的老百姓却可能在平凡的岗位上，做出不平凡的事业。

立志诚然重要，坚持和实现志向的行动更加难能可贵。没有志向的行动是盲目的，没有行动的志向是虚幻的。真正有志的人不仅胸怀大志，而且能为实现志向坚持不懈地奋斗。有的人空谈理想、志向，但没有刻苦学习、埋头苦干的行动。今天想当科学家，明天想当将军，最终一事无成。此所谓“无志之人常立志，有志之人立志长。”马克思说：“一步实际行动比一打纲领更重要”，这是人生的宝训，不仅适用于政党，也适用于我们每一个个人。

一个人确立志向之后，就要采取实际行动，为实现志向不懈地奋斗。不放过眼前的机遇，不拒绝小事；从脚下起步，从现在做起；甘于贫贱，甘于寂寞；不民困难险阻，不怕失败挫折，不怕打击和压力。如果有这等精神，志向、理想便可成为巨大的动力，鼓舞人们抵达成功的彼岸。

为了实现远大志向，甘于贫贱和寂寞，淡泊自守，更为古人所重视。诸葛亮在《诫子书》中说：“非淡泊无以明志”。只有甘于淡泊的生活，才能表现和保持高尚的志向。洪应明在《菜根谭》中说：“藜口苜蓿者，多冰清玉洁；锦衣玉食者，甘婢膝奴颜。盖志以淡泊明，而节从肥甘丧矣。”清贫之士，大多有冰清玉洁的情操，而高官显贵、养尊处优者，却甘心卑躬屈膝，阿谀奉承，丧失原则。

何以只有淡泊自守，才能保持高尚的志气和节操？因为淡泊使人清心寡欲，从而超越短浅的功利目标，建立更加高远的人生志向；使人不为眼前繁华浓艳或贫困的生活所困惑，坚持和实现远大的志向。如果一个人沉溺于眼前的物质享受，平时就会追随流俗，趋炎附势，玩物丧志，乱世就会向侵略者或当权者屈服，丧失原则和气节。

诸葛亮说的淡泊明志，并非仅仅为了洁身自好，明哲保身，而是着眼于实现远大的抱负，鞠躬尽瘁，死而后己。也就是说，要置个人的功名富贵于不顾，把主要精力放在理想、事业的追求上。这种对人生的睿智见解，今天仍有积极的现实意义。我们要成就一番事业，就要有恬淡自守的精神，不可把金钱和物质享受看得太重。立志搞科学研究的人，不能看到别人发财就弃科研去“下海”经商；立志搞艺术创作的人不能为了多赚钱，就放弃自己的艺术追求和艺术良心。

有些志向关系到政治信仰和国家民族的利益，更应该坚持不渝。这就是上面谈到的气节。气节者，志气和节操也。气节是做人的基本原则，体现人的尊严，国家的尊严，民族的尊严。气节是立身处世的根本，是撑天撑地的柱石，是一个人、一个民族的脊梁。

孟子关于“大丈夫”的精辟论述，是对气节的极好诠释。他说：

“居天下之广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得志，与民由之；不得志，独行其道。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孟子·滕文公下》）

气节表现于平时，是不放弃原则以邀名取利，不掩盖真实情感以曲意逢迎；气节表现于威胁利诱、生死攸关的时候，是宁折不弯，大义凛然。

文天祥可称为坚持民族气节的代表人物。元兵南侵时，他为挽救南宋浴血奋战，被俘后坚贞不屈，终遭杀害。他在被俘途中，写下了“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的著名诗句。在被囚的土室中，他又写下了著名的《正气歌》。《正气歌》是一篇忠贞刚烈人士坚持气节的颂歌。如春秋时期齐国、晋国不怕杀头、秉笔直书的史官，西汉时期誓不归降，在北海持汉节牧羊十九年的苏武，三国时宁作断头将军、不作投降将军的严颜，唐代安史之乱时“每与贼战，大呼誓师，毗裂血流，齿牙皆碎”的张巡，三国时“清操厉冰雪”的管宁和“鬼神位壮烈”的诸葛亮，等等。文天祥认为这坚持气节的忠贞之士，体现了“地维赖以立，天柱赖以尊”的浩然正气。他们虽然离我们远去了，但他们给后人树立了榜样。他们的形象因高尚品德的照耀而更加光辉。今天我们读这篇作品，当如作者当时的感受一样：“哲人日已远，典型在夙昔。风檐展书读，古道照颜色。”

在改革开放、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时期，仍然要重视气节。在日常工作、生活中刚正不阿，不拿原则做交易；在和外国人的交往中，不做有损民族尊严，有损人格国格的事，这正是先哲们昭示于我们的做人的宝贵品格。

德行与事业

古人把德行与事业看作人生追求不可分割的两个方面。《尚书》中讲“正德，利用，厚生”；《周易》中讲“君子敬德修业”，“开物成务”；《左传》中讲君子有三立：立德、立功、立言；孔子讲修己以安人，修己以安百姓：都是把德行和事业结合在一起的。

此后，从《大学》、《中庸》到宋明理学家，也是遵循这种人生理论的。《大学》提出：以修身为本，达到治国平天下的目的；《中庸》提出：“诚老非自成而已矣，所以成物也”；周敦颐说：“圣人之道，人乎耳，存乎心；蕴之为德行，行之为事业”：这都是说，要把内在的德行和外在的事业结合起来。不过在实践上理学家们重视心性修养，不重视国计民生，受到李觏等人的激烈批评。

古人讲德行与事业的关系，包含了内外关系，知行关系，完善主体与征服客观世界的关系。德行是内在的修养，事业是外在的表现，在己为德行，及物为事业。培养内在的美德和从事外在的功业，两者是互相统一、不可分割的。正如《周易》中说的：“美在其中，而畅于四支，发于事业，美之至也。”（《坤卦·文言》）美德是存于内心，而表现于行动，见之于事业的。这样的美德才是至善至美的。

道德问题包括知和行、即道德认识和道德实践两个方面。敬德、修德是对道德原则、道德观念、道德规范的认识培养，修业、治国平天下是对道德原则、道德观念、道德规范的实践。道德不能流于空谈，要见之于行动，表现干事功。

修己、敬德是完善主体，开物成务、治国平天下是改造客观世界。既要注意内心的修养，又要追求外在的事业。在完善自我的同时，不要忘记改造社会、改造自然的责任。

不过，中国文化是以道德精神为主导的。人生的意义在于道德上的自我完成，达到圣贤的境界。这种道德精神落实到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活动领域。因此，古人认为：在道德与事业、道德与事功的关系中，道德是主要的。

古人强调德是事业的基础。立业如果不思养德种德，事业就没有根基。人的富贵名誉也是如此，要靠道德的涵养，不能靠权势或其他的东西来获得和长久保持。因此，洪应明说：“富贵名誉自道德来者，如山林中花，自是舒徐繁衍；自功业来者，如盆槛中花，便有迁徙废兴；若以权力得者，其根不植，其萎可立而待矣。”（《菜根谭》）

事业的成败和个人的德才有直接关系。而“德”与“才”相比，“德”是主要的。“德者才之主”，没有“德”的约束，“才”会走反面，使事业遭受失败，使个人身败名裂，使社会遭受危害。无德的人，才越高危害越大。故个人修身要重视道德品质的培养，要以德御才，不要恃才败德。用人要注意德才兼备，以德为生。

在处理人际关系上，古人也重视道德的感召力。有道德的人才能吸引人，感化人，获得别人的尊敬，并对他人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孟子》中说：“闻伯夷之风者，顽夫廉，懦夫有立志”，“闻柳下惠之风者，鄙夫宽，薄夫敦。”（《万章下》）伯夷能使贪婪的人廉洁，使懦弱的人立定志向，柳下惠能使狭隘的人心胸宽阔，使刻薄的人变得厚道，这都是因为他们有高尚

人格的感召力量。

人格的高下不按地位财富划分。有德者处在贫贱的地位也会受人尊敬，无德者地位显贵，富甲天下，也会受人指责。道德与财富比较，古人重德，认为“德者，本也；财者，末也。”

推而广之，处理政务，治理国家，也要贯彻重德的原则，实行“仁政”、“德政”。这就是道德伦理型的政治。《荀子·强国》篇说：威有三，有道德之威者，有暴察之威者，有狂妄之威者。这三种“威”中，道德之威最强，因此要以德服人，不以力服人。诸葛亮七擒孟获，每次捉住孟获以后，都把他放了，最后使孟获心悦诚服，不再闹事，使蜀国后方巩固，得以专心对待魏国。这是以德服人的成功事例，也是解决汉族和少数民族矛盾的成功范例。刘备临终时告诫刘禅说：“勿以恶小而为之，勿以善小而不为，惟贤与德，能服于人。”这是他治国经验的总结。

从个人处世方面说，修德是保身远祸的好办法，修德就是积善，善积一分，德长一分。《周易·坤卦》中说：“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增广贤文》说：“善恶随人招，祸福自己招。”这都是说德可得福、恶必遭殃的道理。

修德积善还可获得人生的乐趣，实现人生的价值。修德向善者，仰不愧于天，俯不作于人，自然有心灵的宁静、充实和满足，免却追逐名利、勾心斗角、尔虞我诈的种种烦恼。

孔子盛赞颜回说：“贤哉回也！一簞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贤哉回也！”（《论语·雍也》）孔子本人也是在贫困的物质生活条件下“发愤忘食，乐以忘忧”的。这就是理学家推崇的“孔颜乐处”。“孔颜乐处”乐在哪里？周敦颐解释说：“天地间，至尊者道，至贵者德而已矣。至难得者人，人至难得者，有道德于身而已矣。”这和孔子说的“仁者不忧”是一致的。有道德的人能超越世俗的功利眼光和尘世的物质诱惑，不论富贵贫贱，都处之泰然而自得其乐。他们从道德的修养、完善中获得人生的乐趣和价值。

古代的道德理想、道德原则和道德实践是有差别的。满口仁义道德、一肚子男盗女娼的人比比皆是。鲁迅在《狂人日记》中愤慨地写道：“我翻开历史一查，这历史没有年代，歪歪斜斜的每页上都写着‘仁义道德’几个字。我横竖睡不着，仔细看了半夜，才从字缝里看出字来，满本都写着两个字是‘吃人’！”

其次，古人的道德理想、原则和规范产生于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自然会打上那个时代的阶级烙印。但是，道德有阶级性，也有继承性。我们既要依据新的社会条件建立新的道德规范，又要继承发扬民族的传统美德。古人关于德行与事业的关系的论述，对我们就有许多启示。

改造社会、改造自然的事业离不开人的德行修养；人的德行修养也离不开改造社会、改造自然的事业。经济的发展，社会的进步，和每一个社会成员道德品质的提高是同步的。就个人而言，要把对事业的追求和品德修养结合起来，在改造客观世界的同时，注意改造自己的主观世界。就国家和社会而言，要把物质文明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结合起来，在抓经济建设的同时抓好思想道德建设，树立良好的社会风尚。

如何认识和处理道德与事业的关系，道德与财富的关系，精神生活与物质生活的关系，今天仍然是很有现实意义的课题。在处理上面这些关系时，

要持全面、统一的观点，不可偏执一端。“德本财末”、“重义轻利”的传统观点，理学家们空谈心性、视国计民生为末务，把主体的内心修养提高到至高无上的程度，确有偏颇之处，阻碍了社会的发展。物质生活是精神生活的基础，没有经济的发展，科技的进步，社会的道德水平是不能普遍提高的。安贫乐道式的“孔颜乐趣”很难被大多数人接受。因此，我们要加速经济建设，改变经济文化落后的状况，不断提高人们的物质生活水平。另外我们也要看到，经济的发展要有思想道德的保证，两者如车之两轮，鸟之两翼，只有同时并举，才能推动社会协调地发展。

当前，我们正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市场经济也要和道德建设同步发展。传统道德观念中与市场经济不适应的部分应该摒弃，有一些则是可以继承发扬的。市场经济重视经济效益，对经济效益的追求应该带来社会的进步，参与市场竞争的人应该遵守道德规范，承担道德责任。市场经济不是靠行政命令，而是靠信誉、责任感维持的。遵守信誉，遵守商业道德，是市场经济正常运转的保证。因此，见利思义，言而有信，这样一些道德要求在市场经济活动中仍然是应该遵守的。从个人来说，生活的乐趣和人生的意义，也不仅仅在于获取物质财富和优越的物质生活享受，还要有超越物质生活的更高追求，即高尚的道德情操和丰富的精神生活。物质生活贫乏和精神生活空虚，都不能使人享受完美的人生。

今天，我们实行的是社会主义道德。它和社会主义制度相联系。国家利益、集体利益和个人利益相结合，是它的基本原则；大公无私，全心全意为人民利益服务，是它的最高道德理想；爱祖国，爱人民，爱劳动，爱科学，爱社会主义，是它的基本内容。维护封建等级制度的道德规范和资产阶级的个人利己主义，是和社会主义道德不相容的。但勤劳勇敢、爱好和平、尊老爱幼这样一些传统美德仍然需要继承发扬。传统道德中的仁、义、礼、智、信（“五常”），是维护公共生活、协调人际关系的基本准则，是具有普遍性的道德形式，我们可以赋予新的内容加以利用。例如，我们要以仁爱之心对待他人；以“义”对待公共利益和他人利益；以“礼”对待人际的交往活动；以“智”区别善恶是非；以“信”处理各种经营业务活动；等等。

总之，我们在更新观念、重视物质利益的时候，不能淡化道德观念。经济的发展，物质生活的进步，不能以世风败坏、道德沦丧为代价。良好的道德风尚又以个人的道德修养为基础。我们修身的目标，仍然是追求良好的道德修养和赫赫的事功相统一。

人品与气度

古人修身，还重视人品和气度的修养。人品是人们通过生活实践和社会行为表现出来的思想品质。气度是人们对外界事物（包括他人）的影响所反映出来的态度。人品和气度都是人格修养的现实表现和达到的境界。

人品有正邪高下之分。正直高尚的人品使人格向健康完善的方向发展，卑微邪恶的人品使人格向庸俗奸诈的方向发展。人品是人的基本素质。忠贞与邪佞，君子与小人，都是以人品划分的。修身进德首先要立品，用人择交首先要观品。人品不好，害人害己，遗患无穷。

综合前人所述，人品的要求一曰真诚，二曰正直，三曰仁厚，四曰无私。四者以无私为基础，互相联系，不可分割。

做人首先要真诚，古人称为本然人品，率真人品。一个人的思想、品格、言行，都要发自内心、自然而然地表现出来，不能为了某种功利的目的矫揉造作，掩盖自己的真实面目，扭曲自己的本性。“文章做到极处，无有他奇，只是恰好；人品做到极处，无有他异，只是本然。”（洪应明《菜根谭》）真诚做人，保持本然人品，是做人的起点，也是人品的极致。真诚的反面是虚伪，自欺欺人，靠戴假面具过日子。真诚坦率的人不失本色，自然有感人的力量。虚伪矫饰的人一生部在演戏，给人留下伪佞可憎的形象，自己也丧失心灵的本性，忍受心理上的折磨。

正直也是做人的本分。正直人品表现为襟怀坦白，秉公持正，坚持原则，刚正不阿。正直的反面则是伪善狡诈。正直的人，对人对事公道正派，言行一致，表里一致。虚伪狡诈的人伪善圆滑，曲意逢迎，背信弃义，拿原则做交易。正直和真诚是互相紧密联系的，只有真诚才能正直，反之亦然。观察一个人，可以把这两个方面联系起来，看他是真诚直爽，还是虚伪圆滑；是光明正大，还是阴险诡诈。这是区别人品的重要标准。

做人还要有仁厚的胸怀。《尚书·皋陶谟》说：“宽而栗，柔而立，直而温。”宽容而庄重，柔和而能干，正直而平易近人，这是将刚直与仁厚相结合，以造成完美的人格。孔子讲“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就是要以平等仁爱之心对待他人，设身处地为他人着想，自己不想要的，不要强加给别人。能够以仁爱宽厚的态度对待他人，各种人际关系就可以理顺了。仁厚的反面是刻薄狠毒：或者察察为明，记人小过，发人隐私，念人旧恶；或者阴险狠毒，落井下石，趁火打劫，置人于死地而后快。这种人对人严，对己宽，伤害善良，在任何时候都是应该被谴责和唾弃的。

无私是真诚、正直、仁厚的思想基础。“有欲甚则邪心胜”。（《韩非子·解老》）私心重、利欲心重的人，不可能真诚坦荡，刚正不阿，也不可能宽厚待人。“公生明，偏生暗”（《荀子·不苟》）；“君子坦荡荡，小人常戚戚”（《论语·述而》）；“海纳百川，有容乃大。壁立千仞，无欲则刚。”（林则徐手书联）这都是说，要做到真诚、正直、仁厚，就要大公无私，先公后私。当然，无私不是否定个人的合理欲望和正当利益；但个人利益不能无限膨胀，不能为了满足个人利益去损害别人的利益、集体的利益和国家民族的利益。“欲炽则身亡”，私欲过甚，不仅害人，还将害己。这是古今部适用的道理。

以真诚、正直、仁厚、无私为标准，可以判断世人人品的高下。吕坤在《呻吟语》中将大臣分为六等：上等人宽厚深沉，远见卓识，造福于无形，

消祸于未然。第二等人刚正清明，慷慨敢言，爱国如家，忧时如病，但未免太露锋芒；第三等人顺应时势，循规蹈矩，不能兴利；不能除害；第四等人只顾自己的名望荣华和上司的恩宠，毫不考虑国家安危；第五等人贪巧闹事，恃宠扬威，刚愎自用，扰乱国政；第六等人奸险凶淫，煽虐肆毒，危害百姓，伤害善良，蛊惑君心，断国家命脉，失四海人望。吕坤品评大臣主要是从人品考虑的，而品评的标准大体上包括了上面说的四点。吕坤还特别指出：有一种圆滑的人，放弃为人的原则，“巧趋人所未见之利，善避人所未识之害；立身百祸不侵之地，事成而我有功，事败而我无咎。”这种“巧智之士”，国家不能依靠他们。吕坤对这种用“巧智”营私的大滑头刻划得入木三分。这种人现在并未绝迹，吕坤的话可以帮助我们提高警惕，防止上当。

董仲舒提出“性三品”说，认为有人天生是下品，必然是恶的；有人天生是上品，必然是善的；有人天生是中品，可善可恶。董仲舒的说法当然不对。还是告子的“性无善恶论”比较正确。除自然属性以外，人的社会属性不是先天固有的，而是后天形成的。人品也是如此，不是先天决定的，而是后天形成的。人品的正邪高下，决定于社会、家庭的影响和个人的主观努力。自觉的修养对人品的形成有重大的影响。

人品的好坏不能只凭地位名分来划分，主要看实际表现。地位高、名声显赫的人不一定个人品高尚；没有地位名声的普通老百姓中，也有许多人品高尚的人。因此，每一个人不论社会地位和职业分工如何，都要自觉地进行人品的修养。

古人除注意人品修养之外，还注意气度的修养。气度又称器量、胸怀、胸襟，反映一个人对不如意的人和事所持的态度。有的人气度宽宏，能忍受不如意的事，能宽容不如意的人。有的人气度狭小，于人则落落寡合，遇事则常常烦恼。气度不仅影响事业的成败和人际关系的和谐，也影响个人在社会中地位、作用和身心健康。俗话说：“宰相肚里好撑船”，有大胸襟、大气度，方能担大任，成大事。有大胸襟、大气度，方能着眼于大处和长远，不致把宝贵生命浪费在委琐的小是小非中。“日月笼中鸟，乾坤水上沤”，“唐虞揖逊三杯酒，汤武征伐一局棋”。有这种吞吐六合、上下古今的大气度，则毁誉欣戚都不足以动其中，面对任何不如意的人和事，都可以处之泰然了。

历史上不乏气度恢宏的人。明人宋纁辑录的《硕辅宝鉴》中有三则讲气度的故事：

第一则讲唐朝的狄仁杰。高宗时狄仁杰是大理丞，后为豫州刺史、洛州司马。天授二年（公元691年），他做了宰相。有一天，武则天对他说：你在汝南有善政，然而有人说你的坏话，你想知道吗？狄仁杰说：“陛下认为他说得对，臣当改正；认为臣没有那样的过错，那是臣之幸也。至于谁说臣的坏话，臣不愿意知道。”武则天听了很高兴，称赞狄仁杰是一个宽宏大量的长者。

第二则故事讲唐朝的陆贽。陆贽在德宗时当过中书侍郎、门下同平章事。当初，御史中丞窦参常常排挤陆贽。后来窦参被李龚巽奏，德宗大怒，欲杀之。陆贽替窦参讲情，才未被杀，被贬到驩州当司马。德宗又想诛连窦的亲党，没收他的家产，陆贽请皇上加以宽恕。宋纁称赞陆贽公正诚实，以德报怨。

第三则故事讲宋朝的吕蒙正。蔡州的知州张绅犯贪污罪被免职。有人对

宋太祖赵光义说：张绅很有钱，不至于会贪污；是吕蒙正贫穷时向他索取财物没有如愿，现在对他报复。吕蒙正不申辩，结果张绅复了官，吕蒙正被罢了宰相的官职。后来考课院查到张绅贪污的证据，于是又免了张绅的官职，吕蒙正重当宰相。太宗对吕蒙正说：张绅果然有脏。吕蒙正不辩也不谢。宋纁称赞吕蒙正的气度不是那些浅薄的人可以做到的。

气度大小具体表现在如何对人、如何对事上。世界上的事情是复杂的。金无足赤，人无完人。一个人在一生中会遇到各式各样的人。为人既要有严正的操守，又要有容人的雅量，不可狂狷孤傲，独来独往。明人薛瑄说：“人当自信自守，虽称誉之，承奉之，亦不为之加喜；虽毁谤之，侮慢之，亦不为之加沮。”（《古今药石》）如果遇到横逆无理的人，如果被他人误解，被人中伤，也要冷静对待，不要丧失理智，使自己也跟着做出错事。在人生旅途中，不如意的人和事，处处有，时时有。气量大才能心情舒畅，气量小只能在自烦恼。

吕坤《呻吟语》中曾提出对付强横无理的人和事的诸种办法，其中最具有参考价值的有下面几种：

1. “与小人处，进德之资也。彼侮愈甚，我忍愈坚，与我奚损哉？”“不遇小人，不足以验我之量。”和小人相处，可以增进自己的品德，检量自己的气量，对我又有什么损失呢！的确如此，经常听听反对自己、攻击自己的话（反对攻击自己的人不一定是小人），使自己保持谦虚谨慎的态度和清醒的头脑，这只有好处，没有坏处。

2. “凡强逆来侵，先思所以取之故，即思所以处之法。”遇到蛮横无理的人和事，先考虑问题产生的原因，再考虑处理的办法，不要恼怒动气。“水激逆流，火激横发，人激乱作。”人激恼了，就会丧失理智，闹出乱子来。因此古人把“制怒”作为座右铭。

3. “你说的是，我便从”，“你说的不是，我便不从。”对批评攻击的话要采取冷静的态度，善于吸取其中有益的部分。

4. “自反无阙，彼欲难盈，安心以待之，缄口以听之，彼计必穷。”经过反省自己并无过失，而对方无理纠缠不休，这时可以置之不理，最后他也就无计可施了。这就是兵书上说的：“不应不动，敌将自静。”

5. “小人侵陵，则惧患防危，长虑却顾，而不敢侈然有肆心，则百祸潜消。”这就是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无。对小人要保持警惕，防患于未然，如此自可消除祸患。

气度和思想、性格、见识有密切关系。“心底无私大地宽”，没有私心的人对人对事自然宽厚豁达；私心重的人必然斤斤计较恩怨得失，处处疑神疑鬼。此所谓“居心不净，动辄疑人。人自无心，我徒烦恼。”（申涵光《荆园小语》）性格开朗随和的人，遇到不如意的人和事，能想得开，放得下；性格固执暴躁的人，遇到不如意的人和事容易激怒，死钻牛角尖不能自拔。见识高的人眼界高，气量大；见识低的人，眼界浅，气量也小。这就是古人说的“识进则量进”（《薛文清读书录》），“观于沧海者难为水，游于圣人之间者难为言。”（《孟子·尽心下》）。故欲涵养大胸襟、大气度者，要提高自己的学识和整体素质，造就高尚完善的人格。

学问与见识

学问与见识是修身的另一项重要内容。《中庸》中说：“君子尊德性而道学问，致广大而尽精微”，将德性和学问作为君子的基本素质。孔子也认为：要做一个君子，必须在德性和学问两方面下功夫。一方面要培养高尚的道德情操，另一方面要学习知识，培养治国安邦的本领。修德行和做学问是相辅相成、不可偏废的。在《论语》中经常是“仁”、“智”并提的。如“仁者安仁，知者利仁”（《里仁》），“知者乐水，仁者乐山。知者动，仁者静。知者乐，仁者寿”。（《雍也》）孔子还对智作过解释：“樊迟问知，子曰：‘务民之义，敬鬼神而远之，可谓知矣。’”（《雍也》）尽力做民众需要做的事，对鬼神采取敬而远之的态度。这样，智包括了道德的内容，也包括了对外界事物的认识和态度。

《论语》首篇就强调学习的重要性。学习的内容包括品德修养和诗、书、礼、乐、易、春秋等六艺的学习。孔子认为：“德之不修，学之不讲，闻义不能徙，不善不能改”，是最令人担忧的事情。孔子一生“学而不厌，诲人不倦”，因材施教，身体力行，培养了一大批人才。在《先进》篇中，他对这些人才作过评价：论德行当数颜回、闵子骞、冉伯牛、仲弓；论辩才当数宰我、子贡；论从政本领当数冉有、季路；论掌握历史文献当数子游、子夏。这反映了孔子仁智并重的教育思想。

先秦诸子中反对智育的只有老庄一派。老子认为：“古之善为道者，非以明民，将以愚之。民之难治，以其智多。”（《老子三章》）按照这种观点，只有使老百姓无知无欲，天下才有太平。庄子认为：智是争名夺利的工具，“上好知而无道，则天下大乱”，把知识、智慧当作天下动乱的根源。老庄的主张与社会进步的要求相违背，在实践中也行不通。孔子之后仍然是德智并举的路线占优势。

《中庸》中说：“智、仁、勇三者，天下之达德也”；“好学近乎知，力行近乎仁，知耻近乎勇”，把智、仁、勇作为天下共同的德目，而智和好学是分不开的。《中庸》中又说：“成己，仁也；成物，知也。”仁是完成自我，智是完成万物。《中庸》以“诚”为万物的本源，人的本性和万物的本性都是“诚”的表现。通过智了解“诚”的道理，可以达到主观和客观的统一，达到人与天地并立。

孟子、荀子都不否定智的重要。孟子把德、慧、术、知作为人的四种素质。他说：“人之有德慧术知者，恒存乎疚疾。”（《孟子·尽心上》）人的德性、聪明、学术、才智是从艰难的处境中得来的。孟子还说到：“知者无不知也，当务之为急；仁者无不爱也，急亲贤之为务。”（同上）智者无所不知，但须处理好当前的紧急事务；仁者无所不爱，但须首先亲近贤人。智是对事物的认识，仁是道德伦理问题。尧舜既仁且智，只不过他们注意急当务和亲贤人罢了。

荀子主“性恶”说，因此强调后天学习、教化的重要，并认为人有认识客观世界的的能力。只要通过学习，在认识上达到极其透彻、毫无偏蔽的境界，就可以“坐于室，而见四海；处于今，而论久远；疏观（统观）万物而知其情；参稽（考察）治乱而知其度（法度），经纬（治理）天地而材官（利用）万物，制割大理（制断众理）而宇宙里矣（包罗了宇宙）。”（《荀子·解蔽》）荀子说的“智”是掌握自然、社会的规律。这和他制天命而用之的思

想是一致的。

汉代以后，许多学者都肯定“智”的重要。汉代学者以仁、义、礼、智、信为“五常”（五种基本道德）。《白虎通义》中说：“故人生而应八卦之体，得五气以为常，仁义礼智信也。”王充在《论衡》中又说：“五常之道，仁义礼智信也。”董仲舒对智有具体的发挥：“仁而不智，则爱而不别也；智而不仁，则知而不为也。”（《春秋繁露》）认为仁智不可偏废。董仲舒又说：“智者见祸福远，其知利害早，物动而知其化，事兴而知其归。”（同上）这里说的智已包含学问和见识的意思。有了对外界事物的知识，就可以掌握事物发展变化的规律，预见事物发展的趋势，预见未来的吉凶祸福。

此外还有许多学者论学问和智慧的重要性。如刘向说：“夫学者，崇名位身之本也。仪状齐等而饰貌者好，质性同伦而学问者智”。（《说苑·建本》）有学问才能增长智慧和才干。清人袁牧说：“学如弓弩，才如箭镞，识以领之，方能中鹄。”（《续诗品注·尚识》）学问、见识、智慧和德行、才能、事业是相互依存、相互促进的。

古人说的学问、见识、智慧，虽然包含对客观事物的认识，但以道德知识为主，掌握知识也主要是为了辨别善恶是非，提高道德品质。也就是说，偏重成己，忽视成物，偏重改造主观世界，忽视改造客观世界。学习内容也偏重于政教伦理，忽视生产劳动方面的科学技术知识。中国古代虽有天文、数学、医学等方面的成就，但自然科学始终没有成为学术研究的重点和主流。许多人的聪明才智都耗费在治经治史和吟诗作赋上去了。这样，造成科技落后、生产发展缓慢的局面。这是值得我们反省和总结的。

英国哲学家费兰西斯·培根提出“知识就是力量”的著名口号。培根认为：“赤裸裸的手和无依靠的理智，都是不能有多大作为的。”（《新工具》）只有掌握反映自然发展规律的知识，才能成为改造自然的巨大力量。培根的观点冲破了中世纪神学的束缚，推动西方现代科技的发展，并造就了西方社会现代高度的物质文明。

综合中国古代德智并重的思想和西方的知识观，我们可以对现代人的素质获得全面的了解。人的全面发展，即体力和智力的结合，会使身心和才能得到充分、全面、自由的发展，最终摆脱旧的分工的奴役和束缚。这是我们的理想。根据这种理想，现代人的素质要求应该包括德、才、学、识、体等各个方面。“德”是处理个人与社会、自我与他人关系的行为规范的总和。“才”是才能，反映一个人认识、改造世界的本领、技巧和能动性。“学”是知识水平，包括直接知识和间接知识，理论知识和实践知识。“识”是在才和学的基础上形成的对客观事物的见解和预见性。“体”是体质和体力，是德才学识的物质基础。在人的诸种素质中，“学”（文化知识水平）为其它素质的发展奠定智力基础。文化知识水平低，德、才、识的发展都要受到限制。体力的发展，也有赖于医药卫生科学知识的发展。总之，掌握现代科学文化知识，是培养“四有”新人的需要，是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需要，也是我们修身的基本内容和要求。

一个人不仅要有学问，有知识，还要有见识。有学而无识，知识就是一堆死的东西，不能在实践中发挥作用。识和学相联系，识是建立在可靠的知识储备和运用知识的能力之上的。对客观事物有正确的认识，懂得事物发展的规律，才能预测事物的发展趋势，提出解决问题的办法。

因此见识表现为对事物的认识具有预见性，深刻性，有独到的见解和判

断力，善于分析事物的矛盾，能够抓住关键问题，妥善处理各种复杂的矛盾。《周易》上说：“履霜，坚冰至。”（《坤卦·初六》）古人认为，霜表示阴气开始凝聚，踏着霜，知道坚冰就要到了。由霜到冰，是事物发展的顺序和规律。由霜预见冰，这是古人总结客观规律提出的见解。

吕坤对“识”作过具体分析。他说：“未事而知其来，始事而知其终，定事而知其变，此之谓长虑。此之谓识。”（《呻吟语》）事情没有发生能预见它的发生，事情开始发生时能预见它的结局，事情发生后能预见它的变化，这就是见识。可见吕坤也是把见识理解为对事物的预见性。吕坤又说：“见面前之千里，不着见背后之一寸。故达观非难，而反观为难；见见非难，而见不见为难。”这里提出对事物的预见应该具有全面性、深刻性。不仅要看到正面，还要看到背面，不仅要看到明的，还要看到暗的。正面的东西，已经暴露出来的东西，人们容易看到，背面的东西，还隐藏着的東西，一般的人就不容易看到。所以说：“反观为难”，“见不见为难”。能不能“反观”和“见不见”，可以判断一个人是否具有远见卓识。

远见卓识不是每个人都有的。有的人见识高远，有的人见识短浅，有的人人云亦云，没有独立见解。“群行群止看识见”，许多人在一起做事和讨论问题，就可以看出每个人见识的高低来。

不能要求每个人一开始就有远见卓识，但可以要求每个人对事物有独立思考的能力，有自己的判断和看法，提出自己独立的见解，不能依傍别人，随声附和。如果遇事提不出自己的看法，那还谈什么见识。

一个人的见解不一定都高明正确。如果见解不正确，又要固执坚持，就会成为偏见。有见解是好的，固执偏见是不好的。增长见识要从学习和实践两个方面下工夫。这就是古人说的“博学而不穷，笃行而不倦。”学习能够增长见识。学理论，学历史，学各种科学知识。理论的指导，知识的涵养，历史的经验教训，可以帮助人们了解事物的真相，提出正确的判断和处理办法。实践经验可以增长见识。实践出真知。真知是对事物的正确认识，许多真知是从实践中来的，不是从书本上来的。因此，要了解社会，了解生活，通达世态人情；对社会生活、世态人情一窍不通的人，虽有学问，往往流于迂腐，不能成为有识之士。

增长见识，还要向一切有识之士学习。每个人的知识见闻总有局限性，对事物的认识、见解也会有局限性。吸取别人的正确看法，可以弥补自己的不足。真正的远见卓识，往往是集中众人智慧取得的成果。有识之士不仅指那些见识超群的少数杰出人士，也包括有真知的见的普通人。“庙堂之士，常不及山野之夫可以料事烛理。”（《洪应明《菜根谭》）因为“庙堂之士”高高在上，对一些问题的看法可能发生错误。“山野之夫”了解实际，反而能够深明事理，料事如神。孔子提出“不耻下问”，这对于增进德性、学问和见识都是很重要的。

勤学多思

勤学多思是最基本的修身方法。人的品德、学识、才能等等，无一不是从学习中得来的。

《论语》记载了许多孔子关于学习问题的论述。例如：“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也”（《述而》）；“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焉，不如丘之好学也。”（《公冶长》）孔子成为有学问、有道德的圣人，是和他终身勤奋学习分不开的。他教育弟子们以虚心的态度对待学习，“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不知就学，不会就问。还要“学而时习之”，“温故而知新”，把复习学过的知识和获取新的知识结合起来。孔子不仅这样说，也这样做。他的一生都是在勤奋学习中度过的。《史记》记载：孔子“与齐太师语乐，闻《韶》音，学之，三月不知肉味。齐人称之。”孔子晚年还孜孜不倦地学《易》，以至“韦编三绝”。

荀子是博学的儒学大师，他的著作《荀子》首篇就是《劝学》。这篇著作系统地谈了学习的重要性和治学的态度与方法。荀子提出“学不可以已”，学习是不可停止、不可废弃的，君子能够博览群书，并对自己的言行进行检点反省，就可以知识日明，行为也不会有过错了。

荀子认为：学习是知识积累的过程，应该有恒心，踏踏实实，循序渐进。他说：“不积跬步（半步），无以至千里，不积小流，无以成江海。骐驎一跃，不能十步，弩马十驾（十天的路程），功在不舍。锲而舍之，朽木不折；锲而不舍，金石可镂。”良马一跳不能到十步，劣马跑十天，可以行千里，功效就在于不停止。雕刻半途而废，朽木也折不断；雕刻不停顿，金石也刻得动。荀子以排比的文笔，多方取譬设喻，说明学习必须坚持不止的道理。

荀子还说：“目不能两视而明，耳不能两听而聪”；“真积力久则入，学至乎流而后止也。”眼睛同时看两处就看不清楚，耳朵同时听两处就听不明白。因此，学习必须真诚、专一，真诚专一地积累，实践就能深入，学习一直到死才能停止。荀子说的这些对我们的学习仍有指导意义。

被称为杂家著作的《吕氏春秋》，在学习问题上赞成儒家的观点。书中的《孟夏纪·尊师》中提出：“故教也者，义之大者也；学也者，知之盛者也。”学习是最符合仁义的事，学习是最聪明的事。书中列举六个人的例子说明学习可以使小人变为君子。子张是鲁国鄙陋的小人，颜涿聚是梁父山的大盗，段干木是说合交易的牙商，高何、县子石是齐国的暴徒，索卢参是极狡诈的人。他们后来跟孔子、墨子和孔墨的学生学习，都免受刑戮耻辱、成为享誉天下的名士显人，王公大人也尊重他们。这都是得益于学习的结果。

《尊师》篇还说：上天生人，让他的耳朵能听，眼睛能看，嘴巴能说，心能了解万物。如果不学，还不如耳聋、眼瞎、口哑和痴狂无知好。学习的意义就是保全人的本性，使人能通达天性，认识客观事物的规律。这种看法是符合现代科学的。人虽有认识、思考等智力方面的潜能，如果没有教育和学习，这种潜能便不能开发出来，人和其他动物便没有区别。印度发现的狼孩就是有说服力的证明。这样，学习不仅关系到人的思想、道德和知识水平，也是人能成为人的必要条件。因此，荀子说：“学，人也；不学，禽兽也。”

北齐颜之推的《颜氏家训》中也有《勉学》篇专读学习问题。《颜氏家训》是写给子弟们看的，不是从成圣成贤、治国安邦立论，而是从子弟们如何能生存自立考虑的。颜之推生当南北朝的乱世，人生命运变幻无常。一些

富贵人家的子弟，多不学无术，一旦家庭败落，无人庇荫，连独立生活的能力都没有，其命运也可想而知了。颜之推由此总结出“父兄不可常依，乡国不可常保”，因而要“自求诸身”的人生宝训。颜之推告诫子弟们说：“积财千万，不如薄技随身。技之易习而可贵者无过于读书也。”颜氏认为，每个人都应当学习一技之长，农商工贾、厮役奴隶，如钓鱼屠肉、贩牛牧羊的人，都有先达可为师表。他批评一些士大夫“耻涉农商，羞务工技，射则不能穿札，笔则才记姓名”，一旦讨论吉凶大事，便张口结舌，议论诗文，只能塞默低头伸欠而已。颜之推的见解更加世俗化，实际化，对我们也颇有启发。

古人还提出学习宜早的观点。刘向说：“少而好学，如日出之阳。壮而好学，如日中之光。老而好学，如炳烛之明。”少年、壮年、老年时期，人们的精力和接受能力不同，学习的效果大不一样。颜之推也说过同样的道理，并有具体阐释。他说：“人生小幼，精神专利。长成已后，思虑散逸。固须早教，勿失机也。”人在幼小时精力专一，接受能力强，长大以后被各种事务缠绕，学习时精力就不容易集中了。他还举了自己例子：“七岁时诵《鲁灵光殿赋》，至于今日，十年一理，犹不遗忘；二十之外所诵经书，一月废置，便至荒芜矣。”可见他“早教早学”的观点，是根据自己的切身经验得出来的。

颜之推除提倡早教早学之外，认为晚学也是不可放弃的。如果少年时期失去学习机会，应该用壮年、晚年的学习去弥补。他列举许多实例说明这个道理：孔子五十学《易》可以无大过，魏武、袁遗少学而至老不倦，汉公孙宏四十余方读《春秋》，朱云四十始学《易经》和《论语》，皇甫谧二十学《孝经》、《论语》，他们都终成大儒。最后他得出结论说：“幼而学者，如日出之光。老而学者，如秉烛夜行，犹贤乎瞑目而无见者也。”幼小时期是学习的最佳时期，但老而学比老而不学要好得多。

颜之推的看法比较全面。我们一方面要重视儿童智力的早期开发，珍惜青年时期的大好时光，同时又要要有“少学而至老不倦”的精神。我们生活在科学文化飞速发展的时代，每天都有新的知识需要我们去学习。青少年时期丧失学习机会的人要加紧学习，青少年时期受过正规教育、学有专长的人也要不断学习新的知识。学习是终生任务，要活到老，学到老。

古人在强调勤学的同时，还强调多思，做到学与思相结合。孔子有“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论语·为政》）的名言。只学习，不思考，就会迷惘而无所获；只思考，不学习，就会有陷入空想、乱想的危险。孔子又说：“吾尝终日不食，终夜不寝，以思；无益，不如学也。”（《论语·卫灵公》）荀子也说过类似的话：“吾尝终日而思矣，不如须臾之所学也；吾尝跂而望矣，不如登高之博见也。”（《荀子·劝学》）他们都认为学习和思考不可偏废。

除孔子、荀子外，主张学思结合的人还很多。如刘向认为：“讯问者智之本，思虑者智之道也。”（《说苑·建本》）讯问和思虑都是不可缺少的。朱熹认为，学习要“循序而渐进，熟读而精思”（《读书之要》）。宋明理学家虽有偏重于“思”而空谈心性的毛病，但朱熹是一位知识广博、比较重实务的学者，他在学习方面有不少正确的见解。例如，他认为读书要三到：心到、眼到、口到。“三到”之中心到最重要。读书“先须熟读，使其言皆

若出于吾口；继以精思，使其意若出于吾之心。然后可以有得耳”；读书要循序渐进，过好第一难关，

“始初一书费十分工夫，后一书费八九分，后则六七分，而后则四五分矣。”前面说的“循序而渐进，熟读而精思”，就是他的这些读书经验的精辟概括。

为什么要学、思结合，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是只有经过思考，才能消化掌握学习的知识，使书上讲的变成自己的东西。朱熹讲读书要心到，使其意若出于吾之口，就是说明这个道理。学习任何一门知识，都要学习与思考相结合、掌握它的主旨要领，领悟它的精神实质；只有掌握精神实质以后，才能受到启发，引发出自己的思想见解。这就是举一反三，就是自悟。学习中的自悟是很重要的。“事理因人言而悟者，有悟还有迷，总不如自悟之了了。”（洪应明《菜根谭》）科学文化领域的新发现、新创造，都是从自悟中得来的。

学思结合的另一个理由就是：只有经过思考，才能发现书中缺点和错误，不做书本的奴隶。孟子说：“尽信书，则不如无书。”（《孟子·尽心下》）他对《尚书》中《武成》篇说的“血流漂杵”提出疑问。武王伐纣，是以仁义之师征伐不仁德的人，受到天下人的拥护，怎么会血流成河，能够把棒槌都漂起来呢？《尚书》虽然列为六经，孟子对它并不迷信，而是采用分析的态度，认为《武成》篇不可全信，取其二三片竹简就可以了。

我们读书也应该采取这种态度。人类的认识是不断发展的。书上说的，或者本来就有错误，或者本来正确，因为情况变化现在不适用了。这样，就需要用新的结论去代替它们。如果迷信书本，句句照办，字字照办，在实践中就要碰钉子。因此，读书贵疑，有疑才会引起思考，有疑学习才能深入。即使是学习正确的理论和知识，也要开动脑筋，提出问题，认真思考，这样才能加深理解。当然，也不能对书上讲的都怀疑。当疑则疑，当信则信，这才是科学的态度。

关于读书学习问题古人还有许多精辟见解，闪耀着智慧的火花。下面略举数例：

“书曰：‘好问则裕’。《礼》云：‘独学而无友，则孤陋寡闻。’”（《颜氏家训》）

“闻见欲众，而采择欲谨。”（魏征《群书治要》）

“圣人无常师。”（韩愈《师说》）

“读书须知出入法，始当求所以入，终当求所以出。”（陈善《扞虱新语》）

“善学邯郸，莫失故步。”（袁枚《续诗品注·尚识》，源出《庄子·秋水》）

“善读书者日攻日扫，攻则直透重围，扫则万了一物。”（郑板桥《花间堂诗草跋》）

以上说的要善于向一切人学习；读书要博览与精读相结合；要钻得进，出得来；学习别人好的东西，同时要保持、发扬自己的长处和特色，等等。这些都是经验之谈，值得我们参考。

谨言力行

谨言力行涉及知与行、说与做的关系，是修身的基本方法和要求。先秦诸子对言行问题非常重视。

孔子说：“君子欲纳于言而敏于行。”（《论语·里仁》）把“行”看得比“言”更重要。

老子说：“信言不美，美言不信。善言不辩，辩言不善。”（《老子八十一章》）认为好话不在动听，而在于真实，能言善辩的人不一定善良。

《韩非子》中说：“内外相应，言行相称”，从言行一致的角度强调谨言力行的必要性。

《墨子闲诂》中记载了一则有名的故事：“子禽问曰：‘多言有益乎？’墨子曰：‘虾蟆、蛙蝇，日夜恒鸣，舌干舌擗，然而不听。今观晨鸡，时夜而鸣，天下振动。多言何益，唯其言之时也。’”墨子认为，多说没有用处，要说就要说在当口上。

古人为什么重视谨言力行的问题，有下面几点理由：

“学”的目的是为了“知”，“知”的目的是为了“行”荀子说：“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君子之学也，以美其身；小人之学也，以为禽犊。”（《荀子·劝学篇》）学习的目的是为了修养身心，增进德性，不是为了讨好别人，猎取功名利禄。因此，君子的学问要体现在行为举止上，小人的学问只是挂在嘴巴上。扬雄也说：“学，行之，上也；言之，次也；教之，又其次也。”（《法言·学行》）学习首先要身体力行。朱熹从认识论的角度说明知行互相促进的道理：“知之愈明，则行之愈笃；行之愈笃，则知之愈明。”（《朱子语类》）陆游亦有诗云：“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冬夜读书示子聿》）真知要从实践中来，学了知识只停留在口头上，不能付诸行动，就不能算是真知。

言行一致，少说多做，是君子的品格。“有其言，无其行，君子耻之”（《礼记·杂记下》）；君子“耻其言而过于行”（《论语·宪问》）；“言顾行，行顾言”。（《中庸》）这都是把言行一致作为一个人应该具备的品格。有这样的品格，就是可以成为君子，没有这样的品格，就会成为口是心非的小人。

言行关系到事业的成败，人生的祸福。《论语》中有一言兴邦、一言丧邦的话，认为说话有时关系到国家的兴衰。荀子说：“言有招祸也，行有招辱也，君子慎其所立乎。”（《荀子·劝学》）把言行作为君子立身处世的大事来看待。刘向说：“口者关也，舌者兵也，出言不当，反自伤。”晋傅玄（一作南齐肖子良）《口铭》说：“病从口入，祸从口出。”他们把慎言作为全身远祸的人生忠告。

在言行问题上，古人对“言”的论述更多，提出了许多慎言的遗训。例如：

要言而有信，言而有征。“言必信，行必果”（《论语·子路》）；“无稽之言，不见之行，不闻之谋，君子慎之。”（《荀子·正名》）强调说话要有根据。

讲话要看对象，当说则说。“交疏自古戒言深，肝胆徒倾致烁金。”（司空图《狂题十八首其三》）“言虽至当，言于必不受言之人，便是妄语。”（申居勋《西岩赘语》）说话不考虑对方情况，不考虑对方能否接受，不考

虑交情的深浅，话虽然正确，说了也不会有好的效果。

澄心定气，防止大喜狂怒时失言。明陈继儒说：“喜时之言多失信，怒时之言多失体。”（《安得长者言》）清王豫说：“不可乘喜而多言，不可乘快而易事。”（《蕉窗日记》卷二）喜怒过甚，情绪失控，说话容易走火，说些大话、空话和偏激的话。因此要澄心定气，心思专一，情绪稳定，这样才能“一言而服人，一言而明道。”（吕坤《呻吟语》）

明人敖英还编了一本《慎言集训》，可算是一本研究说话艺术的专著。《慎言集训》辑录前人和诸子、史书中关于说话的言论，分上下两卷。上卷讲说话容易犯的二十二种毛病，依次为：

戒多言：说话不要太多，言多必失。

戒轻言：不要轻率他讲话，轻言的人会召来责怪和羞辱。

戒狂言：不要不知轻重，胡侃乱说。胡说乱说往往后悔。

戒杂言：说话不可杂乱无章，杂乱无章就会言不及义，伤害自己的美德。

戒戏言：不要不顾分寸地开玩笑，否则会引起矛盾，招来祸害。

戒直言：不要不顾后果地直言不讳，否则也会引起麻烦。

戒尽言：说话要含蓄，不要不留余地。

戒漏言：不要泄漏机密。“事以密成，语以漏败。”（《韩非子》）

戒恶言：不说无礼中伤的话，不要恶语伤人。“刀疮易没，恶语难销”。

戒巧言：不要花言巧语，花言巧语的人必然虚伪。

戒矜言：不要骄傲自满，自以为是。自矜自夸是涵养不够的表现。

戒谗言：不要背后说别人的坏话。背后说人坏话，会弄得天下都不太平。

戒讪言：不要攻人短处，揭人疮疤。揭人疮疤的人招人痛恨，害人害己。

戒轻诺之言：不要轻易向人许愿，轻易许愿就会丧失信用。

戒强聒之言：不要唠唠叨叨，别人不愿听也说个不停，使人厌烦。

戒讥评之言：不要说讥讽别人的话。喜欢讥讽议论别人的人，对自己的要求往往马虎。

戒出位之言：不要说不符合自己身份、地位的话。

戒狎下之言：不要对下属讲过分亲密的话，以免下属迎合你而落入圈套。

戒谄谀之言：不要说吹捧奉承别人的话，吹捧奉承别人是人品卑微的表现。

戒卑屈之言：不要低三下四，说奴颜卑膝的话，因为德厚者无卑词。

戒取怨之言：不要说招人怨恨的话。说话不要播下使人怨恨的种子。

戒招祸之语：不要说招来祸害的话。许多祸害往往是说话不当的结果。

《慎言集训》下篇讲应该提倡的十一种说话方式，与上篇相对应，有破有立。这十种说话方式是：

言贵简：说话要简洁。说话简洁，又能把意思表达清楚，把道理说明白，就可以提高品德学识的修养：多言，轻言，杂言，漏言，尽言，出位、狎下、强聒、讥评之言这些毛病也就可以根治了。

言贵诚实：说话以诚实为原则，丁是丁，卯是卯，一字是一字，一句是一句，不能脱离实际地乱说。能做到说话诚实，戏言、妄言、巧言、谗言、轻诺之言这样一些毛病就可以克服了。

言贵和平：说话要心平气和，不必疾言厉色。

言贵婉：言词委婉能够感动别人。

言贵逊：说话要谦逊，不要用言语激恼别人。懂得言贵平、贵婉、贵逊，

直言、讪言、恶言、矜言，以及谄谏、卑屈、取怨、招祸之言等毛病就可以避免了。

言贵当理：话不能随便说，说出来就要合情合理。

言贵时：说话要合时宜。该沉默时就沉默，该说时就说，依具体情况而定。

言贵养心：说话要有利于修养身心。言为心声，心地纯正，说话自然不差。

言贵养气：说话要心平气和，不冷静就会说出错话，招来怨恨，闹出乱子。

言贵有用：狄仁杰一言打消了武则天立武三思为太子的念头，保全了唐朝的社稷。颖考叔一言使郑庄公母子和好如初。晏子一言说服齐景公免除了刑刑（砍掉脚的刑罚）。这些例子说明有用之言才能利人济世。

《慎言集训》辑录的古人关于慎言的观点，有一些反映了传统思想的局限性。如戒出位之言是根据“不在其位，不谋其政”的思想推衍出来的。戒狎下之言是受“唯小人与女子为难养也”的影响。有一些观点缺乏具体分析，显得迂腐可笑。如戒直言、戒尽言不能脱离环境和对象。在原则问题上直言不讳，对同志、对朋友知无不言，言无不尽，是一种美德。即使是开玩笑的戏言，只要不失分寸，也有利于创造和谐的气氛，不能一概反对。戒多言，戒招怨取祸之言，如果只从个人利害考虑，不顾国家和人民的利益，也是不可取的。“逢人只说三分话，未可全抛一片心”（南宋普济《五灯会元》），是一种明哲保身的处世哲学，不值得提倡。

但古人和《慎言集训》中说的许多话，对我们是有参考价值的。例如：

言而有信是做人的基本原则，在任何时代都是适用。今天，我们仍然要言必信，行必果，说到做到。在有些问题上还要少说多做，先做后说，不能口是心非，说的是一套，做的是另一套。

不管什么人在什么时候，说话都要守信用，说到做到。领导说话算数，才能取信于群众。父母说话算数，才能取信于子女。在私人交往中说话算数，才能取信于朋友。在经营业务活动中说话算数，遵守合同，才能取信于合作伙伴。企业的广告宣传符合产品的实际，才能取信于顾客。言而无信，必然损害的信誉和形象，最终只能是害人害己，一事无成。

古人讲戒多言，言多必失，如果从积极方面理解，对我们也有益处。可以使我们说话准确精炼，减少废话空话，也可以使我们在复杂的社会生活中避免被人利用。“舌尖飞，泄心机”。在谈判桌上，因多言而漏底，就会处于不利地位。在公共场所和陌生人面前，因多言而泄密，就会给国家造成损失。在茶余饭后，说东遭西，飞短流长，就会影响人际关系，损害团结。还有人逢人便唠叨不休，这也是多言，只能使人厌烦，没有任何好处。当然，戒多言不是不说话，而是当说才说；也不是话越少越好，而是要恰当，尽量用较少的话把问题说清楚，做到要言不繁，一语中的。

古人在慎言方面的其他见解，如说话要看对象，不可交浅而言深；不可乘喜而多言，不可因怒而失言；不可花言巧语，阿谀奉承别人；等等，都值得我们细细玩味，从中吸取教益。

慎独自省

慎独自省是儒家的重要修身方法；要求人们自觉地按照道德原则反省检查和规范自己的言行，而且要从最隐蔽的地方和细微的地方做起。

“慎独”既是修身的方法，也是修身的境界，最早见于《中庸》、《大学》两书。《中庸》中说：“道也者，不可须臾离也，可离非道也。是故君子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惧乎其所不闻。莫见乎隐，莫显乎微，故君子慎其独也。”君子在人们看不到的地方，听不到的时候，都戒惧警惕，不让不符合道德的意念在隐晦细微处表现出来。

《大学》是在解释“正心”、“诚意”时讲到“慎独”的：“所谓诚其意者，毋自欺也。如恶恶臭，如好好色，此之谓自谦，故君子必慎其独也。小人闲居为不善，无所不至；见君子而后厌然，掩其不善，而著其善。人之视己如见肺肝然，则何益矣。此谓诚于中，形于外，故君子必慎其独也。”要求人们去恶从善，坚持善良的意志，不要自欺欺人，像小人那样，闲居无事时什么坏事都干，见到君子以后就遮遮掩掩。

《大学》《中庸》讲慎独的角度虽然不一样，但都强调修养的自觉性，把能否慎独作为区别君子小人的标准。郑玄解释“慎独”时说“慎独者，慎其闲居之所为。”朱熹从理学的观点对“慎独”作了进一步的解释和发挥。他认为“慎独”是对待唯己所知、而不为人所知的细微的事情上要谨慎不苟。这样才能存天理的本性，遏人欲于将萌而不使其滋长于隐微之中。他把“慎独”作为“存天理，灭人欲”的重要方法。理学家们把天理和人欲对立起来，这是应该摒弃的。那么慎独的修身方法是否也应该摒弃呢？需要具体分析。

慎独作为一种修养的方法仍有可取之处。它反映了道德形成的客观规律。道德成为人们的行为规范，要靠内心的自觉，不能靠外力的强制。这种自觉性是由于人们把道德规范化为内在的信念，因而能在别人看不到的地方，听不到的时候，也能够自觉地遵守，不做违反道德要求的事情。由于道德规范已化为内在信念，就能从人们的一切言行中表现出来。不仅在公开的、大的事情上能按道德原则办事，在闲居独处、无人监督的时候，也能在各种细小问题上谨慎行事，不做违反道德原则的事情。按照这样的方法进行修养，就可以达到高尚的道德境界。

慎独也可以作为识别人的道德品质的方法。一个人的道德品质往往从最隐蔽、最细微的地方真实地暴露出来。在公开场合，在大的问题上，由于法制、舆论的压力，人们不能不检点约束自己的言行；在独处无人监督时，或者在细小的问题上，就容易放纵自己，暴露出真实的思想面目。还有一种人自觉地伪装自己，给人以假象，我们也要在日常生活和细小的问题上考察他们的思想本质。

中国古代正直的文人学者，多以慎独为修身的重要方法，也有不少人达到这种高尚的道德境界。《后汉书·杨震传》有一则“暮夜无知”的故事：

杨震被任命为东莱太守，赴任时“道经昌邑，故所举荆州茂才王密为昌邑令，谒见，至夜怀金十斤以遗震。震曰：‘故人知君，君不知敌人，何也？’密曰：‘暮夜无知者。’震曰：‘天知，神知，我知，子知，何谓无知！’密愧而出。”

王密感激杨震过去举荐之恩，晚上拜谒时送他十斤黄金，说‘黑夜无人知道’。杨震严词拒绝，可算是“慎独”的范例。吕坤从这则故事中引出一

条人生教训：“‘暮夜无知’，此四字百恶之总根也。大奸大盗，皆自无知之念充之。”那些大奸大盗干坏事的时候，都自以为别人是不会知道的。这样一种侥幸心理是产生各种罪恶的总根子。还可以补充一点：一切恶行不仅是从无人知道的地方开始的，也是从细小的事情上开始的。先偷偷干点小的坏事，然后胆子越来越大，以至贼胆包天，犯下大的罪行。这样的例子现在也不少见。因此慎独的修身方法仍有现实意义。

刘少奇在谈共产党员修养时说：“即使在他个人独立工作、无人监督、有做各种坏事的可能的時候，他能‘慎独’，不做任何坏事。”说明“慎独”适用于共产党员的修养，自然也运用于一切人的道德修养，只是修养的内容和要求与古人不同。今天我们不是要修养成为古代的谦谦君子，而是要修养成为具有社会主义道德的“四有新人”。我们要达到这个目的，也需要有“慎独”的高度自觉性。

“慎独”和“自省”相联系。有自省的工夫，才能达到慎独的境界。慎独也是自省的内容之一。自省、内省、自讼、自反，都是指自我解剖，自我检查，自觉地改正缺点错误。

孔子首先倡导自省、内省、自讼的修养方法。他说：“见贤思齐焉，见不贤而内自省也”（《论语·里仁》）；“内省不疚，夫何忧何惧？”（《论语·颜渊》）看到好的人和事要学习，看到不好的人和事要自我反省，有没有同样的缺点错误；如果有就自觉改正，如果没有，就无忧无惧，心安理得了。

《论语》中记载了曾子内省的故事：“曾子曰，‘吾日三省吾身：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传不习乎？’”曾子每天从办事、交友、学习三方面进行检查，是否达到了忠信和学而时习之的要求，树立了自省的范例。因此朱熹称赞说：“曾子以三者日省其身，有则改之，无则加勉，其自治诚且如此，可谓得为学本矣。”

孟子说：“君子必自反也。”（《孟子·离娄下》）。荀子也认为君子要“博学而日参省乎己”。孟子说的“自反”和荀子说的“参省”，同孔子说的“自省”、“内省”一脉相承，都是要求人们自觉地检查反省自己的思想言行，发扬优点，克服缺点，以达到提高道德水平的目的。

孔孟之后，自省一直是儒家倡导的基本修养方法。明代王守仁提倡的“省察克治”也是从自省方法发展而来的。王守仁的“省察克治”方法是要求人们通过自我检查，克服不符合道德要求的思想行为，而且要持之以恒。要把隐藏的私利欲念搜索出来，加以克治，不可姑息。如果有丝毫私利欲念存在，众恶便相引而来。可见“省察克治”是为了达到“存天理，灭人欲”的目的，这是不可取的。不过这种方法也反映了思想斗争的某些规律：善恶观念此消彼长，姑息恶念，将成大恶。我们培养道德观念也应该注意这个问题。

儒家自省的修养方法基本上是把道德修养看作封闭的个人内心活动，有自觉性、能动性的合理因素，也有脱离群众、脱离实际的唯心主义倾向。我们要克服其唯心主义倾向，发扬其自觉性、能动性的合理因素，为建设社会主义道德服务。

首先，要运用自省的方法正确地认识自己。人贵有自知之明，对自己的思想、学识、能力，对自己在社会中的地位、角色、作用等等，有正确的认识和评价。这样，才能获得自控能力，提出恰当的目标、计划和要求，以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没有自知之明，就会陷入盲目性而四处碰壁。古人说：

“自知者英，自胜者雄”（王通《文中子·周公》），讲的就是这个道理。但正确认识自己并不是容易的事情。“人虽至愚，责人则明，虽有聪明，恕己则昏”。（《小学集注·广敬身》）看别人，明察秋毫，看自己就糊涂了。这就需要有自省的自觉性，时时注意反观自己，检查自己，努力做到对自己有一个客观的认识和评价。在自省的时候，要注意听取别人的意见，校正自我认识的盲目性。“占之人目短于自见，故以镜观面；智短于自知，故以道正己。”（《韩非子·观行》）虚心听取别人意见和自省自反是相辅相成的。

其次，要运用自省的方法自觉地克服缺点错误，达到自我完善的目的。人无完人，即便是圣贤也难免有缺点过失。只有不断克服缺点，才能达到成熟完善的境界。因此君子闻过则喜，“过而能改，善莫大焉。”（《左传宣公二年》）每一个要求进步、追求成功的人，都要自觉地解剖自己的思想，反省自己的言行，自觉地克服缺点错误。鲁迅说：“我的确时时解剖别人，然而更多的是更无情地解剖我自己。”（《写在坟的前面》）鲁迅正因为无情地解剖自己，才能坚持新文化革命的正确方向，成为新文化革命的伟大旗手。

再次，人人都注意内讼自省，有利于人际关系的和谐和社会的安定团结。小至家庭团体，大至国家社会，人们相处总会有矛盾冲突。有了矛盾冲突，大家都能反躬自问，从自己身上找原因，矛盾就容易化解。如果只从别人身上找原因，自己处处皆是，别人处处皆非，小矛盾也会变成大矛盾，甚至发展到对抗冲突、势不两立的地步。我们还是要提倡对己严，对人宽，各自多作自我批评。有了矛盾，先从自己身上找原因，凡是要求别人做的自己首先做到，善于求大同，存小异，不把时间精力花在无益的争论上。这样便能创造良好的人际环境，有利于发挥个人的聪明才智和事业的成功。

外国人中也有自省修身的例子。富兰克林就曾自订每天自省的十三项内容：1. 节制。食不过饱，饮酒不醉；2. 沉默寡言，避免无益的聊天；3. 生活秩序：每件东西放在一定位置，每件日常事务应有一定的时间；4. 决心：要做的事情坚持不懈；5. 俭朴：切戒浪费；6. 勤勉：每时每刻做些有益的事情；7. 诚恳：不欺骗人；8. 公正：不作不利于人的事情，不忘记对人应尽的义务；9. 中庸适度，避免极端；10. 清洁；11. 镇静：勿因小事和不可避免的事故惊慌失措；12. 贞节，切戒房事过度；13. 谦虚：效仿耶稣和苏格拉底。富兰克林并不知道儒家自省的修养方法，但他做的却合乎自省自反的要求。这说明自省的方法反映了品德修养的规律，因而具有普遍的意义。

回归大自然

人和自然有密切的关系。司马迁撰写《史记》是“欲以明天人际，通古今之变”。“天人之际”就是人和自然的关系。这是中国哲学中的一个重要问题，也是人生修养中的一个重要问题。

孟子认为：“尽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则知天矣。”（《孟子·尽心上》）尽人之性可以认识天道，人性与天道是相通的。

《中庸》也说：“唯天下至诚，为能尽其性。能尽其性，则能尽人之性。能尽人之性，则能尽物之性。能尽物之性，则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则可以与天地参矣。”一方面肯定天人合一，另一方面又肯定人的能动性。人能尽物之性，了解自然的规律，就以赞助天地化育万物的过程，人也就可以与天地并立而达到三位一体了。

既然人是自然的一部分，人道与天地互相联系，互相贯通，那么从生机勃勃、衍化流行的自然界中获得人生的感悟和启示，就成为人生修养的重要途径和方法了。

山川风物可以激荡心灵，开拓胸怀。“登山则情满于山，观海则意溢于海”（陆机《文赋》），说明自然景物可以影响人的情感。“登东山而小鲁，登泰山而小天下”，说明登山望远，可以开拓、提高人的眼界。曹操东临碣石，看了“秋风萧瑟，洪波涌起”的壮丽景象之后，写下了《观沧海》的不朽名篇。曹操“烈士暮年，壮心不已”的情怀，和他观海的感受自然是相通相应的。范仲淹的《岳阳楼记》，写登楼所见“衔远山，吞长江，浩浩汤汤，横无际涯”的洞庭景色，引起人们“去国怀乡，忧谗畏讥”和“心旷神怡，宠辱皆忘”的不同感受；然后抒发出“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高尚情怀。这也说明自然景物和人的精神情感有密切的感应关系。

洪应明说：“‘霜天闻鹤唳，雪夜听鸡鸣’，得乾坤清纯之气；‘晴空看鸟飞，活水观鱼戏’，识宇宙活泼之机，”又说：“‘乐意相关禽对语，天光常与水相连’，此是彻上彻下的真境。吾人时时以此景象注之心目，何患心思不活泼，气象不宽乎？”从霜天鹤唳、雪夜鸡鸣、晴空鸟飞、活水鱼戏中，感受到自然界的清纯之气和活泼生机。看禽鸟对语，水天一色，顿觉心思活泼，气象宽平。此种奇观妙景，可以净化人的心灵；使人们从赏心悦目中获得人生的感悟，达到物我一体、物我相忘的境界。

古人谈学习时，强调不仅要读有字书，还要读无字书。大自然就是一本无字书。投身到大自然中，不仅可以陶冶性灵，还可以助长学识。许多名人都是读万卷书，行万里路，而后获得杰出成就的。

司马迁写出伟大的历史著作《史记》，不仅是因为他掌握了丰富的遗文古书、诸子杂记等历史档案资料；还由于他二十岁时就走出家门，游历南北名山大川，考察历史遗迹，掌握了许多书本上没有的历史资料。

顾炎武成为杰出的思想家，也得益于读万卷书，行万里路。他“九州历其七，五岳登其四”，走遍大半个中国，搜集了大量的资料。他的许多著作就是根据亲自掌握的第一手资料写成的。全祖望说：“凡先生之游，以二马二骡载书相随。所至厄塞，即呼老兵退卒询其曲折。或与平日所闻不合，则即访肆中发书而对勘之。”（《顾亭林先生神道表》）这样边读书，边调查，援古证今，使他的著作少有疏漏，受到世人的重视。

徐霞客成为伟大的地学家，得益于山川景物之助就更加直接和明显了。

他从 22 岁开始，直到去世为止的 30 年中，足迹遍于华东、华北、中南和西南，深入到道路险阻、人迹罕至的地方，搜奇访胜，获得大量新的资料和结论，纠正了过去旧的成说。

大自然中的花木鸟兽是人类的朋友，可以给我们人品人格方面的启示。孔子说：“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也。”（《论语·子罕》）从耸立寒天、经冬不调的松柏，领悟到人应该具备的坚贞不屈的品格。松柏的挺拔苍劲，又给人以俯视众生、崇高庄严的气象，松柏的风格成为理想人格的象征。因此，松柏是中国人最喜爱、最尊崇的植物，是文艺创作的传统题材之一。

和松柏并称为“岁寒三友”的还有竹和梅。竹除了经冬不凋以外，还因为它直节、空心，使人联想到正直、谦虚的美德。白居易诗云：“千花百草凋零后，留向纷纷雪里看。”苏东坡说：“可使食无肉，不可使居无竹。无肉令人瘦，无竹令人俗。”他们从竹的超凡脱俗的品格联想到坚贞、正直、谦和的君子之风。

梅和松竹一样，也有坚贞的品格。在悬崖百丈冰、众芳销歇的时候，只有它凌霜雪而怒放。这可以给人不怕困难、不随流俗、高标自立等多方面的人生启示。它和松竹并称为“岁寒三友”是很自然的。“岁寒三友”也是中国文人雅士的至友。林和靖隐居西湖的时候，就特别钟情于梅和鹤，有“梅妻鹤子”之说。

荷花也给人以品格的启示。周敦颐曾作《爱莲说》，赞美荷花“出污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是“花之君子也”。荷花深得人们的喜爱，广为种植。这不仅因为它的花可观赏，藕可食用，还由于它色虽艳丽但不失高洁的品格。

鸟类中的鹤和鸥则为高洁隐逸之士所钟爱。北宋李昉称鹤为仙客，鸥为闲客。鹤的超群突兀的体态，虽饥渴而饮啄犹闲的性格，颇合高士们的旨趣；在春风暖日中鸥眠的悠闲自得，也颇合隐士们的生活情趣。

大自然对人生的作用还表现在：佳境幽趣可以解除尘世的烦恼，使心灵获得平衡和慰藉。陶渊明不为五斗米折腰，回到大自然中获得了生活的真趣。他在《归田园居》等诗篇中，抒发了隐居后轻松、解脱的愉快心情：“久在樊笼里，复得返自然”；“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挣脱尘世的牢笼，回归自然，所获得的生活真趣不可言说。陶渊明的感受是真实可信的，不然他何以能写出自然真淳的不朽诗篇。

柳宗元被贬官到永州后，也常以山水自娱，到处搜奇揽胜，发现许多人间幽处胜境，并写成著名的《永州八记》。《永州八记》虽然时有抑郁不平的愤慨，但那些佳丽山水仍能使作者获得心灵的慰藉，因而他的游记在激愤之中仍然呈现出平淡的风格。

大凡一些失意的文人官吏，在仕途受阻之后，便走退居山林这一条路，从大自然中寻找精神的寄托。“宠辱不惊，闲看庭前花开花落；去留无意，漫随天外云卷云舒。”（洪应明《菜根谭》）以闲适超脱的人生追求，平复失意的心灵的创伤。而“山间之空翠，水上之涟漪，潭中之云影，草际之烟光，月下之花容，风中之柳态”，也“足以悦人耳目而豁人性灵”，使人重新获得生活的乐趣。大自然是人类的母亲，她敞开胸怀，抚慰人们的心灵创伤；它的奇妙疗效是毋庸置疑的。

现在，人类对自然的认识，已远远超过前人。人类征服自然、改造自然的能力大大提高了。改造利用自然的结果，使自然界处处打下人的印记，原

生自然界已成为人化的自然界。这一方面是文明的成就，另一方面也造成了人类的环境危机。荒芜的土地变成肥沃的良田，寂静的山林变成喧嚣的城市。由于对自然过度开发利用，破坏了人和自然的和谐关系。森林面积减少，草原退化，资源枯竭，大气、土壤和水被严重污染，某些生物的品种日益减少，有些已经灭绝或濒于灭绝的边缘，等等。这些都对人类的生存造成威胁。这样，正确处理人和自然的关系，不只是一个古老的哲学命题，而且是一个需要正确研究解决的时代课题。古人重视人与自然亲和关系的观点，今天仍有很强的现实意义。

我们需要大自然提供优美的生存环境，需要佳木名花作伴侣，需要珍禽异兽作朋友。人人都需要一方绿地，需要鸟语花香。如果只有高楼大厦，则无异生活在牢笼中。

我们在紧张工作之余，需要到大自然中去调剂生活节奏，领略大自然的奥秘和活泼生机。现在发达国家的居民又对大自然产生兴趣。有钱的富人纷纷在远离城市的乡村建立别墅，享受大自然赋予的生活乐趣。这说明回到大自然中，是提高生活素质，保持身心健康所不可缺少的条件。

现代人重返大自然，只要不是匆匆忙忙地看热闹，而是心与自然契合，就会引起共鸣，产生种种联想。看江河奔流，高峰耸立，胸中就会升腾起崇高壮丽的感情；看禽鸟对语，花树交生，就会忘却尘世的欲念烦恼，进入一个绝俗的世界；融合人类历史活动的人文景观，更能使人俯仰古今，引起种种追思和遐想。这说明即使在今天，大自然对人们心灵的启示作用也是不可忽视的。

培根写过一篇《论旅行》，文中说：“对于青年人，旅游是一种教育的方式。而对于老年人，旅游则构成一种经验。”文中对旅游前应该怎样作准备，旅游时应该注意观察哪些事物，都一一作了指点。卢梭在《徒步旅行》中说：“我从来没有像在独自徒步旅行中那样充分思想，充分存在，充分生活，充分体现自我。”“天气晴朗时，步行在路上，周围是秀丽的景色，前方是惬意的目的地：这就是我最喜欢的生活方式。”路易斯·史蒂文森也写了一篇《徒步旅行》，畅谈旅行的乐趣之后，感叹世人只一刻不停地忙于办事，忙于写作，忘记了生活本身。这几位外国人也认为游览风光景物，考察世俗风情，对于人们的心智是非常有益的。我们能和大自然建立起亲密和谐的关系，我们的生活将更美好，我们的心智将获得更加全面的发展。回归大自然，仍然是现代人的重要修身方法。

待人篇

和为贵

人际交往是人类存在的方式。没有人际交往，就没有人类的社会生活，也就没有社会化的人类。个体的人通过与他人交往，获得信息和知识，发展体力和智力，参加生产、学习等社会活动。一个离群索居的人，不仅体力智力会退化，还会因孤独而导致心理失衡和过早死亡。美国心理学家伦纳德·西默作过抽样调查，发现独居男子的死亡率比喜欢交际的男子的死亡率要高一倍。

因此，人际交往是人类的基本需要，每个人都乐于和他人交往，互相交流信息，倾诉感情，切磋学问和技艺。人际交往的范围、方式和原则，受生产方式和传统文化的影响。中国古代的人际交往方式受小农经济和宗法制度的制约，以家庭血缘关系为基础，进而扩大到邻里、同事、朋友等不同的层次。又由于中国的传统价值观念重群体精神，因而追求和谐稳定的人际关系。中国人的社会交往中，重人缘，重友谊，重对他人的关心和责任，注入了更多的感情、道德因素，和西方人重个人，重竞争，重现实物质利益有明显区别。

孔子说：“礼之用，和为贵。先王之道，斯为美，小大由之。”（《论语·学而》）礼的运用以促进和睦为最宝贵，古代圣王的治国之道中，“和”是最重要的，这是从政治角度谈“和”的重要作用。孟子也说：“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孟子·公孙丑下》）认为“人和”是在军事、政治斗争中取胜的主要因素。

古代思想家强调“和为贵”和中庸之道是一致的。调节矛盾，使社会达到适当、适度的平和状态，是一种最高的理想境界；因而在社会生活中，强调人和，反对纷争。因为“和则一，一则多力，多力则强，强则胜物”；“争则乱，乱则离”，离则弱，弱则不能胜物。”（《荀子·王制》）

古人认为：“和为贵”不仅适用于人事，也适用于自然宇宙，适用于人与自然的关系。阴阳调和，滋生万物，风雨调和，始有丰年。人与自然并不对立，而是相通相依。虫鱼鸟兽可以成为人类的朋友，山川草木可以成为人们心灵的依归。

在人际交往中，“和为贵”是一项基本原则。它适用于人际交往的各个层次。

家庭是社会的细胞。和睦的家庭是社会稳定的基础，兴旺的家庭是社会进步的标志。家庭是人生的摇篮，美满的家庭为少年儿童的健康成长提供理想的环境。家庭是人生的港湾，温馨的家庭为青壮年奋进拼搏提供支持和慰藉。家庭是人生的归宿。幸福的家庭为老人安度晚年提供物质的和精神的保证。尽管现在传统的大家庭已开始解体，向小型化发展，家庭的一部分职能已开始由社会化的组织承担，但家庭对人生的影响仍然是不可忽视的。

“家和万事兴”。在家庭关系中坚持“和为贵”的原则，才能使家庭兴旺发达。夫妻和有利于双方在事业上互相支持，携手同行，有利于子女在和谐融洽的气氛中健康成长，有利于老年人在祥和的气氛中愉快地度过晚年。夫妻不和，以至反目成仇，家庭破裂，就会上不能供养父母，下不能抚育子女，给他们留下难以平复的精神创伤，实为人生的悲剧。此外，父子之和，

婆媳之和，兄弟姐妹之和，也是家庭中形成祥和温馨气氛的必要条件。如果父子不和，婆媳不和，兄弟姐妹不和，都会损害家庭成员之间的亲情，造成紧张沉闷的气氛。在这样的家庭气氛中，每一个人都会感到精神上的压抑和痛苦。

家庭矛盾一般不具有对抗性质，要多一些宽容、理解和交流，少一些冲动和对立。晚辈对长辈要尊重、关心，长辈对晚辈要爱护、引导。夫妻之间要互敬互爱，互信互谅，互勉互励。鲁迅《题赠许广平》诗云：“十年携手共艰危，以沫相濡亦可哀。聊借画图怡倦眼，此中甘苦两心知。”夫妻两心相知，在困境中相濡以沫，在顺境中比翼齐飞，自然可以化解一切困难和矛盾，在建立团结和睦的家庭关系中起支柱作用。

邻里关系中也应该坚持“和为贵”的原则。邻里关系因地缘关系而确立，没有血缘的联系，也不一定有工作和事业上的联系。但邻里关系对个人、家庭和社会都有重要影响。

孔子说：“里仁为美，择不处仁，焉得知？”（《论语·里仁》）《周礼》中以“五家为邻，五邻为里。”《管子·度地》中以“百家为里”。这说明邻里是人们生活的直接环境。邻里的社会风气、道德水平直接影响每个人的思想品德。因此孔子主张：选择住处的时候，要选择有仁德之风的邻里，这样才算是聪明人。孟母曾三次迁徙，为孟子的成长选择理想的地域环境。现代城市居民的邻里已发展成为社区，形成一定的社区文化。社区的风气和人际关系如何，不仅影响个人的成长和幸福，也影响社会的文明进步。古人说：“远亲不如近邻。”邻里之间和睦团结，可以使人们生活在愉快祥和的气氛中，有困难互相关心，互相帮助；可以形成健康文明的社会风气，促进社会的安定团结。邻里相争，产生矛盾和隔阂，就会破坏团结互助的社会风气，造成人际关系的紧张，增加精神上的负担和痛苦。

“德不孤，必有邻”（《论语·里仁》），要搞好邻里关系，关键在于提高每个人的思想道德素质。例如：要尊重他人的利益，不能只顾自己方便，不为他人着想；更不能以邻为壑，损害和侵犯他人的利益。发生矛盾以后，要检查自己，体谅别人，不可为一点小事斤斤计较，争吵不休；更不能覆私护短，无理取闹。邻里矛盾常常是从闲话流言中产生的。喜欢搬弄是非、飞短流长的人，会使邻里间无端生出许多是非，小则增加矛盾，大则酿成悲剧。如果能从以上这些方面提高自身的修养，就可以避免因细小事情破坏邻里关系，收到“德不孤，必有邻”的效果。

一个机关，一个团体，一个企业，也要以“和为贵”的原则处理同事关系、部间关系、上下级关系以及领导者被领导者之间的关系，使大家感情相通，目标一致，同心同德。在这种团结融洽的人际关系中，才能发挥每个人的积极性、创造性，才能把每个人的积极性、创造性联合起来，形成克服困难的强大合力。古人说：“同恶相助，同好相留，同情相成，同欲相趋，同利相好。”（《史记·吴王濞列传》）因为有同样的爱憎，就能互相帮助扶持；因为有共同的目标和利益，就能同甘共苦，同生同死。这种因“众志成城”而产生的巨大力量，是工作事业取得成功的根本保证。一个团体、企业或工作部门，如果人心涣散，关系紧张，情绪对立，个人的聪明才智就会因内部矛盾互相抵消，工作和事业就很难有起色。

日本企业家将“和为贵”的思想运用于现代企业管理，倡导“和谐高于一切”的人际关系，发扬“团队精神”、“家族主义”，促进企业员工之间

的团结合作关系，促使员工为企业效力。这些作法对日本战后的经济恢复和腾飞起了重要作用，形成具有东方文化特色的管理模式。西方管理学家也开始重视人的因素，强调职工参与和民主管理的重要性，使管理者和职工的积极性融为一体，改善企业中人与人的关系，以发挥职工的积极性，提高生产的效率和效益。可见“和为贵”的原则在现代社会中并未丧失它的作用。

从家庭、机关、团体、企业推而广之，和谐团结的人际关系，关系到社会的稳定，国家的强盛，民族的兴衰。和则治，治则兴；争则乱，乱则衰。中国历史展示给我们的就是这样的情况。秦结束战国纷争的局面，而后有汉的强盛；隋结束南北分裂的局面而后有唐的辉煌；中国共产党结束列强争夺、军阀混战的局面，才迎来了民族的复兴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新时期。今天世界形势已发生重大变化，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的主题。和平要靠团结去争取，发展需要有社会的稳定。时代给我们提供了发展的良好机遇。全国人民同心同德，把握机遇，振兴我们的国家和民族，这是我们的共同目标；人民的团结，社会的稳定，人际关系的和谐，是实现这一目标的前提。

维护团结稳定的政治局面，建立和睦融洽的人际关系，不仅是发展的前提，也是发展的目标。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包括物质文明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两个方面。团结和谐的人际关系，文明礼貌、遵纪守法的社会风尚，是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内容之一。从个人来说，不仅需要富裕的物质生活，还需要亲情友谊，需要心灵的沟通、理解和交流。如果不能满足这种精神情感方面的需要，即使成了百万富翁，人生仍然是痛苦的，不幸的。

当然，稳定不是停顿，和谐团结不是不分是非，放弃原则。稳定要促进改革，保证发展，和睦团结要做到“和而不同”，“和而不流”。把“和为贵”变成与坏的思想行为同流合污，当然是完全错误的。如果我们对这个问题有全面的认识和把握，那么“和为贵”的思想，就可以成为处理人际关系的基本原则，成为人际关系的理想境界。

爱人之心

研究人际交往和人际关系问题，不能不提到孔子的仁爱学说。《吕氏春秋》列举诸子学说异同时曾经指出：“老聃贵柔，孔子贵仁，墨翟贵廉（节俭）”（《吕氏春秋·审分览·不二》），把“仁”作为孔子思想的核心。

仁的思想在孔子之前就已经提出了。《春秋左传》中说：“出门如宾，承事如祭，仁之则也。”（僖公三十三年）《国语·晋语》中引舅犯的话说：“亡人无亲，信仁以为亲。”可见“仁”这个词在春秋时期已经广泛使用，其含义是一种亲善、亲密的人际关系。孔子继承和发挥仁的思想，赋予“仁”以新的意义，使之成为最高的道德准则。

在《论语》中孔子谈“仁”的言论很多，在《颜渊》篇中更有集中阐述和发挥：

颜渊问什么是仁，孔子回答说：“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颜渊又问仁的细目，孔子回答说：“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

仲弓问什么叫仁，孔子回答说：“出门如见大宾，使民如承大祭。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樊迟问什么叫仁，孔子回答说：“爱人。”

在《雍也》篇中孔子回答子贡的问题时又说：“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

以上关于仁的观点，除“出门如见大宾，使民如承大祭”见于《春秋左传》以外，都是孔子的见解和发挥。孔子认为仁的基本含义是“爱人”。爱人的出发点是承认人人都有独立的人格，都应该受到尊重。爱人就要做到“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前者是从消极方面讲不应该怎样做，后者是从积极方面讲应该怎样做。两者都是讲要推己及人，设身处地为他人着想，并积极地关心和帮助他人。

孔子说的“仁”是和“礼”结合的，要克服自己的私欲，回复到礼的原则上去。一方面讲爱人，另一方面又讲维护贵贱尊卑的等级制度，这是孔子思想的内在矛盾。但孔子讲仁是真诚的，仁是他所追求的最高精神境界，是他所推崇的君子人格的核心。

孟子继承和发挥孔子的思想，将仁德运用于政治，提出“仁政”的学说：“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孟子·尽心上》）仁政是仁爱之心的扩大。有了仁爱之心，才能关心民众的疾苦，才能普遍地爱天下人：做到“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

在先秦诸子中，墨子也讲爱人，“视人之国若视其国，视人之家若视其家，视人之身若视其身”；要“天下人皆相爱，强不执弱，众不劫寡，富不侮贫，贵不敖（傲）贱，诈不欺愚。”（《墨子·兼爱中》）这就是墨子主张的兼爱，即无差别地爱一切人。他一生为此奋斗不息，表现出崇高的自我牺牲精神。

法家是反对仁义的，认为威势可以禁暴，德厚不足以止乱。（见《韩非子·显学》）治国不能讲仁爱，而要严刑峻法。道家也批判仁义学说。老子说：“绝圣弃智，民利百倍；绝仁弃义，民复孝慈。”（《老子十九章》）在老子看来，智巧仁义都是巧饰的东西，不能用以治天下；只有抛弃仁义以后，人民才能恢复孝慈的天性。庄子认为：“夫孝悌仁义，忠信贞廉，此皆自勉

以役其德者也，不足多也。”（《庄子·天运》）孝悌仁义和忠信贞廉都是违反人的本性的，是束缚人的刑罚，不值得赞美。

法家否定思想教化和伦理道德的作用，显然失之偏颇。道家批判仁义，但没有提出取代它的思想原则。因此儒家的仁爱学说仍然是中国古代影响巨大的道德原则，并被文人学者们不断提倡和发挥。唐代的韩愈曾作《原道》，对仁义道德作出下面的解释：

“博爱之谓仁，行而宜之之谓义，由是而之之谓道，足乎已无待于外之谓德。”

在韩愈看来，仁是博爱，义是行为合乎社会的等级秩序，实行仁和义就是道，内心具备了仁和义就是德，道德以仁义为内容，道德不能离开仁义。他以此立论，批判佛道两家以“清静寂灭”作为道德内容的观点。

宋代的张载对儒家的仁爱学说也有发挥。他在《西铭》中说：“民吾同胞，物吾与也。”张载认为：天地是人民的父母，自天子到天下的受苦人都是兄弟；不过仍有富贵贫贱之分。“富贵福泽，将厚吾之生也；贫贱忧戚，庸玉汝于成也。”富贵是天地的恩赐，贫贱也是天地给予的锻炼机会，每个人应该乐天知命，安分守己。张载的“民胞物与”是调和等级矛盾的兼爱思想，他所追求的是以社会为大家，人与人之间“立必俱立，知必周知，爱必兼爱，成不独成”，以达到相亲相爱的目的。

应该怎样评价儒家和墨家的仁爱学说，我们是否可以从中汲取一些有益的成分呢？

毛泽东曾经指出：“世上决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至于所谓‘人类之爱’，自从人类分化为阶级以后，就没有过这种统一的爱。”（《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在阶级社会里，博爱的确不曾有过。爱与恨互相联系，爱善的美的东西，不能同时又去爱恶的丑的东西，爱人民，爱同胞，不能同时又去爱坏蛋，爱敌人。孔子的“泛爱众”，墨子的无差别的爱，都有空想的成分。实际上儒墨的仁爱思想有明显的阶级性。墨子并不主张废除贫贱富贵的差别，只是要求不相欺凌而已。孔子讲爱人，又讲维护尊卑等级的礼。孟子讲民为贵，讲仁政，又讲“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韩愈讲博爱，又讲“民不出粟米麻丝、作器皿、通货财以事其上则诛”，如此等等。这都说明，儒家倡导的仁爱学说，是以维护封建等级制度为前提的。正因为如此，它才成为官方大力提倡的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

不过，我们对儒家的仁爱思想还要进一步作全面的具体的分析。它除了为巩固封建统治制度服务以外，还有反对苛政暴政和协调人际关系的积极作用。在长期的封建社会中，一些比较正直、开明的官吏和思想家，从仁爱、仁政的思想出发，关心人民的疾苦，主张和实行减轻人民负担的惠政，反对残酷压迫剥削人民的暴政、苛政。有些人还做了许多造福人民的好事。这对广大人民是有利的，不能简单地加以否定。

仁爱学说在处理人际关系中的积极作用更加明显。今天我们研究如何处理人际关系时，应该认真总结这份宝贵的思想遗产，以便从中获得有益的启示。

人与人是同类。人类是社会性的有理性的群体。人际交往是“人类生命表现的器官和人的生命的一种占有方式。”（《马克思恩格斯全集》42卷125页）人类为了向大自然索取生活资料，需要互相联系，互相协作。随着社会的发展，人际交往成为人的精神和情感的需要，原来作为手段东西成了目的。

“人与人之间的兄弟情谊在他们那里不是空话，而是真情，并且从他们那由于劳动而变得粗犷的容貌上向我们放射出人的高贵精神的光辉。”（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94页）人际交往不仅是劳动、工作的需要，也是精神情感的需要。人与人相互友爱的真情，表现人的本性和精神光辉。在把握这种人的本性方面，儒家比道家更接近真理。人和禽兽不同。禽兽之间是弱肉强食、互相残杀的关系，人则具有感情和理性。他们在生产、生活中互相协作，在思想感情上互相友爱，互相交流，充满亲情和友情。如果人与人之间没有情感，没有友爱，人就会丧失作为人的本性而沦为禽兽了。我想应该从这个角度来把握仁爱学说的合理性。

在原始社会，人类结成了纯朴的亲善关系。进入阶级社会以后，这种纯朴的亲善关系被破坏了。人们为了个人和阶级的利益互相仇视，互相倾轧。在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里，统治阶级和被统治阶级是奴役与被奴役的关系。在资本主义社会里，人与人是赤裸裸的金钱关系，人对人不是人，而是狼。

在社会主义社会里，消除了剥削制度，为建立“人对人是人”的平等友爱关系创造了条件。但在过去的一段时间里，我们过分强调人与人之间的斗争，把友爱、同情等作为小资产阶级的温情主义加以批判，造成人际关系的扭曲和冷漠。在市场经济的大潮中，人们又受到拜金主义、利己主义的冲击，道德价值观失落，只顾自己、不顾他人的人增多了，只讲现实物质利益，不讲友爱、同情和关心帮助他人的现象也发生了。但友爱、同情等珍贵的情感是人类的本性。人不能只有个人优越的物质生活，没有充满友爱的精神情感，人不能生活在孤独的、冷漠的甚至紧张、仇视的人际关系中。因此人们又想起孔子“仁者爱人”的呼唤。“让世界充满爱”，“只要人人都献出一点爱，世界将会变成美好的人间”，这便是现代人对两千多年前孔子“仁者爱人”的积极回应。

今天，我们可以做到真正用爱人之心处理人际关系，我们“爱人”的范围也远远超过孔子所处的那个时代。对人民，对热爱社会主义祖国的炎黄子孙，对同情支持我们朋友，对那些过去干过坏事、现在改恶从善的人，我们都不妨以爱心待之。当然，我们还不能实行无差别的统一的爱，不能爱坏人和敌视反对我们的人。爱坏人、爱敌人和爱人民、爱朋友是相冲突的，二者不可得兼。对敌人仁慈，就是对人民犯罪，这句话仍然是真理。

尊重人是爱人的前提。要承认人和人是平等的，不论富贵贫贱，尊卑长幼，每个人都有独立的意志和人格尊严，要尊重别人的意志和人格尊严。人当然要自爱自尊，但又不能过于自爱自尊。“人不自爱，则无所不为；过于自爱，则一无所为。”（吕坤《呻吟语》）过于自爱自尊，就不会去爱别人和尊重别人。

要同情和理解别人。以推己及人之心设身处地为他人着想。别人有了困难和不幸的事情，我们能给予安慰和鼓励，就会使别人获得战胜困难和不幸的精神力量。别人有了过失，我们要了解他的本意和产生过失的主客观原因，作出实事求是的分析，提出切实有益的建议。

要关心和帮助他人。爱人不能只停留在口头上，要有实际行动。别人有困难，要济人之难，扶人之困，一方有难，八方支援。墨子说：“有力者疾以助人，有财者勉以分人，有道者劝以教人。”（《墨子·尚贤下》）每个人都能根据自己的条件和能力去帮助别人解决困难，就会使处于逆境的人重新踏上人生的坦途，获得人生的幸福。

帮助别人要遵循“君子爱人以德”和“君子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恶”的古训。爱是有原则的，要成人之美，帮助别人上进，帮助别人实现美好的愿望，成就有意义的事业，不能帮助别人去做危害社会和他人坏事。

爱人，同情和关心帮助别人，是人类美好的感情和崇高的德性。它是无私的，爱是奉献，不是索取。这种无私奉献的爱，不会因奉献而减少，只会因奉献而增加。因为“爱人者，人必从而爱之，利人者，人必从而利之；恶人者，人必从而恶之，害人者，人必从而害之。”（《墨子·兼爱中》）。每个人付出的爱，会得到加倍的回报。这种回报，不仅是别人的同情、关心和帮助，还有精神情感上的满足和充实，以及充满友爱的世界和人际关系。生活在这样社会环境中，人们会获得真正的幸福。

知人之明

正确进行人际交往，需要有知人之明。知人才能择友，知人才能善任，知人才能正确处理亲友关系、同事关系以及各种社交关系。除血缘关系以外，人际关系的建立都以互相认识了解为基础。互相认识了解，才能开始交往，认识了解的深度，决定交往的稳定程度和亲密程度。工作中团结和谐的同事关系，事业上亲密合作的伙伴关系，生活中生死不渝的朋友关系，都是建立在互相了解信任的基础之上的。了解越深，关系就密切。从积极方面说，知人可以获得真诚的友谊；从消极方面说，知人可以防止上当受骗。

然而知人不是一种容易的事。人的外表与内心有时并不一致，透过外表了解内心品质，要有一个过程。有的人故意隐蔽自己真实面貌，给人以假象，要了解他的思想品质就更困难了。对他人的了解还受自己主观因素的影响。“爱而不知其恶，憎而遂忘其善。”（唐吴兢《贞观政要·封建》）喜欢一个人，往往看不到他的缺点，讨厌一个人，往往忽略他的长处。这就是因为主观的感情因素影响了对人的全面认识。还有观念差异、民族差异、历史文化差异和个性差异等等，也会造成正确认识他人的障碍。因此古人发出“人心难测，海水难量”的感叹，并提出了许多如何知人的原则和方法。

孔子在《论语》中多处说到如何知人的问题。他说：“始吾于人也，听其言而信其行。今吾于人也，听其言而观其行。于予与改是。”（《论语·公冶长》）孔子从自己的人生经验中得出一条观察人的基本原则和方法，就是把言和行、说的和做的结合起来观察人，认为“听其言而信其行”是应该改正的缺点。他在《论语·为政》篇中又说：“视其所以，观其所由，察其所安，人焉廋哉！人焉廋哉！”这段话可以作为“听其言而观其行”的具体解释和发挥。只要看一个人的所作所为，了解他的来龙去脉和走过的道路，考察他的爱好和行为动机，他的真实面貌就无法隐藏了。孔子说的这些，表现了他作为哲人的睿智，后来人们从“听其言而观其行”的基本原则出发，对如何知人作了具体深入的阐发。例如：看不同情况下的表现，看关键时刻的表现，看长期的表现，进行综合观察比较，等等。

一、看不同情况下的表现：

“居视其所亲，富视其所与，达视其所举，穷视其所为，贫视其所不取。”这是《资治通鉴·周纪》中的一段话，提出了从不同的人生境遇观察人的方法。

“居视其所亲”是看他在日常生活中亲近、结交什么人。物以类聚，从他亲近结交的人可以判断他的人品气质。这可以称为间接观察法，即不知其子视其父，不知其人视其友。与小人呼朋引类的人，其人品也可想而知了。

“富视其所与”是看他富裕时怎样对待和处理钱财，是为富不仁，夸豪斗富，还是乐善好施，节俭自持。富裕也是对人的考验。思想文化素质不高的人，一旦成了暴发户，不仅不能保持原有的良好德行，还会滋长丑恶的思想，成为金钱的奴隶。今日某些人成了大款之后，便嫖娼纳妾，一掷千金。说明“富视其所与”的观人法现在仍有用处。

“达视其所举”是考察官员和一切领导者的好办法。一个人有了社会地位和权力之后，只要看他推举任用什么人，就可以看出他的胸襟、气度和思想政治品质。贤明的领导者自然是选贤任能，品质低劣的领导者就会反其道而行之，做出妒贤嫉能、结党营私的事情来。

“穷视其所为”和“贫视其所不取”，是看一个人在贫贱不得志的时候的所作所为，来判断他的思想品质。如果身处逆境，仍能坚持高尚的志趣和做人的基本准则，他就是一个品德高尚的人。

二、看关键时刻的表现：

“观操守利害时；观精力在饥疲时；观度量在喜怒时，观存养在纷华时；观镇定在震惊时。”（吕坤：《呻吟语》）在处理利害关系的时候可以看出一个人的品德。在饥饿疲惫的时候，可以看出一个人的精力。在喜悦愤怒的时候，可以看出一个人度量。在荣耀得意的时候，可以看出一个人的修养。在遇到突发事变而震惊的时候，可以看出一个人是否镇静。这就是从关键时刻的表现看人的方法。

其中“观操守利害时”对我们更有启发，一个人的政治操守和品德操守如何，在平时不一定能看清楚；一旦面临生死考验、利害冲突的时候，就会暴露无遗了。国家危急存亡之秋，最易分辨忠臣和奸贼；权位名利诱惑之下，最易分辨君子和小人。“人用财试，金用火试”（宋李邦献《省心杂言》），说的是同样的道理。

关键时刻也能检验人情世态。司马迁在《史记·汲郑（汲黯郑庄）列传》的赞语说：“夫以汲、郑之贤，有势则宾客十倍，无势则否”，然后讲了翟公的故事：翟公当廷尉的时候，宾客盈门；罢官以后，门庭冷落。翟公后来又当了廷尉，一些人又去巴结他。于是翟公在门上写了下面的话：“一死一生，乃知交情。一贫一富，乃知交态。一贯一贱，交情乃见。”这是人生经验的深刻总结。真正的友谊才能经得起贫贱富贵、患难生死的考验。那些势利小人，平时恭顺亲密，一到危难穷困的关头，便会成为路人，甚至落井下石，反目成仇。

三、看长时期的表现：

“路遥知马力，事久见人心。”（宋陈元靓《事林广记》，元杂剧《争报恩》作“路途知马力，日久见人心。”）长途奔驰，可以看出马的气力，长时间的观察考验，可以看出人的内在本质。白居易诗《放言五首》其二云：

赠君一法决狐疑，不用钻龟与祝蓍。

试玉要试三日满，辨材须待七年期。

周公恐惧流言日，王莽谦恭未篡时。

向使当初身便死，一生真伪复谁知。

作者自注说：“真玉烧三日不热”，“豫章才生七年而后知。”识别玉的真假和分辨豫木章木都需要时间。识别人也是这样，要经过时间的检验，要看全部历史和全部工作。“不可以一时之誉断其为君子，不可以一时之谤断其为小人。”（冯梦龙《警世通言·拗相公饮恨半山堂》）周公忠诚辅佐成王，曾有说他篡权的流言，王莽真正篡夺了汉朝的帝位，却曾骗得“谦恭下士”的美誉。如果不看他们的全部历史，只凭一时之谤和一时之誉作结论，那就会把是非完全颠倒。

四、通过综合观察和比较：

世界上的事情是复杂的，一个人的本质是好是坏，一时不容易看清楚。有一些人本质是好的，又有一些缺点，或者本质上不好，但能给人好印象。这样，就要多观察，多分析，不能轻率地下结论。吕坤曾指出：“君子而近小人之迹，小人而为君子之态”，遇到这种情况，的确很难分辨。不过如果能全面地考察比较，就会黑白分明，无可掩盖了。接着他具体分析了君子和

小人的区别：

“君子容貌，敦大老成；小人容貌，浮薄琐屑。君子之心，真正光明；小人之心，邪曲微暖。君子之言，雅淡质直，惟以达意；小人之言，鲜穠柔泽，务欲可人。君子与人，真诚而不养其过；小人与人，谀悦而多济其非。君子处事，可以盟天质日，虽骨肉而不阿；小人处事，低昂世态人情，虽昧理而不顾。君子临义，慷慨当前，惟视天下国家人物之利病，其祸福毁誉漠不关心；小人临义，则观望顾忌，先虑爵禄身家妻子之便否，视社稷苍生，漫不属己。君子事上，礼不敢不恭，难使枉道，小人事上，身不知为我，侧意随人。君子御下，防其邪而体其必至之情；小人御下，遂吾欲而忘彼同然之愿。君子自奉，节俭恬雅；小人自奉，汰侈弥文。如此类者，色色顿殊。”（《呻吟语》）

上面这一段话，从容貌言辞，待人处事，对待道义原则，对待上级和下级，以及对待生活享受等各个方面分析了君子和小人的不同表现。其中关于小人待人处事、对待道义原则、对待上级下级的心态，刻划得准确而深刻。若从以上各个方面观察一个人，就不会上当受骗了。

全面考察并不是求全责备，要求别人十全十美。如果求全责备，就没有可交之友，可用之人了。每个人都会有缺点，要全面认识别人的优点和缺点，不能看到他的缺点就否定他的优点。在实际生活中，一个人的优点和缺点往往是相联系的，有一长处就有短处，短处即在所长之中。

要全面评定别人的功过是非。没有错误的人是没有的。有的人功大过小，不能因为他一时的错误就否定他的主要功德，这就是古人说的“不以一青（过错）掩大德。”（《左传·傅公三十三年》）看人要看本质，看主流，不能专挑别人的小过小非，斤斤计较别人的小节问题。因此古人又说：“人有厚德，无问其小节；人有大誉，无疵其小过。”（《淮南子》）

看人还要有发展的眼光。“士别三日，当刮目相待。”《三国志》吕蒙传及裴松之注所引《江表传》讲了吕蒙的故事：吕蒙年少从军，英勇善战，屡有战功，受到孙权重视。孙权劝他多读书，蒙始就学，笃志不倦。后来他为鲁肃密筹怎样对付关羽的计划，鲁肃大为惊异，“抚蒙背曰：‘吾谓大弟但有武略耳，至于今者，学识英博，非复吴下阿蒙。’蒙曰：‘士别三日，即更刮目相待。’”旧日吕蒙，只会打仗，勤学之后的吕蒙学识渊博，精于谋划，既有武略，又存文韬，因此要刮目相待。刮目相待就是用新眼光看人。人不是一成不变的。别人变化了，我们的认识也要随之变化，不能用固定的眼光看人。这也是如何知人的一个重要问题。

待人之道（上）

待人之道既是待人的原则，也是做人的品德。在这方面古人有许多论述对我们待人处世有重要的参考借鉴作用。其中有些待人的原则，如诚实、守信、宽厚、谦逊、忍让等，有普遍的适用性。我们今天待人处世，仍然要遵循这些原则。

诚 实

儒家思孟学派以“诚”为天地万物的本性。《中庸》论“诚”时说：“诚者天之道也，诚之者人之道也。”《中庸》又说：“诚者，物之始终，不诚无物，”把“诚”提到本体论的高度，视为万物的本源。孟子也有类似的说法。他说：“是故诚者天之道也，思诚者，人之道也”（《孟子·离娄上》）；《中庸》和孟子都认为“诚”是天道，也是圣人的精神境界，并提出“尽性知天”、“尽性参天”的天人合一思想。

荀子的思想和《中庸》、孟子的思想有所不同，他不求知天，主张明天人之分，制天命而用之；但他也把“诚”作为重要的道德、政治准则，认为“夫诚者，君子之所守也，而政事之所本也。”（《荀子·不苟》）

以“诚”为宇宙万物的本源，有明显的唯心主义色彩；以“诚”为待人处世的准则，则具有普遍的积极意义。朱熹为《中庸》作注说：“诚者，真实无妄之谓”。庄子谈“真”时说：“真者，精诚之至也。不精不诚，不能动人。”（《庄子·渔父》）。把“诚”理解为真实无妄，真心实意，诚实无欺，则可以作为待人和做人的一项重要道德准则。

做人首先要诚实，说老实话，作老实事，做老实人，不能靠矫饰伪装过日子。靠矫饰伪装、戴假面具过日子的人，“白日欺人，难逃清夜之愧赧”；“对人则面目可憎，独居则形影自愧。”（洪应明《菜根谭》）他们不仅令人憎恶，自己也活得很累。因为他们时时提防假面具被人戳穿，或者受良心的谴责，经常处于紧张戒备的状态，很难获得心理上的轻松、安宁与平衡。

古人中不乏诚实做人的楷模。下面举宋人的两则故事：

——则是寇准的故事。寇准十九岁就中了进士。当时宋太宗赵光义选用人才常问年龄，年纪轻的往往遣回不用。有人给寇准出主意，要他增报年龄。寇准不听，说：“吾初进取，可欺君耶？”

另一则是晏殊的故事。晏殊少有文名，十四岁时，就被人推荐给朝廷。正值宋真宗御试进士，出考试题目让晏殊做，晏殊看了题目后说：“这个题目我十天前做过，草稿还在，请陛下另出题目吧。”真宗称赞他诚实可信，赐他“同进士出身”，后在史馆供职。当时群臣常在假日郊游饮宴，只有晏殊闭门读书写作。真宗因此选他任辅佐太子的东宫官。晏殊谢恩后说：臣也是喜欢游乐饮宴的，只是因为家贫才没有参加。

寇准不愿为了当官就隐瞒年龄，晏殊不愿为了获得皇帝的信任就隐瞒事实和自己的真实思想。他们通过具体言行表现出诚实品格。

诚实有巨大的人格感召力。一个人没有半点虚假隐瞒的东西，说话诚实，做事诚实，内心诚实，就会令人信服。故诚实可以消除隔阂，化解矛盾，促进人际关系的和谐团结。《后汉书·广陵思王荆传》中有“精诚所加，金石为开”的话。格言“精诚所至，金石为开”即由此衍化而来。《后汉书》注引《韩诗外传》说：“昔者楚熊渠子夜行，见寝石，以为伏虎，弯弓而射之，

没金引羽，下视，知其石也，因复射之，矢摧无迹。熊渠子见其诚心而金石为之开，而况人乎，”这是说精诚的力量可以贯穿金石，何况人心呢。至诚之心的确有巨大的精神力量。诸葛亮对孟获七擒七纵，终于使孟获心悦诚服，化解了汉族和少数民族长期积存的矛盾，便是一个有说服力的例证。

今天，我们仍然要实行诚实待人的原则。上级要以诚对待部属，父母要以诚对待子女，企业经营者要以诚对待顾客，每一个人都要以诚对待同事和朋友。以诚待人，才能得到友谊和真情，得到别人的信任和尊敬。人际交往如果离开诚实的原则，人与人之间互相欺骗，尔诈我虞，那么，人世间便不会有真情友谊，不会有团结亲密的人际关系了。

诚实也是做人的基本品德，从小孩子的时候开始，就要培养这种品德。诚实是一切德性的基础。一个人连诚实都做不到，其他的品德都谈不上了。朱熹说：“凡人所以立身行己，应事接物，莫大乎诚敬。”（《朱子语类》）诚就是不自欺，不虚妄，诚实对待他人，诚实对待学习，诚实对待工作，诚实对待为人处世、立身修德中的各种问题。要做老实人，说老实话，办老实事。力戒贪图虚名，不求实际。做任何工作，如果华而不实，有名无实，或名过其实，都是不老实的表现，结果终将误国误民，害人害己。力戒虚夸，说大话，说空话，说假话。过去发生的浮夸之风，给国民经济和社会风气带来巨大的危害，我们应该切实引以为教训；反对弄虚作假，盗名欺世。例如，伪造成绩，骗取荣誉，窃取别人的荣誉和成果，等等。这类行为不仅是不道德的，也是侵犯他人权益的违法行为，应该坚决唾弃。

守 信

《说文》以诚信互训：信，诚也；诚，信也。信和诚是一回事。因此古人有时说诚实为诚信。不过，从处理人际关系的原则来看，诚和信仍可以分开来说。

儒家以父子、君臣、夫妇、长幼、朋友为“五伦”（五种人际关系），以仁、义和礼、智、信为“五常”（五种基本道德原则）。信是“五常”之一，是待人的基本道德要求。《论语》中谈“信”的地方很多：

孔子说：“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为政》篇）一个人不讲信用，就无法在社会上立足。

子夏说：“贤贤易色，事父母能竭其力，事君能致其身，与朋友交，言而有信。虽日未学，吾必谓之学矣。”（《学而》篇）把信和忠孝并列，作为品德修养的基本要求。

子夏问怎样治理政事时，孔子讲了三项事情：足食（充足的粮食储备）、足兵（充足的兵员）和取信于民。子夏又问：如果不得已要去掉一两项，应该去掉什么呢？孔子回答说：去掉足食和足兵，因为“自古皆有死，民无信不立。”（《颜渊》）孔子认为，从政事角度考虑，取信于民比粮食和兵员更重要。

孟子也谈过“信”的问题：“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孟子·滕文公上》）把“信”作为人伦的基本道德原则之一，不过孟子认为“义”比“信”更重要。他说：“大人者，言不必信，行不必果，惟义所在。”（《孟子·离娄下》）只要合乎道义，说话不那么信实也是可以的。

法家反对儒家的“仁政”学说，主张法治，但在推行法治的时候，仍然重视取信于民。《史记》中有商鞅“徙木立信”的故事：“令既具，未布，恐民之不信己，乃立三丈之木于国都市南门，募民有能徙置北门者予十金，民怪之，莫敢徙。复曰‘能徙者予五十金’。有一人徙之，辄予五十金，以明不欺。率下令。”（《商君列传》）。商鞅制订新法以后，怕老百姓不相信，于是用徙木赏金的具体行动，说明自己说话算数，结果树立了新法的威信和权威。新法“行之十年，秦民大悦，道不拾遗，山无盗贼，家给人足。”王安石写诗称赞商鞅说：

自古驱民在信诚，一言为重百斤轻。

今人未可非商鞅，商鞅能令政必行。

今天我们待人处世，仍然要实行诚实的原则，言而有信，说到做到。只有守信用的人才能取得别人的信任。领导说话算数，才能取信于群众，父母说话算数，才能取信于子女，在日常交往的各种业务活动中说话算数，方能取信于朋友和合作伙伴。花言巧语，欺骗伪装，只能得逞于一时，一旦谎言和伪装被揭穿，必然被人唾弃。

在市场经济活动中，遵守合同，讲究信誉，是一条重要原则。市场经济的运行，建立在有关企业严格遵守合同协议的基础之上。每一个人，每一个企业都要认真履行合同的规定，遵守合同的协议。只有这样，市场经济活动才能正常运行。不守信用，不履行合同和协议，不仅是不道德的行为，也是违法的行为，要承担法律和道义的责任。

在市场经济活动中，信誉是企业的生命，也是个人在事业上取得成功的保证。只有守信用、说话算数的人，才能找到合作的伙伴，才能得到别人的信任和支持。只有讲信用、说话算数的企业才能取得顾客的信任，才能占领市场。一个人、一个企业，如果丧失信誉，在激烈的竞争中就没有自己的立足之地，更谈不上发展了。

企业的信誉就是企业的形象。良好的企业形象虽然不像产品那样可以直接带来经济利益，但它可以给企业带来多方面的、稳定的、长远的利益。例如：可以取得顾客的信任和认同，使每一项产品都能迅速地占领市场；可以取得财政金融部门的信任，比较容易地吸引利用社会资金；可以使其他企业产生信任感、安全感，乐于与之合作；可以增强企业员工的凝聚力，并使社会上的优秀人才慕名而来；如此等等。企业的信誉和良好形象的确是企业的一笔巨大的无形资产。有人这样说：生产可口可乐的全部工厂在一夜之间烧光，依靠可口可乐的商标牌号也可以重振旗鼓，因为它已在全世界顾客的心目中建立了自己的信誉。凡是精明的有远见的企业家，都千方百计通过提高产品质量和售后服务，来树立自己信誉；宁愿减少利润，也不做欺骗顾客、破坏信誉的事情。古人提出的诚实原则，在现代社会中获得了新的意义。

待人之道（下）

宽 厚

宽厚是为人的美德和处理人际关系的重要原则。“有容，德乃大”（《尚书·陈君》），“宽则得众”（《论语·尧曰》）。能够宽容别人，就显示一个人有大的德行，就能得到众人的拥护。

宽厚待人是孔子的忠恕之道在人际关系中的具体运用。《论语·卫灵公》中记载了子贡问孔子：“有一言而可以终身行之者乎？”孔子回答说：“其恕乎，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孔子认为恕道是一个人应该终身奉行的。以后中国人都重视忠恕之道的修养。范仲淹的次子范纯仁说：“我生平所学，唯得忠恕二字，一生受用不尽。”他告诫他的子侄们说：“人虽至愚，责人则明；虽有聪明，恕己则昏。尔曹但以责人之心责己，恕己之心恕人，不患不到圣贤地位。”这种严以律己、宽以待人的处世态度，和孔子说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是一致的。

推己及人、为他人着想的宽厚态度，是以尊重别人为前提的。在处理问题的时候，设身处地为别人着想，尊重别人的人格、意志和感情，不能只考虑自己，不考虑别人。“人之情欲不可拂，当用顺之之法以调之，其道只在一个恕字”（洪应明《菜根谭》）；“处人不可任己见，要悉人之情；处事不可任己意，恶悉事之理。”（金兰生《格言联璧》）这里说的就是要对别人的情欲、愿望采取顺应的方法予以宽容和理解。洪应明还说：“居家有二语，曰：惟恕则平情，惟俭则足用。”可见恕道不仅适用于社会交往，也适用于家庭内部。对于自己家里的人，也要尊重他们的意志、愿望和要求。这样才能沟通感情，建立和睦融洽的家庭人际关系。

推己及人的宽厚态度还表现在对别人的要求要实事求是，合情合理。“不责人所不及，不强人所不能，不苦人所不好。”（《文中子·魏相》）别人办不到的事不要苛责他，别人不能做、不愿做的事，不要强迫他做；否则就不是宽厚，而是刻薄狠毒、不近人情了。

宽厚待人还要求有正直的品格，坚持原则，正大光明，不利用他人达到自己不可告人的目的。古人有两句话值得我们重视。一句是“不排毁以取进，不刻人以自人”（魏征《群书治要·体论》）；另一句是“不乘入于利，不迫入于险。”（刘向《新序·杂事》）。排毁进取，刻人自人，就是靠诋毁别人谋取自己晋升，靠攻击别人攀上高位，这是卑鄙的小人行径。乘人于利、迫人于险，就是在别人行时的时候，借其有利地位来达到自己的目的；别人倒楣的时候，又乘人之危，要挟别人来达到自己的目的。这种人不仅卑鄙，而且是阴险狡诈了。一个团体，一个社会，有了这样的小人，就会破坏人际关系，败坏社会风气，我们要警惕和揭露他们。

宽厚当然要讲是非和原则，否则就会纵容、包庇错误和坏的东西。吕坤说：“‘恕’之一字，是个好道理。看那推心者是什么念头。好色者恕人之淫，好货者恕人之贪，好饮者恕人之醉，好安逸者恕人之惰慢。未尝不以己度人，未尝不视人犹己，而道之贼也。故行恕者不可以不审也。”（《呻吟语》）吕坤说得有道理，讲恕道不能离开道德原则，一律采取宽容态度。例如，因为是亲戚和哥儿们，对违纪违法的事也采取宽容态度，那样就有损道义和法律的尊严了。

宽厚待人不排除原则性的批评斗争。不过这种斗争应该实事求是，适可而止。不能搞残酷斗争和无情打击。“攻人之恶毋太严，要思其堪受；教人以善毋过高，当使其可从。”（洪应明《菜根谭》）苛责与苛求无助于对方改过从善。对于失败者和有错误的人要设身外地为他们着想，考虑犯错误者的本意，分析他们犯错误的主观原因和客观原因，公正地评定他们的功过是非。“念人之过，必忘人之功”（高诱《吕氏春秋》注），只谈别人的过错，必然抹杀别人的功劳，这也是需要我们注意的。

批评别人的错误还要注意适可而止，不要纠缠不休，得理不让人。宋俞文豹说：“蔡州褒信县有道人工棋，常饶人先，其诗曰：“自出洞来无敌手，得饶人处且饶人。”（《唾玉集·常谈出处》）饶人就是宽客，能够宽容别人的地方就要宽容别人，这是有益的人生格言。

今天，我们需要提倡一下宽厚待人、推己及人的待人原则。无论是在家庭还是在其他场合中，每个人都要和别人发生联系，要能相处得和睦融洽，亲密无间，就要尊重人，理解人，以己之心度人，不拂逆别人的合理情意。以己之心度人，就是换一个位置，站在对方的立场、角度去想一想。这样，矛盾、隔阂就容易解决了。例如商店的售货员和顾客，车上的货票员和乘客，都时常发生矛盾，都觉得自己有理，对方无理。如果互相换一下位置，售货员、售票员想想假如我是顾客、乘客，顾客、乘客想想假如我是售货员、售票员，就能理解对方的处境和合理要求，发现自己的缺点和不足，这样，矛盾就可以迎刃而解了。一位近代民族资本家创办的天津东亚公司，把“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作为店训。要求员工做到“你愿人怎样待你，你就先怎样待人”。结果每个员工都礼貌待客，保证服务质量，使公司赢得了良好的声誉。这是用以己度人的态度处理公司和顾客关系的成功范例。不仅办公司应该这样，办其他各种事业也应该这样。只有用以己度人的宽厚态度去对待别人，才能广结善缘，达到互惠互利、共同发展的目的。

谦 虚

在人际交往中，还要提倡谦虚的态度，反对傲慢的态度。“劳谦虚己，则附之者众，骄慢倨傲，则去之者多。”（《抱朴子·斥骄》）谦虚待人，愿意和他亲近交往的人自然就多；如果骄傲自大，盛气凌人，原来和他亲近的人也会离他而去了。

谦虚是人品、学识修养高的表现。人品高、知识多、见闻广的人，才能以谦虚的态度待人。骄狂傲慢的人往往是浅薄无知的人。这种人摆出一幅盛气凌人，不可一世的俗态，只会引起别人的反感，不能获得别人尊敬和信任。

《庄子》中有多则斥骄的故事。其中有一则说：宋国有一个叫曹商的，替宋王出使秦国。去的时候他得到几辆车马，回来后宋王很高兴，又赏给他一百辆车马。曹商洋洋自得，对庄子说：“在闾陋巷壤过苦日子，我没有这种本事；游说大国的君主，使其悔悟，因而得到百辆车马，这是我的长处。庄子对他说：

“秦王有病召医，破痛溃痤者得车一乘，舐痔者得车五乘，所治愈下，得车愈多。子室治其痔耶？何得车之多也？子行矣。”（《庄子·列御寇》）

庄子对这种得志小人的骄狂之态刻画得活灵活现，而其入木三分的辛辣讽刺更是发人深省。这种人的人品已亏，又怎能得到别人的尊重和信任呢！

要做到谦虚待人，需要注意两点：一是尊重别人；一是认识自己。韩愈说：“是故圣人一视而仁，笃近而举近。”（《原人》）不分贵贱长幼，每个人都有独立的人格，都要求维护人格的尊严，不受侮辱，不被歧视。在和别人交往时，要尊重他的人格，做到平等待人，礼貌待人。不能以势利的态度，谄上而慢下，媚富而傲贫。另外，还要有自知之明，须知山外有山，天外有天。个人的知识、能力总是有限的，要善于发现别人的长处，学习别人的长处。有地位的不要以地位骄人，有才学的不要以才学骄人，有财富的不要以财富骄人，如果有这样的胸襟，自然能以谦和平等的态度待人，不致给人以骄狂傲慢的俗态。清人申涵光说：“自谦则人愈服，自夸则人必疑。”（《荆园小语》）一个人有地位、有才学而能谦虚待人，就越能使别人信服。因为谦虚是美德，有巨大的吸引人、感召人的力量。

忍 让

谦虚和忍让是相联系的。心地宽阔、态度谦和的人，能够豁达大度，忍常人不能忍之事，容常人不能容之人。忍让也是立身处世、协调人际关系不可缺少的品德。

洪应明说：“处世让一步为高，退步即进步的张本”；“路窄处，留一步让人行；滋味浓的，减三分让人食。此是涉世一极安乐法。”（《菜根谭》）洪应明是从明哲保身、全身远祸的角度谈退让的必要性的。一个人涉身处世，只一味争夺，不知退让，就会像“飞蛾投烛，羝羊触藩”一样，走上绝路。

“明哲保身”源出《诗经·大雅》：“既明且哲，以保其身。”明王艮作《明哲保身论》加以发挥：“知保身者，则必爱身如宝。能爱身，则不敢不爱人；能爱人，则人必爱我，则吾身保矣”，“知保身而不知爱人，必至于适己自便，利己害人，人将报我，则吾身不能保矣。吾身不能保，又何以保天下国家哉。”

王艮把保自身、保他人、保天下国家联系起来。这样，忍让便不完全是为了自己全身远祸，而是明达事理，顾全大局的智者胸怀和仁者美德。张英让墙的故事可以反映这种胸怀和美德。

张英是安徽桐城人，在清康熙年间做过文华殿大学士兼礼部尚书，他老家准备扩建住宅，正巧邻居也要扩建住宅，两家为地基问题发生矛盾。张英的母亲写信给他，想借他的地位压服邻居。张英看信后沉吟良久，提笔写了一首诗劝说母亲：“千里家书只为墙，再让三尺又何妨。万里长城今犹在，不见当年秦始皇。”母亲见信后主动将院墙后让三尺。邻居很感动，也将院墙后让三尺。这样，在两家院墙之间形成一条六尺宽的巷道，人称“六尺巷”，传为美谈。

张英不以权势压人，采用忍让的态度解决矛盾，取得良好的效果。这种忍让是值得提倡的。现在，家庭之间、同事之间、邻里之间，以及公共场所中，人们常常因一些小事发生矛盾。当事者双方各不相让，致使矛盾激化。如果有一方能采取忍让的态度，就可以化解矛盾，给紧张的人际关系带来祥和气氛。忍让对于做好工作、发展事业也是必要的。小不忍则乱大谋，争强好胜，意气用事，往往会危害社会利益和国家利益。蔺相如为了赵国的利益，忍受廉颇的寻衅羞辱，终于使廉颇感悟，维护了将相的团结，保卫了赵国的安全。这种以忍让求团结的精神，表现了蔺相如不计个人荣辱得失，以大局

为重的博大胸怀和高尚品格，在历史上传为美谈，这也是我们今天应该学习和发扬的。

当然，忍让要讲原则。在原则问题上要有当仁不让的精神。孔子说：“当仁不让于师。”（《论语·卫灵公》）朱熹在《四书集注》中解释说：“当仁，以仁为己任，虽师亦无所逊。言当勇往而必为也。”凡是符合道德原则、符合国家和人民利益的事情，不必谦让于老师，而要勇往直前，率先而为。这是从正面说的；如果从反面说，凡是违反道德原则、违反人民和国家利益的事，不能退让迁就，而要坚决抵制和反对。

洪应明谈谦让时还说过一句话：“让，懿德也，过则为足恭，为曲礼，多出机心。”（《菜根谭》）有一种人过分地谦让，虚情假意地谦让，往往怀有不可告人的目的，这是需要警惕的。

治家方略

家庭是社会的细胞，家庭关系到人际关系的起点和基础。充满亲情的家庭关系对社会人际关系的和谐稳定有重要影响。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父子关系列在五種基本人伦关系的首位。如何处理父子关系，即子女如何孝敬父母，父母如何教养子女，是处理家庭人际关系的重点，也是关系到社会稳定、国家兴衰的大事。

孔子和他的弟子们多次谈到孝敬父母的问题。《论语·为政》篇中孔子阐述治理国家的政治原则时，就强调要立足于礼，实行孝道，并对孝道作了具体的解释：

孟懿子问孝，孔子说：“无违”，即不违反礼的原则，要“生，事之以礼；死，葬之以礼，祭之以礼。”

孟武伯问孝，孔子说：“父母唯其疾之忧。”子女生病，是父母最担忧的事情，为了免除父母的忧虑，要注意自己的身体。

子游问孝，孔子说：“今之孝者，是谓能养。至于犬马，皆能有养。不敬，何以别乎？”孔子认为，子女不仅要奉养父母，还要孝敬父母。

子夏问孝，孔子说：“色难”，对待父母和颜悦色是不容易做到的，仅仅是“有事弟子服其劳，有酒食先生馔”，还不能算孝。

综观上面说的，孔子关于孝的要求包括物质生活和精神感情两个方面。在物质生活方面，子女要赡养父母；在精神感情方面，子女要尊敬父母，免除父母的精神负担。

孔子认为，“孝”还包括继承父母的遗志，规劝父母的过失。他说：“父在观其志，父没观其行。三年无改于父之道，可谓孝矣。”（《论语·学而》）对孔子的这一观点要全面分析。谨守父母的遗训和主张，不思创造进取，确有保守的消极作用。但人类社会的发展不能完全抛弃历史传统，继承前人的正确主张，发扬历史的优良传统，还是很必要的。

孔子还说过，“事父母几谏，见志不从，又敬不违，劳而不怨。”（《论语·里仁》）可见孔子并不主张愚孝，父母有过失，子女要提出意见。

儒家的门人托名于孔子、曾子写《孝经》，对孔子的思想加以发挥，提出“孝治”的思想，后来被推崇为儒家的经典著作。《孝经》中说：“夫孝，德之本也，教之教由生也”，“夫孝，始于事亲，中于事君，终于立身”，“生则亲安之，祭则鬼享之，是以天下和平，灾害不生，祸乱不作。故明王之以孝治天下也如此。”

《孝经》的“孝治”思想源于《论语》中一段话：“有子曰：‘其为人也孝悌，而好犯上者，鲜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乱者，未之有也。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孝悌也者，其为人之本与！’”（《论语·学而》篇）《孝经》对《论语》的思想作了发挥，把“孝”和“忠”结合起来，把家庭伦常关系和社会政治关系结合起来；认为发挥“孝”的教化作用，以孝治国，就可以灾乱不生，祸乱不作，天下太平。可见孝治思想属于封建意识形态，是为巩固封建制度服务的。

《孝经》也认为不能盲目服从君命和父命。君王和父亲有不义之行时，为臣为子的要规劝谏阻，否则也是不忠不孝。历史上有许多诤臣诤子在这种思想指导下，敢于犯颜直谏。他们的行为对于改革时弊、推动社会进步有一

定的积极作用。

除《论语》、《孝经》外，《大学》也谈到社会基本人伦关系的处理原则：“为人君，止于仁；为人臣，止于敬；为人子，止于孝；为人父，止于慈；与国人交，止于信”，对君子父子双方都提出了要求。西汉董仲舒提出“三纲”之说：以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确立了君、父、夫对臣、子、妻的主导地位。南宋理学家进一步主张君臣、父子、夫妻间的绝对服从关系。二程门人罗仲素说：“天下无不是的父母”。朱熹的弟子陈埴说：“天下无不是的君”。臣对于君，子对于父，都要绝对服从，不应见其不是处。这种忠孝观起了强化中国封建社会专制主义的作用。

由此可见，传统文化中的孝道，既与忠君思想相联系，

是维护封建制度的意识形态；又是处理家庭关系的准则和传统美德。我们要具体分析，区别精华与糟粕。笼统地把孝道作为封建道德加以全盘否定是不科学的。

孝道作为一种传统美德永远不会过时。父母含辛茹苦，以无私的爱心把子女教养成人，子女理应奉养和孝敬父母，对父母的爱给予回报。如果子女长大成人之后，对父母冷漠无情，不履行赡养父母的义务，就丧失了做人的起码道德。

人类历史是世代承传、连续的。前一辈人的辛勤劳动为后一辈人的幸福创造条件和基础。没有前辈的辛勤劳动，就不会有后辈的幸福。孝敬父母就是尊重父辈的劳动，就是尊重历史。从这种意义上说，孝道可以从家庭扩大到社会，从孝敬父母扩大到尊敬社会上的所有老人。这就是孟子说的“老吾老，以及人之老”，也是中国“尊老”的传统美德。

每个人都会从少壮走向衰老，在衰老之时，能够老有所养，老有所乐，愉快地安度晚年，是社会文明进步的重要标志。现在全世界都面临人口老龄化的问题，老年人口在总人口中所占的比例越来越大。为了正确解决这个问题，除建立社会养老保险制度以外，还要继承发扬中国孝亲尊老的传统美德。

子女要尽赡养父母的义务，使父母在物质生活方面得到保障，而无冻饿之虞；要尊敬父母，对父母和颜悦色，有事多和父母商量；要使父母精神愉快，给父母以感情上的慰藉；还要在全社会养成尊老敬老的风气，继承父辈遗志，完成他们未竟的事业。上面这些，都是中国传统道德的精华，可以古为今用，作为处理父子关系的准则。然而，在现实生活中这些道德观念逐渐淡化了，甚至完全遗忘了。有的子女不愿意赡养父母，只想从父母那里占便宜，分遗产。有的子女成家立业以后，视父母如同路人，使父母在精神上孤苦无依。还有不少子女不愿意和父母交流思想，不愿意听取父母的意见，无形中扩大了两代人的距离。辛劳一生的父母，处在这种孤独困苦的生活境遇中，难免不生悲凉之感；作子女如果设身处地为父母着想，是应该感到羞愧的。

现在我们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也包括树立孝敬父母、尊敬老人的社会风气在内。天下的父母和老人都能老有所养，老有所为，老有所乐，这正是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也是东方文明的魅力和特色。

治家的另一个重要问题是父母如何对待子女。父母对子女有抚养教育的责任，养和教是同等重要的。但人们往往重视养，轻视教，或者教而不得法，收不到预期的效果。古人有许多教子的佳言懿行，可供我们借鉴。

古人认为教子宜早。王廷相说：“童蒙无先人之杂，以正导之而无不顺

受……壮大者已成驳僻之习，虽以正导，彼以先入之见为然，将固结而不可解矣，夫安能变之正。故养正当于蒙。”（《雅述》上）颜之推还谈到胎教问题：“古者，圣王有胎教之法：怀子三月，出居别宫，目不邪视，耳不妄听，声音滋味，以礼节之。”

古人关于胎教、早教的见解，颇合乎儿童教育的科学理论。现代儿童教育科学也重视胎教。斯特娜夫人认为：“母亲不仅要考虑儿童的健康，同时也要为胎儿的品德形成和智力的发展负责。所以，妊娠期的母亲应使自己的生生活过得快活，不应经常哭泣”，“应看好书，想好事情，听好音乐，欣赏大自然的美和艺术作品，并且要作好事。”（见木村久一《早期教育和天才》）至于儿童教育要从早抓起，更是中外教育家的一致看法。

教子的目的、内容首先是如何做人。中国古代的《学记》把教育分为小学、大学两个阶段。小学是识字和德育教育的重要阶段，要适时而教；同时也要注意不超越儿童的年龄阶段和接受能力，“不躐等”，“不陵节而施”。朱熹编了一本《小学》，作为教育少年儿童如何做人的课本。他说：“古者小学，教人以洒扫应对进退之节，爱亲敬长、隆师亲友之道，皆所以为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之本。”朱熹把劳动、待人礼节、孝敬父母、尊敬师长、亲爱学友作为教育的基本内容，并且要“讲而习之于幼稚之时”，使其“习与智发，化与心成”，为将来立身处世打下良好基础。这些意见和作法对我们是有参考价值的。

凡做父母的都爱自己的子女，但爱要和严格要求结合起来。只有爱没有严格要求，或者相反，都不会有好效果。袁采提出：“父母不可妄憎爱”，“子幼必待以严，子壮无薄其爱”。他具体阐述了为什么要这样做的理由：

“人之有子，多于婴孺之时，爱忘其丑，恣其所求，恣其所为，无故叫号，不知禁止，而以罪保母，陵轹同辈，不知戒约，而咎他人。或言其不然，则曰小未可责。日渐月渍，养成其恶，此父母曲爱之过也。及其年齿渐长，爱心渐疏，微有庇失，逆成憎怒，摭其小疵，以为大恶……此父母妄憎之过也。”（《袁氏世范》）

这种“曲爱”与“妄憎”的情况，往往发生在一个人身上。开始是溺爱子女，把子女惯出许多坏毛病，于是又由爱变为憎，对子女采取简单粗暴的态度。这样教子不会有好结果。袁氏说的“子幼必待以严，子壮无薄其爱”，很值得我们参考和深思。

颜之推提出对子女不能偏爱：“人之爱子，罕亦能均；自古及今，此弊多矣。贤俊者自可赏爱，顽鲁者亦当矜怜，有偏宠者，虽欲以厚之，更所以祸之。”（《颜氏家训》）偏爱子女，往往养成子女骄纵的思想，在家里自视特殊，在社会上也不能和别人和睦相处。偏爱的结果，是害了子女。今天一对夫妻生一个孩子，不会有偏爱自己的哪一个子女的问题，但在家里以孩子为中心，在社会上认为自己的孩子高人一等，这样的问题仍然可能发生。郑板桥的作法值得我们参考。他在给弟弟的信中写道：

“家人儿女，总是天地间一般人，当一般爱惜，不可使吾儿凌虐他。凡鱼膾果饼，宜均分散给，大家欢喜跳跃。若吾儿坐食好物，令家人子远立而望，不得一沾唇齿；其父母见而怜之，无可如何，呼之使去，岂非割心剜肉乎！”（《郑板桥家书信集》）

郑板桥把自己的孩子和佣人的孩子同等看待，可说是爱子以其道了。现在有些人有了金钱地位，便让子女享受种种特殊的待遇，或者送子女上贵族

式的学校。这种教子方法与郑板桥说的相比，其思想境界和实际效果当有天壤之别。古人十分重视教子勤俭自立，不使他们依赖父辈的优越条件骄奢成性，丧失锐意进取的精神和独立生活的能力。司马光在《训俭示康》中谈到宋仁宗时宰相张知白戒奢崇俭的故事：张知白当宰相后仍然保持在河阳当书记官时的生活水平。有人劝他把生活标准提高一点，张知白回答说：“吾今日之俸，虽举家锦衣玉食，何患不能。雇人之常情，由俭人奢易，由奢返俭难。吾今日之俸，岂能常有、身岂能常存。一旦异于今日，家人习奢已久，不能节俭，必致失所。岂若吾居位、去位、身在、身亡，常如一日乎。”司马光认为张知白的深谋远虑不是常人所能及的，特地举这个故事教育他的子女。我们也应该用这类故事教育我们的子女。现在有些做父母的有一种不正常心理，认为时代变了，不应该再让子女过俭朴的生活，父母要为子女准备过幸福生活的各种现成条件。这样，子女从小就生活在安乐窝中，只知享受，不思奋斗和创造。他们一旦失去父母的庇荫，连生存能力都没有，还谈什么过幸福生活呢！司马光在《训俭示康》中还谈到反面的例子：寇准当宰相时、豪华奢侈冠一时，不过因为他的功劳大，没人敢指责他，他的子孙继承这种奢侈的作风，后来多数都贫困了。寇准的例子是值得我们深思的。

交友要旨

人生在世，不仅需要家庭的亲情，还需要朋友的友谊。诗云：“嘒其鸣矣，求其友声。相彼鸟矣，犹求友声。矧伊人矣，不求友声？“鸟犹嘒嘒求友，不失其群，何况我们人呢！

真诚的友谊可以把人的心灵结合在一起；可以增进人的智慧，涵养人的德性；可以分担人的痛苦，共享人的欢乐。没有友谊，人将终身孤独。

历史上流传着许多动人的友谊故事。《列子·汤问》记载了俞伯牙、钟子期的“知音”之交：“伯牙善鼓琴，钟子期善听。伯牙鼓琴，志在高山。钟子期曰：‘善哉，峨峨乎若泰山！’志在流水，钟子期曰：‘善哉，洋洋乎若江河！’伯牙所念，钟子期必得之。”伯牙遂引子期为知己。子期死后，伯牙把琴摔碎，不再鼓琴。

《史记》中也有管仲、鲍叔“知己”之交的故事。他们年轻时就是朋友。鲍叔事齐公子小白，管仲事齐公子纠。后来小白立为齐桓公，公子纠死，管仲当了囚徒。鲍叔知道管仲贤能，把他推荐给齐桓公，帮助齐桓公成就了霸业，管仲说：“吾始困时，尝与鲍叔贾（做生意），分财利多自与，鲍叔不以我为贪，知我贫也。吾尝为鲍叔谋事而更穷困，鲍叔不以我为愚，知时有利不利也。吾尝三仕三见逐于君，鲍叔不以我为不肖，知我不遭时也。吾尝三战三走，鲍叔不以我为怯，知我有老母也。公子纠败，召忽死之，吾幽囚受辱，鲍叔不以我为无耻，知我不羞小节而耻功名不显于天下也。生我者父母，知我者鲍叔也。”

伯牙、子期与管仲、鲍叔之交成为“知音”、“知己”之交的象征而为人们所向往。然而朋友有好有坏，友谊有真有假。孔子说：“益者三友，损者三友。友直，友谅，友多闻，益矣。友便辟，友善柔，友便佞，损矣。”（《论语·季氏》）有益的朋友三种，有害的朋友三种。和正直的人、诚实的人、见闻多的人交友是有益的，和谄媚逢迎的人、虚伪奉承的人、花言巧语的人交友是有害的。

明苏浚将朋友分为四种：“道义相砥，过失相规、畏友也；缓急可共，生死可托，密友也；甘言如饴，游戏征逐，昵友也；利则相合，患则相倾，贼友也。”（《鸡鸣偶记》）。

因此，交友要选择，多交益友、畏友、密友，不交损友、昵友、贼友。“近朱者赤，近墨者黑”（晋傅立《太子少傅箴》）；“近贤则聪，近愚则聩”（皮日休《耳箴》）；“善人同处，则日闻嘉训；恶人从游，则日生邪情”（《后汉书·爱延列传》）这些古训都说明交友对一个人的思想、品德、学识会产生深刻的影响。清冯班认为：“气习相染，师不如友”（《钝吟杂录》）。朋友的影响比老师还大，因为这种影响是气习相染、潜移默化的，久而久之就不知不觉地受其影响。这就是《孔子家语》中说的：“与君子游，如入芝兰之室，久而不闻其香，则与之化矣。与小人游，如入鲍鱼之肆，久而不闻其臭，亦与之化矣。”

涉世不深的青年人，尤应注意谨交游、慎择友的古训。在交友时要有知人之明，不要错把坏人当知己，受骗上当，甚至落入坏人的圈套而无法自拔。

交友有一个选择的过程。开始是结识和初交，在交往过程中互相了解以后，才由初交成为熟悉的朋友。朋友可以是暂时的，也可能是永久的。从学习、工作的需要出发，本着互惠互利、共同发展的原则，结交一些志同道合

的朋友是有益的。如果不仅志同道合，而且感情深厚，心灵相通，“随便在一个人的任何一根心弦上轻轻一触，就会引起另一个人的共鸣”（托尔斯泰《童年少年青年》），这样就可以从合作共事的朋友变成生死相依、患难与共的知音知己。

在人的一生中知音知己不可多得。罗曼·罗兰有言：“人生的苦难是不能得一知己。有些同伴，有些萍水相逢的熟人，那或许还可能，大家把朋友这个名词随便滥用了。其实一个人一生只能有一个朋友，而这还是很少的人能有的福气。”（《约翰·克利斯朵夫》）罗曼·罗兰的话也许太绝对化了，不过知己不可多得则是确实的。鲁迅所录清人的名句也说：“人生得一知己足矣，斯世当以同怀视之”，可见知己难求，古今同慨。

尽管知己难求，人们还是渴望友谊，以广结天下名士为人生乐趣。青年人更是如此。交游广阔对增长见闻，了解信息，成就事业都有好处，本是无可厚非的事，但也不可滥交。申涵光说：“交游太广，不止无益，往往多生是非……逢人班荆，到处投辖，然真知己果是其多乎？不过声气浮慕，共为豪举耳。”（《荆园小语》）上文中的“班荆”典出《左传·襄公二十六年》。伍举和声子相遇于郑郊，布荆坐地，共议归楚之事。“投辖”典出《汉书·陈遵传》。陈遵好喝酒，客人来了就关上门，把客人车轴的键投于井中，殷勤留宴。“逢人班荆，到处投辖”者，逢人都是故交，到处都是知己。因此申涵光提醒读者，知己真有这样多吗？实际上人情冷暖，自古皆然。在顺利得势的时候，人人都是你的朋友，在困难失意的时候，许多人会远离而去，真正的患难知己不多了。这时就会感到“人生得一知己足矣”的名言，意味深长。

交什么朋友，怎样交友，这是一问题的两个方面。朋友有君子，有小人，交友也有君子之交和小人之交。《礼记》说：“故君子之接如水，小人之接如醴；君子淡以成，小人甘以坏。”（《礼记·表记》）庄子也有同样的话：“君子之交淡如水，小人之交甘若醴。君子淡以亲，小人甘以绝。”（《庄子·山木》）君子之间的友谊平淡情纯，但真实亲密而能长久。小人的友谊浓烈甜蜜，但虚假多变，经不起时间的考验。如果我们把君子看作思想品德好的人，把小人看作思想品德不好的人，那么，上面《礼记》、《庄子》所说的就颇具普遍性的指导意义。

君子之交以互相砥而道义、切磋学问、规劝过失为目的，友谊是建立在互相信任、思想一致的基础之上的，故虽平淡如水，但能风雨同舟，生死不渝。小人之交是建立在私利的基础上的，平时甜言蜜语，信誓旦旦，一旦面临利害冲突，就会交疏情绝，反目成仇。

欧阳修有著名的《朋党论》，文中说的“朋党”虽属政治集团和政治派，但文章的论点也是对君子之交和小人之交的精辟分析。试摘引如下：

“大凡君子与君子以同道为朋，小人与小人以同利为朋，此自先之理也。然臣谓小人无朋，惟君子则有之。其故何哉？小人所好者，利禄也；所贪者，财货也。当其同利之时，暂相朋引以为朋者，伪也；及其见利而争先，或利尽而交疏，则反目贼害，虽其兄弟亲戚不能相保。故臣谓小人无朋，其暂为朋者，伪也。君子则不然，所守者道义，所行者忠信，所惜者名节。以之修身，则同道而相益，以之事国，则同心而共济，始终如一，此君子之朋也。”

君子之交和小人之交的区别在于“同道”还是“同利”。小人之交因为是为了私利而互相勾结，所以见利就争先，利尽就交疏。这样的朋友是假朋

友，或者是暂时的朋友。君子之交是坚持道义的原则和社会的使命，所以能够相益共济，始终如一。这样的朋友才是可靠的真朋友。我们要交志同道合的真朋友，不要交追逐私利的假朋友。

在交友方式上也要宁取平淡而持久，勿取甜蜜而多变。孔子提出“以文会友，以友辅仁。”（《论语·颜渊》）通过文字结交朋友，是知识分子交友的常用方式，通过交流作品互相切磋学问，研究问题，来增进友谊和感情。”人之相知，贵相知心”（《李陵答苏武书》），不必过分讲求形式和礼节。古人说：“情相亲者礼必寡”（林逋《省心录》），“礼貌过盛者，情必疏”（申居勋《西岩赘语》）。巴尔扎克也有类似的话：“亲爱的朋友，切忌轻信，切忌平庸，切忌殷勤，这是三大暗礁！”（《幽谷百合》）巴尔扎克说的“切忌殷勤”，颇合乎“君子之交淡如水”的中国古训。”

友谊的基础是理解和感情，不能用权力和金钱去换取。“以势交者，势倾则绝；以利交者，利寡则散。”（《文中子·礼乐篇》）克雷洛夫也有同样的见解：“在你有权力有名望的时候，卑鄙的人是不敢抬起嫉妒的眼睛看你一眼的。然而，到了你一落千丈的时候，显示最大的毒辣的是他们。”（《克雷洛夫寓言》）我们怎么能把这种势利眼当朋友呢！财富的作用也是这样，靠金钱、靠酒肉引不来真诚可靠的朋友。李白《赠友人》诗云：“人生贵相知，何用金与钱。”李白以亲身的经验道出了人生的真理：因此，古人注意从贫困患难中识别人。当你倒楣时愿意和你交往的人是真朋友，在你飞黄腾达时才和你拉关系的人多半靠不住。宋纁所辑《古今药石·自警篇》中有一则故事：司马光推荐刘元城到集贤院供职。有一天，司马光向刘元城说：“你知道我为什么推荐你吗？”刘元城说：“是因为我和先生往来已久罢了！”（刘元城中进士后，不就选，而从学于司马光，所以他这样回答。）司马光说：“不是这样。是因为我不任职闲居的时候，每到节时令节日，你问候不断。我当宰相以后，唯独你没有书信问候我，这才是我推荐你的缘故。”刘元城的人品值得称赞，司马光也善于识人择交；刘后来当了谏议大夫，处事刚正不阿，为士人所敬重。

人的生活环境和职业不断变化，朋友的圈子也会随之变化。既有旧友，也有新知。我们要接交新朋友，又要不忘老朋友。一个人在地位升迁、富贵显达后，不忘贫穷患难时的老朋友，是中国人推崇的美德。对故旧之交态度更要热情，不要因为双方地位条件的变化而中断友谊。这样的友谊就会更加纯真动人，如果一阔脸就变，就有悖于中国的传统美德了。

由于种种原因，有些朋友在中途分手，这也是正常的事情。但“君子断交，不出恶声。”（《史记·乐颜传》）当友谊无法继续维持的时候，要好合好散，互道珍重，各奔前程；不要谩骂攻击，反目成仇。这是交友中应该注意的另一个问题。

处人艺术

交友相处人是一回事，又不完全是一回事。朋友可以选择，而在生活中与之发生联系的人是由生活环境和社会联系决定的，范围和对象要大得多，也复杂得多。如邻里、同事、领导、下属，以及社会公共活动中遇到的人，不管当事者双方是否愿意，都要互相发生联系。一个人只要不是离群索居、与世隔绝，就必然要和各式各样的人发生交往关系。能否正确处理这种人际关系，直接影响到一个人的思想、情绪、生活和工作。没有良好的人际关系，就不会有身心的健康愉快和事业的成功。因此，我们不能不对处人艺术予以重视和研究。以上各章所谈的都是处人艺术的内容，下面再从另一种角度作些补充说明。古人说及的处人艺术很多，这里只谈四点：一曰精明练达，浑厚温和；二曰和而不同，和而不流；三曰责人勿刻，责己勿宽；四曰善待君子，善处小人。

精明练达，浑厚温和，是讲处人的原则性和灵活性。待人接物既要有正派方严、宽厚平和的涵养，又要有精明练达、灵活圆通的智慧。这就是古人说的“方其中，圆其外”、方圆结合的处人原则。一个人既能持身方正，又能灵活圆通地对待他人，才能正确处理复杂的人际关系。如果只有方正的原则性，没有圆通的灵活性，就不能团结、影响多数人，使人际关系中的矛盾复杂化。

吕坤说：“方严是处人大病痛。圣人处世，离一温厚不得”，“只凭踽踽凉凉，冷落难亲，便是世上一个碍物。即使持正守方，独立不苟，亦非用世之才，只是一节狷介之土耳。”（《呻吟语》）

的确如此。脱离浑厚的方严，会成为不近人情的严酷苛刻，成为协调人际关系的障碍。以这样的态度立身处世，虽然为人正派公道，也只能洁身自好，不能影响和带动他人，成为改造社会，成就事业的有用人才。

社会是复杂的，我们接触的人形形色色，贤愚不等，性格各异。其中固然好人是大多数，但也有思想品德不好、甚至阴险刁诈的人。面对人情多变、人心难测的现实，如果只讲待人浑厚包容，就会吃亏上当。因此又有“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无”的古训。“防人之心不可无”是针对社会生活的复杂性提出来的。现实生活中有美好的东西，也有丑恶的东西。丑恶的东西常常披着美丽的外衣。甜言蜜语的后面可能是阴谋诡计，功名利禄的诱饵后面可能是圈套陷阱。因此，善良的人们要育自我保护的防卫心理，要有冷静的思考，机敏的警觉，要有洞察世态人情的智慧。只有这样，才能对奸诈之徒的阴谋诡计及时采取预防处置措施。

防人之心过甚，也会成为人际交往的障碍。因为人人互相戒备，互相猜疑，人际关系中就会充满紧张冷漠的气氛。如果离开浑厚，防人之心便成为尔虞我诈，离我们要求实行的处人原则就更远了。

为了避免无根据地互相猜疑而破坏人际关系的亲密和谐，孔子提出“不逆诈”的处人原则。他在《论语·宪问》中说：“不逆诈，不亿（臆）不信，抑亦先觉者，是贤乎！”孔子认为，不事先琢磨别人是否欺骗自己，不随意猜测别人不守信用，却能及早察觉出来，这样的人才是贤者。

孔子“不逆诈”的思想比较全面、实用。我们要相信大多数人是善良可靠的，要以温厚的态度对待他们，不要无根据地怀疑别人，同时我们又要有足够的警惕性和机智，及早察觉少数人的欺诈行径。孔子还提出“以直报怨，

以德报德”（以正直报答别人的怨恨，以恩德报答别人的恩德）。即使别人有错误，有过失，也不妨以德性感化之。用这样的态度待人，既可避免上当受骗，又可保持团结和谐的人际关系。这就是上面说的精明练达、浑厚温和相结合的处人艺术。

和而不同也是孔子提出的处人艺术。他说：“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论语·子路》）君子与人和睦相处，但不盲从苟同。他在《论语·为政》）篇中说：“君子周而不比，小人比而不周。”君子与人亲近和睦，但不朋比为奸。《中庸》里面也有“君子和而不流”的话，认为君子应该随和，与人和睦相处，但不同流合污。这和孔子的意见差不多。

“和而不同”“和而不流”，“周而不比”，也是灵活性与原则性相结合的处人艺术。我们所处的生活环境，我们接触的各式人物，不可能都合乎自己的理想和要求。对于生活环境中的不健康的東西，对于人群中不正确的思想、行为和作风，我们不能盲目附和，而要保持自己的操守和品格。这是原则性。另一方面，我们又要适应环境，善于和各式各样的人物协调和睦地相处，这是灵活性。只有原则性，没有灵活性，就会脱离现实，脱离群众，使自己陷于孤立的境地。只有灵活性，没有原则性，和坏的思想、行为、作风同流合污，就会损害自己的思想品格，不能达到祛邪扶正、改造环境、改造社会的目的。

洪应明说：“作人要脱俗，不可存一矫俗之心；应世要随时，不可起一趋时之念。”“随时之内善救时，若和风之消酷暑；混俗之中能脱俗，似淡月之映轻云。”《菜根谭》）洪氏的观点虽有掸者随缘就事、随遇而安的味道，也合乎孔子“和而不同”的主张。“随时”也可解释为顺应时代之潮流去适应生活，参与生活；“脱俗”则要求在世俗生活中保持超越流俗的品格。“随时”如果是积极的处世态度，则有利于把握现实，参与补救时弊的现实变革，并为日后的成功积累经验，创造条件。如果脱离现实环境，怨天尤人，就会白白地浪费时光，最终一事无成。“脱俗”如果不是自命不凡，故意标新立异，则可以避免无原则、无主见地去赶时髦、赶潮流、丧失自己的个性和本色。

从处理人际关系来说，“随时”、“脱俗”，“和而不同”，也包含尊重自己、尊重别人的问题。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欲望和感情，要了解别人的感情，尊重别人的感情。只考虑自己，一切从自己的要求、愿望出发，就会对什么人都不顺眼。即使别人真有缺点过失，也要“养其体面，体其情私”，不要伤害别人的感情。如果能以随和的态度与人和睦相处，注意尊重别人的感情，这样，批评别人的缺点的时候，就会如春风拂柳，细雨润苗，使人感到舒畅可从。如果脱离群众，甚至伤害别人的人格尊严，批评的意见即使正确，也会使人反感对立。故在处理人际关系时，既要坚持原则，又要顺应人情。凡是不近人情的做法，都是违背处人原则的。

善待君子，善处小人，是说如何对待性格、品质不同的人。洪应明在《菜根谭》中也说到这个问题：“休与小人仇雠，小人自有对头；休向君子谄媚，君子原无私惠。”这虽然有“明哲保身”的味道，但区别待人的思想可供我们参考。勿媚君子的道理是很清楚的，君子有处人的原则，低声下气地去讨好君子，只会引起反感，自找没趣。为什么不要和小人结仇，是因为小人胡搅蛮缠，和小人争论是非，往往白白浪费精力。洪应明还谈到一点，“待小人不难于严，而难于不恶；待君子不难于不恭，而难于有礼。”这“不恶”

和“有礼”也讲得很有意思。一般人常常是以小人之道对待小人。如以谩骂对谩骂，以攻击对攻击。这样，就把自己也降为小人了，无助于问题的解决。因此对小人要注意“不恶”，以凛然正气压倒小人的邪气，以冷静的态度摆事实，讲道理，揭露小人的攻击和诽谤，这样才是解决问题的正确办法。对待君子，则不仅要尊敬他们，还要以礼相待，按照君子之道立身处世。要学习君子的品德学识，使自己也成为君子。只尊敬而不学习，不能算是对待君子的正确态度。

清代金兰生所编《格言联璧》中讲到如何对待君子与小人时说：“小人固宜远，然断不可显为仇敌；君子固当亲，亦不可曲为附和。”对小人不亲近，也不公开结为仇敌，对君子既亲近，又不曲意逢迎。这合乎洁身自好、明哲保身的待人之道，和洪应明说的“勿仇小人”、“勿媚君子”差不多，在正派中带有消极回避的味道。倒是这本书中的另一条格言值得注意：“小人亦有好处，不可恶其人并没其是；君子亦有过差，不可好其人并饰其非。”这条格言主张对君子、小人要一分为二，小人也有对的地方，不可一概抹杀。君子也有过失，不要代为掩饰。这是颇有见地的观点，可补洪氏观点的不足。在现实生活中，好人全好、坏人全坏的思维方式仍然流行，以致评人论事主观偏颇，颠倒是非，可见这条格言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清人申涵光的《荆园小语》中多处谈到如何对待小人的问题。例如：“小人当远之于始，一饮一啄，不可与作缘。非不我恨也，泛然若不相识，其恨浅。若爱其才能，或事势相借，一与亲密，后来必成大仇。”从择交的角度考虑，申涵光的意见是有道理的。与小人交往，交浅恨浅，交深恨深。如果因为爱小人之才，或者办某些事借小人之力，与之亲密交往；一旦发生利害冲突，就必然结成大仇，遭到小人的疯狂报复。

申涵光还说：“觉人之诈而不可说破，待其自愧可也。”这是心中清楚、外存浑厚的态度，但未免失之消极。供应明说的“恶人未可轻去”可以作补弃。离开恶人，揭露和除掉恶人，需要有准备，并且要等待适当的时机。如果条件不具备，时机不成熟，就仓促行事，不仅恶人除不掉，反而会被恶人陷害。这是历史上好人与恶人斗争的惨痛教训，值得我们记取。

君子与小人，好人与恶人，不过是各色人物中的两极。在这两极之间，还有缺点突出、脾气古怪、性格特殊的人物。对这些人也要区别情况，采取不同的对待方法。

申涵光说过：“奸人难处，迂人亦难处。”“好便宜者不可与共财，多狐疑者不可与共事。”（《荆园小语》）迂腐的人不是坏人，但固执而又刚愎自用，有时断情绝交，比奸人还厉害。对这种人要预先有所准备，采取妥善的处理办法。至于贪财的人，好疑神疑鬼的人，完全不和他们来往、共事是不可能的，但要心中有数，预先估计到可能发生的矛盾，想好处理的对策。

骄傲自满的人也不好相处。斯威夫特曾提出应付的办法：“要一个骄傲的人看清他自己的嘴脸，只有用别人的骄傲给他做镜子。倘若别人向他卑躬屈膝，不过增长了他的气焰，徒然自取其辱罢了。”（《书之城》）这是以骄傲对骄傲的办法。

莫里哀的《怪客人》中谈到一种人是天生的死脑筋，听见真理就踢蹄撩蹶，遇到正理的平直大路就挺直了身子不肯上前。那种人就只能绕着弯儿把他们引到我们愿意他去的地方。

除上面谈到的几类人以外，还有性情急躁的、拖拉的、暴烈的、懦弱的人，和这些人相处，也要根据不同的性格特点，采取区别对待的办法。

交往戒律

交往戒律也是处人艺术，不过是从反面、从教训来谈的，告诉人们不应该做甚么。交往中需要引为戒律的问题很多，择其要者有戒锋芒毕露、戒趋炎附势、戒纵情使性、戒诿过掠功等。

锋芒毕露

与人相处要谦虚谨慎，不要锋芒毕露，到处炫耀自己，这是儒家和道家都谈过的交往戒律。

老子说：“圣人自知而不自见也，自爱而不自贵也。”（《老子》第七十二章）圣人有自知之明而不自我表现，自爱自重而不自以为高贵。

孔子说：“君子欲纳于言而敏于行。”（《论语·里仁》）要求人们少说多做，不要锋芒毕露，夸夸其谈。

《礼记》中也说：“良贾深藏若虚，君子盛德若无。”（《大戴礼记·曾子立言》）精明的商人把财富深藏起来，好像没有财富一样。有盛德的君子不炫耀和表现自己，和普通人一样。

后来信奉儒道思想的文人都根据上面的观点来阐述待人处世的原则。吕坤说：“气忌盛，心忌满，才忌露。”（《呻吟语·人品》）把心满气盛、卖弄才华，视为待人处世的大忌。

洪应明说：“君子之心事，青天白日，不可使人不知；君子之才华，玉韞珠藏，不可使人易知。”君子的胸怀应该光明磊落，君子的才华应该深藏不露。

古人反对锋芒毕露，炫耀自己的学识和才华，主要有两种考虑：一是为了明哲保身，一是教人谦虚谨慎。在复杂的社会生活中，品德贤良的人容易遭到名利之徒的猜疑和非议；才华学识出众的人，容易遭到平庸之辈的嫉妒和打击。杨修因才华过人，为曹操所忌，招来杀身之祸。韩信自矜其能，自伐己功，说刘邦只能将兵数十万，他自己则多多而益善，最后落个夷宗灭族的下场。

满招损，谦受益，是每个人都应该记住的古训。《荀子·宥坐》篇有一则故事；孔子参观鲁桓公庙的时候，看到一种器皿，叫宥坐之器。这种器皿里面空的时候倾斜着，里面注适量的水就端正，里面水注满了就要翻倒（虚则欹，中则正，满则覆）。于是孔子喟然长叹道：那有盈满而不倾覆的呢！宥同右，宥坐之器是放于座右的器皿，如同座右铭一样，教导人们牢记“满则覆”的教训。

上面这两种考虑对我们都有启发。在现代社会里，显露才智当然不会招来杀身灭族之祸，但妒贤嫉能的社会心理仍然存在，遭到别人的非议、责难是完全可能的。我们要考虑社会生活的复杂性，注意待人的态度和方式。我们不主张明哲保身，但也不要锋芒毕露，咄咄逼人，否则就很难被别人接受，甚至于遭到别人的猜忌和打击。

“上智者必不自智，不愚者必不自愚。”（《陈确集·警言》）最聪明的人不自以为聪明，最愚蠢的人不以为愚蠢。因而自我炫耀、锋芒毕露，往往是浅薄幼稚、盲目自满的表现。炫耀学识的未必真有学识，炫耀才华的未必真有才华。他们往往是坐井观天，见闻狭小，不知山外有山，天外有天。

没有学识炫耀学识，没有才华炫耀才华，自然是幼稚可笑；有了一得之功，一孔之见，就到处张扬，这也是一种令人讨厌的作风。有超人的才智而不自我炫耀，有突出的成就而不自满自足，这是自我修养的高尚境界。

戒趋炎附势

由于利欲薰染和奴隶社会、封建社会的人身依附关系，趋炎附势便成为人际关系中长期流行的丑恶现象。一个人富贵显达的时候，门庭若市，在贫穷失意的时候，门可罗雀。这种趋炎附势的社会心理也从统治阶层扩散到整个社会，腐蚀普通人的心灵。《史记》中记载，苏秦出游数岁、大困而归的时候，兄弟嫂妹妻妾都窃笑他。后来苏秦佩六国相印以后，兄弟妻嫂都侧目不敢仰视。苏秦问他的嫂嫂：“何前倨而后恭也？”嫂嫂匍匐前进，以面掩地回答说：“见季子位高多金也。”这一幅人情冷暖、世态炎凉的生活图画，的确令人感叹不已。

趋炎附势虽然是自古以来的社会流行病，但一直为正直的人们所不齿。一是因为趋炎附势者人品卑下。他们没有原则性，没有廉耻心和是非心，只要能获得名利之类的个人私利，不惜对有钱有势的人阿谀逢迎，溜须拍马，什么事都能做出来。他们见风使舵，有奶便是娘，一旦形势变化，便树倒猢猻散，去投靠新的主子。他们也没有自尊、自信、自强的观念，而是靠投机钻营，靠有钱有势的人过寄生生活。这样的人不可能真诚待人，是败坏人际关系的腐蚀剂。

其次，趋炎附势者必然招辱招祸。依靠别人的权势，一时也许能春风得意，青云直上。但这种建立在依附关系上的功名富贵，如苍蝇附骥，茑萝依松，捷则捷气，高到高矣，难免遭到世人的耻笑；不可能像那些自尊自强的人，可以享受成功的荣誉和欢乐。而且人事变幻，世事沧桑，是不可避免的事，一旦靠山倒台，趋炎附势者就会随之身败名裂。汉代邓通的历史可以说明这个道理：

邓通是一个划船戏水的人，没有治国安邦的本事，只靠向汉文帝献媚来往上爬。其献媚取宠的手段令人恶心。一天，文帝背上长的痈疮化浓；邓通用嘴吮吸浓液，深得文帝的欢心。邓通因此官至上大夫，还获得蜀地一座铜山的赏赐和自铸铜钱的特权。真可谓身居高位，富甲天下。文帝死后，景帝即位，情况马上发生变化。邓通被罢官还乡，接着又被抄家查处，最后身无分文，在贫困中死在别人家里。邓通的结局说明，趋炎附势之祸甚快且烈。趋炎附势者往往是始以势利害人，终以势利自毙。

人际交往要讲自尊自重，平等待人。古人说：“君子上交不谄，下交不读。”（《周易·系辞下》）和地位高的人交往，不要巴结逢迎，而要不卑不亢，落落大方；和地位低的人交往，不要轻傲怠慢，而要平和谦虚，一视同仁。如果以势利眼光处理人际关系，就会沾污自己的品行，在别人眼中成为势利小人，这样，当然不可能获得真正的友谊。

在人际交往中需要注意两点：一是自己不要趋炎附势，不要只想攀高枝，专门和地位比自己高的人拉关系。即使是旧交故友，对方地位变化以后，也要慎重对待。申涵光告诫他的子弟：“公门不可轻人，若世谊素交，益与自远”；“亲交中有显贵者，对人频言，必遭鄙诮”；“故人仕宦者，贻书见招，以不赴为正。或久别怀想，抵署盘桓数日，款款道故，不及他事，切勿

在外招摇，妄有关说。一贫一贱，交每不终，未必尽贵人之过也。”（《荆园小语》）申涵光经历明末清初的社会大变动，明亡后渡江南下，返归故里，力耕养母亲和两个弟弟，朝廷屡次召用，他都力辞不应召。他的《荆园小语》实为人生至语，上面引的几则，就值得我们细细体味。

要注意的另一点是，警惕那些趋炎附势之徒，不要把他们当真朋友。这种人在你行时的时候，便围在你的周围，尊敬你，奉承你；在你倒楣的时候，就会翻脸不认人，离你而去，有的人甚至落井下石，墙到众人推，这种人“饥则附，饱则飏，燠则弃，寒则弃”。他们奉承的不是你本人，而是你的地位、金钱和权力，如果对此心中有数，就不会因世态炎凉而伤感，也不会错把他们的假意当真情而受骗上当。

戒纵情使性

纵情使性就是放纵自己的感情，不加约束。喜怒哀乐，本是人之常情，也是推动人工作、创造的重要力量，但感情要受理智的约束，如果丧失理智，感情用事，就会闹出许多乱子来。一个人在大怒的时候，在狂喜的时候，在急躁的时候，都容易失去理智，对人对事不能冷静地分析判断。这就是古人说的“激则有失，怒则无智。”

因此，我们要克制自己的感情，保持冷静平和的心境。这样待人处事就可以从容不迫而合乎事理。在高兴得意的时候要注意克制自己的感情。“不可乘喜而多言，不可乘快而易事”，因为在这种时候，情绪兴奋冲动，容易说一些错话，犯一些不该犯的过失。如不冷静考虑，就对别人作出某种承诺，结果办不到，便犯了轻诺寡信的过失；或者胡言乱语，得意忘形，闹出笑话来。

在恼怒激动的时候，更要控制自己的感情。孔子说：“小不忍，则乱大谋。”（《论语·卫灵公》）因外来刺激而激动恼怒的时候，要克制忍耐。如果在小事上不能克制忍耐，就会耽误大事。《孙子兵法》说：“主不可怒而兴师，将不可愠而致战。”兴兵打仗，要全面分析天时、地利、人和与敌我力量对比，合于利而动，不可因一时愤怒而作出错误决策。古时有激将法，就是故意激恼对方，使之落人自己设计的圈套。

不可因怒而兴师，也不可因怒而行事。克己以制怒，是一条重要的处世经验。林则徐秉性耿直，但性情急躁。他知道这样会使自己犯错误，坏大事，于是在房里悬挂一块匾，上书“制怒”二字。每当他情绪激动的时候，看到这块匾上的字，便马上克制自己，使情绪平静下来。

在人际交往中，有了矛盾不能及时解决，反而尖锐激化，常和当事者情绪激怒有关系。吕坤说：“两个君子无争，相让故也；一君子，一小人，无争，有容故也；争者，两小人也。”（《呻吟语》）两个君子在一起不会争斗，因为他们能互相忍让。一个君子，一个小人也不会争斗，因为君子能宽容小人。凡是争得不可开交的，因为双方都是气量狭窄、思想境界不高的人。

在人民内部，许多矛盾并不是你死我活的斗争，但双方都激动恼怒，互相攻击，非闹到身败名裂、家破人亡不肯罢休。其实只要互相向对方说几句温和的好话，问题就解决了。即使是原则性问题的争论，也要用冷静理智的态度，摆事实，讲道理，有理有利有节；如果任凭感情驱使，丧失理智，就会说出过头的话，做出过火的事。这样，自己本来有理，也成为无理了。

平和的气氛是保持和谐人际关系的基本条件。我们不仅要自己克制感情，还要注意不去激怒对方。”水激逆流，火激横发，人激乱作”。一个人被激怒以后，情绪失去控制，什么事都会做得出来。用温和的言辞去说服对方，不讲道理的人也没有机会发作；用过激的言辞去刺激对方，明白事理的人也会激动、反抗，我们千万不要图一时痛快招来这样的结局。

戒诿过掠功

人间恩怨多和功过是非有关。工作、事业成功以后，功归于谁？工作、事业失败以后，谁来承担责任？女何对待这个问题，反映每个人的修养和品德，并引起人际关系的变化。

“诱罪掠功，此小人事；掩罪夸功，此众人事；让美归功，此君子事；分怨共过，此盛德事。”（金兰生《格言联璧》）这里提出了几种对待功过的不同态度，反映出几种不同的人品。品德不好的人推诿罪过，争夺功劳。一般的常人掩盖罪过，夸耀功劳。有道德的人谦让美誉。把功劳归于别人。主动分担怨恨，和别人共同承担错误的责任，则是最有道德的了。

诿过掠功，是一种损人利己的行为，有这种行为的人必然留下丑恶的名声，为世人所不齿，因此应该引为交往戒律。

掩盖过失，夸耀功劳，虽然是常人的心理，也不应该原谅和提倡。有错误应该承认改正，有错不改，反而掩盖，不仅错误仍然存在，又增加了新的错误。有功劳应该由别人去评说，自己夸耀，并不能增加光彩，反而有了自吹自擂的坏名声。《增广贤文》说：“凡是自是，便少一是；有短护短，更添一短。”这是朴素实在的真理。

在功过的问题上，应该采取让美归功、分怨共过的态度。把美誉和功劳让给别人，并勇于承担错误的责任。这样的人自然会得到别人的信任，乐于和他合作共事。俗话说：公道自在人心。一个品德高尚、有成就有功劳的人是不会被长期被埋没的。诿过掠功的人可能得意于一时，但经不起时间的考验。历史最终会还他本来的面目。

居于领导地位的人，主动让美归功、分怨共过是很重要的。因领导者有地位、有权力，可以利用地位和权力去掠取功劳，推诿罪过。中国人又有为尊者讳、为贤者讳的历史传统，名人和领导者的错误不容易被揭露，而获得功劳的机会则很多。因此名人和领导者要有更高的自觉性，时刻提醒自己，有了功劳和荣誉，自己少得一点，有了怨恨和过失，自己多承担一点。只有这样；才能真正获得后辈和部属的爱戴和尊敬。

施恩还需释怨

人世纷争，无非恩怨。因恩生爱，因怨生恨，导致人际关系的巩固或破裂。如何处理恩怨问题，值得作为一个专题来研究。

关于“恩”的问题包括两个方面，即施恩和受恩。受恩必报，是中国传统道德的要求。“投之以桃，报之以李。”（《诗经·大雅》）“礼尚往来，往而不来非礼也，来而不往亦非礼也。”（《礼记·曲礼上》）礼仪上崇尚有来有往的风习由来已久，受人恩惠不思图报，便是忘恩负义，为世人所不齿。

受人恩在精神、道义上有负债感和责任感，因此古人强调不要随便受人恩惠。《孔子家语》说：“受人惠者常畏人，施与人者常骄人。”常常接受别人的施舍帮助而无力回报，就会感到拿了别人的手短，吃了别人的嘴软，站在别人的面前矮了三分。如果遇上心术不正的人，用小恩小惠作手段来达到自己的目的，就会被人控制利用，无法自拔。

古人认为：“处怨易，处恩难。”处怨只要能宽容别人就可以了，处恩则要考虑能否给与相应的回报。杜荀鹤有诗云：“男儿受恩须有地，平地不受等闲恩。”（《投长沙裴侍郎》）不要随便受人恩惠，要考虑有没有报答的能力。

不随便受人恩惠和受恩必报，这是受恩时应该注意的问题；如果施恩给别人，则要实行另外的原则，这就是“施恩勿望报”。古人说：“人有德于我，不可不感；我有德于人，不必望感。”（宋繻《古今药石·憬然录》）“为惠而望报，不如勿为，此结怨之道也。”（清冯班《钝吟杂录·家戒》）受恩和施恩是两回事，应该实行不同的原则：受恩应该回报，施恩则不应该要求回报。给人恩惠以后，如果总记在心上，四处宣扬，就会使别人产生心理压力 and 反感。这样，恩就变成怨了。说施恩望报是结怨之道，原因就在这里。

还有一种人，“不恩人而故作恩人之态”。表面上装出关心人、帮助人、要给人恩惠的样子，实际上并没有给人恩惠。这种口惠而实不至的行径，就更卑鄙可耻了。

要区别两种不同领域的行为规范。一种是经济活动领域的，一种是精神道德领域的。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一切经济活动和业务活动，都受价值规律的支配。互惠互利，等价交换，是合理的、正大光明的事情。经济业务活动中的伙伴，也需要互相支援，互相帮助。但这种支援、帮助是以相应的回报为基础的，甚至相互间的友谊也成为一种感情投资，日后要从这种投资中获得丰厚的回报。

这种等价交换的原则是否可以统治人们的精神道德行为，使友谊、正义、道德、良心等等都变成商品呢？这是不可以的。人与人之间除了金钱关系之外，还有道德、情感的关系。每一个人都应该关心他人，同情他人，帮助他人。从道德要求来说，这种关心、同情和帮助应该是无私的，不以获得相应的回报为目的。无数先进人物和英雄人物，他们都是默默地为他人作好事，连自己的名字也不让别人知道。在必要时，他们可以为了他人和社会的利益献出自己的生命。如果施恩望报，帮助别人就要索取相应的报酬，怎么能有默默的奉献和舍己救人的英雄壮举呢！

由此可见，施恩不望报是精神道德领域的基本原则。人们的道德情操，人们的真诚友谊和同情心，不能用金钱换取，也不能用金钱衡量。一旦把关心、帮助他人作为投资，以谋求更大的利益，那么，这种同情和帮助，便不再是高尚的道德行为，而成为赤裸裸的商品交换，人与人之间也不再有什么真情实意可言了。但人们不仅要有优越的物质生活享受，还需要真诚的爱心和友谊。因此，施恩不望报的精神，今天仍然是需要提倡和发扬的。

无私关心、帮助他人的人，也需要他人和社会的关心、帮助。他们在帮助他人、救助他们之后，常常会给自己造成困难和损失。例如，有的人因为勇斗歹徒而致伤致残，有的人先人后己，住房、调资等问题长期没有解决。这样，社会不仅要表彰他们，尊敬他们，还要帮他们解决实际困难。先进人物、英雄人物的自我牺牲精神和社会的关心、帮助相结合，将有助于发扬正气，提高全社会的思想道德水平，建立高尚、和谐的人际关系。

恩与怨互相联系，互相转化。施恩望报，恩会转化为怨，施恩不当，恩也可以转化为怨。有的人受别人的恩惠多了，习以为常，一旦得不到恩惠，或者得到的恩惠少了，就会对施恩者产生怨恨之心。因此古人主张，施恩应该由薄而厚，以免后来不好应付。除了恩生怨之外，还有其他原因产生的怨恨，影响人际关系的巩固和发展。在待人处世时，一方面要正确处理施恩与受恩的问题，另一方面要正确对待别人的怨恨，做好释怨的工作，以便化怨为恩，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

“邀千百人之欢，不如释一人之怨。”（洪应明《菜根谭》）这是强调释怨的工作比施恩的工作更重要。一人之怨不及时化解，会影响许多人，甚至会坏了大事。春秋时，宋郑两国交战。宋军主帅华元宰羊犒赏三军。在分羊肉时忘了替华元驾驭战车的羊斟。羊斟因此怨恨华元。华元没有察觉，更没有做释怨工作。作战时，羊斟把华元的战车驾到郑军阵地里，使华元当了俘虏。华元本来想犒赏三军以提高士气，但处事不细而结怨于羊斟，遭到兵败被俘的耻辱。这正是“邀千百人之欢，不如释一人之怨”的生动例证。

在日常生活中，因一些具体问题处理不当而结怨的情况时常发生。如果不及时解决，轻则产生隔阂，影响团结，重则关系破裂，闹到势不两立、两败俱伤的地步。在人民内部，冤家宜解不宜结；如果冤冤相报，恩怨之争就没有穷期了。前面讲到，孔子主张以直报怨，以德报德。做到用正直之心报答怨恨是难能可贵的事，需要有理智，有涵养，有宽宏博大的胸怀。如果心胸狭窄，目光短浅，必然是以怨报怨，睚眦必报了。

齐桓公重用管仲，可算是以直报怨的范例。齐襄公死后，两个异母兄弟公子纠和公子小白分别从鲁国和莒国回齐国争夺王位。管仲是辅佐公子纠的。在回齐国途中曾箭射公子小白，为公子纠剪除竞争对手。但公子小白并没有死，抢先回到齐国都城临淄夺取了王位。他就是历史上著名的齐桓公。结果公子纠被杀，管仲被囚、送回齐国。齐桓公本来对管仲有刻骨之恨，想杀死他，后来齐桓公听了鲍叔的劝告，不但没有杀管仲，还亲自出城迎接，任命他为相。齐桓公九合诸侯，一匡天下，成为春秋时代的第一位霸主，这和他不记一箭之仇、重用有治国之才的管仲是分不开的。从这则故事中可以看出，不念旧恶，着眼于全局和未来，就可以化怨为恩，对工作和事业都将产生积极的作用。

释怨不外从两个方面努力：一是别人有怨于我，不可不忘，也就是说不要斤斤计较，耿耿于怀，必思报复而后快。二是我有怨于别人，要及时做好疏通、化解工作，不能任其发展，使怨恨越积越深。疏通化解工作不外交流思想，消除误会；如果自己确有缺点错误，要主动检查，承担责任。此外，在结怨双方寻找共同点，求同存异，也是很重要的。“两惠无不释之怨，两求无不合之交。”（金兰生《格言联璧》）先把旧怨放在一边，双方为共同的目标和利益进行合作，在合作过程中建新的友谊，这样旧怨也就自然消除了。在实际生活中，人们常常采取相反的态度。只记住旧的怨恨，忘记新的共同要求和利益；只记住别人的过失，忘自己应该承担的责任。结果怨恨越积越深，导致关系破裂，两败俱伤。这是很不明智的态度。

求名先要求实

孔子“疾没世而名不称焉”，屈原“恐修名之不立”，可见美好的名声是为每个人所珍惜和追求的。名声是社会对一个人的思想、行为的评价。名声好的人为社会所认同，受到他人的尊重和信任，在人际交往中具有吸引力和感召力。争取好名声，可以激励人们自尊自信，改恶迁善，塑造美好的形象。每个人都应该努力树立好的名声，珍惜好的名声。但如何树立好名声，怎样对待好名声带来的荣誉、地位，是一个十分复杂的问题；如果处理不好，对人品和人际关系会带来负面的影响。

负面影响之一，就是名声大了，反而带来麻烦。一个人出名以后，成为公众追逐的对象，一举一动都不如往日那样自由自在。如名作家、名演员，经常受到读者和观众的包围，还有许多人来信来访，令人难以应付。

负面影响之二，就是名声大了，容易招来非议。一个人出名以后，就和别人拉开了距离，处于一种孤立、突出的地位，成为众人审视评论的目标。“木秀于林，风必摧之；堆出于岸，流必湍之；行高于人，众必非之。”（《文选·运命论》）这是一种普遍存在的妒贤嫉能的社会心理。“名高闲不得，到处人争议；谁知冰雪颜，已杂风尘色。”（卢纶《送吉州孚归楚州旧山》）有高洁德行的人，出名之后也染上了世俗的流言蜚言的脏水。这是名人为高名所累的痛苦。

负面影响之三，就是名声大了以后，容易使人躺在已有的成就上，不思进取。一个人出名以后，听到的都是恭维奉承的话，如果头脑不清醒，就会被恭维奉承的话所陶醉，看不到自己的缺点。其实每个名人都不是十全十美的，别人说的恭维话又常常言过其实，不可全信。“阳春之曲，和者必寡；盛名之下，其实难副。”（《后汉书·黄琼传》）名人对此要有清醒的头脑，如果昏昏然，飘飘然，盛名就成了虚名。虚名是不能长久的，一旦被事实揭破，应有的符合实际的名声也会丧失了。

可见名声也有两面性，名人有为名所累的危险。鲁迅说：“毁或无防，誉倒可怕”，就是为此而发出的人生忠告。

正确对待名声和荣誉问题，首先要树立正确的荣辱观。什么是美名，什么是恶名，什么荣誉，什么是耻辱，这就是涉及道德问题的荣辱观。一个人的名声，就是社会根据一定的荣辱观对他的思想言行作出的评价。如果评价是肯定的，积极的，他就会获得好名声；如果评价是否定的，消极的，他就会获得坏名声。

每个阶级和社会集团都有自己的荣辱观。封建阶级以获得显赫的门第爵位为荣，资本家以攫取大量的财富金钱为荣。中国的儒家在荣辱问题上仍然坚持仁义第一的原则。孟子说：“仁则荣，不仁则辱。”（《孟子·公孙丑上》）荀子说：“先义而后利者荣，先利而后义者辱。”（《荀子·荣辱》）我们的荣辱观是以劳动为荣，以热爱祖国、献身社会主义事业为荣，只有诚实劳动，热爱祖国和人民，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做出贡献的人才是光荣的，才能获得好名声，如果把投机取巧、夸富比阔，甚至丧失人格国格的行为作为光荣，那就颠倒了荣辱的标准，不可能获得好名声。

解决荣辱观的问题以后，还要正确处理有关名声荣誉的一些实际而具体的问题，例如：要有荣誉感，不可有名利心，好名声要用善行去争取，勿图虚名，宜逐实功；不要被荣誉所陶醉，不要独占荣誉；如此等等。

荣誉感是个人对社会关于美好思想言行评价的认识和感受，和社会利益、社会责任相联系。个人的思想行为有益于社会，受到社会的赞誉和褒奖，个人感到荣耀光彩。运动员登上领奖台的时候，英雄人物获得荣誉称号和奖励的时候，都会有这种高尚美好的情感。一个人有这种荣誉感，才会洁身自爱，自尊自强，积极为公众和社会建功立业。荣誉感是推动个人和社会不断进步的精神动力。

有个人荣誉感和集体荣誉感。高尚的个人荣誉感是和集体荣誉感联系在一起的，珍惜个人的荣誉，更珍惜集体的荣誉。个人行为的目的首先是为了集体的荣誉。他对自己的行为和成就感到光荣，也首先因为他为集体作出了贡献，“增添了光彩。这种思想感情有利于集体的团结和进步。一个班级的学生，一个企业的职工，以至一个国家、民族的公民，都要有集体荣誉感，努力为集体争取荣誉，不做有损集体荣誉、民族荣誉、国家荣誉的事情。

名利心是以获取个人利益为目的的，要获得的不仅是名誉，还有金钱、地位和其他物质利益；或者说，获得名誉是手段，获得物质利益才是目的。在现实生活中，名誉、地位和物质利益是相联系的。名大则酬丰，位高则禄厚。在商品社会里，名声可以直接换取金钱。名牌商标的价格大大超过有形的资产，名人上电视做几秒钟的广告，其报酬可以超过一般农民一年的收入。可见名气、名声是宝贵的。不过，这样又出现一个问题，即名声不再是善行的正确评价，而是换取金钱的商品了。因此，不能完全从物质利益的角度看待名声、荣誉问题。真正的名声、荣誉，不可能没有道德要求，不可能没有奉献和责任。如果只是为了个人的物质利益，名人就成商人了。

名利之心还会产生另外的恶果，即促使一些人争名夺利，钓名沽誉，盗名欺世。这样，人际交往成了名利场，人际关系也没有和谐团结的气氛了。还有一些奸诈的人，伪装自己，骗取好名声，来达到自己的政治目的。汉朝时的王莽就曾有“礼贤下士”的好名声，后来干出了篡权的勾当。袁世凯也曾附和共和，后来成了窃国大盗。荀子说：“是奸人将以盗名于暗世者险莫大焉。”（《荀子·不苟》）管子也说：“钓名之人，无贤士焉。”（《管子·法法》）盗名的奸人最危险，猎取虚名的人不是贤士。贤士立身行事，不是为了要出名。凡是钓名沽誉、盗名欺世的人都只有名利心，没有公德心和荣誉感。

由名利心驱使而钓名沽誉、盗名欺世的人是少数，由名利心驱使而产生虚荣心的人就比较多了。有虚荣心的人，以博取别人的称赞为目的，追求表面、虚假的名声。他们做好事是给别人看的，在大庭广众之下是一个样子，在别人看不到的时候是另外一个样子。为了获得别人的称赞，有时不惜弄虚作假，做表面文章。这样取得的名声并不是他们思想言行的真实评价，也不能反映他的成就和贡献，无益于他人，也无益于自己。因此要区别荣誉感与虚荣心。荣誉感不可无，虚荣心不可有。

好名声要用自己的善行去争取。名声也好，荣誉也好，是社会对个人的评价。个人的品德、学识、功绩如何，是自己掌握的，社会对自己的评价如何，则是社会的事情。班固说：“艺由己立，名自人成。”（《与弟超书》）一个人的品德才识是靠自己学习修养得来的，一个人名声是由别人评说得来的。一个人的成绩、贡献是由自己创造的，一个人的荣誉是由社会给与的。自己没有美德善行，怎么能得到荣誉和好的名声呢！

有的人靠自我夸耀或别人吹捧而获得赞誉和美名。这种美名是和实际不

符的虚名，既无价值，也不能持久；一旦败露，就会身败名裂，反而增加耻辱。“善不积，不足以成名”（《易经·系辞上》），“善不可外来兮，名不可伪作。”（屈原《九章·抽思》）勿尚虚荣，宜逐实功。从个人来说，主要是认真地修养品德学识，勤奋地工作创造，至于名声和荣誉是学习工作的结果，实至而名归。这样得来的名声和荣誉才有意义，有价值，不是那种自欺欺人的假名虚名。

不要被荣誉陶醉。学无止境，艺无止境，工作创造无止境。荣誉只说明过去，而人生总要面向未来。“虚名自古能为累”，荣誉也自古能为累。美名殊荣即使是符合实际的，当之无愧的，也会成为继续前进的包袱。如果因获得荣誉自满自足，不思进取，就会成为历史进军中的落伍者。“或誉人，而适足以败之；或毁人，而适足以成之。”（《淮南子》）这是历史的辩证法，值得我们警惕。

居里夫人有一段话说得很有意思：“荣誉就像玩具，只能玩玩而已，绝不能永远守着它，否则就将一事无成。”她这样说，也这样做。英国皇家协会奖给她的一枚象征极高荣誉的金质奖章，真的成了她女儿的玩具。因为她淡泊名利，对荣誉有极清醒的认识，才能在科学研究的道路上攀登不止，两次获诺贝尔奖。她的女儿女婿也同样获此荣誉。

荣誉不可独占。洪应明说：“完名美节不宜独任，分些与人，可以远祸全身。”（《菜根谭》）这种让名逃名的主张，虽有明哲保身的消极成分，但不失为洞悉世态人情的明智作法。沽誉钓名的事当然不能做，即使是应得的荣誉也要分些给别人，不可全占了。这样可以避免别人的嫉妒非议，增强人际关系的友好程度，也可以避免因名气大而产生的麻烦，有利于专心致志地做今后的工作。

古人还从另外的角度谈了让名逃名的必要性。白居易在《与元九书》中引庄子的话说：“名者，公器，不可以多取。”（庄子的原话是：“名，公器也，不可多取。”见《庄子·天运篇》）名是应该由公众共同享用的，个人不可以取得太多。

因为名是公器而让名，比为了远祸全身而让名更正确一些，认识也更全面、更深刻一些。个人生活在社会中，个人的品德才能离不开社会的培养，个人的成就贡献离不开他人的支持。盛开的鲜花得益于枝叶输达养份，荣誉不宜由鲜花独占。人也是如此。这不是虚假的谦虚，而是对待荣誉的实事求是的态度。学生成名，不要忘记老师，后辈成名，不要忘记前人，将军成名，不要忘记士兵，专家成名，不要忘群众。少数声名显赫的杰出人物，实际上是一个群体的代表，每一位有名英雄的背后，都有一批无名英雄。用这样的观点看问题，自然不会把荣誉全归于自己。

现代社会分工日益细密，几乎没有一件工作可以单独完成。名为公器的观点更具有合理性。当然，每个人付出的劳动不同，贡献也有大有小。着重奖励贡献突出的个人是完全应该的。但不能把功劳完全归于某一个人。获得荣誉的人也要有谦虚礼让的精神，不占有别人的荣誉，甚至把自己应得的荣誉分一些给同事和合作者。这样有利于增强团结，减少矛盾。许多人事纠纷不是产生于合作奋斗的过程中，而是产生于功成名就之后。在完成任务时前进一步，在享受荣誉时后退一步，是解决人事纠纷的好办法。

我们还要把名誉看得淡一些，闻誉勿欣，闻毁勿戚。人生在世，总会有人评说。评说有毁有誉，誉是说好，毁是说坏。不管别人说好说坏，自己要

有冷静客观的分析，不能因为别人的毁誉就影响自己认识和情绪。明人薛瑄说：“人当自信自守，虽称誉之，承奉之，亦不为之加喜；虽毁谤之，侮慢之，亦不为之加沮。”（《古今药石·薛文清公要语外篇》）立身处世应该有自信心，有自己的主见和操守，不要听了赞誉就洋洋自得，听了批评就垂头丧气。白居易亦有诗云：“闻毁勿戚戚，闻誉勿欣欣。自顾行何如，毁誉安足论。”（《续座右铭》）这也是一种自信自守的处世态度。重要的是要自我反省，是否行得端，做得对；只要“内省不疚，何恤人言”，走自己的路就是了。

别人的毁誉常有不符合实际的地方。孟子说：“有不虞之誉，有求全之毁。”（《孟子·离娄上》）有一种赞誉是意料之外的，有一种诋毁是求全责备，对这种毁誉不必过分重视。还有一种毁誉是出于一种思维定势和从众心理。有名的，大家都说好的人容易得到赞誉，无名的，大家意见多的人容易受到批评。葛洪说：“世有雷同之誉而未必贤也，世有欢哗之毁而未心恶也。”雷同之誉和欢哗之毁往往是随声附和、跟着起哄的，并不符合真实情况。

爱因斯坦根据亲身的体会说：“这种现象是很常见的。就是一个人的实际情况与别人认为他是怎样很不相称的，比如我，每每小声咕噜一下也成了喇叭的独奏。”爱因斯坦因为名声盖世，一言一行都受到别人的重视和赞誉，然而他能保持清醒的头脑，不为赞誉所迷惑，这是他的伟大之处，很值得我们学习。

责人毋忘责己

怎样要求别人，怎样要求自己，也是处理人际关系时需要解决的一个重要问题。人际交往中产生矛盾恩怨，工作中发生缺点错误，总有自己和别人两方面的原因。解决矛盾，克服缺点错误，需要从自己和别人两方面找原因，严格要求自己，主动承担自己应该承担的责任。如果只看到别人的问题，看不到自己的问题，只要求别人，不要求自己，矛盾和问题就永远不能解决。

《论语》中多处谈到责人与责己、正人与正己的问题：

“君子求诸己，小人求诸人”（《卫灵公》）；

“躬自厚而薄责于人，则远怨矣”（同上）；

“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颜渊》）；

“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子路》）

这几段话谈了两个方面的问题：一是与人相处有了矛盾，先要检查自己的缺点；二是先要正己，然后才能正人。这样才能解决矛盾，消除怨恨。历史上有不少正反方面的事例可以说明这个道理。

刘备主动改正酒后失言的错误，可以作为正面的例子。刘备依庞统之计，西取益州。在夺取涪关之后，设宴劳军。刘备酒醉，与庞统发生争执，大发脾气，把庞统赶出宴席。酒醒后刘备自悔，又把庞统请回来，恢复了君臣间的融洽关系。《三国志·庞统法正传》记载了这段故事：

“先主（刘备）然其中计，既斩怀、沛，还向成都，所过辄克。于涪大会，置酒作乐，谓统曰：‘今日之会，可谓乐矣。’统曰：‘伐人之国而以为欢，非仁者之兵也。’先主（刘备）醉，怒曰：‘武王伐纣，前歌后舞，非仁者耶？卿言不当，宜速起出！’于是统逡巡引退。先主寻悔，请还。统复故位，初不顾谢，饮食自若。先主谓曰：‘向者之论，阿谁为失？’统对曰：‘君臣俱失。’先主大笑，宴乐如初。”

《三国志》的注者裴松之认为：在这场冲突中刘备有失而庞统无失，庞统说“君臣俱失”，是分谤之言，主动承担责任，表示和解的态度。而刘备以君主的身位能及时悔悟，主动请庞统回席，也不失知过必改的坦诚态度和豁达大度。因为双方都有责己之心，一场相当激烈的冲突便及化解了。不久，庞统率兵攻雒县，为流矢所中，牺牲时年仅36岁。刘备对庞统的牺牲非常痛惜，言则流涕。可见他们的君臣情义是相当动人的。

战国时燕惠王文过饰非，失去名将乐毅，致使兵败将亡，国势衰微，则是反面的典型事例。惠王的父亲昭王知人善任，重用贤能。他听从乐毅的建议，联合赵、楚、韩、魏等国攻打齐国，以乐毅为上将军，攻下齐国七十余城。昭王死后，继位的惠王中了齐国的反间计，以才智不如乐毅的骑劫取代乐毅的职务。乐毅被迫逃往赵国。乐毅离开燕国后，齐国的田单即领兵攻打燕国，收复了全部失地。燕惠王后悔以骑劫取代乐毅，但又不检讨自己的错误，反而指责乐毅忘恩负义。他责备乐毅说：

“先王举国而委将军，将军为燕破齐，报先王之仇，天下莫不震动，寡人岂敢一日忘将军之功哉！会先王弃群臣，寡人新即位，左右误寡人。寡人之使骑劫代将军，为将军久暴露于外，故召将军且休，计事。将军过听，以与寡人有隙，遂捐燕归赵。将军自为计则可矣，而亦何以报先王之所以遇将军之意乎？”（《史记·乐毅列传》）

惠王把用骑劫取代乐毅，归咎于左右人的蒙蔽，同时也是为了让长期在

外辛劳的乐毅回来休息，共商国事。如此言不由衷，文过饰非，自然不能使乐毅回心转意，燕国的国势也从此一蹶不振。如果惠王能有刘备的自责之心，结局将会是另外的样子。

大至国家君臣，小至个人私交，发生矛盾以后，如果双方都有责己的雅量，任何矛盾都不难解决。如果只责备对方，不检讨自己，隔阂怨恨就会越积越深，以至矛盾激化，关系破裂。这是上面两则历史故事给我们的启示。

如果过失的责任在别人身上，或者主要在别人身上，在批评别人的时候，也要有“见不贤而内自省”的气度。既责人，又责己，先正己，后正人。这就是古人说的“责人者必先自责，成人者必先自成”；“专责己者兼可成人之善，专责人者适以长己之恶。”（《清李惺《西沅外集·药言剩稿》）责己就是从我做起，以实际行动和活的榜样去教育人、感化人。这样，别人才会心悦诚服，教育批评才起作用。如果只责人，不责己，就会助长自己的错误。这种人自身不正，去批评教育别人，又有谁会听呢！

历史上具有人格感召力的人都是严于律己的。诸葛亮为蜀之相国，“善无微而不赏，恶无纤而不贬”，但“刑政虽峻而无怨者”。这不仅因为他“用心平而劝戒明”，还因为他严于律己，以身作则。街亭之役，马谡违反诸葛亮的节度，举动失宜，使蜀军大败。诸葛亮既斩了马谡，又上疏检讨自己“授任无方”、用人不当的过失，自贬三级。

然而在日常生活中，有一种人往往是责人则明，责己则昏；责人则严，责己则宽。对社会上的不良现象，可以评议指责，但不能身体力行，从自己做起。因为批评指责是针对别人的，往往不顾事实，不讲分寸，甚至捕风捉影，信口开河。这种批评指责不仅影响真诚和谐的人际关系，还助长言行不一、清谈空议、惹是生非的不良风气。

韩愈曾作《原毁》一文，考究当时士大夫阶层嫉贤妒能、毁谤他人的不良风气的思想根源。文章指出：“古之君子，其责己也重以周，其待人也轻以约”；“今之君子则不然，其责人也详，其待己也廉。”这是对人对己的两种不同态度：一种是对自己的要求严格、全面，对别人的要求宽厚、简约；另一种是对别人的要求很周详，对自己的要求则低而少。

文章认为：为什么会有两种不同的态度，是由于对人对己要求的标准不同。“古之君子”以舜和周公这样的圣贤为标准，认为他们能做到的，自己也应该做到。因此对自己的要求就严格而周全；对别人则先看他的优点和进步，“取其一不究其二，即其新不究其旧”，唯恐损害别人为善的积极性。这样，对别人的要求自然就宽厚而简约了。“今之君子”则不然，他们以圣人的标准要求别人，“举其一不计其十，究其旧不图其新”，唯恐别人有好名声。他们对自己的要求则比普通人还低，“外以欺于人，内以欺于心”，还没有取得一点进步就停止了。这样，他们责人周、责己廉，也就不奇怪了。文章进一步揭露“今之君子”对人严、对己宽的思想根源在于“怠”与“忌”两个字，“怠者不能修，而忌者畏人修。”自己懒惰懈怠，不求进步，又嫉妒别人进步，因此“事修而谤兴，德高而毁来”。谁办成好事，谁有高尚品德，就会受到他们的诽谤打击。韩愈对世态人情的剖析，可谓入木三分。

今天读《原毁》仍然可以获得有益的启示。首先，对人严、对己宽的问题，仍然普遍存在；问题的实质也是对人对己要求的标准不同。对别人马列主义，对自己自由主义；看别人的缺点多，看自己的优点多；批评别人往往苛刻求全，攻其一点，不及其余，不看别人的现实表现，纠缠过去的恩怨是

非；批评自己的时候则轻描淡写，强调客观，覆短护私。出现这种情况，也和“怠”与“忌”不无关系。自己不求进步，不思进取，又害怕别人进步，获得成就和名声。应该去掉这种不健康的心理，改变这种不健康的风气。用高标准要求自己，严格检查自己思想上、工作上的缺点；同时以宽厚的态度对待别人，鼓励、支持别人从善、向上的积极性。这样，有利于自己和别人共同进步，也有利于解决人际关系中的矛盾，形成积极健康的社会风气。处世篇

见利思义

为人处世，首先需要处理的问题是义与利的关系，即道德要求与物质利益的关系，精神生活与物质生活的关系，道德理性与感情欲望的关系。对这个问题的认识和处理，关系到人生的目的、意义和价值，关系到处世的态度、原则和方法。

中国历史上开展过义利关系的长期论辩。儒家强调义利的区别和对立，把义摆在首位。孔子说：“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论语·里仁》）他首先提出义利的分别，并把追求义还是追求利作为划分君子和小人的标准。但孔子并不完全否定利。他曾说过：“因民之所利而利之，斯不亦惠而不费乎？”（《论语·尧曰》）他还赞美管仲“九合诸侯，一匡天下”，使老百姓得到好处。孔子反对的是只追求个人的私利，要求君子“见得思义”（《论语·季氏》）。如果利不符合道义要求，就要舍利而取义。

孟子继承和发挥孔子的思想，更加强调义利的对立，表现崇义排利的倾向。他对梁惠王说：“王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矣。”如果大家都追求利，就会造成“上下交征利义而国危矣”的局面。（以上见《孟子·梁惠王上》）孟子说的利也是个人的私利。

荀子的观点和孟子有区别，他认为“义与利者，人之所两有也。虽尧舜不能去民之欲利”，“虽桀纣亦不能去民之好义”。（《荀子·大略》）在荀子看来，义和利是人们兼有的要求，任何人都不能抹杀人们对精神道德的追求，也不能抹杀人们的物质利益。但他强调不能使对利的追求超过对义的追求。“义胜利者为治世，利克义者为乱世”（同上）荀子先义后利的原则和孔子说的“见得思义”是一致的。

墨家的思想和儒家有区别，认为义和利是统一的。《墨经》上说：“利，义也”，利就是义。墨家说的利是天下国家之利，是爱人、利人、有益于天下人的行为，不是个人的私利，对子亏父而自利、臣亏君而自利、父亏子而自利、君亏臣而自利的行为持反对态度。有益于天下人的利和义是一致的，故义利是互相统一而不是互相对立的。

管子提出：“仓廩实则知礼节，衣食足则知荣辱。”（《管子·牧民》）认为物质财富是道德的基础，脱离物质利益单纯用仁义教化民众是徒劳无功的。这是不同于儒墨两家的重利轻义的义利观。法家也认为精神道德和物质生活条件有关系，古时“人民少而财有余，故民不争”，今时“人民众而财货寡，事劳力而供养薄，故民争。”（《韩非子·五蠹》）他们对人们孜孜求利的现象进行了冷静的分析。

西汉董仲舒在独尊儒术的背景下，对儒家的义利观加以概括和发挥，提出“夫仁人者，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汉书·董仲舒传》）

的著名观点，明确表达了崇尚道义、否定功利的观点。

孟子和董仲舒崇义排利的观点受到李觚、叶适、颜元等人的批评。李觚针对孟子“王何必曰利”的观点说：“利可言乎？曰：人非利不生，曷为不可言？”叶适对董仲舒的观点提出异议，认为离开功利，道义就成了空话。他说：“仁人正谊不谋利，明道不计功，此语初看极好，细看全疏阔。古人以利与人，而不自居其功，故道义光明。后世儒者行仲舒之论，既无功利，则道义者乃无用之虚语耳。”（《习学记言》卷二十三）

颜元在明末清初黄宗羲、王夫之、顾炎武等思想家反对空谈义理、宏扬实学的风气下，进一步阐述了义利统一的观点。颜元认为：人的活动就是谋利计功，耕种要谋收获，荷网持钩要计得鱼。人的道德存在于功利之中，只有通过实功才能表现出来。“正谊便谋利，明道便计功，是欲速，是助长；全不谋利计功，是空寂，是腐儒。”（《颜习斋言行录》卷下）颜元反对董仲舒的价值标准，提出要“正其谊以谋其利，明其道以计其功。”（《四书正误》卷一）

古人关于义利关系的论辩，现在仍有现实意义，他们提出的见解也能给我们许多启示。在他们研究、争论的基础上，我们可以对义利关系得出下面一些认识：义和利既有区别，又有联系，只有两者辩证统一，社会才能进步；我们不能抹杀和否定个人利益，但要超越个人的眼界，谋取集体和社会的利益；我们不能否定物质利益，但不能只追求物质利益，牺牲精神道德的价值；真正的人生幸福在于创造与享受的统一之中，只有享受、没有创造的人生是毫无价值的。

义是什么？有多种解释。《中庸》说：“义者，宜也。”孟子说：“义者，人之正路也。”（《孟子·离娄上》）他以“敬长”为义，以“非其有而取之”为非义。（见《孟子·尽心上》）韩愈以“行而宜之之曰义”。（《原道》）可见义是人们思想行为的道德原则和规范要求，属于社会的意识形态。利指功利和物质利益，与经济关系和物质生活条件相联系，属于社会的经济基础。

作为社会意识形态的义即道德原则，是由经济基础决定的。人类的道德随着经济上的需要一步步发展起来。“在这种意义下，可以也应当说，利益是道德的基础。”（《普列汉诺夫选集》第二卷）“每一个社会的经济关系首先是作为利益表现出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 537 页）于是有适应不同历史发展阶段的道德，如原始社会的道德，封建社会的道德，资本主义社会的道德，社会主义社会的道德。这些不同社会历史阶段的道德既有继承性，又有变化和原则区别。

道德原则对经济基础有巨大的反作用。它协调和保护人们的物质利益关系，规范人们的思想行为，激发人们的积极性创造性，以促进经济的发展。道德原则还从整体利益和长远利益的考虑出发，为人们的经济活动提供方向和指导原则。一个没有道德的社会，是不可能真正获得功利和效益的。

不能脱离物质利益来谈道德原则，不能空谈心性，轻视功利。在改革开放、建设社会主义的新时期，我们的道德原则应该是追求社会主义建设的功利，改善人民的物质生活条件和水平。脱离人民的物质利益谈道德，就会脱离人民的需要，成为迂腐可笑的事情。

同时，我们也不能只讲物质利益，否认道德的作用。只讲利益，不讲道

德，是短视的功利主义。如果“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史记·货殖列传》）人人都唯利是图，“一切向钱看”，其结果不仅是道德沦丧，还会破坏社会的安定和经济建设。这样，也就无功利和利益可言了。

道德不能离开宣传教育和自我修养而自发地产生。最富有的人不一定是道德高尚的人。经济发展了，人们的生活水平提高了，社会的道德水平不一定随之提高。因此，我们在进行物质文明建设的同时，要加强精神文明建设，在追求物质利益的同时，要加强自身的道德修养。从个人道德修养来说，儒家先义后利的原则，还是值得我们重视的。

义利关系涉及个人利益和集体利益的关系。个人利益和集体利益是相互联系、不可分割的。个人生活在集体之中，个人的发展离不开集体提供的机遇和条件，个人利益的实现离不开集体的共同奋斗和保障。皮之不存，毛将焉附；覆巢之下，焉有完卵。没有集体的发展和集体利益的实现，也就没有个人的利益。从另一方面看，集体利益也离不开个人利益。个人利益是集体利益得以实现的基础，集体利益最终要通过每个劳动者的个人利益体现出来。

在私有制条件下，个人利益和集体利益的一致性受到极大的破坏。占统治地位的剥削阶级奉行“人不为己、天诛地灭”的利己主义，用剥削他人、损人利己的办法谋取个人和本阶级的私利，并把这种私利冒充为社会的整体利益。这就是黄宗羲所说的“以我之大私为天下之大公”（《明夷待访录·原君》）。当然，也有一些杰出人物，为了社会的发展和国家民族的利益，或者致力于科学文化事业；或者反抗权贵，造福人民；或者慷慨捐躯，英勇就义。他们的行为符合全体人民的利益，是值得我们崇敬的。

在社会主义条件下，以公有制为主体，个人利益和集体利益的基本一致，有了现实的经济基础。社会主义可以把个人利益和集体利益有机地结合起来，并为个人利益的实现开辟广阔的前景，提供可靠的保证。在社会主义条件下，个人利益和集体利益也有矛盾。这种矛盾可以按照个人利益服从集体利益的原则加以解决。这样处理，虽然牺牲了个人的暂时利益，却保证了大多数人的利益，也保证了个人的长远利益和根本利益。儒家重义轻利、见利思义的原则如果正确地理解运用，把义理解为社会公共利益，把利理解为个人利益，不因追求个人利益去损害社会的公共利益，那么，这样的原则应该说是合理的，有益的。而形形色色的个人至上主义、利己主义则是有害的，应该加以摒弃；不能因为建立市场经济体制就去批判集体主义原则，批判大公无私，就去为个人主义正名，为利己主义正名。

利己主义以损人利己、损公肥私为特征，牺牲别人的正当利益，攫取个人非分的私利，损害公共利益，以满足自己无厌的贪欲；为了达到目的，不择手段，不顾廉耻。这种思想是社会的腐蚀剂，怎么可以任其滋长蔓延呢！

义和利，公和私，在经济领域是国家、集体利益和个人利益，在道德领域是一心为公的思想行为和自私自利的思想行为。处理经济领域的义利关系，应该实行公私兼顾、照顾个人利益的原则；在道德领域，应该提倡一心为公、大公无私，不能把个人主义、利己主义作为我们的道德原则。

义利关系更直接的是如何处理物质生活与精神生活的关系。每个人都有物质生活需要。饥则食，渴则饮，寒则衣，就是物质生活需要。缺乏必要的物质生活条件，会使人痛苦和不幸。正是人们追求物质生活条件的改善，推

动了社会不断的发展进步。每个人还有精神生活的需要，如学习的需要，文化娱乐的需要，以及科学的创造，事业的成就，理想的实现，等等。精神生活需要得不到满足，使人的生活降到动物的水平，也会感到痛苦和不幸。

对待精神生活和物质生活的态度，受人们的人生价值观的制约。有的人重视物质生活的享受，有的人重视精神生活的愉悦。实际上两者相互作用，相互制约。物质生活是人类生存、创造活动的基础，没有起码的物质生活条件，人们的精神生活就会受到极大的限制。精神生活是人类更高层次的需要，它可以指导和支配物质生活的需要，使人们获得真正的幸福。如果沉湎于物质生活享受，精神上就会感到苦闷空虚。这样的人生也是不幸的。

古希腊哲学家伊壁鸠鲁认为，肉体的快乐和感官的快乐是一切快乐的基础，但精神快乐高于肉体的快乐，只有这种快乐才是持久、稳定和深刻的。人生应该追求的是“身体的无痛苦和心灵的无纷扰。”（《古希腊罗马哲学》）

孟子提出“舍生取义”的著名观点。他说：“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一箪食，一豆羹，得之则生，弗得则死。噓尔而与之，行道之人弗受；蹴尔而与之，乞人不屑也。”（《孟子·告子上》）“乞人不屑”指的是《礼记·檀弓》记载的，齐国一位饥民宁愿饿死，不吃嗟来之食的故事。生属于物质生活需要，义属于精神生活需要。当事关人格尊严、道义原则，而生与义又不能兼顾的时候，孟子认为应该坚持人格尊严，舍生取义。

孟子高扬人格价格的思想在中国历史上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是我们民族的宝贵精神财富。我们不应该抹杀物质利益，否定物质生活的享受和幸福；但是，不应该为了追求物质生活的享受，出卖人格尊严和国家民族的利益。

我们的人生价值不仅重视道德和人格的价值，重视精神生活需要的满足，而且重视享受与创造的统一。创造满足需要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这是获得幸福的基础和条件；同时创造本身也会给人带来最大的幸福。人们甚至认为：人生的快乐，不在于创造的成果，而在创造过程本身。创造的需要，成就的需要，是人们更高层次的精神需要。

通过诚实劳动，取得合理的享受，是应该鼓励和提倡的。但不思创造、只图享受的思想和作法是应该反对的。这种脱离创造、以享受为最高价值的享乐主义人生观，以声色犬马、恣情纵欲、寻求感官刺激的处世态度，是一种粗俗、颓废、没落的处世哲学。一个人只追求个人享乐，就会丧失生活的目标和进取心，以致道德沦丧，腐化堕落。一旦落到这种地步，享受不再是快乐而是痛苦了。我们在任何时候，都要讲理想，讲奋斗，讲奉献，在创造、奋斗的过程中实现人生的价值，享受人生的欢乐。

自强不息

自强不息是中华民族的宝贵传统，是我们立身处世应持的基本态度。我们的民族能走过数千年的历史风雨，战胜自然，战胜天灾人祸，战胜动乱和分裂，一直生存发展到今天，和这种充满生命力、创造力的宝贵传统有非常密切的关系。自强不息能够成为一种民族传统和民族精神，既是先哲们对民族历史实践的深刻总结，也是先哲们超越人事、对宇宙万物发展规律的综合把握。

《易经》上说：“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乾卦·象》）

根据《易经》的思想，宇宙不是机械的，僵死的，而是不断创造发展、充满生命活力。宇宙化育万物，生生不已，呈现出浩荡无涯、大化流行的生命景象，宇宙是刚健生动、充满生机的活宇宙。日月星辰，东升西落；风雨雷电，奔腾激荡；潺潺细流，汇为江河，草木花卉，枯而复绿。天道的创造力化育万物，于是自然界便弥漫生命的洪流，生机盎然，创进不已。

生于天地间的人类，面对创进不已的自然界，自然也应该秉此精神，不断创造，不断奋进。因此《易经》提出“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的宇宙观和人生价值观。儒家的思想家认为，人是有这种创造潜能的。《中庸》说：“能尽人之性，则能尽物之性；能尽物之性，则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则可以与天地参矣。”撇开《中庸》以“诚”为天地万物本源的唯心主义宇宙观不说，它所倡导的高扬人的生命价值和创造力，人与大地并立的自强不息、刚健有为的精神，则可以涵养人的德性，发挥人的智能。人有幸生于天地之间，应该通过自强不息的奋斗和追求，以达到人格的完美和生命的笃实光辉。

以自强不息的精神立身处世，则人生的目的和意义在于不断的奋斗与创造。而其具体目标则有立德、立功、立言三项。立德是追求道德上的成就，立功是追求事业上的成就，立言是追求学术研究上的成就。这虽然是对知识分子说的，但除立言之外，其他两项和一般人也有关系。人人都可以根据自己所处的环境和条件，追求思想上的进步和事业上的成就。这样，自强不息便可以作为处世的态度，以积极奋进的姿态对待生活，对待人生，在思想和事业上都不断追求更高一级的境界；不论是环境顺利还是险恶的时候，不论是取得成功还是遭受失败的时候，都奋斗不息，永不停止。

《山海经》里有两则故事便是自强不息精神的生动写照。一则是精卫填海：

“发鸠之山，其上多柘木。有鸟焉，其状如鸟，文首，白喙，赤足，名曰精卫”，她原为“炎帝之少女，名曰女娃。女娃游于东海，溺而不返，故为精卫。常衔西山之石，以堙于东海。”（《山海经·北山经》）

另一则是刑天舞干戚：

“刑天与帝争神，帝断其首，葬之常羊之山，乃以乳为目，以脐为口，操干戚以舞。”（《山海经·海外西经》）据宋罗泌《路史·后纪三》），刑天为炎帝臣，帝为黄帝，“刑天与帝争神”，是炎黄之战的余波。

精卫是和自然界进行斗争的英雄，衔西山的木石想把东海填平，显示了她顽强的斗争毅力。刑天是社会斗争中的英雄，失败被砍头以后，仍然挥舞盾牌和兵器，显示他死而不屈的顽强斗志。陶渊明为他们的精神所感动，写了金刚怒目式的名作。其诗云：

“精卫衔微木，将以填沧海。刑天舞干戚，猛志固常在。”（《读山海经》其十）

除以上两则外，还有许多神话传说，如夸父追日、愚公移山等，无一不是自强不息精神的生动体现。我们的民族，我们的文化传统，没有遭受已化为历史陈迹的古埃及、巴比伦等文明古国的命运，至今仍绵延不绝，生生不息，实在赖于自强不息精神所赋予的生命力和创造力。

自强不息的精神不仅属于英雄人物，圣贤君子，也是一般常人应有处世智慧和处世态度。自强才能自立。一个人只有自强不息，才能立足于社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只有自强不息，才能立足于世界。

一条最简单的真理，是一个人先要有独立生存的能力，靠自己养活自己，然后才谈得上发展创造，成就事业，造福人类。

不能一辈子靠祖宗和父母。君子之泽，五世而斩。父母有衰老死亡的时候，家庭遗产也会坐吃山空。自己没有谋生的本领，没有独立生活的能力，一旦发生变故，就会陷于困顿沦落的境地。八旗子弟后来成为衣食无着的末路王孙，便是证明。因此有见识的古人注意教子自立，不留下大量的财富田产去害儿孙。一些西方人也注意培养子女的独立生活能力，男女青年十八周岁以后，就和家庭脱离经济关系，过自食其力的生活。

不能事事依赖别人。在生活 and 事业中，外力的支援帮助是需要的，但应以自立自强为主，一个人没有自强的决心，只靠别人支援，就永远也不能自立。高尔基说过：“一个对事事都抱怨不绝、又叹息又呻吟的人，半文不值，不配受人怜悯，就是帮助他，也不会给他带来任何好处”，“只会由于怜悯他们，使得他介萎靡不振，那就更害了他们。”（《福马·高尔杰耶夫》）

不能埋怨环境，坐等命运的恩赐。人生在世，总不能事事如意。身处逆境，也不要作无益的烦恼，白白浪费时间；而要平心静气地去办事。肖伯纳在《华伦夫人的职业》中写道：“我不信什么境遇。世界上有成就的人都是能放开眼光找他们需要的环境的人。要是找不着，就自己创造。”这正是强者的处世态度。命运也是如此。强者自己主宰命运，弱者屈从命运，受命运支配。而命运又只照顾强者，不照顾懦弱和懒惰的人。

陶行知有《自立立人歌》，说得朴实而深刻。歌词说：

滴自己的汗，
吃自己的饭，
自己的事自己干。
靠天、靠地、靠祖上，
不算是好汉。

要做一个好汉，做一个顶天立地的人，就要靠自强不息的精神，去开辟人生的道路，创造美好的未来。这样得来的成就和幸福最可靠。

自强自立是保持人格独立、人格尊严的必要条件。古人云：“宁能我食，不食于人；复食于人，是食其身。”（《皮日休文集·食箴并序》）“人不自重，斯召侮矣；不自强，斯召辱矣。”（《薛方山统述·上篇》）宁愿自食其力，不依赖别人生活；如果依赖别人生活，自己就要吃亏。不自强自立，也就是不自重，不争气，就会招来别人的侮辱。依靠别人，靠别人的帮助或者施舍过日子，就会受人制约，被人摆布。这样当然谈不上人格的尊严和独立，最终还会被别人抛弃。

以上是古人总结的关于人生的经验教训。我们对这些经验教训，要结合

时代的要求从积极方面去理解。今天我们所处的时代是充满机遇和竞争的新时代。我们的民族要在竞争中振兴腾飞，我们民族的每一分子，特别是青年，要具备新的素质才能适应时代的要求。这种新的素质包括：

振兴中华的爱国意识：对祖国历史、文明、河山的热爱，对祖国未来的信心，为祖国振兴而奋发有为的志向；

自强自律的生存意识：独立思考的习惯，自信进取的心理，勇敢顽强的意志，遵守社会规范的纪律法制观念；

团结协作的群体意识：对社会和集体的责任感，对他人的爱心、同情心，与他人合作共事、乐于助人的良好作风；

追求真知的创造意识：勤于观察，善于思考的思维能力，勇于探索、勇于实践的革新精神，等等。

以上内容可以概括为一种健康向上的人格意识。这种人格意识处处渗透着自强不息的奋斗精神。振兴中华的爱国意识是以自强不息精神对待祖国的命运和前途；自强自律的生存意识是以自强不息精神对待生活和社会；追求真知的创造意识是以自强不息精神对待工作和事业；团结协作的群体意识也是以自强不息精神为基础、为前提的。试想：一个不能自强自立的人，又怎么能履行对社会的责任和帮助他人呢！

由此可见，自强不息是一种积极向上的处世观，一种创造超越的处世观。它拒绝软弱和懒惰，拒绝停滞和自满，拒绝依赖他人，坐享其成。

用这种精神来指导人的思想行为，就不应该怨天尤人，无所作为，而应该自己动手，改变环境，改变现状；就不应该满足于已有的成绩，而要生命不息，奋斗不止；就不应该屈服于困难和压力，而要有战胜一切、压倒一切的信心和勇气。对于我们的子女，也不应该用金钱为他们铺设幸福的前程，而要帮助他们自强自立，掌握生存发展的能力，使他们能应付各种生活环境，会劳动，会工作，会创造，并能帮助他人，服务社会。

在自强不息的奋斗过程中，也会有失败，有挫折，甚至有牺牲，因为人生道路不会一直平坦，我们的世界也不会完满无缺。我们要战胜厄运，通向胜利的道路，只能用自强不息的精神去开辟。事物发展的总趋势，是经过不懈的奋斗，总会取得成功。

人生的意义和价值不能只用胜利去衡量，还要看心灵和意志。心灵高尚、意志坚强的人，即使失败了，也是英雄，堪“强有力的、独立的、高尚的人物。”（契诃夫《匿名的故事》）他们的失败，是“傲然抗衡胜利的意气扬扬的失败”（蒙田《人生随笔》），可以激励后人，教育来者。

人生的幸福不只是取得胜利后的喜悦，还在于取得胜利的整个奋斗过程。经过失败挫折、全力拼搏后取得的胜利，是最完满、最充实、最值得回味的；一旦取得胜利，奋斗过程终结，胜利的喜悦就会因丧失奋斗的目标而成为一种失落感所代替。哲人有言：“斗争就是幸福”；“与天奋斗，其乐无穷；与地奋斗，其乐无穷；与人奋斗，其乐无穷”，此中有深意存焉！

不徒贫贱

贫贱是一种困顿的生活境遇和低下的社会地位。在远古的初民社会，人们的社会地位处于同一水平线上，没有剥削和压迫。但由于生产力低下，整个人类为贫穷所困扰。后来，随着生产力的发展，私有制产生了。人们的社会地位有了高低贵贱的不同，人们的物质生活水平也有富裕和贫穷的差别了。

贫贱的社会地位和生活境遇，使人们忍受物质生活和精神上的双重痛苦。物质生活的痛苦如饥饿、寒冷、疾病、流亡等，这是人人都能感受到的。精神上的痛苦如思想麻木、意志消沉、遭受屈辱歧视等，也已由文人们形之于笔端。因此，求富贵，避贫贱，便成为人之常情。

如何看待贫贱，如何改变贫贱的现状，古代的思想家们作过深入的思考。他们用长远的观点看到富贵贫贱可以生灭、转化，要求人们从个人与天下国家、精神生活与物质生活等方面，全面看待富贵贫贱的得与失，忧与乐，做到贫不失志，贫不失义。

孟子有一段名言：“敌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孟子·告子下》）

孟子这段话是根据六位名人的成功事例总结出来的。这六位名人就是“发于畎亩之中”的舜，“举于版筑之间”的傅说，“举于渔盐之中”的胶鬲，“举于士”的管夷吾，“举于海”的孙叔敖，“举于市”的百里奚。舜原来“耕历山，渔雷泽，陶河滨，作什器于寿丘”（《史记·五帝本纪》），农、渔、手工业都干过，都干得很好，并能以良好的品德影响人，因而被推荐接替尧的职位，成为中国历史上有名五帝之一。傅说原来是做建筑工作的奴隶，后来被推举为商朝皇帝武丁的大臣佑，使衰落的商朝重新复兴。胶鬲原来是贩鱼盐的，后来经人推荐，当了商朝的大臣。管夷吾即管仲，原先辅佐公子纠，公子纠争王位失败后管仲当了囚徒，经鲍叔推荐，辅佐齐桓公成就了霸业。孙叔敖长期隐居在东海之滨，后来当了楚庄王的丞相，使楚国“吏无奸邪，盗贼不起”。百里奚原为虞国谋士，虞国灭亡后成了奴隶。秦穆公用五张羊皮赎买了他。后来百里奚成了帮助秦国称霸的著名政治家。

上面六位名人原来都很贫贱，有的还是奴隶，后来成了名君名臣。这说明贫贱的逆境对人的影响有两面性：一方面给人带来物质生活和精神上的痛苦；另一方面又可以锻炼人的意志，增长人的才干，也就是孟子说的“动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

外国人也有类似的看法。

泰戈尔说：“世界之路并没有铺满鲜花，每一步都有荆棘。但是你必须走过那条荆棘的路，愉快，微笑！这是对人的考验，你必须把忧愁转变为有所得，把辛酸转变为甜蜜。”（《采果集》）

罗曼·罗兰在他的作品中写道：“累累的创伤，就是生命给你的最好的桌面，因为在每个创伤上面都标志着前进的一步。”（《约翰·克利斯朵夫》）

哈代在作品中说：“人生里有价值的事，并不是人生的美丽，却是人生的痛苦。”（《德伯家的苔丝》）

托马斯·曼也有如下的名言：“不识愁苦滋味的人终生是幼稚的赤子。”（《布登勃洛克一家》）

他们说的意思也是贫困苦难可以使人坚强，使人成熟，不必计较人生的困苦，那都是生活对我们的教诲。外国也不乏身处贫贱、但善于接受生活教诲的人，最后取得了富贵和成功。美国总统林肯降生在猎人的小屋、成长在马车和帐篷里，当过帮工、船员和店员，受正规教育的时间加起来不到一年。漂泊无定的艰苦生活丰富了他的生活阅历，为他后来从事政治活动打下了坚实的基础。马克·吐温 12 岁起即自谋生活，以后长期流浪，当过水手、舵工和淘金者。这一段颠沛流离的苦难生活，是他独有的财富，使他成为举世闻名的作家。爱因斯坦大学毕业后长期没有固定的工作，但他以乐观的天性忍受物质生活的贫困而潜心于科学研究，建立了相对论，成为在物理学许多领域都有重大成就的科学家。他们的人生经历证明了贫困是生活给我们的磨练和教诲，它会使一切有志者受益无穷。

当然，不是每一个人都能改变贫贱的人生困境而获得成功的。问题的关键在于贫贱时能不能仍然信念坚定，志向不移，不向环境屈服，不消极沉沦。苏拭在《上梅直讲书》中说：“人不可以苟富贵，亦不可以徒贫贱”。梅直讲即梅尧臣，他和欧阳修主持考试，看到苏拭的应试文章《刑赏忠厚之至论》，非常赞赏，列为第二。苏拭及第后写信推崇欧、梅，畅谈知遇之乐和自己的抱负。他认为一个人不能苟且地得到富贵，也不能徒然地安于贫贱；不论富贵贫贱，都要和贤能的人一起研究学问，做到“不怨天，不尤人，下学而上达”。（《论语·宪问》）苏轼一生坎坷，但始终不失乐观进取的精神，最后贬到海南，仍然热心于文化教育事业，深受黎族人民的爱戴。

“贫不足羞，可羞是贫而无志；贱不足恶，可憎是贱而无能。”（金兰生《格言联璧》）贫贱富贵是受多种因素制约的，有客观的环境、条件和机遇，有主观的条件和努力程度。客观条件是外在的，机遇也可遇而不可求，只有主观因素是自己可以掌握的。由于客观因素而贫贱，不是可羞可恶的事，由于主观不努力，因贫贱而丧失志气，随波逐流，安于贫贱，那就是可羞可恶的了。在身处贫贱的时候，仍然要保持积极进取的精神，冷静地分析人生环境，把握人生的机遇，认真做好眼前能做的每一件事，在任何时候都不放松学习和努力。这是一切成功者的秘诀。

什么是贫贱，不能只用物质财富和权力地位衡量，还有精神道德的标准。物质上富有的人精神上可能很贫困，地位高、权力大的人，道德上可能很卑贱。反过来说也是这样：物质生活不富裕的人，精神生活可能很充实，社会地位不高的人，道德可能很高尚。

对富贵贫贱的认识和感受还受人生观、价值观的制约。有人重物质生活，有人重精神生活。孔子说：“君子忧道不忧贫。”（《论语·卫灵公》）忧道就是忧“德之不修，学之不讲，闻义不能徙，不善不能改”（《论语·述而》）。孔子认为，这些属于品德学业的事比物质生活享受更重要。虽有优越的物质生活享受，但若是误了修德讲学的大事，还是令君子担忧的。虽然物质生活贫困，如果“内省不疚”，达到了仁的境界，也可以有精神上的快乐。

周敦颐说：“君子以道充为贵，身安为富，故常泰无不足，而株视轩冕，尘视金玉”（《通书》）。轩冕者，权位也，金玉者，财富也。这些常人追求的东西，有道德的君子是不屑一顾的。他们认为：“天地间，至尊者道，至贵者德而已矣。”这就是儒家推崇的“安贫乐道”的处世态度。

应该如何评价安贫乐道的处世态度呢？物质生活是基础，没有起码的物

质生活条件，人生是痛苦的。一般的人很难像颜回那样，生活在陋巷，一簞食，一瓢饮，而不改其乐。安贫乐道如果指否定改善物质生活的要求，放弃改善物质生活的努力，那显然是偏颇的。但物质生活要以精神生活为指导，没有健康高尚的精神生活，物质生活再优越，人们也会感到苦闷和痛苦。一个人如果物质生活条件好，又有高尚的道德和文化修养，就会感到生活充实、美好、幸福。如果整个社会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都得到高度发展，人们便可以摆脱贫贱的命运，大家都过富裕、文明、幸福的生活了。

现在还不具备这样条件。贫贱的命运还可能降临到我们头上。当一个人贫贱的时候，需要道德原则的指导和精神力量的支持。古代许多正直的知识分子就是靠道德原则和精神力量来保持自己的品德和人格尊严的。荀子说：“志意修，则骄富贵，道义重，则轻王公。”（《荀子·修身》）陶渊明不为五斗米折腰，李白高唱“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都反映了精神道德的作用。这种坚持道义和人格尊严的处世态度还是应该肯定的。我们总不能因为贫贱，就不顾廉耻，出卖人格，向富贵者卑躬屈膝。

一个人虽然贫贱，只要有高尚的道德修养也能得到生活的乐趣。苏拭在《上梅直讲书》中曾以孔子为例说明这个道理。孔子一生恹恹惶惶，到处奔波，不能为天下所容。但他和颜渊、仲由等贤才相与问答，也足以相乐。苏拭认为：周公之富贵，不如孔子之贫贱。周公辅成王，管叔、蔡叔散布流言，说周公要加害成王。管蔡是周公的弟弟，骨肉之亲因猜忌不能共享富贵。孔子和他的弟子虽处贫贱，但生活得和和乐乐。这说明精神道德的作用可以减少、抵消物质生活贫困所带来的痛苦。

贫不失道还有另一方面的要求，就是不能只忧个人的贫贱，还要忧天下国家的贫贱，忧广大人民的痛苦。范仲淹说：“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就表现了这种崇高的思想境界。我们应该以这样的思想境界来把握安贫乐道的积极因素，对它作出新的解释：“安贫”是指个人应该忍受暂时的贫苦生活，而致力于品德修养和工作事业；“乐道”是指吃苦在先，享受在后，为人民谋富裕幸福的生活，必要时可以为了人民的利益牺牲个人的利益。

我国还有不少地区处于贫穷落后的状况，有几千万人生活还没有达到温饱水平。为了使广大人民富裕起来，使国家富强起来，贡献出我们的全部智慧和力量，这是道义的基本要求。今天讲忧道，就是忧人民的苦乐，忧民族的兴衰。我们不能安于贫穷落后，而要迎头赶上，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贫富的标准是比较明确的，贵贱的标准则随着时代和人们的观念不断变化。古代社会以门第、权力分别贵贱尊卑，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以金钱分别贵贱尊卑。在我们的社会主义社会里，又有了分别贵贱尊卑的新的标准。从总体上看，门第已不受社会重视，金钱也失去评判一切的权威。一切社会成员只有社会分工的不同，没有高低贵贱的区别。但社会仍然对每个人作出评价，有的人受尊敬，有的被鄙视。评价的标准就是每个人的思想品德和成就贡献。先人后己、一心为公的人受人尊敬，自私自利、损人利己的人被人鄙视。各行各业中成就突出、业绩辉煌的人受人尊敬，消极沉沦、醉生梦死的被人鄙视。身处显要岗位的人，如果碌碌无为，他是平凡的。身处平凡岗位的人，如果成就突出，他是高贵的。这种变化为每个人改变贫贱的地位开辟了广阔的前途。只要贫而有志，贱而有能，个人的价值总会被社会承认，创造出光

辉而有意义的人生。

不苟富贵

富贵与贫贱相对立，是人生境遇的另一极。一般人都避贫贱而求富贵。千百年来，功名利禄，富贵荣华，一直是人们向往的目标。但对富贵也要有全面的认识和正确的态度，如果处理不当，就会对社会、对人生产生负面的影响。

“甚爱，必大费；多藏，必厚亡。”（《老子》第四十四章）过分求名声，必然带来大的花费，过多的收藏财货，必然招致重大的损失。

“高位实疾颠，厚味实腊毒。”（《国语·周语下》）地位高了，会很快坠下来，醇厚的美味吃多了，会损害身体，成为毒药。

上面两句话说明：过分贪恋财货权位，会招来祸害。历史上这类事例很多。西晋的石崇财富敌国，连晋武帝的舅舅王恺也望尘莫及。《世说新语》记载：“石崇与王恺斗豪，并穷绮丽以饰舆服”。武帝曾赐给王恺一株高二尺的珊瑚树，王恺拿出来给石崇看。石崇用铁如意把珊瑚树打碎，又令家人把自己收藏的珊瑚树拿出来，有六七枝高三至四尺的珊瑚树，条干绝世，光彩溢目，像王恺那样的珊瑚甚多。王恺看了不禁目瞪口呆。石崇又造私人园林“金谷园”，成天在其中饮宴游乐，过着奢侈无比的生活。石崇正因为财富敌国，最后被赵王司马伦所杀，全家老小无一幸免。

在封建社会里，不少人因为位极人臣、功高震主而招灭门之祸。韩信以勇略震主被擒，霍光以权势逼君灭族。韩信的故事前面已经说过，这里说说霍光。霍光也是西汉重臣，受武帝遗诏辅佐年仅8岁的昭帝。昭帝21岁就去世了，无子，另立武帝的孙子刘贺为帝。刘贺行为淫乱，在位27天即被废，再立宣帝。霍光先后辅佐三朝皇帝，功勋卓著，但秉权日久，结怨日多。《汉书》记载：宣帝始立，渴见高庙时，霍光同车陪乘，宣帝十分恐惧，若有芒刺在背。后车骑将军张安世代霍光同车陪乘，宣帝才浑身舒展。霍光死后，霍家子弟诸婿骄恣不谨，反对者日多，终招满门诛灭之祸，与霍氏相连坐而被诛杀者数千家。霍氏的灭门之祸，是从宣帝与霍光乘车时产生的戒惧心理开始萌发的。

对财富权力的贪欲，如猛火烈焰，不仅焚人，亦将焚己。争夺财富权力人们尔诈我虞，互相倾轧，以至骨肉相残，夫妻反目。在极富极贵的宫廷内部和王公贵族之家，这种斗争更加激烈。因此帝王将相家的儿女们常有不生在平常百姓家的感叹。“炎凉之态，富贵更甚于贫贱；妒忌之心，骨肉尤狠于外人”（洪应明《菜根谭》），就是这种情况的写照。此外，因富贵而骄奢淫佚，道德沦丧，失去在学问、事业方面的进取心，成为无德无才的纨绔子弟，也是富贵常常带来的负面影响。

富贵不足恃，富贵不可长保。盛极而衰，是事物发展的普遍规律。名门望族，转眼间就会衰败下来。刘禹锡诗云：“朱雀桥边野草花，乌衣巷口夕阳斜。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西晋政权建都金陵后，乌衣巷是王导、谢安等名门望族的居住地。随着时光流逝，王侯们的高堂华屋，已成为普通百姓的住处，煊赫一时的贵族，也如过眼云烟，转瞬间化为历史的陈迹了。

从个人来说，富贵荣华都是生不带来、死不带去的身外之物。一旦生命终结，富贵者贫贱者都成了一杯黄土。唯有道德高尚的人，替人民办过好事的人，对社会作过贡献的人，可以活在人们的心里，可以超越个人的生命而

永垂不朽。为个人富贵钻营争夺的人，生前时时受贪欲的缠绕折磨，死后仍然两手空空。《红楼梦》有一首《好了歌》：“世人都晓神仙好，唯有功名忘不了！古今将相在何方，荒冢一堆草没了。世人都晓神仙好，只有金银忘不了！终朝只恨聚无多，及到多时眼闭了……”这首歌以幻灭无常的观点看人生，不免有消极的意味，不过对醉心于个人功名富贵者，仍不失为一副清凉剂。

以上富贵害身、富贵无常的观点，是封建时代人们对人生经验的总结。现在时代不同了，不会再有因富贵而被杀身灭族的事情发生。我们不应该因富贵无常而消极避世，不能完全脱离物质生活享受去寻找“孔颜乐趣”。改变贫穷落后的状况，过富裕、文明、幸福的生活，是广大人民的迫切愿望，也是时代赋予我们的责任。古人的丰富人生经验不完全适合现代的实际。

但如何对待富贵，仍然是人生的严峻考验。因为贪求金钱权力而违法乱纪的事时有发生。“富贵害身”的规律并未失去时效，古人的一些遗训对我们仍有启示借鉴的作用。

孔子说：“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遭得之，不处也。”（《论语·里仁》）不是用正当方法得到的富贵是不应该享受的。

孟子说：“万钟则不辨礼义而受之，万钟于我河加焉？”（《孟子·告子上》）他批评一些人分辨礼义就接受万钟的俸禄，这样得夹的万钟俸禄对我又有什么好处呢？

后来人们把孔子孟子的观点概括为“君子爱财，取之有道。”这种人生忠告今天仍有很强的针对性和现实意义。我们鼓励致富，改善人们的物质生活条件。但如何致富，仍然要考虑“以其道得之”的问题。也就是说：要勤劳致富，合法经营致富，依靠科技进步致富。如果不是这样，另外去搞邪门歪道，去搞坑蒙拐骗，贪污盗窃、投机倒把那一套，那就不仅是害国家，害人民，最终也必然会害自己。

自有商品交换以来，金钱便作为衡量财富的尺度。于是，在有些人眼里，金钱便具有万能的魔力。“无位而尊，无势而热。排金门，入紫闼。钱之所在，危可使安，死可使活。钱之所去，贵可使贱，生可使杀。”（鲁褒《钱神论》）用通俗的话说，就是“有钱能使鬼推磨”，用文雅的话说，就是金钱拜物教或拜金主义。

拜金主义是一种金钱至上观念，把金钱作为衡量一切标准。在拜金主义者看来，“世界上没有一样东西不是为了金钱而存在的，连他们本身也不例外。因为他们活着就是为了赚钱，除了快快发财，他们不知道还有别的幸福，除了金钱的损失，也不知道还有别的痛苦。”（《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卷 564 页）

拜金主义者以攫取金钱为人生目的，恰恰是人性的异化和人生价值的丧失。人要活着当然需要金钱，但人不是为了金钱而活着。从人生价值考虑，道德、事业比金钱更重要。而金钱不一定使我们道德高尚，金钱也不一定使我们拥有智慧。《吕氏春秋·孟冬纪·异宝》说：宋来之野人耕而得玉，献之司城子罕，子罕不受。野人请曰：‘此野人之宝也，愿相国为之赐而受之也。’子罕曰：‘子以玉为宝，我以不受为宝。’”这是把道德看得比玉更重要。爱因斯坦也曾把 1500 美元的支票当书签用。别人很惊讶。爱因斯坦平静地说：“重要的不是这个东西，而是科学。”这是把科学看得比金钱更重要。他们的言行告诉我们一个真理：不择手段地贪求金钱富贵会害了自己，

淡泊金钱富贵可以帮助我们完善品德，成就事业。

上面说的是要以道德、事业为重，取得富贵要符合道义的要求。那么，已经取得富贵的人应该怎么办呢？答曰：有钱财的人要善处钱财，有权力的人要慎用权力。

钱财本来是好东西，可以保证人们的物质生活条件，可以用来办事业，搞建设，推动社会的文明进步。但如果处理不当，也会产生负面的作用，例如滋长奢侈心，崇尚奢侈型的消费。为了炫耀财富和地位，在衣食住行和娱乐方面，放纵自己的需求欲望，肆意挥霍钱财，白白浪费社会财富，进而助长享受思想和腐朽没落的生活方式。这样，不仅阻碍社会进步，败坏社会风气，还会使个人和家庭因奢侈而衰败没落。

有了财富以后，仍然要注意节俭，实行适度消费。古人说：“俭开福源，奢起贫兆”（《魏书·李彪传》）；要求人们居丰行俭，在富能贫。”知道贫富变化的道理以后，在富贵的时候也要注意勤俭度日。这是饱含生活智慧的古训。勤俭节约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尚书》里说：“克俭于家”。老子以“俭”为“三宝”之一。墨子主张节用节葬，过俭朴的日子。荀子主张君主实行节用富民的政策，即“故明主必谨养其和，节其流，开其源，而时斟酌焉”。（《荀子·富国》）在荀子看来，勤劳节俭不是抑制合理消费，否定人们的物质生活，而是为了达到富国富民的目的。

中国人多底子薄，现在虽然经济发展了，和经济发达国家相比，还落后一大截，勤劳节俭的美德万万不可抛弃。即使将来普遍富裕以后，仍然要崇尚节俭，反对奢侈浪费。

从满足个人欲望的角度看，贫富具有相对性。奢者富而不足，俭者贫而有余。奢侈成性的人，财富愈多，贪心愈大，永无止境，时时陷入欲壑难填的苦恼之中。财富不多的人，因勤俭度日，反而能获得生活的乐趣。这就是“奢者心常贫，俭者心常富”的原因。有财富的人要从金钱的奴役下解放出来，才能得到心灵的充实，才能有益于社会和人民。

一个人不仅要善处钱财，还要慎用权力。刘向在《说苑·政理》中说：“临官莫如平，临财莫如廉”。当宫的人以公正最为紧要，理财的人以廉洁最为紧要。公正就是不谋私利，不循私情，不借公法来报复私人的仇怨，也不借公法来报答私人的恩德。清廉就是洁身自好，不凭借手中的权力谋取私利。只有公正，不受私欲的蒙蔽和牵制，才能察明事理，作出正确的决断；只有清廉，才能受到老百姓的信任和拥护，树立领导者的权威。

在古代封建社会，循私舞弊、贪赃枉法的人比比皆是。也有一些人刚正不阿，廉洁自律，反映了我们民族的传统美德。

春秋末期的晏婴，“以节俭力行重于齐”，当齐相以后，食不重肉，妾不衣帛，多次谢绝国君的封赏。他认为“古之事君者，称身而食，德厚而受禄，德薄则辞禄”（《晏子春秋集解》）。他老了以后，向齐景公辞去了自己的封邑。司马迁对晏婴很敬慕，说：“假令晏子而在，余虽为之执鞭，所忻慕焉。”

汉文帝刘恒行俭约之政，轻徭薄赋，与民休息，并躬行节俭，即位 23 年，宫室苑囿狗马服御无所增益。他曾想造露台，和工匠计算，需要花费百金。文帝说：“百金中民十家之产，吾奉兄帝宫室，常恐羞之，何以台为”，把造台的计划撤销了。他自己穿纬衣，他宠幸的慎夫人，“令衣不得曳地，帷帐不得文绣，以示敦朴，为天下先”。由于他勤政廉政，出现了“文景之

治”的盛世，为汉王朝进入全盛时期奠定了基础。

明代徐光启是大科学家、著有《农政全书》，晚年官至太子太保，文渊阁大学士兼礼部尚书，官阶相当于宰相。但他生活清廉，起居住处“室广仅丈，一榻无帟”，“盖棺之日，囊无余资”，箱子里只有几件旧衣，一两银子。这种“宰相居斗室，遗产一两银”的高尚风范，的确催人泪下。

今天的领导者和古代的官吏不同。他们不是统治人民的父母官，而是人民的公仆。公正清廉，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各级领导者的行为规范和基本职责。古代只有少数人能做到的事今天应该普遍做到。我们不仅要自己清正廉明，还要推进廉政建设，使贪污渎职者受到纪律制裁和法律惩处。在民主法制建设的保证下，公正清廉的美德将会普遍发扬，并达到一个新的水平。

待时而动

人们的命运遭遇各不相同。有人富贵，有人贫穷；有人显达，有人沉沦；有人常交好运，一帆风顺，有人恶运缠身，常陷困境。到底是什么力量在冥冥中主宰？

《论语》中说：“死生育命，富贵在天。”（《颜渊》篇）

《庄子》中说：“死生存亡，穷达富贵，贤与不肖，毁誉，饥渴寒暑，是事之变，命之行也。”（《德充符》篇）

这两种答案都认为人生的吉凶祸福受天命的主宰。只有荀子提出“制天命而用之”的主张。现在，人们对这个问题作出比较全面、科学的解释。人生的命运遭遇决定于客观条件，也决定于主观因素；有必然性，也有偶然性。客观条件是历史、社会、家庭提供的条件，主观因素是个人的素质和处世态度、处世方法。主客观因素相结合，构成决定命运的必然性。这种必然性通过各种偶然性表现出来。正确认识必然性，善于把握偶然性，人们便可以主宰自己的命运。其中的一个重要环节就是把握机遇，待时而动。

机遇指行事有利的空间、时间、环境和条件，是一种外在的客观因素，通常称为时机、机会，等等。有的时机是一定社会历史条件所提供的人人平等的机会。例如，当前国际国内形势为我国的经济发展提供了有利时机，也为每个人提供了施展才能抱负的良好机遇。有的时机是每个人在人生道路上所遇到的人、事、物、时等因素造成的机遇，带有偶然性，偶然性后面又隐藏着必然性。人们在青年时期的机遇会影响一生的人生道路和命运。因为读一本书走上革命道路，因为某位名人的提携、帮助成为学者或作家，因为受坏人影响而犯罪堕落，这类事情在生活中处处可见。这类机遇带有偶然性，但对人的命运、事业却有深远的影响。

选择时机，把握时机，是我们需要认真对待的问题。外国谚语说：“知道怎样静待时机，是人生成功的最大秘诀。”这就像行船一样，要趁着潮水涨高的那一刹那，非但没有阻力，并且能帮助你迅速成功。中国人谈时机问题的言论也很多：

“顺风而呼者易为气，因时而动者易为力。”（《盐铁论·论功》）顺风呼喊，声音可以传得很远，顺时行动，容易取得成功。

“虽有智慧，不如乘势；虽有镒基，不如待时。”（《孟子·公孙丑上》）虽然有智慧，不如把握住形势，虽然有好锄头，不如把握住农时。利用有利时机，可以事半功倍。

“时不至，不可强生也；事不究，不可强成也。”（刘向《说苑·谈丛》）时机不成熟，问题没有研究清楚，不能勉强去蛮干。

以上言论都强调时机对人生命运和事业成功的重要意义。善于利用时机，容易取得成功，丧失时机，就会终生遗憾。审时度势，认识时务，把握机遇，是一条处世要诀。

中国有句古话，“识时务者为俊杰。”这句话源出《三国志·诸葛亮传》注所引《襄阳记》：“刘备访世事于司马德操。德操曰：‘儒生俗士，岂识时务？识时务者在乎俊杰。此间自有伏龙、凤雏。’备问为谁，曰：‘诸葛亮孔明、庞士元也。’”这里讲的是治国兴邦的大时务，自然只有诸葛亮这样的俊杰才能看得清楚透彻，不是俊杰的普通人，即使不能认清天下的大形势，

也要认清时代的潮流，认清生存的大环境，从中把握人生的机遇。

机遇总是有的，问题在于你能不能发现它，抓住它。机遇是稍纵即逝的，你不及时抓住它，就会失之交臂，后悔莫及。古人说，“难得而易失者时也，时至而不旋踵者机也。”说明时机难得而易失，机不可失，时不再来。在人生旅途中要特别注意发现机遇，珍惜机遇；有了好机遇，就要及时抓住它，运用它。苏格拉底说：“最有希望的成功者，并不是才干出众的，而是那些最善于利用每一时机去发掘开拓的人。”这位哲人的话值得我们细细品味。

历史上有这方面的正反事例。大家熟知的故事“毛遂自荐”，是抓住机遇取得成功的例子。故事的梗概是：毛遂在平原君赵胜那里当门客，住了三年，平原君连他的名字都不知道，公元前260年，秦国攻赵，赵国的国都被围，形势危急。

平原君亲自去楚国求救，要从3000门客中挑选20个文武全才的人随行。选来选去，合格的只有19人。这时毛遂立即自我推荐，与平原君同往楚国。到楚国后，毛遂机智勇敢，说服楚王出兵救赵。平原君回来后对毛遂说：“毛先生一至楚，而使赵重于九鼎大吕，毛先生以三寸之舌，疆于百万之师。”于是尊毛遂为上客。（见《史记·平原君虞卿列传》）毛遂及时抓住机遇，施展自己的才干，完成了救赵的使命，也改变了自己长期被埋没、不受重用的命运。

三国时袁绍“以婴疾失机”，可以作为反面的例子。《三国演义》第二十四回说：曹操杀董卓后，发兵攻打徐州的刘备。刘备派孙乾向袁绍求救。袁绍的谋臣田丰带孙乾见袁绍。田丰对袁绍说：“今曹操东征刘玄德，许昌空虚，若以义兵乘虚而入，上可以保天子，下可以救万民。此不易得之机会也，惟明公裁之。”袁绍因为幼子生疥疮，执意不听田丰的意见。田丰以杖击地说：“遭此难遇之时，乃以婴儿之病，失此机会，大事去矣，大事去矣！可痛惜哉！”《三国志·袁绍传》也有记载：“建安五年，太祖（曹操）自东征刘备。田丰说绍袭太祖后，绍辞似子疾，不许。”可见这个故事并非虚构。史称袁绍、刘表“咸存威容、器观，知名当世。”而袁绍当时占据北方广大地区，势力最大，足以与曹操抗衡。但他外宽内忌，好谋无决，坐失良机，最后被曹操打败。如果袁绍善于把握时机，听取正确意见，“三国”的历史也许是另外的样子。

每个人都是这样，把握机遇还是坐失良机，会写出不同的人生历史。在人生的某个阶段，可能遇上特别有利的机遇，抓住这种机遇就可以改变自己的处境，开辟美好的前程；如果放弃有利的机遇，时过境迁以后再干，就要付出加倍的代价，甚至要遗憾终生。“夫冻者假衣于春，暍者反冬乎冷风。”（《庄子·则阳》）受冻的人春天才借衣服，中暑的人冬天才吹冷风，这都是时过境迁、无济于事的愚蠢行为。

《易经》上说：“君子藏器于身，待时而动。”（《系辞下》）器者品德，学识、才干，君子要准备好做事的本领。修养品德，增长才干，这是什么时候都可以做的、采取行动，则要分析形势，选择时机。时机不成熟，无法施展才干。前面谈到过的百里奚，是有本领的人，很想干一番事业。他撇下妻子，先后到过好几个国家，都没有遇上贤明的国君，可以使他发挥才干。到70多岁的时候，终于遇上秦穆公。秦穆公知道他有才干，用五张羊皮把他从楚国赎回来后，与语国事三日，大悦，“授之国政，号曰‘五羖大夫’”（见《史记·秦本纪》）

秦末汉初的叔孙通，可算是一个知道待时而动的聪明人。他原来是秦王朝的待诏博士，后来带 100 个门生投靠刘邦，刘邦不喜欢儒生，他专门推荐“斩将搴旗之士”。他的弟子很有怨言。他对弟子们说：“现在是打天下的时候，你们能参加战斗吗？你们耐心等着，我不会忘记你们。”刘邦即位以后，废除秦时仪法，结果“群臣饮酒争功，醉或妄呼，拔剑击柱”。刘邦很恼火。叔孙通看准这个机会，向刘邦建议说：“夫儒者难与进取，可与守成。臣愿征鲁诸生，与臣弟子共起朝仪。”于是他邀请鲁国的儒生和他们的弟子共百余人操演皇帝上朝的礼仪。后来正式按这套礼仪举行朝典，没有人再敢喧哗失礼。刘邦非常高兴，说：“吾乃今日为皇帝之贵也”，拜叔孙通为太常，赐金 500 斤。叔孙通又趁机对刘邦说：“我的弟子跟随我很久了，这次和我一起制订、操演上朝的礼仪，希望陛下能重用他们。”结果，他的弟子都得到了“郎”的职位。叔孙通把刘邦赏的 500 金也分给众弟子，弟子们皆大欢喜，说：“叔孙生诚圣人也，知当世之要务。”（见《史记·刘敬叔孙通列传》）

叔孙通的行为受到一些儒生的批评。他为人处世的确有逢迎讨好的庸俗作风。例如他为了讨好刘邦，脱下儒服，换上短装。但他能够识时务，待机而动，这一点对我们是有启发的。司马迁也称赞他“希世度务，制礼进退，与时变化，卒为汉家儒宗。”（同上）

掌握时机要和发挥主观能动性结合起来。有时会出现有利的时势、环境和条件，人们只要善于利用，就能取得成功。有时只能看到时势变化的趋势，但没有提供现成的有利条件和机会，这就要根据时势的变化趋势，创造成功的条件和机会，不能消极被动地应付时势，坐待时机。古人说：“贤人观时而不观于时，制兵而不制于兵。”这里讲的就是要观察时势，又不要受时势的限制，要利用兵器，又不要受兵器的制约，要把观察利用时势和发挥主观能动性结合起来。

战国时赵武灵王进行服装和军事改革，可算是善于分析时势、又注意发挥主观能动性的例子。当时赵国国势衰微，常受北方胡人骑兵部队的侵扰。赵国军民穿宽袍大褂，坐在马车上对阵，无法战胜快速机动的骑兵部队。赵武灵王分析形势之后，决定进行“胡服骑射”的改革，穿胡人的窄袖短衣，学习骑马射箭的技术。朝野上下一片反对声，认为胡服是“袭远方之服，变古之教，易古之道，逆人之心”，千万不可行。赵武灵王认为“法令制度各顺其宜，衣服器械各便其用”，“复古未可非，而循礼未足多也。”（《史记·赵世家》）于是颁布“胡服骑射”的命令，很快建立起了自己的骑兵部队。结果，赵国之势大振，五六年之内，不仅收复了失地，还开拓了大片疆土。

一方面要等待时机，另一方面又要自创良机。培根说：“贤者造出机会多于发现机会”，就是强调在掌握和利用时机中，人的主观能动性有重要作用。

事在人为

机遇只是成功的有利条件，能否成功，取决于人们的主观努力。如何努力？主要是选择行动的方向和目标，制定行动的计划和方法，以及根据情况变化采取应变的措施，等等。

选择行动的方向目标就是立志。立志要立大志，办有益于国家和人民的事情，把个人的行动目标和社会的需要结合起来。

《吕氏春秋》说：“尝试观于上志，三王之佐，其名无不荣者，其实无不安者，功大故也。俗主之佐，其欲名实也与三王，之佐同，其名无不辱者，其实无不危者，无功故也。皆患其身不贵于其国也，而不患其主之不贵于天下也，此所以欲荣而逾辱也，欲安而逾危也。”（《士客论第六·务大》）

《吕氏春秋》认为：个人的荣辱、安危和国家的荣辱安危息息相关。当人臣的应该首先为国家建功立业。国家富强了，个人也就会像夏商周三代开国君主的辅佐之臣那样，获得荣耀的名声和稳定的地位。如果不顾国家安危去追求个人的荣名和地位，结果反而会更加耻辱和危险。作者接着举了燕雀的例子：“燕爵（雀）争善处于一屋之下，母子相哺也，区区焉相乐也，自以为安矣。灶突决，上栋焚，燕爵颜色不变，是何也？不知祸之将及之也。”燕雀只知道追求自己的安乐，烟囱破裂，房栋燃烧，灾祸临头，仍然自以为安，可算是最愚蠢的了。人为万物之灵，当然不能像燕雀那样，应该懂得“天下大乱，无有安国；一国尽乱，无有安家，一家尽乱，无有安身”（同上）的道理。

《吕氏春秋》“务大”的思想对我们颇有启发。今天，每个人的安危祸福也是和国家的安危祸福息息相关的。国家富强了，我们才能在世界上扬眉吐气，国家富裕了，我们才能普遍地过上幸福的生活。每个人都要努力为国家建功立业，从国家民族的根本利益出发，选择人生的道路，确定行动的目标，做一番利国利民的大事业。

确定了行动目标和要干的事业，就要采取行动，争取成功。争取成功的第一步就是事先的周密筹划。“谋先事则昌，事先谋则亡。”（刘向《说苑·说丛》）先计划好了再开始行动，就能成功，事业就会兴旺发达；先干了以后再开始计划，就会招致失败。做任何事情都要先有准备，有计划，不能仓促上马，鲁莽从事。

计划要建立在对外客观情况的深入了解和科学分析之上。打仗要了解敌情、友情、我情，办企业要了解市场需要和同行的情况。在掌握客观情况的基础上才能制订出正确的行动方针和工作计划。

了解情况不仅要了解有利情况，还要了解不利情况。《孙子兵法》说：“智者之虑必杂于利害，杂于利而务可信也，杂于害而患可解也。”（《九变》）聪明的人考虑问题一定要顾及利和害两个方面。了解有利的条件，才能提高完成任务的信心；了解不利的因素，才能消除祸患，防患于未然。

如果办一件事缺乏信心，应该多想到有利的条件，以坚定信心，提高勇气。当信心已经建立、决定行动的时候，就要冷静地分析不利因素，准备应付可能发生的问题和风险。

制订计划有两个重要环节，就是“谋”与“断”。“谋”是对计划的准备、拟订和论证，“断”是对计划的审订和决策。多谋善断，是事业取得成功的关键。

在拟订、论证计划的时候，要注意多谋，听取各方面的意见。“智者千虑，必有一失；愚者千虑，必有一得。”（《史记·淮阴侯列传》）聪明人有失误的时候，愚笨的人也会有正确的意见。因此，不仅要谋于“智者”，也要听取“愚者”的意见。这样才能集思广益，对事物获得全面了解。古人说的愚老一般指没有文化的老百姓。这些人直接从事生产实践活动，在和他们的实践活动有关的领域中，他们比有文化的人更有真知灼见。只有理论知识、缺少实践知识的人，多听听他们的意见，可以克服自己的偏见和无知。“谋及下者无失策，举及众者无顿功。”（桓宽《盐铁论·刺议》）桓宽所说的意见是比较深刻的。

广泛听取意见虽然很重要，但众人的意见往往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最后仍然要由个别人或少数人作出决断。如果只有多谋，不能及时决断，就会贻误时机，耽误大事。诗云：“谋夫孔多，是用不集。”（《小雅》）出主意的人太多了，反而办不成事情。其实，问题不在于出主意的人多，而在于无人决断，以致众说纷坛，议而不决。

张居正说：“天下之事，虑之贵详，行之贵力，谋在于众，断之在独。”（《陈六事疏》）这是比较全面的看法，看到了虑和行、谋和断的区别与联系。考虑问题要慎密周详，行动要果断迅速；谋划要集思广益，决断权要集中在个别人或少数人手中。这样才能避免主观专断和议而不决的弊端。当年赵国实行“胡服骑射”改革的时候，赵武灵王面对群众反对的意见，犹豫不决。支持改革的大臣肥义对他说：“臣闻疑事无功，疑行无名”，“愚者暗成事，智者睹未形，则王何疑焉。”（《史记·赵世家》）于是，赵武灵王决定积极改革，同时做大臣的工作，最后使改革取得成功。如果没有赵武灵王的决断，这场改革就会化为泡影。

“举一纲众目张，弛一机万事隳。”（王通《中说·朗兴》）在谋断的时候，要抓住关键问题，至于细节方面问题可在执行计划的过程中逐步解决。情况是不断变化的，情况变了，计划也要因时而变化。能否善于因时而变，随机而变，是取得成功的另一个重要问题。

石涛《画语》说：“凡事有经必有权，有法必有化。”经和法是行事应该遵循的原则、法则，权和变是执行原则、法则的时候，要根据情况灵活变通和变化。这虽然是针对绘画说的，也适用于做其他工作。

《吕氏春秋》也说过为政治国要因时而变的道理：“敌治国无法则乱，守法而弗变则悖。悖乱不可以持国。世易时移，变法官矣。譬之若良医，病万变，药亦万变。”（《慎大览第三·察今》）治理国家要有法度，又不能死守法度，时代变了，法度也要变化。就像医生治病一样，病者万变，药方也应该万变。书中讲了三个故事说明这个道理：

第一个故事：楚国人想渡过灊水打宋国，先派人设置渡河的标记。灊水突然暴涨，楚国人不知道，仍按设置的标志在夜里渡河，结果淹死1000多人。如果水不涨，他们是按照标志顺利渡河的。现在水涨了，他们还是按原来设置的标志渡河，这是他们失败的原因。

第二个故事：有个渡江的楚国人，他的一把剑从船上掉到水里，立即在船边刻个记号，说：“我的剑是从这里掉下去的。”等船停下以后，他就从刻记号的地方下水找剑，不知道船已移动了，而掉下水的剑是不动的。这种“刻舟求剑”的行为的确愚蠢可笑。

第三个故事：一个人要把一个小孩扔到江里去，小孩吓得哭起来。旁边

的人问这个人为什么这样做？他说：小孩的父亲善于游泳。他不知道父亲善于游泳、小孩并不会游泳的道理，因此干出这种荒唐的事来。

上面这些故事告诉我们：做任何事情都要根据时势的变化，不断修改行动的计划 and 方案，否则就会干出像“楚人渡江”、“刻舟求剑”那样的蠢事。

在人生道路上，在执行计划的过程中，会遇到突发的事变和严重的困难。这是对一个人的素质的严重考验。有的人镇定从容，处变不惊，可以找到应对的妥善办法，从而克服困难，达到胜利的彼岸。有的人则惊慌失措，悲观失望，无所作为，结果只能是陷入困境而无法自拔。

东晋的谢安在淝水之战中处变不惊的故事可以给我们很多启发。晋太元八年（公元383年），前秦苻坚统兵80余万人，大举南下。强敌压境，东晋处于危急之中。谢安当时任宰相，一身系东晋之安危。他紧张地进行军事部署，令谢石指挥全军，谢玄任前锋，统领8万兵马抵抗秦军。谢安内心全神贯注，观察分析战局的变化，表面上则镇定自若，整天下棋和游山玩水。战斗开始后，晋将刘牢之袭击秦将于洛水，然后各路兵马水陆并进。至淝水，待秦军后移，过淝水决战。苻坚想等到晋军半渡时袭击，于是命令秦军稍退。这时朱序大呼：“秦军败矣！”秦兵惊恐大奔，无法阻止，以至风声鹤唳，草木皆兵，死者蔽野塞川。谢安收到秦兵大败的驿书时，正在和客人下棋，客人问驿书讲了什么，谢安平静他说了句：“小儿辈遂已破贼”，然后继续和客人下棋。他的内心却是无比激动的，下完棋急忙奔回内室，过门槛的时候，把木屐的齿都碰断了。

重臣将帅都应该有这种处变不惊的风度，这样才能稳定人心。淝水之战的胜利，东晋的内部团结和部署指挥得当自然是根本原因，倡谢安的镇定自若，对于安定人心，提高信心，也起了重要作用。苻坚的失败，则是由于开始骄傲轻敌，等到洛涧的战斗失败后，又惊慌失措，把八公山上的草木也当作晋军了。在数量上占绝对优势的秦国，就这样被自己的惊慌失措情绪打败了。

不仅重臣将帅是这样，我们一般的普通人也是这样。遇到意外事变和严重困难时，如果能保持镇定，总可以找出克服困难、摆脱困境的办法。如果惊慌失措，丧失信心，就会一筹莫展，自行崩溃。洪应明说：“无事，常如有事时提防，才可以弥意外之变；有事，常如无事时镇定，方可以消局中之危。”（《菜根谭》）没有重大事变时，要有提防的准备，这样才能防止意外事变的发生。意外事变发生以后，要像无事那样镇定，才能冷静地分析和处理问题，消除意外事变带来的危险。在人的一生中，很难避免意外情况、意外事变的发生，处变不惊是我们应有的修养和气度。

人们认识客观事物要有一个过程，失败是难免的。做一件事情，常常要先经过失败，然后才能成功。战场上没有常胜将军，在事业中也没有常胜将军，重要的是要从失败中总结经验教训。

《商君书·战法》篇说：“王者之兵，胜而不骄，败而不馁。”一个人要经得起胜利的考验，也要经得起失败的考验。胜利了骄傲自满，就会停顿落后，埋下失败的祸根。失败了悲观失望，灰心丧气，就会不愿再起，永无成功的可能。楚汉相争，项羽乌江自刎，演出了末路英雄的悲壮一幕。杜牧《题乌江亭》诗云：

胜败兵家事不期，包羞忍耻是男儿。

江东子弟多才俊，卷土重来未可知。

杜牧对项羽有同情，又有寓于惋惜之中的批评。如果项羽能忍受眼下失败的耻辱，返回江东，认真总结失败的教训，依靠江东子弟重振旗鼓，说不定会卷土重来，和刘邦再决雌雄了。

任何一个取得成功的人，都犯过错误，遭受过失败。聪明的人不是没有错误、没有失败的人，而是不会或很少犯同样错误的人。错误是正确的先导，失败孕育着成功，成功的秘诀就在于对目标坚韧不拔，失败了也不灰心。

爱迪生说：“失败也是我需要的，他和成功一样有价值。只有在我知道一切做不好的方法以后，我才知道做好一件工作的方法是什么。”

肖伯纳说：“在我年轻时，我们做的事，十中有九都是失败的，为了不甘失败，我便十倍努力于工作。”

不甘失败，努力从错误的方法中找到正确的方法，这是对待失败的正确态度。

还有一种失败，不是因为主观原因产生的，而是客观条件的限制，意外情况的发生，或者敌我力量对比过于悬殊。例如：革命的先行者，科学研究的开拓者，刑场上的烈士，和自然灾害搏斗而牺牲的英雄，等等。他们失败了，牺牲了，但他们是崇高目的和光荣事业牺牲的，他们的失败、牺牲有价值，有意义，虽死犹生，虽败犹荣。正如《吕氏春秋》所说的：“夫大义不成，既有成己。”（《士容论第六·务大》）他们失败的教训为后人提供成功的经验，他们英勇无畏的精神鼓舞后人继续战斗，直到成功。他们的生命也就和他们开拓的事业同在，万古常青。

知足不辱

在如何对待物质享受和名誉地位的问题上，老子提出知足知止的原则。五千言的《老子》中是这样写的：

“故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可以长久。”（第四十四章）

“祸莫大于不知足，咎莫大于欲得。故知足之足，常足矣。”（第四十六章）

“知足者富，强行者有志。不失其所者久，死而不亡者寿。”（第三十二章）

何以知足才不会受到耻辱，知止才不会有危险？在老子看来，大底上有下面几点理由：

逞强好争，不但得不到什么，反而会召来祸害。“强梁者不得其死”（第四十二章），“自见者不明，自是者不彰。自伐者无功，自矜者不长。”（第二十四章）社会上为什么会有斗争的灾祸，是由于人心贪不知足；如果都能知足知止，相互忍让不争，一切纷斗冲突都可以避免了。

人生幸福在于内心的宁静自守，摆脱物欲的束缚而恬淡自安，怡然自得。然而，“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聋；五味令人口爽，驰骋畋猎令人心发狂；难通之货，令人行妨。”（第十二章）可见人生的幸福不在于声色之娱，而在于知足知止，摒弃物欲的诱惑而保持安定的生活。

从变化、超越的观点看问题，人生的祸福、得失等等，都是暂时的，相对的，可以互相转化的。永不知足地去追求这种变化无常的东西，最终是争而不得，反受其祸了。

老子的这种思想深刻精辟，饱含人生的经验和智慧。千百年来，不仅被文人学者品味研讨，还通过格言、谚语等形式传播到普通老百姓中间去。《增广贤文》中就有“知足常足，终身不辱；知止常止，终身不耻”之类的话。

“知足常乐，能忍自安”，现在还是人们熟知的人生格言，这种思想的社会影响有积极的和消极的两个方面。积极方面的影响是使人们在困乏的物质生活条件下能够恬淡自守，在恶劣的人生境遇中能够豁达超脱。消极方面的影响是安于现状，不思进取，圆滑世故，与世无争。

知足知止的思想是传统农耕社会的产物。生活在这种社会中的人们，固守一片土地，耕种有时，追求安宁稳定、安土乐天的生活情趣，知足知止的思想和这种生活情趣是相吻合的。今天，传统的农业社会正在向现代社会转化，知足知止的思想必然和现实生活发生矛盾。

现代社会是开放的、充满竞争的社会，是不断变革、飞速发展的社会，要求人们具有竞争、创新等新的思想观念。知足知止的思想使人故步自封，怠情苟安，和社会的发展要求不相适应。从这个角度看，知足知止的思想应该抛弃。我们对工作、对事业，以及个人的品德学识修养，应该不断追求，不断进取，永远也不应该知足知止。

不过，如果我们换一个角度看问题，那么，知足知止仍然是有益的人生教训。例如，我们对物质欲望，对个人私利的追求，都应该适度，应该知足知止；不能贪得无厌，永无止境。换句话说，对工作、学习、事业不能知足知上，而对物欲私利则应该知足知止。

儒家倡导积极人世的精神，同时也主张控制物欲，赞美安贫乐道的“孔颜乐趣”。道家主张知足知止，无为无争，但不完全否定物欲，摒弃物欲。

两者的人生态度、价值取向不同，但都重视精神价值。不过儒家追求的是人的精神的完善与升腾，达到至大至刚、与天地并立的境界；道家追求的是人的精神的解脱与超越，摆脱物欲的羁绊和人世的纷争，达到自由逍遥的境界。儒家为了理想道义反对贪求物欲私利，今天仍有积极意义。道家为了精神的解脱而反对贪求物欲私利，也不失为一种智慧实用的处世原则。

老子说：“祸莫大于不知足”，就是饱含生活智慧的见解。不知足就是贪婪，而对物欲钱财、名誉地位的贪婪心，常常使人利令智昏，做出愚蠢可笑、害人害己的事来，的确祸害无穷。《列子》中有齐人攫金者的故事：“昔齐人有欲金者，清旦衣冠而之市，适鬻金之所，因攫其金而去。吏捕得之。问曰：‘人皆在焉，子攫人之金何？’对曰‘取金之时，不见人，徒见金！’”为什么在众人存在的时候，他就敢伸手抢金子？因为他抢金子的时候，没有看到人，只看到金子。这就是利令智昏，贪欲蒙蔽了他的眼睛。可见贪欲会扰乱人的心智，使平时能察秋毫之末者不见泰山之形，能听五音之和者，不闻雷霆之声。在日常生活中，也可以看到一些人争名夺利，旁若无人，这和齐人攫金并无不同。

贪物欲私利的人，往往贪小失大，甚至亡国灭身。北齐刘昼所著《刘子》中有一则贪小失大的故事：“昔蜀侯性贪，秦惠王闻而欲伐之。山涧峻险，兵路不通，乃琢石为牛，多与金帛置牛后，号牛粪之金，以遗蜀侯。蜀侯贪之，乃堑山填谷，使五丁力士以迎石牛。秦人帅师随后而至。灭国亡身为天下所笑，以贪小利失其大利也。”

蜀侯因贪金而开路迎接敌人，结果丧失领地，丢掉性命，可算是贪小失大的典型事例。在现实生活中，也常有贪小失大的事情发生。有人上街购物，因为贪小便宜被不法商人利用，买了伪劣产品，有人在业务活动中因为贪图钱财，收受贿赂，结果坑害了国家和集体的利益，也玷辱了自己名声，断送了自己的前程。还有人在金钱的诱惑下，被敌特间谍机关收买利用，出卖国家机密，危害国家的安全和利益，走上叛国犯罪的道路。

对物欲的追求不加约束，贪欲就会越来越大。“分金恨不得玉，封侯怨不授公”（《菜根谭》）；“山高不算高，人心比天高”（《增广贤文》）。贪欲恶性发展以后，又进一步使人丧失理智和自我控制能力，“逐兽而不见泰山在前，弹雀而不知深井在后。”（《菜根谭》）明明前面是泥潭陷阱，也会继续朝前走下去。有些人走上经济犯罪的道路，多从贪小利开始，因为不能及时悔改，胆子越来越大，最后成为大贪污犯、大231盗窃犯。此所谓“一念之不制，而流祸于滔天。”（《二程遗书》）

幸福的人生自然要有物质生活条件作为基础和保障。当人们忍受饥饿和寒冷的时候，不能说他们是幸福的。追求物质利益是人们正常的、合理的要求。从世界大多数人来说，争取生存权、发展权、争取免于饥饿，免于匮乏的自由，是一项神圣的权利和正义的行动。“知足知止”，不能理解为否定物质利益的要求，安于饥饿贫穷的状态，而是对物质利益不能贪得无厌，以致成为财富和金钱的奴隶。

具体来说，实行知足知止的原则，就是对物欲私利的要求应该适度。只取自己应该得到的利益和享受，不向社会提出额外的、非分的要求。通过诚实劳动取得利益和享受，不以非法手段谋取利益和享受。在追求自己的利益和享受的时候，同时尊重社会的公共利益和他人的利益。上面这些要求，是一个文明、健康的社会应有的社会公德，是每一个社会成员应该遵守的行为

规范。

从人生意义、人生价值的角度考虑问题，实行知足知止的原则，就是要求人们不单纯以物欲私利为人生的价值取向，而要超越物欲私利，追求人的精神道德价值。孟子说：“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几希。”（《孟子·离娄下》），
“饱食暖衣，逸居而无教，则近于禽兽。”（《孟子·滕文公上》）人和一般动物的差别，就在于除饮食男女等生理感官方面的需求以外，还有精神道德方面的需求。例如：人要有社会、道德理想，没有这种理想，就会精神空虚，产生失落感；人要有人格理想和人格尊严，丧失人格独立和人格尊严，就会感到精神压抑，产生屈辱感；人需要得到自由全面的发展，并在创造性的实践活动中取得成就，如果人性被物欲扭曲，只有物质享受，没有创造，也会感到空虚失落，不会感到幸福；人需要有亲情友谊，在紧张、冷漠的人际关系中，就会感到孤独，也不会感到幸福；此外，人需要文化娱乐，需要审美的愉悦等等，也属于人的精神生活需要。可见，人生幸福不完全系于物质生活条件，还需要有种种精神方面的条件。一个健全的社会，需要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同步协调发展，才能全面地满足人的需要和实现人的价值。

现在西方一些发达国家，人们一方面享受物质文明高度发展所带来的成果，另一方面也出现了拜金主义、利己主义、道德冷漠、信念危机等现代西方文明的流行病，给整个社会带来混乱，使人们精神失落，对社会人生产生绝望的情绪。可见，精神需要不能用物欲代替，也不能用金钱去满足；相反，贪图物欲的享受，还会损害人的思想道德和精神生活，物欲太多，会使人放弃理想，放弃事业，放弃人格，放弃道德情操方面一切高尚美好的东西。

懂得人生真谛的先哲们，以恬淡的态度对待物质享受和功名地位，而去追求理想、道德和事业。他们的物质生活是俭朴清贫的，他们的精神却是高尚充实的。他们可以免除贪欲带来的种种烦恼，而获得心灵的平静和怡然自得。他们可以把有限的人生用于有益社会的创造性劳动之中，并时时享受到创造的乐趣。他们的人生价值也体现在他们创造的业绩中而获得不朽的意义。这正是知足知止的处世原则在现代社会中的意义和价值。

居安思危

居安思危是古老的人生教训，至今仍有警世戒人的现实意义。

“《书》曰：‘居安思危。’思则有备，有备无患。”（《左传·襄公十一年》）人们处于安全的情况时，要想到可能发生的危险，事先做好应付危险的准备，这样就可以避免祸患。

《周易》上说：“君子安而不忘危，存而不忘亡，治不忘乱”。（《系辞》下）安全的时候要想到可能发生危难的事情，生存的时候要想到灭亡的教训，太平的时候要想到动乱的危险。

大至国家民族，小至个人家庭，在安乐顺利的时候，要有应付危难灾祸的思想准备，预先采取应付的措施。这样才可以处变不惊，化险为夷。

为什么要居安思危？因为世享沧桑，一切事物都处于不断变化之中。互相对立的两极，如安与危，存与亡，治与乱，祸与福，得与失，富贵与贫贱，成功与失败，如此等等，都互相对立，又互相转化。

老子有一句名言：“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老子》第五十八章）福倚傍在祸里面，祸潜伏在福之中，祸福相倚相成，在一定条件下，可以互相转化。老子以超人的智慧审视社会和人生，看到了一切对立的事物可以互相转化：教导人们虚静自守，以便化难为易，化危为安。

《淮南子·人间世》有一则“塞翁失马”的故事，用寓言的形式阐明了祸福相倚相成的哲理，故事全文如下：

“近塞上之人，有善术者，马无故亡而入胡，人皆吊之。其父曰：‘此何遽不能为福乎？’居数月，其马将胡骏马而归，人皆贺之。其父曰：‘此何遽不能为祸乎？’家富良马，其子好骑，堕而折其髀；人皆吊之。其父曰：‘此何遽不能为福乎？’居一年，胡人大入塞，丁壮者控弦而战，近塞之人，死者十九。此独以跛之故，父子相保。”

故事中住在边塞上的塞翁是一位智者。他对事情的看法常常和一般人不同。丢失一匹马，别人认为是坏事，他认为可能成好事。几个月后，丢失的马带回一匹胡地的骏马，别人认为是好事，他认为可能成坏事。有了好马，儿子骑马游玩，不幸失马跌落，摔断了胯骨，别人认为是坏事，他认为可能是好事。一年后，胡人大举进攻，青壮年参加战争，十之八九战死，唯独塞翁的儿子脚跛了，不能参加战斗，父子得以保全性命。故事的作者最后说：“故福之为祸，祸之为福，化不可极，深不可测也。”

这则富于戏剧性的寓言故事并不是作者凭空虚构出来的，而是真实地反映了事物发展的辩证规律。在现实生活中，我们到处可以看到好事变坏事、坏事变好事的例子。事业成功了，生活安定安全，这是好事。但因事业成功，生活安定安全，可能松懈麻痹，看不到存在的问题和潜在的危机。这样，成功就会转化为失败，安定安全的虫舌就会变为动乱的危险的处境。反之亦然。失败后如果认真总结教训，失败就可以转化为成功。事物的转化是有条件的，和人们的思想态度、主观努力有很大的关系。居安思危的古训，就是要我们认识事物发展的辩证法，看到事物的两面性和变化的可能性，争取事物向好的方面转化，防止事物向坏的方面转化。司马迁称赞管仲说：“其为政也，善因祸而为福，转败而为功。”（《史记·管晏列传》）管仲是善于做转化工作的人，故能帮助齐桓公成就霸业。

为什么要居安思危，还有另一方面的原因：事物的发展有必然性，也有

偶然性，有一些突发的偶然事件是人们始料不及的。“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说的就是这种情况。这种意外的突发事件，往往会使人陷入困境，甚至会改变人的命运。因此，在平时要有应付突发事变的准备，以免事变发生之后手足无措，陷于被动。在和平时期要想到战争。从国家来说，要加强国防建设，提高部队的战斗力。从个人来说，要树立战备观念、国防观念，作好保卫祖国的思想准备。和平时期并非一切太平，还有敌特的破坏活动，不可放松麻痹，被敌人利用。

在风调雨顺的年景要想到自然灾害。旱涝风雹等自然

灾害不一定每年都有，但每年都要有抗御自然灾害的思想准备和物质准备。这样才能人定胜天，减少灾害造成的损失。

在个人生活中，突发的意外事变也会经常发生。因此，居安思危是人生的格言。每一个人的生活不可能永远一帆风顺，坦途与荆棘，顺境与逆境，常常交替出现。在事业成功的时候，要想到失败和挫折；在生活富裕的时候，要想到贫穷和困苦；在身体健康的时候，要想到疾病和伤亡；在青春年少、风华正茂的时候，要想到老年的衰朽和辛酸。想到这些，不一定能避免问题发生，却可以减少问题带来的痛苦和损失，或者因有思想准备而能从容应付，泰然处之。

居安思危和骄傲自满、松懈麻痹是相对立的。因成功而骄傲自满，不图进取，就会落后和失败。因富贵而骄傲自满，目空一切，盛气凌人，就会招致别人的怨恨和反对。“满招损，谦受益。”（《尚书·大禹谟》）“富贵而骄，自遗其咎。”（《老子》第九章）“君子泰而不骄，小人骄而不泰。”（《论语·子路》）都是讲骄傲的危险。有了松懈麻痹的思想，就会看不到潜伏的问题和危险，落入陷阱，坠入深渊。“苦时之坎易逃，而乐处之阱难脱。”人们在高山危桥，战战兢兢，一般不会出问题，到了平坦的道路上，思想松懈了，反而会被土坎、蚁蛭绊倒。这就是安而忘危的结果。

居安思危，就是我们常说的忧患意识。忧患意识对国家民族和个人都是至关重要的。孟子说：“入则无法家拂士，出则无国外患者，国恒亡。然后知生于忧患而死于安乐也。”（《孟子·告子下》）孟子认为：一个国家内部没有了解、执掌法制的大臣和辅粥的贤士，外部没有敌国和外来的侵犯，往往是要灭亡的，并由此揭示出“生于忧患，死于安乐”的普遍规律。

欧阳修曾作《五代史伶官传序》，总结后唐庄宗李存勖兴亡的历史教训。李存勖继承其父李克用为晋王后，谨慎恭谨，执行其父遗命，纵横疆场，诛燕灭梁，建立起后唐王朝，可谓功勋赫赫。但在“仇敌已灭、天下已定”，李存勖做了天子之后，“常与俳优杂戏于廷，伶人由此用事。”结果，不过三年，李存勖就死于自己宠幸的伶官之手，后唐成了短命的王朝。欧阳修总结这段历史教训，提出“忧劳可以兴国，逸豫可以亡身”的深刻教训。这和孟子说的“生于忧患，死于安乐”是完全一致的。

在当今世界，每个国家都处在激烈竞争的环境中。我们的国家经过长期的斗争，得到了独立和发展，特别是改革开放以后，经济快速、持久地发展，引起全世界的重视，这自然是值得高兴的事。不过，我们要有清醒的认识，看到我们在经济、科技发展水平上，同西方发达国家相比，还有很大差距。国际间的竞争是综合国力的竞争。不努力提高综合国力，我们在竞争中就处于不利地位，就有落后挨打的危险。

因此，我们要增强国家民族生存发展的忧患意识，抓住机遇，迎接挑战，

加速经济建设，加速社会主义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使我们的民族以富强、文明的新面貌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忧患意识也是一种振兴民族的历史责任感、使命感，一种自强不息、艰苦奋斗的精神，一种以振兴中华为己任，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崇高思想境界。

从个人来说，增强忧患意识和危机感也是非常重要的。历史老人常常戏弄英雄，颠倒豪杰，捉弄人的命运。唯有对坎坷命运有思想准备的人，才能忍辱负重，奋勇抗争，最终战胜恶运，永远立于不败之地。在任何时候，都不能安于已有的成就，沉浸在已得的安乐幸福之中；而要放眼未来，想到未来的生活道路，未来要做的事业。《战国策》中有一篇《冯谖客孟尝君》，说明人们需有居安思危的忧患意识。孟尝君是战国时的四公子之一，齐湣王时为相。冯谖是孟尝君的门客。他为孟尝君办了三件事，即焚烧债券以“市义”，谋复相位和请立宗庙。三件事办完后，他对孟尝君说：“三窟已就，君姑高枕为乐矣。”出身贫贱、寄食豪门的冯谖，确有过人的见识，他看到孟尝君只求财富、不知爱民的危险性，所以去薛地收债时，假借孟尝君的命令，把债券都烧掉，取得老百姓的拥护。他又利用统治集团内部的矛盾和宗法关系，为孟尝君谋长治久安之策。“孟尝君为相数十年，无纤介之祸”，是听从冯谖之计，居安思危，营“狡兔三窟”的结果。

居安思危并不是神经过敏，庸人自扰，杞人忧天，也不是消极悲观，逆来顺受，无所作为。其中蕴涵着关注未来，防微杜渐的远见卓识和积极主动的处世态度。社会的治乱存亡，人生的吉凶祸福，都有先兆可寻。如果能见微知著，把问题解决在萌芽状态，就可以避免酿成大的灾祸。

老子说：“其安易持，其未兆易谋；其脆易判，其微易散。为之于未有，治之于未乱。”（《老子》第六十四章）事物稳定时容易维持，事物无变化先兆时容易图谋，事物脆弱时容易分解；事物微小时容易消散。因此要防微杜渐，问题未发生时就处理，天下未乱时就治理。我们可以从老子文约义丰的哲理诗式的话中，获得防患于未然的人生启示。

《吕氏春秋》中有两篇讲防微杜渐的道理。一篇是《先识览·察微》讲“故治乱存亡，其始若秋毫。察其秋毫，则大事不过矣。”文章通过正反两方面事例，说明要注意探求治乱存亡的征兆。能够明察如秋毫之末的先兆，处理大事就不会有过失了，如果小处不察，不注意考察事物变化的端倪，就会酿成大祸。

另一篇是《似顺论第五·慎小》讲慎于小事、防微杜渐的重要性，文中说：

“巨防容蝼，而漂邑杀人，灾泄一燹，而焚宫烧积。将失一令，而军破身亡。主过一言，而国残名辱，为后世笑。”

大堤中藏着小小的蝼蚁，就会使大堤崩溃，引起淹没城市、淹死民众的水灾。烟囱里冒出一点火星，就会引起焚毁宫室、烧毁财物的火灾。将领下错一道命令，君主说错一句话，也会召来军破身亡、国残名辱的大祸。《吕氏春秋》是着眼于治国的政治问题立论的，对我们为人处世，也有警醒的作用。上面引的“巨防容蝼，漂邑杀人。灾泄一燹，焚宫烧积”，可以作为人生格言。如果我们居安思危，防微杜渐，将灾祸消灭在萌芽状态，就可以避免遭受大的挫折，获得持久稳定的人生幸福。

以柔克刚

以柔克刚，源于老子贵柔守雌的思想。老子把先天地而生的“道”作为万物的本源。“道”的特征便是贵柔主静，自然无为。它收敛光辉，不露锋芒，明显而似暗弱，前进反若后退。正是这样的“道”创造万物，蓄养万物。宇宙万物和社会人生也应体道而行，柔弱处下，虚静不争。

依老子看来，世界上一切对立的事物都互相依存，互相转化。从发展变化的趋势看，坚强的东西要走向死亡，柔弱的东西才有前途和生命力。老子从自然、社会、人生的广阔领域，反复论证柔弱战胜刚强的道理。

“人之生也柔弱，其死也坚强。草木之生也柔脆，其死也枯槁。”（《老子》第七十六章）

老子举的事例是人人都能看到的。一个充满生命力的人，身体是柔软而富有弹性的；当生命结束以后，身体就僵硬了。生长着的草木，枝叶柔脆，随风披离，当它们死了以后，也就校干叶枯了。老子从中得出结论：“坚强者，死之徒；柔弱者，生之徒”；“坚强处下，柔弱处上”（同上）。

老子反复以水为例，论证柔弱能胜刚强的道理：

“上善若水，水善利万物而不争，处众人之所恶，故几于遭。”（《老子》第八章）老子称赞水上善的美德，处在众人所厌恶的下位，善于滋养万物而不与之相争，因此水最接近于遭了。

“天下莫弱于水，而攻坚克强者莫之能先，以其无以易之也。故柔之胜刚，弱之胜强，天下莫不知，莫能行。”（《老子》第七十八章）的确，天下最柔弱的东西莫过于水了，但水又是最有力量的，能攻坚克强的东西也不能战胜它。老子感叹天下人都知道柔胜刚、弱胜强的道理，但虽然知道却不能实行。

“江海所以为百谷王者，以其善下之，敌能为百谷王。”（《老子》第六十六章）江海所以能成为百川交汇的地方，也是因为它善处低下之处的缘故。

老子多方论证，作出柔胜刚、弱胜强的结论，教导人们要贵柔守雌，甘居下位，不矜不争，不为天下先。这种思想的消极面是很明显的。柔弱处下，使人在矛盾面前消极退缩，懈怠苟安，失去积极进取的精神。不矜不争，不为天下先，导致人的生命力与创造力的萎缩。虚静自守，又容易流于自私自利，阴柔圆滑，不明是非，不恃正义。不过我们不仅要看到老子这一思想的消极面，还要看到它超越其消极面的理论价值和实用价值。

在先秦诸子中，老子所创的道家学说，从本体论的角度研究宇宙万物的本源和发展规律，提出了朴素的辩证法思想。他以发展的观点看到一切互相对立的事物相互转化。“曲则全，枉则直；洼则盈，敝则新；少则得，多则惑。”（《老子》第二十二章）委曲才能保全，弯曲才能矫直；低洼才能盈满，敝旧才能生新；少获可以多得，贪多反而困惑。老子所揭示的事物向相反方面转化的规律，在先秦诸子学说中独树一帜。

老子贵柔的思想就是以事物发展转化的规律为依据的。“反者，道之动；弱者，道之用。”（《老子》第四十章）事物向相反方面转化，是“道”运动的结果，保持柔弱的状态，是“道”的作用。

用发展变化的观点观察社会和人生，老子发现荣辱、祸福变化无常，物

极必反，盛极而衰，是普遍规律。一种事物发展到顶点，就会走向衰败和死亡。人们处于柔弱的下位，反而可以避免盛极而衰带来的痛苦。老子还发现争没有好处。争强好胜，常常争不到什么，自讨苦吃；如果不争，反而可以身受其益，能得到内心的平静和别人的敬重与拥护。此即“后其身而身先，外其身而身存”（《老子》第七章），“以其不争，故天下莫能与之争。”（《老子》第六十六章）老子依据人生真实复杂的情况所提出的处世原则，是饱经沧桑之后的经验之谈，具有实用价值。

首先，老子以发展的观点看人生，是非常深刻和有价值的。他告诉我们，不要拘泥于眼前的现实，而要放眼未来。柔弱的东西，从眼前看没有力量，从长远看却是最有力量的，因为它有远大的前途。强大的东西，从眼前看最有力量，从长远看却是最无力量的，因为它要盛极而衰，走向死亡。明白这个道理，对我们立身处世很有好处。当我们处在弱小地位的时候，放眼未来，可以提高信心和勇气。当我们处在强大地位的时候，看到由强变弱的危险，可以克服松懈麻痹思想，争取向更强的方面转化。这种观点还告诉我们：在任何时候都不要轻视新生力量，更不能压制新生力量。新生力量代表未来，努力为新生力量的成长开辟道路，社会才能前进。

柔弱与刚强互相转化是有条件的。弱者要有积极进取精神，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争取利用有利的条件，不断壮大自己，才能最终战胜强者，取代强者。老子没有看到强弱转化的条件，没有看到强弱转化过程中人的主观能动性的巨大作用，只是消极地强调柔弱处下，虚静不争。因此，他不能像儒家那样，提出一个社会人生的理想目标，只能退回到“小国寡民”的远古社会中去。这是老子思想的局限性。我们应该剔除老子思想中的消极面，使其中的朴素辩证法思想大放光彩。

其次，老子的贵柔思想对我们处理社会和人生问题，具有策略、技巧方面的意义。儒家提出了“修、齐、治、平”的人生目标，但对如何实现这种目标的策略技巧问题则很少探究，老子的思想正好填补了这个空白。几千年来，从重臣名将到普通老百姓，都从老子思想中汲取营养，提炼出以退为进、以柔克刚、大智若愚等等处世的策略，而且往往能收到奇妙的效果。

以退为进，以柔克刚，是二种重要的处世策略，大至国家的政治军事，小至个人的生活和工作，都可以灵活运用，一个人不论信奉儒家道家佛家，或者纯粹是现代新派人物，都在自觉不自觉地运用这种处世策略。

事物发展有一个过程，实现目标需要具备必须的条件。当目标已定，是进还是退，就要看条件。在条件不具备的时候，后退是必要的；而且只有后退，才能前进。运动员为了跳得更远，先要后退一段距离，通过助跑获得前进的动力。经济发展过快，引起原材料供应短缺，需要后退一步，把速度降下来，才能继续前进。

以退为进，在军事活动中表现得最明显了。一个战役过程就是由战略进攻、战略退却交替组成的。一个将军只知进攻，不知退却，就不可能打胜仗。毛泽东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中就设专章研究战略退却问题。他说：“战略退却，是劣势军队处于优势军队进攻面前，因为顾到不能迅速地去击败其进攻，为了保存军力，待机歼敌，而采取的一个有计划战略步骤。”“战略退却的目的是为了保存实力，准备反攻。”为了反攻而有计划地退却，这种退却不同于逃跑而具有积极的意义。

退却还有策略上的意义。为了迷惑敌人，造成敌人判断上的错误，然后

乘敌之隙予以打击，此即“示形于东而击于西”的策略。毛泽东用拳师的例子说明先退后进才能取胜的道理。他说：“谁人不知，两个拳师放对，聪明的拳师往往退让一步，而蠢人则其势汹汹，劈头就使出全副本领，结果往往被退让者打倒。”

不仅拳师的对抗性斗争如此，其他领域的争斗也是如此。要战胜对方，不能一味剑拔弩张，其势汹汹，要后退一步，寻找机会，后发制人。从这里又引出另外一种策略，即以柔克刚的策略。要战胜对手，不能只用强硬的办法（如攻击的办法，压迫的办法），还要用柔软的办法（如感化的办法，分化瓦解的办法），软硬两手交替使用，才能达到取胜的目的。在政治军事活动中，软硬两手常常是交替使用的。大棒加胡萝卜，威协加利诱，高压之后继之以怀柔，这是外国人也知道的斗争策略。

软办法和硬办法交替使用，也常见于处理各种人际关系和内部矛盾，不过是目的和性质不同罢了。例如：上级对待下级要恩威并用。“威”是严格管理，严格要求，是硬办法；“恩”是关怀体贴，以情感化，是软办法。在业务谈判活动中，既要坚持原则，又要善于退让妥协，才能实现既定的目标和要求。父母教育子女，教师教育学生，要宽严结合。既要严格要求和约束，不能放纵姑息，又要爱护宽容，晓之以理，动之以情。如果只严不宽，一味高压，就会产生对立情绪，激化矛盾。处理其他人民内部矛盾也是这样，许多用硬办法解决不了的问题，用软办法反而容易解决。

上面是从处世的策略、技巧方面谈贵柔思想对我们的启示，下面再从人格修养方面谈贵柔思想的价值和现实意义。前面谈到贵柔思想在中国人性格方面造成的消极影响，但这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我们还要看积极的一面，即在这种思想的影响下，形成了中国人通权达变、成熟老练、谦虚随和、豁达超俗的性格。

老子教导人们知晓强弱、兴衰、生死、祸福互相转化，乃是自然万物的法则。根据这一法则，人要着眼于事物未来变化的结局，善于积蓄力量，保护自己生存的信心和活力，故能以豁达的胸怀和老练深沉的眼光看待社会和人生。

老子教导人们柔弱处下，宽容不争，造成中国人谦虚随和的美德。如果不是模糊是非界限，不是放弃原则，宽容谦虚的美德还是应该发扬的。发扬这种美德，有利于人们客观冷静地对待事物，有利于自己不断进步，也有利于协调人际关系，避免无谓的纷争。

老子教导人们不矜不争，造成中国人知足知止、恬淡自安的性格。我们在前面已经谈过这种性格的消极面与积极面，这里毋需再加赘述。但有一点还需要再强调一下，即老子超越物质生活领域而进入到精神领域来探究人生的价值和意义，发现人生的幸福并不全在于物质生活欲望的满足，还需要有精神生活的充实与宁静自得。现代西方社会物质生活与精神生活失衡，整个社会被吸毒、犯罪和家庭解体所困扰，造成社会的畸形发展和人的精神世界的空虚与失落。这说明老子说的恬淡自守、不矜不争的处世原则，用于对待个人的物质生活要求，还是具有一定的合理性和现实意义的。不否定排斥物质生活的需要，同时又能超越物欲而追求心灵的宁静与精神世界的高尚充实，这正是智者的处世态度。

大智若愚

苏轼说：“大勇若怯，大智如愚。”（《贺欧阳少师致仕启》）苏轼的话可以在老子的书中找到来源。（《老子》第四十五章）有这样的话：“大直若屈，大辩若纳，大巧若拙。”

大智如愚和大巧若拙的含义相同，都是说智慧才能极高的人，表面上看来，反而像是愚蠢笨拙的。其差别不过是一偏重才智、一偏重技巧而已。于是中国人的处世哲学和人格修养中，便有了“大智若愚”的原则和要求。它深刻地影响到中国人的性格、生存艺术以至中国的文化艺术。这一份古老的思想遗产值得我们重视和研究。

大智若愚是才智技艺达到精湛圆熟的最高境界。

才智极高的人，学习越深入，见闻越广博，越感到学海

无涯而个人知识有限，因而更加谦虚谨慎，处处收敛锋芒，

从不炫耀和显示自己。不像有些才智浅薄的人，不知山外有山，天外有天，一知半解之后，便自吹自擂，目中无人。这就是俗话说的“满罐不晃荡，半罐起波浪。”

真正大智大巧的人往往深藏不露，这是对大智若愚的一种理解。此外，还可以有另外一种理解，即大智大巧者的智慧技巧，经过长期的修养磨练之后，达到朴实、自然、平易的化境，能够以简驭繁，寓巧于拙。

从技巧来说，庖丁解牛可以说明这种境界。庖丁为文惠君解牛，手之所触，肩之所倚，足之所履，膝之所踣，莫不中音，以神遇而不以目视，官知止而神欲行，刀在牛的筋骨空隙间活动而能游刃有余。（见《庄子·养生主》）这种臻于自然平易的化境，是在实践中长期艰苦磨练的结果。

艺术上的化境则是绚烂达于极致后复归于平淡自然。陶渊明的诗可以代表这种艺术境界。陶诗自然平淡却真淳感人，因为在自然平淡的诗句中反映了五光十色的现实生活和深沉曲折的人生感悟。苏轼说陶诗“质而实绮，癯而实腴”。元好问称赞陶诗“一话天然万古新，豪华落尽见真淳。”陶渊明不为五斗米折腰，受到世人的称赞。他平淡自然的诗歌也为历代读者传诵。他的平淡自然的诗歌反映的是一种崇高的人品与诗品。

艺术是需要技巧的、而最高的技巧是不留斧凿痕迹、看不到技巧的技巧，如“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原始的、初生的艺术，一般是急管繁弦，色彩华丽，热情奔放。成熟的艺术则归真返朴，趋于简约、平淡、含蓄，呈现出深邃空灵的意境，可以供人们自由驰骋想像的翅膀。元人的画常以一树一石反映千山万壑，可谓简淡至极了，然而简洁的画面却包含了无穷的世界。

如果从这样的角度看问题，大智若愚是个人修养的一种深沉、含蓄、圆熟的境界，愚中包含着大智慧，拙中包含着大技巧，同浅薄外露的众生相形成鲜明的对照。

大智若愚也是一种寓刚于柔、刚柔相济的理想性格，人的秉性有的刚烈，有的柔顺。刚与柔本身难分优劣，而且有互补作用，如果各走极端，就会成为弱点。古人说：“柔之戒也以弱，刚之戒也以躁。”（《郭嵩焘日记》卷一）性情柔顺的人要防止软弱，无主见，无原则，缺乏进取精神和斗争精神。性情刚烈的人要防止暴躁冲动，缺乏耐性和灵活性，缺乏圆融变通的处世方法。人的理想性格应该是刚柔结合，刚中有柔，柔中有刚。

中国人不但追求刚柔相济的性格，也追求刚柔相济的艺术。唐司空图《诗

品》中的雄浑（具备万物，横绝太空。荒荒油云，寥寥长风）、豪放（天风浪浪，海山苍苍。真力弥满，万象在旁）等属于阳刚之美；纤秣（碧桃满树，风日水滨。柳阴路曲，流莺比邻）、绮丽（雾除水畔，红杏在村。月明华屋，画桥碧阴）等属于阴柔之美。一些艺术大师的作品，往往是刚柔相济、豪放而不粗疏、绮丽而不纤弱的。

人们年轻时性格刚烈暴躁的居多，随着生活的磨练，刚烈的性格逐渐增加柔顺的因素，变得深沉老练起来。晋末刘琨，北伐石勒失败、被盟友段匹鹤禁，自知必死，于是写了《重赠卢谡》。其结句说：“何意百炼钢，化为绕指柔。”原诗表达的是刘琨英雄失路、壮志难酬的满腔悲愤，我们在这里用来说明性格磨练变化的过程和境界。钢经过千锤百炼，能变为可以绕指的柔物。一个人久经生活磨练之后，可以变得更有韧性，既不放弃原则和目标，又能根据环境和条件，能进能退，能屈能伸。这就是许多成就大事业的人所具有的刚柔相济的性格。

古人把“绵里藏针”作为处世的要诀。绵里藏针有两种情况：一种是内心狠毒的人装出和善的面貌，以达到害人利己的目的，这种行径是世人所不齿的；还有一种情况就是寓刚于柔，柔中有刚。待人接物，既有原则性、斗争性，又有宽容亲和的态度。讲原则性、斗争性，不是锋芒毕露，盛气凌人，讲宽容亲和，不是口是心非，表里不一。这样的绵里藏针，既能坚持原则和宗旨，实现行动的目标，又能协调人际关系，团结大多数，在今天，仍然是一种明智的处世方法。

大智若愚也是一种自我保护的处世策略。古代的一些政治家，当自己处于劣势、面临被别人吞并消灭的危险时，常常施行“韬晦之计”。韬即韬光，晦为晦迹。韬晦之计就是收敛锋芒，把自己的志向、才能、行迹隐藏起来，以免遭受别人的注意和攻击。

《三国演义》中写了刘备施行韬晦之计的故事：刘备志在天下，但实力不足，被吕布夺去徐州和小沛，连栖身之地都没有，只好到许昌授奔曹操。其时曹操挟天子以令诸侯，权倾朝野。刘备虽然受到汉献帝的倚重，被封为左将军，但怕曹操猜忌谋害，于是韬光养晦，在后园种菜。一天，曹操约刘备饮酒，谈论谁是当今的英雄。刘备说了当时的群雄袁术、袁绍、刘表、孙策、刘璋、张绣、张鲁、韩遂等人。曹操认为这些人算不得英雄，然后“以手指玄德，复自指曰：‘今天下英雄，惟使君与操耳。’”刘备听后大吃一惊，手中的匙箸不觉落到地下。当时正好有雷声，刘备才趁机掩饰过去。

刘备在“煮酒论英雄”的过程中，始终是收敛锋芒，藏而不露，列举许多人为英雄，不把自己算入英雄之列。在当时的情况下，他采取这种态度是比较明智的。曹操虽然看出刘备有“包藏宇宙之心，吞吐天下之志”，但刘备的现实表现令他比较放心，不会对他构成威胁。这样，刘备才得以乘机逃出曹操设置的笼网，演出后来“三国鼎立”的故事，如果刘备当时自吹自擂，锋芒毕露，结局可能是另外的样子了。

在“煮酒论英雄”的开头，曹操说了关于龙的变化的一段话：“龙能大能小，能升能隐；大则兴云吐雾，小则隐介藏形；升则飞腾于宇宙之间，隐则潜伏于波涛之内。方今春深，龙乘时变化，犹人得志而纵横四海。龙之为物，可比世之英雄。”这段话可以作韬光善晦、待时而动的注解。

韬光养晦，不仅适用于天下的政治人物，对我们一般人立身处世也是有启发的。肖统《靖节先生集序》中说：“圣人韬光，贤人遁世。”圣人和贤

人把自己的名声和才能隐藏起来，不到处炫耀自己。老子说：“邦之利器，不可以示人。”（《老子》第三十六章）国家锐利的武器不可以随便向人炫耀；同样的道理，个人的才能本领也不可以随便向人炫耀。

自吹自擂，到处炫耀自己的本领和才华，至少会产生两种不良效果。一种不良效果是引起别人的反感，因为谁都不愿意和自吹自擂的人打交道。另一种不良效果是引起别人的猜忌。妒贤嫉能的心理仍然普遍存在，为了免遭别人嫉妒和打击，收敛锋芒，掩藏才能，有时是明智的选择。另外，在和对手竞争的过程中，到处夸夸其谈，自我吹嘘，容易暴露自己的实力和意图，这样就会被对手利用而遭受失败。

中国人还有“难得糊涂”的处世方法。这也是从大智若愚衍化而来的。按常理说，应该是糊涂容易聪明难。一个人要经过长期的学习思考，才能变得聪明起来，只求浑浑噩噩、糊里糊涂地过日子，是不必花费什么工夫的。为什么又说难得糊涂呢？因为这里说的糊涂不是真糊涂，而是本来清醒而要装作糊涂，或者小处糊涂，大处不糊涂。这样的“糊涂”的确难得。

“难得糊涂”所提倡的是对外界事物包容并蓄、不为苛察的态度。世界上一切互相对立的事物都是可以互相转化的。各种事物的是非、好坏、善恶的标准也是可以变化的。在一定条件下，好事可以变成坏事，坏事也可以变成好事。我们不必苛察严究事物的好坏是非，不妨以圆通灵活的态度对待之，使之向有利的方面转化。如果不是原则性的问题，用这种态度处理是比较明智的。

还有一些事情很难分清是非，或者不值得花时间和精力去分清是非。对这样的问题采取“难得糊涂”的态度也是比较明智的。例如同事之间的个人恩怨和纠纷，当领导的不必一一评判是非曲直，而应该搁置一边，把大家的注意力吸引到工作、事业上来。

家庭、邻里间的纠纷也不要过分重视，提倡互相宽容谅解，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增广贤文》说：“不痴不聋，不作阿姑阿翁。”当公婆的，对儿媳之间、婆媳之间、妯娌之间的矛盾，都宜装聋作哑，不必事事计较，事事表态，更不要卷人矛盾的漩涡，使矛盾复杂化。

古人说“勿没没而闇，勿察察而明”（《旧唐书·张蕴古传》）；“聪明流通者戒于太察，寡闻少见者戒于壅蔽。”（《资治通鉴·汉纪》）一个人不能孤陋寡闻、庸庸碌碌、糊里糊涂地过日子，也不能大事小事都苛察严究。察察为明的人往往对人苛刻求全，造成人际关系紧张；同时因为注意力花费在小事上，容易忘了大事，忘了全局。这种人自以为精明，其实是小事精明，大事糊涂。

我们提倡相反的态度，即大事精明，小事糊涂。判断是非善恶的标准不是从个人利益出发，而是从工作、事业的大局出发。凡是无关大局的问题，都可以采取“难得糊涂”的态度。

少戒躁情

在人生的不同阶段，有需要特别注意对待处理的问题。青年时期需要注意什么问题呢？诸葛亮的《诫子书》提出了可供参考的意见。信中是这样说的：

“夫君子之行，静以修身，俭以养德，非澹泊无以明志，非宁静无以致远。夫学须静也，才须学也，非学无以广才，非志无以成学。淫漫则不能励精，险躁则不能治性。年与时弛，意与日去，遂成枯落，多不接世，悲守穷庐，将复何及！”（《诸葛亮集》）

信中谈的问题都是从青年的特点出发的，其中关于防止浮躁和散漫怠惰的意见，更是具有很强的针对性。

青年人血气方刚，精力充沛，意气风发；但其弱点是容易浮躁、急躁、暴躁。心情浮躁，就会盲目追逐流行的时尚和思潮，不能沉下心来对事物作深入的研究和理性的思考，思想情绪也容易波动起伏，缺乏坚定性和持久性。性情急躁，处理问题就容易轻率鲁莽，不能全面分析情况，权衡得失，不知掌握分寸，讲究策略和方法，常常对问题作出错误的判断和处理。脾气暴躁，就会感情冲动，丧失理智，以致激化矛盾，造成紧张、对立的人际关系。如何克服这些弱点，诸葛亮说的“宁静以致远”是一副对症的药方。

保持宁静的心境，人的思虑才能达到深远的境界。洪应明《菜根谭》中有关“宁静致远”的话可供我们品味：

“时当喧杂，则平日所记忆者，皆漫然忘去；境在清宁，则夙昔所遗忘者，又恍尔现前。可见静躁稍分，昏明顿异。”

“夜深人静，独坐观心，始知妄穷而真独露，每于此中得大机趣；既觉真现而妄难逃，又于此中得大惭愧。”

“静中念虑澄澈，见心之真体。闲中气象从容，识心之真机。淡中意趣冲夷，得心之真味。观心证道，无如此三者。”

用我们的生活经验去验证，洪应明的话有一定的道理。环境与心境对人的思维活动有很大的影响。在安静的环境和宁静的心境中，人的思维能力能够充分发挥，记忆情晰，感受细腻，思维敏捷而深刻。在嘈杂的环境和浮躁的心境中，人的思维能力就会大受影响。不仅思维迟钝，连平时很熟悉的东西也会忘得一干二净。可见只要心境的宁静与浮躁稍有区别，心灵的昏昧和清明就会迥然不同。

以静识物，以静观心，是认识真理和自我修养的好办法。在宁静中人们的心绪清明澄彻，才能透过表象和假象，把握事物的本质和广阔深远的时空。在环境嘈杂，心情浮躁时，人的思想不集中，常为事物的表象和假象所蒙蔽，无法了解事物的真相。当一个人被复杂的问题困扰时，会说：“让我静下心来好好想一想。”创作的灵感，对事物的真知灼见，都是在掌握大量素材、积累丰富的经验之后，再加以冷静深入的思考才得来的。

宁静的环境和心境，对正确认识自己，加强自我修养，也是很重要的。环境嘈杂，心情浮躁，人的思想受各种狂妄念头的影响，对自己的认识常常是主观的、片面的，只看到是，看不到非，只看到成绩，看不到缺点。如果夜深人静，独坐观心，客观冷静地反省自己，平时的错误念头就会一扫而光，客观真实的本性就会自然而然地萌发和呈现出来。一旦真情萌生，良心发现，就会对平时的妄念妄行感到愧悔。这就是洪应明说的“静中观心，真妄立现”

的道理。

佛家道家认为宁静淡泊，是观心证道的好办法。儒家也强调“静”对修身明道的重要作用。《大学》中说：“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静，静而后能安，安而后能虑，虑而后能得。”只有做到“静”和“安”，才能思虑周详，达到学习修养的目标。

吕坤对“静”作过如下解释：“沉静非缄默之谓也。意渊涵而态闲正，此谓真沉静。”（《呻吟语》）吕坤认为：是不是沉静，要看内心，不能看表面。沉静是指思虑深沉，意态安详端庄。如果心绪安定，一天到晚说话，也不影响他的沉静；如果心情浮躁，一天到晚不说话，也不能算沉静。

吕坤根据自己切身体会，强调待人处事要心平气和，不能急躁动人。爱动火的人都是心胸狭窄、修养不厚的人。不管遇到怎样紧急复杂的事情，只要不急躁动火，就会“神有余而不劳，事从容而就理”；只要急躁动火，一切努力都会白废了。这的确是经验之谈。他还提出：“宁耐是思事第一法；安详是处事第一法；谦退是保身第一法；涵容是处人第一法；置富贵贫贱死生常变于度外，是养心第一法。”思考和处理事情，要宁静耐心，从容自如。要做到这一点，就要加强自己的修养，谦虚退让，涵蓄包容，把富贵、贫贱、生死等等置之度外。有了这样的修养，自然能遇事冷静，处世从容，而不致浮躁不安、喜怒无常了。

在当今社会中，我们自然不能像古人那样，退隐到山林。去观心证道，修身养性。但在快节奏的生活中，在繁忙的工作中，仍然要记住“宁静致远”的古训。要摆脱日常事务，尽可能多抽出一些时间，冷静地回顾做过的工作，总结工作中的经验教训，想一想工作中带有全局性、关键性的问题。也不妨在夜深人静、万籁俱寂之际，对自己的思想言行进行剖析反省。这时你也许会觉今是而昨非，从而心胸豁然开朗，摆脱种种烦恼，或者会悟出人生的真谛，攀登上人生道路的新高峰。经常静思反省，就可以逐步克服浮躁、急躁、暴躁等弱点，而能冷静对事，从容处世。

青年人除了宁静戒躁以外，还要勤奋戒怠。从某种意义上说，勤奋戒怠，对青年人的一生有更加重要的意义。

青年时期是人生的春天，是人生的播种期，是人生一切光明和幸福的开端。

许多农作物都在春天播种，秋天收割。春天是这些植物的生长季节，错过了生长季节，再播种、灌溉、施肥，秋天也不会有好收成。青年时期是人类的生长季节。一个人从呱呱坠地开始，智力、体力就迅速生长发育，并通过教育培养获得知识和技能。许多知识技能要在青少年时打下坚实的基础。错过青少年时期的学习时机，到壮年老年时期再学，效果就会大大降低，很难取得突出的成就。这和农作物错过生长季节很难有好收成，是同样的道理。

青年时期是美好的，青年时期又是容易流逝、一去不复返的。诗人们常常发出青春易逝、老大伤悲的感叹：

“百川东到海，何时复西归。

少壮不努力，老大徒伤悲。”（汉乐府）

“盛年不重来，一日难再晨。

及时当努力，岁月不待人。”（陶渊明）

“少年易学老难成，一寸光阴不可轻。

未觉池塘春草梦，阶前梧叶已秋声。”（朱熹）

这种人生感悟，都是在青春已逝、进入中年时期以后才能有的。他们已不能重度青春年华，但他们的体会可以作为。今天或未来青年的人生宝训。

人生的幸福固然和客观环境、先天秉赋有关，但客观环境和先天秉赋，要通过后天的培养、主观的努力才能发生作用。在同样的环境中，先天秉赋差不多的人，因为主观努力不同，因为所受的教育不同，才能和成就会有很大的差别。王安石写的《伤仲永》，讲了一个神童因为不学习而变为普通人的故事。文章开头写道：

“金溪民方仲永，世隶耕。仲永生五年，未尝识书具，忽啼求之。父异焉。借傍近与之，即书诗四句，并自为其名。其诗以养父母、收族为意，传一乡秀才观之。自是指物作诗立就，其文理皆有可观者。邑人奇之，稍稍宾客其父，或以钱乞之。父利其然也，日扳仲永环谒于邑人，不使学。”

仲永五岁能诗，而且文理可观，可算是智力超常的儿童。但是他的父亲不让他学习，天大领着他到处拜谒邑人，通过作诗获取钱财。结果，他的智力非但不能发展，而且每况愈下。仲永十二三岁时，王安石在舅舅家见到他，让他作诗，诗的水平已不如原先传说的那样高。又过七年，即仲永成年以后，王安石又到舅舅家打听他的情况，这时的仲永已经“泯然众人矣”。

一个智力非凡的儿童，因为不学习，结果泯然成为凡人。这使王安石非常惋惜。文章最后说：“彼其受之天也，如此其贤也；不受之人，且为众人。今夫不受之天，固众人；又不受之人，得为众人而已耶？”说明天赋不可恃，后天的学习才是重要的。只靠天赋的才能，不努力学习，最后天赋的才能也会泯灭，只能成为平凡的众人；如果既无天赋的才能，又不努力学习，恐怕连成为平凡的众人也不可能了。沈德潜认为：“《伤仲永》，不独为仲永也。聪明子弟，宜悬为座右箴铭。”一个人不论智力水平如何，都要珍惜青春，惜取少年，不可磋陀岁月，虚度年华；否则就会“红颜矢志，空贻白首之悲了。”

青年时期是人生的奠基时期。基础扎实，才能根深叶茂，前程似锦。首先要在思想品德方面打下良好的基础，包括树立远大的理想，培养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道德观，继承、发扬优良的革命传统作风。只有这样，才能在人生的旅途中，把握正确方向，战胜艰难险阻，奔向光明幸福的未来。其次，要尽可能掌握比较广博的科学文化知识，同时根据社会需要和自己的兴趣特长，掌握一种或几种专门的知识技能，做到学有专长。凡是文化素养高、学有专长的人都是社会所需要的，可以在不同的岗位上作出不平凡的成绩。

学习的途径和方法是多样的，不限于向书本学习，还要在实践中学习，在生活中学习。处处留心皆学问，人情练达即文章。人情世故，风土人情，社会风习，都是要从生活中才能了解到的。如何分析解决问题，如何处理上下左右的人际关系，也不能从书本中找到现成的答案，还要在实践中积累经验，增长才干。“操千曲而后知音，观千剑而后识器”，说的就是这个道理。

当今社会对人的素质提出了更高要求。一个人只有在青少年时期勤奋学习，全面提高自己的素质，才能适应时代的要求；如果懒散懈怠，虚度岁月，就会被时代淘汰，这是每一个青少年应该经常警惕的。

老宜忘情

青年人处于生命的生长发育时期，故需奋发上进，事事用意；老年人处于生命的衰败枯老时期，故需豁达超脱，事事忘情。

历史上不乏老有所为、大器晚成的事例。从事某些职业的人，如政治家、学者、作家、画家等，老年时期还可能是继续工作、创造的黄金岁月。不过从总的趋势说，从大多数人说，人到老年，体力和创造力逐渐减退，要想再和少壮时那样拼搏冲杀，就会力不从心，事与愿违。

从社会发展历史看，新旧交替，新陈代谢，是不可抗拒的历史规律。老年人要从现在的岗位上引退，由青年人接班。这样，人到老年，不仅有生理上的衰老，还有社会角色的变化；要根据新的社会角色，过一种新的生活。老年人要以豁达洒脱，泰然超然的态度，正确对待进入老年期后发生的种种变化。

以明智的态度对待进退出处：

古人讲进退出处，是指做官还是退隐的问题，处理的原则是从道义、政治方面考虑的。薛文清说：“进将有为，退将自修。君子出处，惟此二事。”这和“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的原则是一致的。“进”是为了兼善天下，并非自己有所求。还有一些人从全身远祸考虑，功成名就之后，飘然远引。如范蠡帮助越王勾践称霸之后，辞官不做，驾一叶扁舟游于太湖之上。鲁仲连帮赵国退秦兵之后，谢绝了上爵之封。张良帮刘邦夺取天下之后，便飘然离去，从赤松子游。这些人不贪恋功名利禄，急流勇退，受到后人的称赞。

我们这里说的进退出处，和古人说的不同。古人说的进退出处是个人的选择，我们说的进退出处是社会发展的趋势，是制度的规定，不以个人意志为转移。到了规定的年龄，领导人要从领导岗位上退下来，干部要从工作岗位上退下来，工人要从劳动岗位上退下来。这种进退的变化是人生的大转折，必然会造成心理上的影响和冲击。领导者失去往日指挥命令的权力，会产生失落感。一般职工离开工作岗位，也会感到心中空荡，无所依托。离开工作岗位，社会联系也随之减少，生活在狭小的天地里，又会产生与世隔绝的孤独感。

老年人对上面说的的问题应该有充分的思想准备，自觉地进行心理调节。既然新旧交替是历史发展的规律。老年人就应该以明智的态度主动让贤，把自己的事业传给青年人。青年超过老年，后人超过前人，也是历史发展的规律。老年人应该有宽阔的胸怀，帮助青年人超过自己，后来居上；不要和青年争高低，比短长，更不要以自己的威望、名声去压制青年。李商隐酬韩偓诗云：“十岁裁诗走马成，冷灰残烛动离情。桐花万里丹山路，雏凤清于老凤声。”李商隐为诗才俊拔的韩偓青出于蓝而感到由衷的喜悦，写出了“雏凤清于老凤声”的名句，表现了贤达长者明智开阔的胸怀。

古人漠视功名富贵，淡泊处世的态度，对克服老年人的失落感是有帮助的。欲望太多，俗情太重，失落感也就逾重。孔子说：君子有三戒，“及其老也，血气既衰，戒之在得。”（《论语·季氏》）老年人不能贪得，贪得心太甚，就会事事计较，自寻烦恼。

老年人还要安分，安于扮演新的社会角色。例如，领导者退下来以后，已经从官到民，就要安于当民，不要仍然以领导者自居，要求享有过去的权

力、威信和待遇。吕坤在《呻吟语》中说：“一贵达还家，门户不如做官时，悄然不乐。曰：‘世态炎凉如此，人何以堪！’”这位达官贵人不为官以后，门庭冷落，便埋怨世态，难以忍受。吕坤认为：是他自己炎凉，不能光怪世态。因为他留恋富贵，一旦过普通人的生活便忍受不了。现在有些人不当官以后，有人情冷暖，人走茶凉的感叹，这也是因为不能甘于当民、过普通人生活的缘故。

按照适度的原则开辟新的生活领域：

老年时期是人生的一个阶段，人的自然衰老也有一个过程。从一般情况看，老年人并不是完全丧失工作、劳动能力，可以根据主客观条件，从事适当的活动，以发挥余热，实现人生新的意义和价值。

老年人的活动是自主选择的，有较大的自由度。可以根据自己的兴趣爱好，做些力所能及的事情。例如：静下心来认真读点书，审视自己走过的人生道路，这样会获得新的人生感悟和乐趣。如果在某方面有创造才能和欲望，过去由于职业分工未能实现的话，在老年时期可以发挥自己的才能，实现创造的欲望。还可以参加文化体育活动和社会公益活动。参加这些活动，一方面有利于身心健康，延缓衰老过程，另一方面可以保持和社会的联系，丰富生活内容，增加生活乐趣。老年人只有开辟新的活动领域，确立新的生活目标，才能情有所钟，情有所寄，使人生获得意义和价值。无目标、无内容的老年生活是没有意义的，乏味的，甚至是令人痛苦的。

老年人的活动以适度为原则。想事情，订计划要量力而行，不要有过高的要求和不切实际的幻想。老年人来日苦短，去日苦多，时间是非常宝贵的，因此要立足现在，立即行动。想一件，做一件；做一件，成一件。不可一切等待明日，也不可把有限的时间和精力，花在冒险性大的事业上。

适度原则还包括生活节奏的安排。不能无所事事，空虚度日，也不能过度紧张，疲于奔命。对于学习、工作、锻炼、休息、睡眠等，要全面考虑，作出合理的安排，以保持有规律的、平和适度的生活节奏。

以乐观精神保持身心健康：

身心健康是安度晚年的基本条件。一个疾病缠身的人，既不能为社会贡献余热，也没有个人的幸福和生活乐趣。健康第一，是老年人考虑和处理问题的基本原则。

医学专家认为：身心健康的老人应该符合下面一些条件：没有严重疾病，保持良好的思维能力，情绪正常，行动自如，生活能基本自理。保持身体健康，主要靠社会的医疗保健条件和个人平时注意防治，另外，加强体育锻炼也有重要意义。保持心理健康，主要靠个人的修养和努力。

乐观者长寿。情绪、心境对生理健康有重要影响。老年人宜心胸开阔，不为世事俗情而烦恼。所谓心胸开阔，就是从大处想，从远处想。从大处想，多想国家、民族、人民的大事，不为个人得失而烦恼。从远处想，就是超越现实看到事物的发展变化，不为眼前一时一事而烦恼。

老年人有丰富的人生阅历，看问题应该比青年人明智通达。青年人容易偏激，老年人应该平和从容。青年人争强好胜，老年人应该淡泊名利，为而不争。如能这样，就可以减少许多烦恼，增添生活的乐趣。

老年人要处理好和青年人的关系，沟通思想，消除“代沟”。对青年人要多放手，少操心。人类文明是由一代一代人接力创造出来的。每代人只能完成自己应该完成的任务，未来的事业要留给下一代人去做。老年人未了的

心愿也只能由下一代人去实现，不要奢望所有的事都由自己亲手办完。此所谓“天下事了犹未了，不妨以不了了之。”

对家务事也不妨采取这种态度。在适当的时候，把主持家政的任务交给后辈负责，做一个开明让贤的家长。不要包办子女儿孙的婚姻、工作问题，不要按自己的思路规划他们的前程。“儿孙自有儿孙福，不给儿孙作马牛。”放下这些俗务，做自己感兴趣的事，不仅可以减少烦恼，还可以减少家庭矛盾，建立民主和睦的新型家庭关系。

以安详的心境跨越生死之门：

人的生命有起点，有终点。古人寻求长生不老之术，都成泡影，最后惟也难逃生死大限。

近代科学证明，人的自然寿命有一个极限。按照不同的测算方法，这个极限为 110 岁至 145 岁，在实际生活中，有一位匈牙利农民活了 196 岁，超过了极限的最高数。在中国，超过百岁的老人不是个别的。随着社会的进步，生活条件和工作、医疗条件的改善，人的平均寿命正在延长。尽管这样，人到老年，总有一天会由于衰老而走向生命的终点。我们应该以怎样的态度面对死亡呢？

死亡是自然的规律。承认这个规律是唯物主义者应有的态度。有生有死，才构成生生不，良的生命洪流。如果只有生，没有死，地球上会人满为患，导致整个人类的毁灭。如果我们活着的时候，曾发出过热和光，对人类社会作出过贡献，那么，我们已经实现了人生的价值，可以无悔无愧，以平静的心情面对死亡。当死神招手的时候，我们不必拒绝，也不必恐惧，把死亡当作生命的自然归宿。

宋代有两位禅师在生死之际曾写下遗偈。一份遗偈是宏智正觉写的：

梦幻空花，六十七年。白鸟烟没，秋水天连。

另一份遗偈是妙峰之善写的：

来也如是，去也如是。来去一如，清风万里。

宏智视死亡为生命的完成，如同白鸟飞离尘世，烟没于辽阔的虚空。妙峰视生死如一，如万里清风，来去无碍。佛家认为“色不异空，空不异色；色即是空，空即是色”，故能以清明自在的态度告别人世。我们则视死亡为自然的规律，人从自然来，复归自然去，生亦自在，死亦安然。正如泰戈尔所说：“愿生时丽如夏花，死时美如秋叶。”曾经放出光华的生命，死亡也是圆满自在，没有惋惜和遗憾的。中国人视老人，善终为白喜事，表现了这种通达的人生态度。

不过，老年人也不能消极地等待死亡。就绝大多数人说，多死于饥寒疾病和恶劣的环境，远未达到人类自然生命的极限，老年人器官组织衰变，抵抗力减退，增加了因疾病而死亡的可能性。许多在少壮时种下的病根，到老年时会暴发出来。如果注意锻炼，注意防治，并保持乐观的态度，就可以减少疾病，延缓衰老的过程。因此，老年人对死亡宜采取不迎不拒的态度。“存心时时可死，做事步步求生。”按照目前的条件，人到了七十八十，的确时时可死，死亦正常，要有这种思想准备。但在行动上要步步求生，做到思想乐观，活动适度，不断改善生活环境和医疗条件，以达到防治疾病、延缓衰老、延长寿命的目的。

古人说：人生七十古来稀。现在不少国家的人平均寿命已经超过七十，人生八十、九十也不稀奇了。随着社会的发展和科学的进步，实现人生百年

愿望的人也会越来越多。我们应该以乐观的态度开辟老年生活的新天地，发现老年生活的意义和乐趣，使老年时期成为人生丰实充盈的金秋季节。

奋斗人生

如何修己、待人、处世，都受人生态度的制约和指导。人生态度是人生目的、人生价值的具体化。对人生真谛的理解不同，就会有不同的人生态度。有人积极奋进，有人悲观厌世；有人开拓进取，有人苟且偷生；有人庄严战斗，有人游戏人生；有人利世济民，有人自私自利；有人追求享乐，有人崇尚奉献；如此等等。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以积极进取的人生态度为主导，把人生视为积极向上、不断进取、达于至善境界的过程，这种人生态度表现于建功立业、济世利民的社会行为中，也表现于个人的品德修养中。一个人不论是富贵还是贫贱，不论是身处顺境还是身处逆境，都要积极奋进，有所作为。有所作为，便是人生的真谛。

人生态度是人们在人生实践活动中对人生目的、人生价值的认知和实践。正确的人生态度，便是对人生目的、人生价值的正确认识和积极实践。人不应该只是活着，还应该理想、有追求；没有理想和追求，人的生存和动物的生存便没有区别，人不能只是享受，没有创造。没有创造，社会不能进步，人生的价值也不能体现出来。因此，我们摒弃自暴自弃、悲观厌世的人生态度，这种人生态度使人销磨斗志，虚度年华；我们反对随波逐流，苟且偷生的人生态度，这种人生态度使人丧失自我，丧失人生目标和创造力；我们也反对玩世不恭、游戏人生的人生态度，这种人生态度貌似狂狷孤傲，实为醉生梦死。

人要有一点精神。也就是古人说的“人之精神不可无所寄。”（申涵煜《省心短语》）这里说的精神可以理解为人的理想、追求以及为实现理想、追求所采取的行动。这样，人才能发挥自己的创造力，过一种有意义、有价值的生活。

许多外国思想家也对人生持这种态度。古罗马艾匹克蒂塔说：“每个人的一生都是战役——多事多难的战役。”既然人生是战役，那么，人生的意义就在不停息地战斗。

别林斯基说：“世界上有两种人，一种人虚度年华，另一种人过着有意义的生活。在第一种人眼里，生活就是一场睡眠，如果这场睡眠在他看来，是睡在既柔和又温暖的床上，那么他便十分心满意足了；在第二种人眼里，可以说生活就是建立功绩……人就是在完成这个功绩中享受到自己的幸福。”可见人生的意义和幸福在建立功绩的奋斗中，把人生当作睡眠，是醉生梦死，浪费生命。

有人把调侃生活、游戏人生当作一种时髦。而歌德则认为：“谁若游戏人生，他就一事无成。”人生是严肃的，需要严肃对待。人生是宝贵的，需要爱护珍惜。奋斗进取，有所作为，使有限的生命放出光华，这才是我们应取的人生态度。

人生的意义不仅取决于人生态度是积极的还是消极的，还取决于人生目的、人生价值取向是否正确。人为什么活着？应该怎样做人？怎样处理个人和社会、和他人的关系？这些问题处理不正确，态度越积极，效果就越坏。

西方的人生价值观以个人为中心，实现人生价值就是实现个人利益，特别是个人的物质利益。以儒家为代表的中国传统价值观念则追求个人价值与群体价值的统一，重视人的尊严与伦理道德价值。

儒家伦理思想以仁为中心，包括智、勇、孝、悌、忠恕、诚信等美德。《中庸》中说：“仁者人也，亲亲为大。”仁是人的本性和特征。做一个有意义、有价值的人，就要发扬仁的美德，否则便失去人的本性。仁既然是人的本性，仁的道德境界是人人都可达到的。因此孟子说：“人皆可以为尧舜”，荀子也说：“涂之人可以为禹”。尧、舜、禹都是仁德的圣贤。

儒家认为：坚持仁的德性，便是坚持人的尊严和价值，丧失仁的德性，就丧失人的尊严和价值。孔子说：“志士仁人，无求生似害仁，有杀生以成仁。”（《论语·卫灵公》）荀子说：“是故权利不能倾也，群众不能移也，天下不能荡也。生乎由是，死乎由是，夫是之谓德操。”（《荀子·劝学篇》）他们把人的道德操守看得比生命更重要。

儒家不仅强调个人的道德操守，还重视个人对社会的责任。《大学》中提出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就是讲个人对家庭、国家、天下应该负的责任，修身也是完成个人的道德责任。个人的仁的美德，表现在家庭关系上便是孝悌，孝敬父母，尊敬兄长；表现在和他人的关系上便是忠恕，尽心尽力地履行自己的责任，以宽厚之心对待他人，并以礼善待他人。礼和忠也适用于君臣之间，“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个人仁德的修养，通过履行对家庭和社会的责任，才能完成和表现出来，家庭、社会的安宁进步，又要依赖个人的修养和成就。两者相互依存，不可分割。儒家从个人与社会相互关系中研究人生的目的和意义，是相当深刻而有价值的。

青年时代的马克思在他的中学毕业论文中曾谈到自己对人生的认识。他说：“我们在选择职业时所应遵循的主要指针，是人类的幸福和我们的自我完善。不能认为这两神利益会彼此敌对，互相斗争，一方必然要消灭另一方；人类的天性生来就是这样：人们只有为了同时代人的完善，为了他们的幸福而工作，他自己才能达到完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40卷7页）马克思也是从个人和社会相统一的观点出发，来考虑人生的意义与价值的。马克思的上述思想后来发展成为人的全面发展和全人类解放的学说。人的全面发展是人的脑力与体力相结合，人的个性得到充分自由的发展，全人类的解放是消灭一切剥削制度和产生剥削制度的社会根源。

儒家的思想和马克思的思想在内容和性质上有根本的区别。但我们可从两者的类比中看到：儒家重视个人的道德修养和个人对社会的责任的观点，是值得肯定和珍视的。

古人曾探讨人生怎样才能获得永恒的、不朽的意义。《左传·襄公二十四年》有一段对话：“穆叔（豹）如晋，范宣子逆之，问焉，曰：‘古人有言曰，死而不朽，何谓也？’”穆叔豹回答说：“大（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虽久不废，此之谓三不朽。”立德是个人道德修养，立功立言是服务社会，造福人类。人的自然生命是有限的，但如果能立德、立功、立言，就能死而不朽，流芳千古。这和儒家的人生价值观是一致的。一个人如果能在道德和功业，完善自己和服务社会这两个方面达到完善的境界，人的生命便获得了不朽的意义，人的价值也就发挥到了极致。

有一种意见认为：中国传统的人生价值观重群体价值，

否定个人价值，已不适用于现代社会的需要。这种看法是值得商榷的。在任何时代、个人都是社会的一分子，不能离开社会而存在。个人受社会养育，自然应该承担对社会的责任，个人又是人类历史的一部分，应该为后人造福。个人的发展，个人价值的实现，在任何时候都不能脱离为人类幸福

所进行的斗争。

积极进取的人生态度是以服务社会、服务他人为前提的，在服务社会、服务他人的过程中，同时也实现了个人的价值，获得了人生的幸福，世界历史上凡是有作为、有成就的人都是这样认识的，同时也是这样做的。

黑格尔说：“个人的价值在于代表民族精神，参与创造。”

莎士比亚说：“仅仅一个人独善其身，那实在是一种浪费。上天生下我们，是要我们当作火炬，不是照亮自己，而是普照世界；因为我们的德行倘不能推及他人，那就等于没有一样。”

爱因斯坦说：“我每天上百次地提醒自己：我的精神生活和物质生活都依靠别人（包括生者和死者）的劳动，我必须尽力以同样的分量来报偿我所领受了的和至今还在领受着的东西。”

这三位是伟大的思想家、文学家和科学家，是历史上出类拔粹的人物。他们的人生光华四射，业绩辉煌，他们的创造力得到了充分的发挥，他们的人生价值得到了充分的实现，而这一切都是勤奋为他人奉献、为社会服务之后才取得的。人生的意义在此，人生的幸福也在此。

每一代人有每一代人的历史使命和社会责任，因而人生意义、人生价值有鲜明的时代内容和特色。个人要根据时代要求确立人生的目的，选择人生的道路。在民族危急存亡关头，救亡图存是时代要求。在民族贫穷落后的时候，改变贫穷落后面貌是时代要求，每个人都应该适应时代要求，完成时代赋予的历史使命。

今天，我们身处改革开放、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新时代，经济的发展，社会的进步，国家的富强，民族的振兴，是每一位中华儿女的社会责任。我们的人生态度，应该和这种时代要求相适应，体现出鲜明的时代精神。具体来说，就是要有拼搏进取的精神，开拓创新的精神，敬业乐业的精神。

中国体育界第一位世界冠军容国团说：“人生能有几回搏”。他靠拼搏登上了世界冠军的宝座。我国是发展中国家，经济和科学文化的许多领域还处在落后的地位。我们需要有无数敢于拼搏的勇士，改变落后的地位，跻身世界的先进行列。如果总是害怕困难，安于现状，那就会永远处于落后的状态。

改革意味着走前人没有走过的道路，唯有不囿于陈规，大胆开拓创新，才能取得成功。开放意味着各国经济文化的交流与竞争，这是发展的机遇，也是严重的挑战。只有开拓创新才能生存发展，如果因循守旧，墨守成规，就会在竞争中被淘汰。

合而言之，拼搏进取，开拓创新，是我们的人生价值观应该具备的新内容。只有把传统人生价值观的精华和这种新的时代内容结合起来，才是适合时代要求的积极奋进的人生态度。

每个人是社会的一分子，每个人做的工作是振兴民族这个伟大事业的一部分。拼搏进取，开拓创新，不能停留在口头上，而要落实到自己从事的工作中。也就是说，要有敬业乐业的精神。敬业者，专心致志地做好自己的工作；乐业者，热爱自己的工作，把全副的热情和精力倾注在自己的工作上。只有敬业乐业，才会去拼搏进取，开拓创新。敬业乐业是职业道德的要求，是个人履行社会职责、为他人服务的实际行动。人生的意义和价值，只有在这种实际行动中才能自然而真实地表现出来。

豁达人生

人生需要奋斗进取，也需要豁达超脱。

儒家倡导积极人世的精神，同时又根据人生的不同境遇，提出不同的处世态度。孔子说：“贤者辟世，其次辟地”（《论语·宪问》），“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论语·泰伯》），孟子说：“古之人，得志，泽加于民；不得志，修身见于世。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孟子·尽心上》）一个人能否建功立业，有所作为，要看时间、地点、条件。如果环境不顺利，条件不具备，孔孟主张走避世、独善其身的道路。

道家创始人老子虽然倡导自然无为，贵柔主静，但并非冷漠社会，忘情人世。他以慈为宝，对后世充满爱心，从人生的现实出发，给人们提出处世的原则和策略。他的无为而治的政治主张，也是为了“我无为，而民自富”，使之各安其业。

佛家主张万物随缘，一切皆空，同时也不忘“普渡众生”的任务。

可见积极人世与超脱出世并不是绝然对立，而是可以互相补充的。中唐以后，禅宗兴盛。中国的士大夫们一方面奉行儒家人世经世的精神，以治国平天下为己任，另一方面又依靠禅学“持其善心”，“夺其浮想”，获得心理上的宁静和平衡。这样，便把人世和出世沟通联系起来，形成了一种既积极进取、又豁达超脱的处世态度。一方面坚持经世济民的理想，完成对社会的责任，不悲观厌世，浪费生命，同时又淡泊自守，对人生的荣辱得失采取超然自适的态度。有的学者认为：这种处世态度是以出世的精神做人世的事业，其实际运用则为得失无谓，宠辱不惊，随缘运用，顺应自然。许多知识分子在坎坷的人生旅途中，以此作为精神支柱，始终对人生保持旷达乐观的态度。

苏轼可算这方面的代表性人物。他有经世济时、仁政爱民的执着追求，又有超然物外、与世无争的旷达情怀。他的仕途坎坷，在以王安石和司马光为代表的两党斗争中备受打击。元丰二年（1079年），他因作诗讽刺新政，被捕入狱，几至于死，后被贬为黄州团练副使。1094年，他又被贬至惠州（广东惠阳）和琼州（海南儋耳）。尽管人生道路坎坷不幸，他始终保持旷达乐观的精神，表现出对生活的热爱，对人生的追求，办了许多利国利民的好事，并在文学领域取得多方面的杰出成就。他旷达乐观的人生态度，也真实生动地反映在他的作品中。

他被贬黄州途中，写了《梅花二首》，其中有句云：“幸有清溪之百曲，不辞相送到黄州。”

他被贬惠州时，写了名篇《食荔枝》：“罗浮山下四时春，卢桔杨梅次第新。日啖荔枝三百颗，不辞长作岭南人。”

后来再贬至琼州，又写了《六月二十日夜渡海》，高唱“九死南荒吾不恨，兹游奇绝冠平生。”

从京城贬至地方和边远地区，在一班人看来自然是人生中的重大打击。苏轼却能泰然处之，并从山水风物中获得生活的信心和乐趣，其旷达豪迈的胸怀可见一般。

苏轼的一些写日常生活的作品中反映了他豁达乐观的人生态度。《定风波》就是一例：

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

任平生。料峭春风吹酒醒，微冷，山头斜照却相迎。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

这首词通过途中遇雨的日常生活事，写作者的人生感悟。遇到自然界的风雨，可以吟啸徐行，泰然处之，只要有洒脱的心境，便会“也无风雨也无晴”。对于人生的风雨也不妨以这种态度对待。只要保持超脱豪迈的情怀，便可在人生浮沉的劫难中怡然自得、“一蓑烟雨任平生”了。

以豁达态度对待人生逆境，是一种有广泛实用价值的处世智慧。和自然界一样，人生总会有风雨，有坎坷，有挫折。只有具备“一蓑烟雨任平生”的豁达胸襟，才能任人生风雨穿林打叶，仍然吟啸徐行，对人生保持热爱和信心。怎样才能保持豁达超脱的胸襟呢？

禅师们提出“化烦恼为菩提”的自我解脱方法。菩提者，豁然开悟的智慧和途径。禅学认为：人的烦恼起源于人的理性和强求。有了理性，才有追忆往昔的愁绪和展望未来的恐惧。有了强求，才使人忙碌奔波，烦恼丛生。如果人能保持平常心，自然心，丰厚心，不为物欲、环境所制约，以平静自然的态度对待人生，就会豁然开朗，清宁自在，一切烦恼也就消失了。无门禅师有诗云：“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若无闲事心头挂，便是人间好时节。”心头如果没有物欲俗情的牵挂，不论在何时何地，都可以治然自得，何来烦恼！

禅师们的看法和儒家思想有相通之处。信奉儒家思想的知识分子也主张恬淡自守，不追逐声色名利。不过两者的出发点不同，禅师们是为了精神解脱而归于虚空的世界；儒家的出发点是为了淡泊明志，避免因追逐物欲私利丧失经世济民的志向和气节。因此，能否保持豁达乐观的精神，同人们的理想情操有密切关系。一个人志存高远，以国家民族利益为重，关心他人和大众的幸福、自然不会为个人的得失而烦恼。范仲淹的《岳阳楼记》对此有深刻的阐发。文中写道：

“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是进亦忧，退亦忧。然则何时而乐耶？其必曰：‘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乎？’”

人们的心境不能像禅师们所说的那样，无理性，无感情，无欲念，如古井止水，没有一点波澜；否则如同槁树死木，全无生气，人生的意义又何在呢！因此，志行高洁、襟怀豁达的人并不是没有忧乐。不过，他们是以天下的忧乐为忧乐，以人民的忧乐为忧乐，不因个人的得失而忧乐。他们视富贵如浮云，又有造福社会、平治天下的大志，身居高官要职的时候，关心人民的疾苦，不与官场的腐败作风同流合污；退处山村当老百姓的时候，仍然以天下为己任，关心朝政得失，不忘苍生社稷。一个人如有这样的胸襟，那么不论在什么情况下，都可以保持积极乐观的处世态度，建立造福社会的功业。

洪应明的《菜根谭》中也有一段话讲解脱烦恼、保持豁达的问题：“释氏随缘，吾儒素位，四字是渡海的浮囊。盖世路茫茫，一念求全则万绪纷起，随遇而安则无人不得矣。”

佛家认为，一切事物因缘生，因缘灭，人应该随缘运任，随遇而安。儒家主张君子安守本位，照本分去做，不要贪恋分外的东西。两者都主张人们随遇而安。不过佛家说的缘是天定的因缘或缘分，有浓厚的唯心主义色彩。我们撇开这些不谈，着重分析这种处世态度的合理因素和实用价值。

安于现状，随遇而安的人，可以保持平静的心境，减少烦恼。不过这种

处世态度容易使人消极保守，无所作为，从总体上说，是不可取的。人们不能安于现状，而要改变现状，使社会和人生逐步达到完善、合理的境界。

改变现状，要立足于人们所处的现实环境。这种现实环境是既定的，人们不能自由选择。既定的现实环境是人们活动的立足点，是人们达到理想境界的桥梁。脱离现实的环境和条件，理想境界就成了虚无缥缈的幻影。

有人有理想，有追求，但埋怨环境落后，埋怨社会风气不好，埋怨现有工作岗位不能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因而愤世嫉俗，牢骚满腹。这样的人至多只能成为一介孤傲猖狂之士，不能成为匡救时弊、改造社会的勇士。

有人沉溺在过去的日子里，或者追忆过去，怀念过去，总认为世风日下，今不如昔；或者为过去而懊悔和愧疚。这样的人背上过去的沉重包袱，无法昂首前行。

有人幻想未来，或者为未来的美梦而陶醉，或者为未来的风险而恐惧。这样的人不能把握现在，也就失去未来，只能在空幻的梦境里或无端的愁绪中白白浪费光阴。

我们一方面要坚持前进的目标和未来的理想，另一方面又要立足于现实，从足下起步，从现在做起，这样，我们会活得充实自在，不如人意的现实会逐步改变，各种无名的烦恼也会随之减少或消失。从这种角度考虑问题，“当下即是”，“随遇而安”不失为一种明智的处世态度。我们生长在中国的土地上，就要立足在中国的大地上干改天换地的事业，不要总是羡慕外国的月亮比中国的月亮圆。我们生长在落后的地区，就要在落后的地区改天换地，不要总想往大城市和沿海地区跑。我们现在当工人，当职员，就要在工人、职员的岗位上认真工作，努力做出出类拔萃的成绩；如果连现在的小事都做不好，想做大事的愿望岂不是要落空。庸庸碌碌、安于现状是不好的，但是，总存着非分的妄想，不安于现实的环境和岗位，也只会徒增烦恼，无助于问题的解决。

除上面说的以外，还有一个问题和保持豁达乐观精神也有密切关系。这就是对成败、得失、苦乐等不要太执着，太计较。胜固可喜，败亦欣然。人生价值不全在于结果，还在于为达到成功所进行的奋斗中。有成功的英雄，也有失败的英雄。已竭尽全力拼搏过，即使失败也问心无愧，也会受到人们的尊敬。赛场上有些世界级的运动员，比赛失败后仍然面带微笑，不失大将风度。这就是得不足喜，失不足悲，是一种更高的精神境界。一个人如果得失心过重，就会心胸狭窄，气量狭小，得也烦恼，失也烦恼。

对苦乐也应作如是观。王籍《入若耶溪》中说：“蝉噪林逾静，鸟鸣山更幽”，深得以动见静之玄机。苦乐也和动静一样，看似相反，实则相成。一帆风顺，万事如意，养尊处优，这种日子是乏味的。只有经过奋斗，尝过苦的滋味，才能真正体会到人生的幸福。只有既有成功、又有失败，既有欢乐、又有痛苦的人生，才是完整、幸福的人生。用这种通达的态度看待成败、得失和苦乐，不论在顺境还是逆境中，都能以乐观进取的态度对待人生。

这样看来，奋斗人生与豁达人生是互相统一的，以奋斗进取为主导，以豁达超脱为补充。奋斗进取意味着担负起社会的使命，实现人生的价值；豁达超脱意味着不为俗情所累，不以荣辱为怀，在任何时候都热爱生活、热爱人生。这就是我们从古人遗训中得出的人生艺术和处世智慧。

1994年10月

